

语言 与 文化 论坛 (2022年)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翻译与文学卷

魏小琳 余玲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文化论坛(2022年)
翻译与文学卷

魏小琳 余玲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文化论坛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语言与文化论坛

上架建议：翻译学 | 文学

ISBN 978-7-5178-5250-6



9 787517 852506 >

定价：88.00 元

语言
与
文化
论坛
(2022年)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翻译与文学卷

魏小琳 余玲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2年. 翻译与文学卷 / 魏小琳, 余玲主编.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2. 12

ISBN 978-7-5178-5250-6

I. ①语… II. ①魏… ②余…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36723 号

语言与文化论坛(2022年)翻译与文学卷

YUYAN YU WENHUA LUNTAN (2022 NIAN) FANYI YU WENXUE JUAN

魏小琳 余玲 主编

出品人 鲍观明
策划编辑 沈 娴
责任编辑 孟令远
责任校对 张春琴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53 千
版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250-6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语言与文化论坛》编委会

主 任 叶兴国 费君清(特邀)

主 编 魏小琳 余 玲(执行)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宇 王 宏 王 峰 冉永平 孙玉华
孙绍振 齐沪扬 吴秀明 宋协毅 张 江
陈众议 陈 龙 陈思和 陆经生 陆建德
胡剑锋 修 刚 聂珍钊 贾文健 曹德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宗杰 王永龙 朱文斌 刘家思 刘成富
刘义圣 许金龙 李建英 李贵仓 杨小平
杨爱军 杨 晶 吴国良 吴 笛 何建乐
何海翔 余卫华 张仕英 张 明 陈文涛
陈科芳 金健人 单胜江 尚云峰 赵海峰
徐 英 栾 栋 曹宇晖 戚宏波 葛金玲

编 务 陈萍萍 杨学叶

前 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讨论,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该研究覆盖面较大,既包括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分析,又包括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文学作品等与语言及文化特征有关的具体介绍,还包括对语言的多种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对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语言与文化论坛》为综合性人文学学术出版物,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出版物坚持以会通中外语言文化、关注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基础应用研究、促进人文学学术交流为宗旨,探讨不同语言与文化理论,交流最新研究动态,挖掘语言与文化多元化特征,弘扬地方文化,紧抓社会热点,凸显栏目特色,打造自身独特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论坛特稿栏目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展现最新学术成果。《论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一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关理论和翻译观,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翻译批评观,探讨了这一批评观对以往主要翻译批评传统之不足的弥补。《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对汉诗英译的“学术性译诗”和“文学性译诗”两种策略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各有其利,各有其弊,将长久并存,以达多元互补的目的。

项目动态追踪栏目注重交流最新项目动态。此次推出《论〈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事架构和主题意义的提升》与《游戏本地化翻译策略比较研究——以〈守望先锋〉为例》。前者基于对《红楼梦》原著语料库文本的分析,利用 AntConc 软件,以“节日”“春”“夏”“秋”“冬”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提出了视角独特的创见;后者针对中国内地(大陆)大陆和港台地区本地化翻译策略不同的倾向与特点,总结其产生的种种因素,并以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以游戏《守望先锋》为例,对该游戏的本地化翻译进行了研究。

文学研究栏目注重对中西方文学著作的研究。此次共收录文章六篇。《〈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一文从《色,戒》文本时间的角度出发,剖析张爱玲作品中上海这一都市场域与挥之不去的“末世情结”的关联,同时思考张爱玲如何对沦陷时期上海形象的现代传统叙事进行解构,以及她的作品对乱世中女性自我表达实现的贡献性价值。《孤独·隐喻·悲悯:白先勇小说的另类生命悲剧书写——以“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为中心》一文以白先勇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部作品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深入解析白先勇进入人成熟期后的另类生命悲剧书写,即对

华人艾滋同性恋群体孤独无奈和悲剧命运的细致描绘、对疾病隐喻和音乐象征等手法的巧妙运用,进一步探究白先勇的文字背后浓浓的悲悯情怀及生命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外部原因,深化白先勇小说和华语文学研究。《鲁迅诗歌创作浅探》重点探讨鲁迅诗歌创作方面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诗歌的创作成就及影响、诗歌理论等内容。《曼努埃尔·里瓦斯作品中的记忆元素——以〈蝴蝶的舌头〉为例》从文学的记忆媒介功能和选择叙述策略的优势两个方面来分析《蝴蝶的舌头》这部作品,通过文本细读揭示西班牙人有关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记忆的存在方式,探索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试图解答“创伤记忆是如何被重建的”以及“为何要重建创伤记忆”这两个问题。《原型理论视角下的〈土生子〉中比格的自性化历程》通过自性化理论来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比格的精神状态和暴力根源,即分析比格的种族情结、自我的面具和阴影、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之间的冲突与调节,展示出比格真实的自我,实现其自性化的过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的“秘密”主题》一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从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历史三个层面解读分析小说的核心主题:秘密。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栏目重在对翻译与跨文化现象的多元化研究。此次共收录文章十一篇。《汉诗对偶英译的审美经验与美国诗学进程——以庞德与斯奈德译文为中心》以庞德《华夏集》与斯奈德《寒山诗》中的对偶诗句英译为研究对象,从阅读进程、空间想象与世界图式三个维度,在审美经验视角下比较两人的翻译方法差异。本篇基于两个译本显现出的审美经验差异,管窥40余年间汉诗英译对美国现代诗学的反向推动作用,进一步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中现代性因素中的世界文学意义。《Nicky Harman英译中国当代文学接受效果研究》基于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论,分析英国汉学家韩斌所翻译的十九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接受效果,得出影响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接受效果的因素可分为文内和文外因素的结论。《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对比研究——基于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一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其英译本中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从语篇连贯的角度研究《报告》及其英译本。《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研究——以冒国安和冯涛译本为例》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在不可靠叙述视角下,对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进行研究,分析两个译本是否成功地重现了原作中不可靠叙述的风格并借此塑造和深化人物形象,指出不可靠叙述再现的必要性,探讨不可靠叙述的翻译策略和叙事学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以期今后的译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再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文主要依据詹姆斯·霍姆斯对翻译理论的定义和分类,将翻译理论分为普遍理论和局部理论、规定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本体理论和跨学科理论,认为翻译理论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不同类别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是有一定范围的,是不同层次上的指导。《热捧与冷遇: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一文聚焦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脉络历程与现实图景、面临的困境及引发的思考,反

思通俗文学如何进一步融入以西方和本土为中心的日本文学的对话之中,达成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归化和异化视角下俄语成语汉译策略初探》一文以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详细了解俄语成语的来源与结构,通过举例说明、类比分析、归纳总结等论证方法,深度分析其表层含义和深层意义,力争找到恰当的翻译方法,对俄语成语汉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0—2021年)》对藏族谚语的译本进行了系统梳理。就藏族谚语的英译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期反映其英译的整体互动情况,旨在丰富相关翻译史料,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乱译、胡译、滥译再探》一文对“胡译”“乱译”“滥译”的定义进行了再探讨,并提出“随译”这一现象及定义。《基于语料库的〈庄子〉译者风格对比研究》一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分析梅维恒和汪榕培这两个全译本呈现的译者风格,并进而探讨两者风格差异形成的主要动因。《唐诗中的引语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假象等值”研究》从文学文体学视角出发,探讨唐诗中引语的特点,并提出“三类五型”的分类方式,并通过分析唐诗引语的英译过程,针对“假象等值”现象的五个方面,提出三种以文体对等为导向的翻译方法,以最大程度还原诗歌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青年学者园地栏目鼓励学术创新,呈现着多元化的学术成果。此次共收录文章八篇。《中美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拒绝策略对比研究——以〈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为例》一文研究发现,中美人士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而美方人士较中方人士更为间接;中方人士在社会地位敏感度方面要高于美方人士;中方人士倾向于使用“回避”策略而美方人士倾向于使用“说明原则”策略。论文将这些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一文选取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的语料作为语料来源,按照词性归类法,即按照语言文化单位词性的不同来划分的方法,从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等几个方面分析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聚合关系语言文化场的异同,丰富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的理论体系。《语料库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以中国知网上 2011—2020 年的三百余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语料库间接应用于教学、语料库直接应用于教学和语料库建设三个方面对论文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基于省级行业面板数据》一文通过利用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计算 2013—2020 年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对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结果展开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应该选择“披萨”代替“比萨”做规范词形》通过语料库统计、问卷调查、企业信息查询软件全面考察了“比萨”和“披萨”的使用现状,得出“披萨”的通用性更强、显示出更强大生命力的结论。《“隐喻”建构模式下的诺兰电影〈信条〉》一文研究分析诺兰导演在电影中埋设、构建的“隐喻”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环环相扣的电影剧情的设计理念和意图。《多模态话语在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个案研究》一文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以 2018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西班牙语组冠军、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师沈怡的比赛

录像为研究对象,对录像中教师的多模态话语进行编码、描写、分类与分析,对其在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索性研究。《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改的路径》一文认为,“新闻采访与写作”仍旧应坚持以报业文化为核心,恪守传承新闻学的基本原理,突出职业能力培养,贴近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推进教改,让学生学会新闻采写的方法,培养他们的新闻文化价值观,使之具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数字信息丛林中弘扬报人精神,精益求精,守本创新。

《语言与文化论坛》收录的论文理论多元,视角多样,既反映了当代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也符合《语言与文化论坛》多元化的宗旨。希望本论文集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海内外从事中外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校内外同人的支持和热爱。

目 录

论坛特稿

- 论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 王晓农 / 3
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 张智中 / 13

项目动态追踪

- 论《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事架构和主题意义的提升 李建萍 / 25
游戏本地化翻译策略比较研究
——以《守望先锋》为例 滕 梅 申 阳 / 34

文学研究

- 《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 陈俊伊 / 45
孤独·隐喻·悲悯:白先勇小说的另类生命悲剧书写
——以“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为中心 冯莹莹 黄爱华 / 54
鲁迅的诗歌创作浅探 林 伟 / 64
曼努埃尔·里瓦斯作品中的记忆元素
——以《蝴蝶的舌头》为例 徐 恬 / 79
原型理论视角下的《土生子》中比格的自性化历程 杨晓丽 胡启平 / 90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的“秘密”主题 赵玲洁 / 99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 汉诗对偶英译的审美经验与美国诗学进程
——以庞德与斯奈德译文为中心 蔡正伍 杜 磊 / 111
Nicky Harman 英译中国当代文学接受效果研究 曾玲玲 金 江 / 125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对比研究
——基于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 常晶昊 / 135

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研究

| | | |
|--------------------------|-----------|-----|
| ——以冒国安和冯涛译本为例 | 窦龙昕 马秀鹏 / | 145 |
| 再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李巧珍 / | 156 |
| 热捧与冷遇: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 卢冬丽 熊 玥 / | 166 |
| 归化和异化视角下俄语成语汉译策略初探 | 强田田 / | 177 |
| 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0—2021年) | 盛俊军 / | 188 |
| 乱译、胡译、滥译再探 | 袁斌业 / | 197 |
| 基于语料库的《庄子》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 张伟红 / | 208 |
| 唐诗中的引语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假象等值”研究 | 朱含汐 / | 221 |

青年学者园地

中美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拒绝策略对比研究

| | | |
|------------------------------|---------------|-----|
| ——以《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为例 | 白春苗 王勃然 / | 237 |
|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 | 高艳荣 / | 249 |
| 语料库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 洪敏芳 王昕玥 李 平 / | 265 |
| 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 | |
| ——基于省级行业面板数据 | 黄春山 / | 275 |
| 《现代汉语词典》应该选择“披萨”代替“比萨”做规范词形 | 黄 萍 彭泽润 / | 285 |
| “隐喻”建构模式下的诺兰电影《信条》 | 钱建萍 / | 296 |
| 多模态话语在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个案研究 | 王心悦 / | 304 |
|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改的路径 | 武 斌 / | 316 |

CONTENTS

Special Contributions

- Towards a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Xiaonong / 003
-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as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ZHANG Zhizhong / 013

New Perspectives on Projecs

- On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the Customs of Seasonal Festivals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Promotion in Its Thematic Significance
LI Jianping / 025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ame Localization; Taking *Overwatch* as
an Example
TENG Mei SHEN Yang / 034

Literature

- The Textual Time in *Lust, Caution* and Eileen Chang's Apocalypse Complex
CHEN Junyi / 045
- Loneliness, Metaphor and 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Tragedy of Life in Bai Xianyong's
Novels—Centered on *Danny Boy* and *Tea for Two*
FENG Yingying HUANG Aihua / 054
- On Lu Xun's Poetic Creation
LIN Wei / 064
- Memory as the Element in the Works of Manuel Rivas: Taking *La lengua de mariposas*
as an Example
XU Tian / 079
- Individuation of Bigger in *Native 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Theory
YANG Xiaoli HU Qiping / 090
-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Secret of *Corazón tan blanc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ZHAO Lingjie / 099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tithetical Verse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Poetics: A Case Study of Ezra Pound's and Gary Snyder's Versions CAI Zhengwu DU Lei / 111
- The Reception of Nicky Harman's Trans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ZENG Lingling JIN Jiang / 125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21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Based on Thematic Type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CHANG Jinghao / 135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 Case Study of Mao's and Feng's Translations DOU Longxin MA Xiupeng / 145
- Reargu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I Qiaozhen / 156
- A "Hot and Cold" Dilemma: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LU Dongli XIONG Yue / 166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Russian Idioms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ization and Alienation Perspectives QIANG Tiantian / 177
- A Review on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Proverbs in the English World (1900—2021) SHENG Junjun / 188
-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Revisited YUAN Binye / 197
-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Translators' Style in *Zhuangzi* ZHANG Weihong / 208
- Deceptive Equivale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Speech Presentation of Tang Poetry ZHU Hanxi / 221

Young Scholars' Foru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fusal Strategies Used by People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llustrated by the Corpora from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and *House of Cards* BAI Chunmiao WANG Boran / 237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ield of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GAO Yanrong / 249

| | |
|---|--|
|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rpora in English Teaching | HONG Minfang WANG Xinyue LI ping / 265 |
|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Industries | HUANG Chunshan / 275 |
| <i>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i> Should Select <i>Pisa</i> (披萨) Instead of <i>Bisa</i> (比萨) as the Standard Word Form | HUANG Ping PENG Zerun / 285 |
|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ve Pattern of Metaphors: Nolan's Film <i>Tenet</i> | QIAN Jianping / 296 |
|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Spanish Grammar Teaching: A Case Study | WANG Xinyue / 304 |
|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 WU Bin / 316 |

论坛特稿

论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①

王晓农



摘要:语文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为基础的三个主要翻译批评传统,各自聚焦于翻译过程的不同环节,都存在一定片面性。本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关理论和翻译观,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探讨了这一批评观对以往主要翻译批评传统之不足之处的弥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关注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以文本的认知世界分析为主要过程,以文本之间的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为主要标准,强调翻译过程诸因素动态、和谐的多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翻译批评观的不足。

关键词: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认知世界;模式

Towards a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Xiaonong

Abstract: Each of the three major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riticisms, based on philology, 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vism respectively, focuses on a different single link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refore, they are one-sided. In light of the basic tenets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and the CL-based translation theory, a CL informed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proposed,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helpful in conducting more thorough, insightful, and accurate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practice. The CL-based translation criticism considers more fully the author, texts, translator, reader, cognitive world and actual world, takes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worlds of the texts as the main procedure and the maximum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extual cognitive worlds as the main criterion, and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multipl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three traditional view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words: translation critic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world; mode

^①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易传》核心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概念化研究”(项目编号:19CWZJ13)的阶段性成果。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体验认知、与语义紧密相连、以语言操作为主的活动。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以下简称CL)以现实、认知和语言的关系及概念结构和意义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关注话语通过概念隐喻或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网络来表达思想(包括隐含意义)的机制。所以,翻译和CL存在天然的内在联系。40多年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和文化研究对文学译作评估产生了直接影响。国内学者近年来在CL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方面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在将CL理论观点应用于翻译批评的理论探讨尚不多见。翻译批评^①指涉的是翻译活动中的文本或事件,因而翻译批评及其研究自然需要CL的介入。CL可以把蒙田式“阁楼写作”和笛卡尔式“炉前思考”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前者对信念进行探索、提炼、写作,写作和论说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而后者通过层层剥离而依据某些规则重建现实(Freeman,2007)。CL能够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视角,也可为这些领域的发现提供解释。翻译批评史上的三大翻译批评传统,即语文学传统、结构主义传统和解构主义传统,都存在着片面性,基于CL的翻译批评观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三种翻译批评观的不足。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以往翻译批评传统理论观点存在的不足,结合体验哲学、CL和CL翻译观,采用文献研究和内省法,探讨CL的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观不足之处的弥补,并对基于CL的翻译批评观和批评模式进行概念性探讨,为建立基于CL的翻译批评理论奠定一定的基础。

1. 历史上主要翻译批评观回顾:西方视角

无论东西方,翻译批评远不如文学批评发达。评价译作远比评价原作复杂,在翻译批评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广大翻译家和学者还是越来越认识到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Holmes(2000)把翻译批评置于翻译学中应用翻译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强调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介的重要性,如Newmark(1988)、王宏印(2017)。从历史上看,西方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是紧密联系的,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批评的主要基础。因此,可从翻译理论的流变看出翻译批评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尽管实际状况纷繁复杂,但若从主流观点出发进行粗略划分,大体可以说西方翻译批评经历了语文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三个阶段(王宏印,2010)⁴¹⁻⁴⁶。以下结合其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翻译理论就这三个阶段的翻译批评略做分析。

语文学翻译批评是古典的翻译批评,其哲学基础是经验论,语言学基础是现代语言学前的古老语文学。客观主义经验论过分强调作者权力,认为语言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功能,人们只要透过语言就可精确了解世界。语文学翻译观认为翻译首先要服务于原作者,将作者视为主人,译者仅是仆人,译文必须“忠实”于作者原意,应与作者原意具有镜像关系。这种翻译批评主要是以原作者为准绳,借助译文正误

^① 本文所述翻译批评主要指文学翻译批评。

的多寡来判断译文质量,过于纠缠于错误识别,评估的主观性强,导致后来许多学者主张描写性评判,尽管后者也不是没有问题。语文学翻译批评的着眼点在于标准问题,从属的是技巧问题;考虑和讨论的焦点,首先是作者本位,其次是文本本位,再次才是别的方面;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地位往往被贬到忠实与否的准伦理化地步(王宏印,2010)³³。因此,语文学翻译批评关注的中心主要是原作者。

结构主义翻译批评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笛卡尔的唯理派哲学,语言学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西方哲学出现认识论转向后,理性被视为知识唯一的来源,20世纪初建立的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研究视为一种纯理性行为,排除人和社会文化的因素,把语言看成以这些因素为围墙的封闭体系,因此其视点不可避免地转向语言的系统、结构和内部规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要通过细读文本本身,努力挖掘文本的言内意义或潜在意义,就可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李弘等,2005)。结构主义翻译观主张原作有确定的意义,译者应从文本内部结构分析入手来获得文本意义,不必考虑文本外的东西;把翻译视为等值或等效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字的过程和结果,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将确定的意义忠实再现出来。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在理论上关心的是不同语言系统之间有无可译性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可能仅靠语言学解决;它在关心语言问题科学性解决的同时,往往舍去了语文学翻译批评最擅长的艺术性解决方式(王宏印,2010)⁴⁵。总之,结构主义翻译批评是一种文本中心论。

解构主义翻译批评建立在欧陆解释派哲学的基础上。20世纪的西方哲学转向语言论后,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欧陆解释派哲学如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流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语言交际的“读者”这个环节,读者也就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样,原文的意义失落于无限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性之中,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李弘等,2005)。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作者和原作的意义乃至生命只有依赖译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在新的时空中得以延续,提出了“翻译就是再创作”这一命题。译者应不断挖掘原文隐含的各种潜在意义、不断赋予文本崭新生命。解构主义对文本权威和统一性的否定冲击了以往的评价系统,传统标准如“准确性”“正确性”已不具有相关性。有的解释派学者认为,译者对原文的解释和译文的产生都是个人的、创造性的行为,难以进行系统化、普遍化和规则化(House,1998)。后殖民学者不否定译文的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和权力关系造成的翻译“失误”。在这两种情况下,译者的登场和作用被突显,翻译评价标准也发生改变。这一理论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战略,关注翻译作为文化介入手段在主体文化中的影响和效果。解构主义翻译批评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文本和语言,毋宁说是文化和交流;与其说是翻译和转换,毋宁说是理解和解释;与其说是标准和方法,毋宁说是传播和分延(王宏印,2010)⁴⁶。因此,这一翻译批评关注的是读者—译者因素。

以上三种翻译批评观分别聚焦于翻译过程的三个主要环节,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虽然三者翻译批评中各具优势和理论价值,也能在实践中说明不少问题,但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片面性。王宏印(2010)⁴⁷⁻⁵¹指出,当前翻译批评思潮的三个转向是:主体方

面从作者中心、译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落实在读者反应的基点上;方法方面从艺术鉴赏型、科学分析型转向文化评论型,以文化批评为重点;研究范式从规定性和描写性转向解释性理论说明,但仍以描写性为基本方式。关于在中西学术交汇语境下如何发展中国翻译批评,国内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探索,例如王宏印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和《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第二版)(2010)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他的翻译批评研究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探索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许钧,2018)。王宏印(2010)⁴⁷⁻⁵¹认为,在主体关系上应保持基本的动态平衡关系,在方法上应努力建设本民族的独特的研究话语,同时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在研究范式上追求以质的规定性为概念基础,以过程描述作为主要倾向,同时不排除价值和非价值判断而又具有文化解释力的理论,作为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完整方法论模型。下文主要从 CL 有关理论观点出发,分析 CL 翻译批评观如何对以往传统翻译批评观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

2. 认知语言学及其翻译观

就 CL 的历史发展而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一个灵活的研究框架(Dirven et al., 2007)³。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心理学基础是认知心理学。体验哲学认为,人的心智和思维产生于人跟外部世界的互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身体获得经验,人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植根于知觉、身体运动和人在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体验。同时,人的概念和概念系统的形成要受人类身体构造的制约。CL 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其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人们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产物,这正是 CL 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语言理论之革命的意义所在(王寅,2012)。CL 认为语言不是直接表现或对应于现实世界,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反映需要借助中间的“认知建构”层次,将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个认知中介层或认知世界是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认知形成的动态的各种概念和概念结构。现实世界通过认知世界“折射”到语言表达上,语言表达也就不可能完全对应于现实世界。CL 的研究思路是挖掘语言背后的人性特点和人本要素,着力探讨语言如何通过体验和认知而形成,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探究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王寅,2012)。对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CL 都可以从认知上作出充分解释,但是不可能做到完全预测,因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凡是复杂和开放的系统都无法做到完全预测(沈家煊,2006)。意义和语义研究是 CL 的中心领域。在语义问题上,与传统客观主义语义学不同,CL 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跟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直接关系,语义是语言符号与认知主体互动的产物,是体验性概念化的结果(王寅,2017)。语义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它与视角有关,是动态的、灵活的、百科的、非自治的,也是基于用法和经验的(Dirven et al., 2007)⁴⁻⁶,强调语义的认知观、互动观、整合观和整体观(格式塔观)等方面。CL 的主要理论有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

知模型、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象似性、语篇、隐喻等,在文化、文学及其批评、翻译、语言教学等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广泛应用。就目前 CL 的研究来看,对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考察似乎关注不够。近年来 CL 在批评领域的进展包括意识形态批评(Dirven et al., 2007)⁴⁻⁶,CL 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如 Chilton(2004)、张辉等(2008),也有学者提出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

CL 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语言研究上的一次革命,也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分析语言的新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后现代人本哲学的主要精神,反映了当前世界人文研究的基本取向,这样,语言学终于能与文学及翻译学进行理论对话了(王寅,2012)。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可视为一种认知模式)的翻译是一种体验认知活动,因此和 CL 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就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陈道明,2005)。语言的体验性本质使不同的语言文化具有通约性,彼此具有基本的可译性,而使用不同语言的认知主体的认知方式差异造成了翻译困难。语言可使作者运用最少的语法结构构建出适合某一语境的具有丰富意义潜势的文本,而文本可提供很少但却足够使读者能找到在某一语境下用于意义建构的线索(法康尼尔,2008)。若读者能够在心智上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文本认知世界,就说明他理解了文本。CL 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身在本质上具有体验性,翻译中理解原文和生成译文的过程都是以译者的体验认知为基础的,是在双方的现实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人”与“本”、“人”“本”与“现实”、译者与读者等)作用为认知基础,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原语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王寅,2007)。翻译的认知原则是根据对翻译制约参数的考量,追求译文与原文在认知世界上的最佳相似性(王晓农等,2019)。从认知世界的角度而言,译者的翻译目标可以概括为使译入语文化中的目标读者能够在译文文本语言符号引导下建构译者所期待的、与目标读者的认知世界统一的译文认知世界。这应该是译文构建的认知前提,而译文表达是译者对原语文化中原文的理解和对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译语语言文化等因素理解整合后形成的。CL 翻译观除了强调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动性、语篇性,还强调一定的创造性。一方面,体验性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思维的共通性、可译性,约束了创造度的范围,另一方面,人类认知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理解和多种译法,这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所以完全客观地翻译原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文本意思是不可及的,译者应做的是尽量较好地理解和反映原作所反映的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创而有度(王寅,2007)。总之,在翻译过程中,应根据 CL 的原则充分考虑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互动关系,从而避免基于传统语文学作者中心论、结构主义文本中心论和解构主义读者中心论等翻译观的不足。

3.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

若将 CL 理论观点作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基础,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CL 翻译批评观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语言学基础是 CL。其翻译理论基础是上文所述的 CL 翻译观,该理论强调翻译的体验性、整合性、语篇性、多重互动性、有限度的创造性、伦理性,具有系统和谐性特征(王晓农,2011)。在下文中,笔者主要针对以往翻译观的不足,论述 CL 翻译观的基本特征和模式。

3.1 CL 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传统的弥补

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观的关系大致如图 1 所示,图中实线圆圈表示客观存在的实体或相对稳定的系统,虚线圆圈表示有一定稳定性的状态,双箭头实线表示互动关系,单箭头实线表示关注对象,单箭头虚线表示相关对象,线的粗细表示关系程度大小。^①这个图表现了简化的翻译过程和各種翻译批评的关注对象。之所以说简化了是因为这里将翻译过程简单分为理想化、一次化的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各种翻译批评观也只标出了其关注的中心对象。对于翻译过程,可略做如下说明。原语语言(文化)1 中的作者通过原语语言文化知识与所欲表达的思想、意图整合,生成原文。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原文语言符号进入译者的认知世界,经互动整合机制而成新概念化,译者理解原文;这一理解再经和译者认知世界,尤其是涉及译入语语言(文化)2 的知识、翻译目的和读者知识等,整合而重新语言符号化为译文。原文的遣词造句最终要落实为译入语言符号化的译文文本(王晓农,2021)。另外,图 1 中还表示了原文读者 1 对原文和译文读者 2 对译文的读解过程。第二节论述的三大翻译批评传统分别以作者(以原文为中介)、原文和译文、读者—译者为中心。如图 1 所示,CL 翻译批评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之处。

前文指出,翻译的原文理解和译文生成过程是以译者的体验认知为基础,在涉及双方的现实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这里的多重互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至少涉及“人”与“本”、“人”“本”与“现实”、译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因此,翻译批评就离不开对这种多重互动关系的指涉。根据“人”和“本”的互动关系,不管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语文学翻译批评观,还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解构主义翻译批评,都是只关注“人”,而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则只关注“本”,三者都是片面的。就译者和读者的互动来看,译者不是一般的读者,他是读者兼译者,他具有一般读者所不具备的双语、跨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同时

^① 本图借鉴了 CL 概念整合理论的思路,由双箭头实线连接的两个圆圈可视为输入空间(input),两个圆圈下方的圆圈是“整合空间”(blend),表示整合结果。图中没有显示“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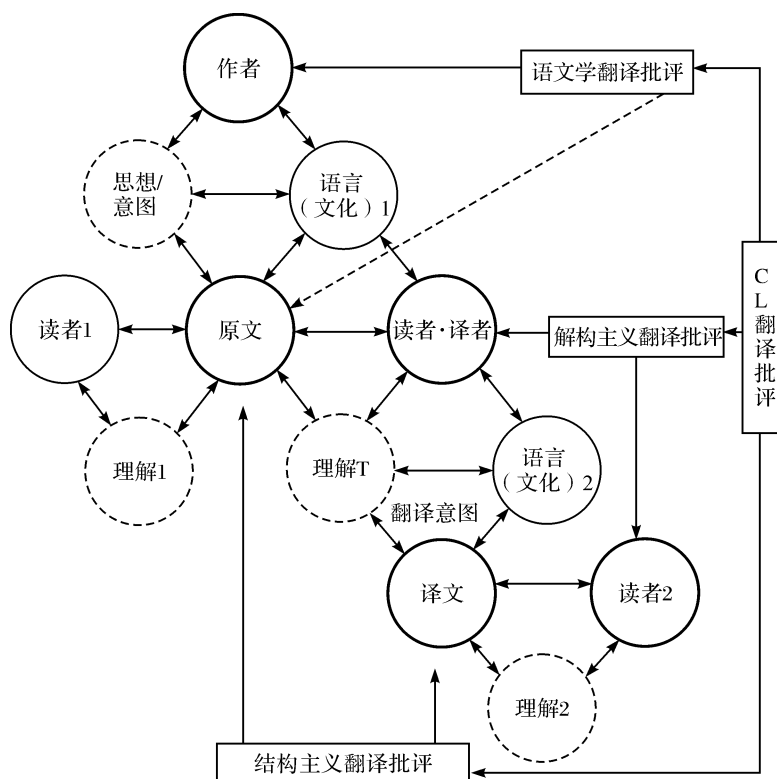


图 1 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

他还具有一定的创作主体身份,但是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和他与作者、文本、读者的基于体验的互动关系使他受制于有限度创造的原则。CL 认为,人的语言和文本都是基于人通过相似的身体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这种体验性制约了作者的文本生成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作者不会说出一些违背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而无法为读者所理解的语句来,而读者对文本所作出的理解也不会无限超越或违背它。因此,读者对原作做适度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个人都有其自己的认知能力,但这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控制力正是来自体验互动(王寅,2008)。语文学翻译批评观在评判译文时,排除了读者和译者对文本有主观理解和翻译的可能,极力强调对原文“忠实”的标准,以此寻找译文的错误并以错误数量衡量译文质量,这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结构主义翻译批评过分强调文本自身,把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关系作为批评标准的首要因素,忽视人的认知加工在文本理解和翻译中所起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也忽视了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影响,这在理论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而解构主义翻译批评则过分夸大了译者的创造性。由此可见,三者的不足都可以由 CL 翻译批评观加以弥补,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翻译批评观。

3.2 对基于 CL 的翻译批评模式的初步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CL 翻译批评观弥补了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形成了具有内在和谐关系的翻译批评观。它的关注要点包括作者、文本、译者、读者、认知世界

和现实世界,体现为图 1.1 中的各个圆圈所表示的实体、状态和系统及其间基于体验认知的多重动态互动关系。House(1998)指出,任何试图对译文的评价都必须把这个事实作为出发点,即翻译就性质上讲是同时与原文和制约译文在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系统中的接受的条件相联系的。这也是 CL 翻译批评的模式建立的基点。在涉及具体的翻译批评操作时,CL 翻译批评最终要落实到译文和原文在文本认知世界的关系确认上。CL 本身对微观层面的分析关注较多,因此可以适当考虑社会认知即对社会安排、组织和关系以及解释、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表征的认知(张辉等,2008)方面的补充。以对某译文的翻译批评为例,本文提出的概念性模式的运作程序可简要描述如下。

首先,分析制约译文产生的诸因素,包括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阐明译者翻译的原因和目的。在评价今天或过去的译作时,批评者应了解译作产生的文化背景,而且要了解译作产生时代的评价尺度和自己的评价标准间的关系。如果作者、译者、批评者属于不同时代,批评者需要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诗学审美特征、译作评价标准以及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条件,对不同时代的译者也需要做如此了解。批评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情况也应熟悉。由此形成对翻译事件发生背景的较为宏观的整体性认识,作为设定译文和原文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标准的参照系。其次,进行文本分析。对原文和译文做出语言学特征方面的描述;把原文和译文各作为独立文本,借助 CL 的相关理论,例如认知模型理论、隐喻理论、认识世界理论以及认知诗学等,对原文的认知世界及其反映的现实世界和译文的认知世界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并加以充分描述。这里也要考虑译者可能在译文的副文本中提及的翻译策略、原则,并考察在译文中的落实情况。最后,对译文和原文的文本认知世界进行比较分析,确立两者在认识世界上的关系,根据第一步确定的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标准对其关系进行评价。评价所涉方面主要包括译本作为独立文本与译入语文化系统的亲和性、译本和原本在认知世界上与文本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原则的符合程度、译本与原本在认知世界上的主要不同之处及其语言表现,并对其做出基于 CL 的解释,同时分析这些表现可能意味着的翻译方法、语言运用和翻译理论上的创新。对具体译作的最终评价可以等级化。以上仅是尝试对 CL 翻译批评概念性模式所做的一个纲要型、粗线条的说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使之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可行性。

4. 结语

本文首先从西方视角回顾了文学翻译批评史上三个主要的翻译批评传统,分析了各自存在的不足,然后介绍了 CL 的基本观点和相关理论,并分析了基于 CL 的翻译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 CL 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传统不足的弥补,初步提出了基于体验哲学和 CL、强调多重互动的、和谐的翻译批评观,最后尝试概念性地探讨了 CL 翻译批评模式。翻译是一个复杂系统,是许多方面和因素互相作用的综合矢量结果,它永远

也不可能达到实时均衡状态,而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基于 CL 的翻译批评观关注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等因素,把这些因素看作处于动态的多重互动关系之中。CL 正在发展之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其内部学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是,其基本理论主张是一致的、明确的,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基于 CL 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并能引起更多学者对 CL 和翻译批评进行整合研究的关注。

参考文献:

- 陈道明,2005. 隐喻与翻译: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9):40-43.
- 法康尼尔,2008. 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40.
- 李弘,王寅,2005. 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力[J]. 外语与外语教学(10):35-39.
- 沈家煊,2006.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N/OL]. 光明日报,7-3[2022-9-1]. <https://www.gmw.cn/01gmr/2006-07/03/content443360.htm>.
- 王宏印,2010.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2 版.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宏印,2017.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88.
- 王寅,2007.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565-592.
- 王寅,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 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3):211-217.
- 王寅,2012.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17-26.
- 王寅,2017.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 中国翻译(6):5-10,17.
- 王晓农,2011.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语篇翻译研究[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88-294.
- 王晓农,2021. 令文义圆通,使微言不坠: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圆通论”诠释[J]. 中国翻译(2):29-36.
- 王晓农,赵红梅,2019. “B 是 A 的译文”,意味着什么?:试据对唐诗“清明”及其英译的语篇认识世界分析进行解答[J]. 语言教育(4):63-69.
- 许钧,20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20.
- 张辉,江龙,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话语批评分析的融合[J]. 外语学刊(5):12-19.
- CHILTON P, 2004. Meta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spaces[M]//MARQUES M. Praticas de investigacao em analise linguistica do discurso-actas do II encontro internacional de analise linguistica do discurso. Cehum: Braga.

- DIRVEN R, POLZENHAGEN F, WOLF H G,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s, ideolog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GEERAERTS D, CUYCKENS 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M,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in cognitive poetics[M]//GEERAERTS D, CUYCKENS 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76.
- HOLMES J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72-183.
- HOUSE J, 1998. Quality of translation[M]//Baker 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7-200.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78.

作者简介:

王晓农,男,1969年11月生,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科研副院长,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孔学堂》英文译审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2015年获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与译论研究,研究课题涉及《易经》、“四书”、《朱子语类》、《古文观止》等典籍英译、莎剧汉译以及中国当代学术外译等领域。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教学项目4项,参与国家级项目8项;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译著14部,教材3部。英语译著《朱子语类选》《古文观止》入选“大中华文库”。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周易研究》、*Translation Journal*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中英文论文80余篇,发表国学研究论文英语译文40余篇。典籍英译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厅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①

张智中



摘要：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是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学术性译诗重在传达原诗的基本信息，强调翻译的忠实性；虽然如此，有时却也因为新鲜大胆的直译而不乏创造性与新颖性。文学性译诗重在传达原诗的审美信息，强调译诗的文学性；虽然如此，创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性译诗，却不时遭到翻译批评界的诟病，责其不忠不信。不过，文学性译诗在遭受西方汉学界最初的批评之后，最终还是得到了肯定与赞赏。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各有其利，各有其弊，将长久并存，以达多元互补之目的。

关键词：汉诗英译；学术性译诗；文学性译诗；多元互补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as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ZHANG Zhizhong

Abstract: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ar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C-E poetry transl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emphasizes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poem, while it sometimes does not lack originality or creativity owing to its bold literal translation.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pays attention to reproduction of the aesthetic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poem, while highlighting the literary quality of a translated poem. Yet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eation, is often criticized by scholars for its “unfaithful” translation. Fortunately, after the initial criticism,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finally wins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each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ll coexist as plural and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Keywords: C-E poetry transl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plural and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16BWW012)的成果。

1. 引言

与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一样,诗歌翻译的策略,也可概分为两种:学术性翻译与文学性翻译。前者注重译文的忠实性,后者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前者注重原文信息的传递,后者注重审美经验的传达;前者不讲究译文之语言,后者需用优美的英文来传达;前者为学术研究之目的,后者为文学交流之用心。

2. 关于学术性译诗

刘若愚(1990)^{绪论4}说:“译文旨在展示中国诗歌语言各方面的特征,因此就需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当然我也尽力使其具有可读性。如果可能,我将遵循原诗的诗体和格律。……我知道我的译文是良莠互见,但某些用笔的低劣则应归咎于对逐字翻译的必需或因使用了某些蹩脚的表现方法。其所以如此,目的是显示原诗的格律及语言特色。”这可以看作是学术性译诗的“宣言”。

学术性译诗虽然强调忠实,却不乏创造性。“当我们站在翻译的角度去看中国诗歌时,问题就变得越发复杂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陈腐的意象在译文中看来就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那些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读者看来,它们或许是既新颖而又感人的。‘秋波’是形容女子眼睛的一个陈腐意象,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即使是说不上造语惊人,至少也是有趣的创新。”(刘若愚,1990)¹⁴¹人们一般倾向于认同在意译中,或在文学性译诗中,译者的创造性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因此,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直译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体现着译者的创造性呢?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直译、敢于直译,正说明了译者对于译入语或英语的良好语感。好的直译,如同作家对于所写作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功莫大焉。我们来看李白《望庐山瀑布》中两个诗句的两种英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英译一:

Flying waters descending straight three thousand feet,
Till I think *the Milky Way* has tumbled from the ninth height of Heaven.

—Tr. Burton Watson(译者华兹生)

英译二:

Its torrent dashes down three thousand feet from on high,
As if *the Silver River* fell from the blue sky.

—Tr. Xu Yuanchong(译者许渊冲)

“银河”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是常见，华兹生将其英译为“the Milky Way”，属于意译或归化译法；许渊冲译为“the Silver River”，显然属于直译或异化译法。许氏如此英译，是经过认真研究而为之的。他曾提到宾纳(Bynner)的古诗英译：顾况的“水晶帘卷近秋河”，被译为“*They have opened the curtain wide, they are facing the River of Stars*”；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被译为“*And the River of Heaven slants and the morning stars are low*”。许渊冲评论说：“如果把‘天河’和‘星河’都改译成‘the Milky Way’，那读者只会看到现实主义的景色，译文却减少了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许渊冲, 1998)显然，许渊冲先生深为赞赏宾纳的直译法，所以才将“银河”译为“the Silver River”。如此英译的好处，显然可见。再看宋人杨万里的《小池》及其英译：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A Pond

The *fountain eyes* quietly treasure the tender streams,
The tree shadows reflecting in water love the sunny softness;
The young lotus blooms just shoot their sharp buds,
On which dragonflies have already settled their tender kisses.
—Tr. LIAO Changyin(译者廖昌胤)

将“泉眼”直译为“*fountain eyes*”，甚佳！如此可以丰富译入语，开发译入语的语言潜力。非有深厚之语言修养者，不敢如此直译，直译可以带来创造之美，是译者胆识和魄力的体现。再如树才《莲花》一诗中的两行：

我只是在学习遗忘——
好让偌大的宇宙不被肉眼瞥见。

I'm merely learning to forget—
Let that huge universe be unseen by *eyes of flesh*
—Tr. Denis Mair(译者梅丹理)

“肉眼”一般英文作“*naked eyes*”，译文以“*eyes of flesh*”出之，生动新鲜，令读者眼前一亮。英语语言的潜力，由此得以开发。

通过以上译例，学术性译诗的优点或优势，显然可见。

3. 钟氏之“创意英译”与许氏之“创译”

中国台湾学者钟玲提出“创意英译”的概念：“我把庞德、韦理^①、宾纳、雷克思罗斯等翻译的中国诗歌称为‘创意英译’，有别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译的诗歌。后者的译者绝大多数是在欧美各大学东亚系任教的教授……这些学者的译作当然以忠实于中文原文为其翻译的原则。而庞德等的译作则以表达美感经验，将他们对中国诗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为其目的，故称‘创意英译’。”（钟玲，2003）³⁴这与许渊冲所倡导的创译理论，正是一脉相承。如果说“创意英译”以“表达美感经验”“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等为特征的话，浓缩于“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许氏译论，也可措以“美”“优”二字为其要害。许渊冲（2003a）¹⁶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在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唐宋词三百首》序言中，许渊冲（2003b）首次拈出“创译”一词：“创译的特点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说，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概括成三个字，可以说是‘信达优’。……我认为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互译应该走创译的道路，希望创译能使我国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使世界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光辉灿烂。”许氏的“创译”，似乎恰好是钟氏“创意英译”的简称；或者钟氏的“创意英译”，恰好是许氏“创译”的扩展，二者在精神上相通。

白芝(Cyril Birch)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部涵盖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两卷本选集，里面没有选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没有选陈子昂、高适、辛弃疾、晏殊等著名诗人的诗篇，却选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寒山的二十四首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寒山诗的译者史奈德(Snyder)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采取了所谓“创意英译”的翻译策略，结果其译诗成为优美的诗歌。在白芝所编的这本中国文学选集中，中国文学史被改写了：在中国不入流的诗人寒山被提升至主流地位。此外，汉学界对史奈德的寒山诗译文之艺术造诣，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在《寒山诗三种英译文》(*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Han Shan's Cold Mountain Poems*)一文当中，赫伯特·法克勒(Herbert Fackler)将史奈德、韦利、华兹生的三版译文做了比较，并认为：在三版译文当中，韦利与华兹生的译诗本身乏善可陈，而史奈德译的寒山诗却组织紧密，自成缜密统一的循环，是重要的诗歌艺术品，因为史奈德“用了最为引人入胜的词汇”（钟玲，2003）³⁹。

许渊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发挥译语语言优势论，其实质是倡导译者充分发挥和利用译入语的语言精华。1994年，由许渊冲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被英国极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出版，这标志着许渊冲的古诗词英译开始走向世界，被国际译坛所承认；正如《读书》总201期105页上所说：“能否进入企鹅丛书也成为一种荣誉及被认可的象征。”许渊冲（2003a）³⁸¹也说：“《不朽诗》是企鹅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译的中

^① 原文如此，现一般译为韦利(Waley)。后文出现此译名不再附注。

国古诗词,因此,我也把这当成一种荣誉,当作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总之,史奈德运用“最为引人入胜的词汇”的做法,恰好与许渊冲所倡导的发挥译语语言优势论不谋而合。创意英译也好,创译也好,都要求译者必须创造性地使用译入语语言,这样才能使译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水平,并进入译入语的文学领域。

4. 关于“创意英译”或“创译”的论争

许渊冲的创译理论,在国内一直存在着对立的 two 派意见,与之相似的是,美国的汉学界对创意英译的反应,也呈两极分化的趋势。美国汉学家对庞德英译中国古诗《华夏集》(*Cathay*)的反应,就是很好的例子。1957年,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亚奇力斯·方(Achilles Fang)在《佛纳罗沙与庞德》(*Fenollosa and Pound*)一文中,就指出《华夏集》乖离中文原意之处,指责庞德译文不忠不信。安吉拉·容·巴兰笛(Angela Jung Palandri)却称赞《华夏集》为英文诗之佳作,她说:“如果不是庞德为《华夏集》中的译文注入了生气,那么这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对西方而言仍将是遥不可及的……”此外,休·肯纳(Hugh Kenner)等专家学者,对《华夏集》的艺术成就也很推崇,把它当作优美的英文诗篇。1966年以后,学者们大多把《华夏集》当作英文的佳作来研究和分析。(钟玲,2003)³⁸⁻³⁹但在国内,似乎还没有人把许渊冲的古典诗词英译当作英文的佳作来研究,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西方学术性译诗的代表,可举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为例。如果说韦利的译诗因含有创译成分而可称为文学性译诗的话,高本汉的译诗策略,却正好相反:他的翻译方针是以学术需要来凌驾一切。高本汉完成了堪称逐字对译的《诗经》全译本。“这种决定牺牲诗意(甚至不考虑诗意问题)的译诗方法,注定高本汉的译本不会在汉学界以外产生什么影响,更不会吸引大量英语读者。”(孔慧怡,1999)⁹⁸虽然如此,在翻译批评界,学术性的译诗经常受到鼓励,而创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性译诗,却不时遭到批评。例如,1971年钟玲与雷克思罗斯合译《中国女诗人》,快完稿之时,在决定书名这件事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清照《一剪梅》里有“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之句,雷克思罗斯便主张用“Orchid Boat”为书名。当时两人都知道“兰舟”是指木兰树之木做的船,而非指“兰花船”,但雷克思罗斯坚持用“Orchid Boat”为书名,认为这比“Magnolia Boat”更富诗意。因为雷克思罗斯坚持诗意至上,钟玲便做出让步。译诗于1972年出版,书名为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1975年,郭大夏(Ta-Hsia Kuo)在书评中批评书名误解了“兰舟”的含义。在错误地被人认为学艺不精的压力下,钟玲给雷克思罗斯写信抱怨,雷克思罗斯终于让步,当1982年此书再版时,书名改为 *Women Poets of China*。也就是说,书名去掉了富有诗意的“Orchid Boat”。(钟玲,2003)⁴⁰⁻⁴¹由此可见,汉学界的批评意见,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创译或文学性译诗的成果。

5. 翻译批评之风的转向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创而译之的译诗,虽然在美国的汉学界最初曾遭到一些批评,责其不忠不信,但后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汉学家转而开始研究和分析这些创意英译的优点,并把这些译作当作优美的英文诗来欣赏。在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举办的“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上,与会的美国诗人一致认为:中国诗学论述对美国诗歌影响巨大。雷克思罗斯、史奈德、莫文、赖特都盛赞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译。总而言之,一些中国诗歌的英译文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坛建立了经典的地位,它们的经典化主要由下述力量所推动:最主要的是,有一些英文文字驾驭能力强的美国诗人或译者把中文诗翻译为优美动人的英文诗章;一些重要的美国文学选集把这些创意英译选入,视之为具有经典地位的英文创作;美国汉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奠定了这些创意英译的文学地位;此外,还有一些美国诗人倡言其成就及影响力。因此,创意英译虽然为数不多,却在美国诗坛的经典系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总之,在美国,“汉学界的学者已放弃了校勘式的批评,而由创意英译的角度来赏析译文。”“他们重视的是译文对读者的美学感染力,而非译文的忠信问题。”(钟玲,2003)⁴¹⁻⁴² 反观国内的翻译批评界,似乎仍以译文对原文的“忠信”为圭臬,而无视译文对读者的美学感染力,或者说对译文的美学感染力重视不够。国内学者愿意为创译作品背书的,似乎还只是少数。国外汉学界在汉诗英译翻译批评方面的倾向,正与许渊冲所倡导的文学翻译的方向吻合一致。可以说,强调译作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其关键点。

6. “学高于才”与“才高于学”

如果译诗的诗意不足,不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无论是译者因追求翻译的“忠信”而故意如此,还是因为力所不逮——其结果,只能是让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译诗,在英语文化里面变得极度边缘化。这样,就不能使中国的传统诗词走向世界,也就不能达到翻译的真正的一——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目的。“诗歌翻译在对译者语感和语言运用方面的要求,远较其他文类的翻译为高,这也正是为什么一般在大学教书的人尝试翻译古典诗词,会遇上那么大的困难:他们有的是专业知识,学者身份更可以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但如果中国文学英译变成有‘学’而无‘文’,那么译作的性质和功能,就和诗歌原来的文学功能脱节了。韦理和高本汉风格迥异的两种《诗经》译本,正好代表‘文’和‘学’两条道路;语言技巧和文学才华并不是去念研究院或拿个博士学位就可以换来的。”(孔慧怡,1999)¹⁰⁵⁻¹⁰⁶ 孔慧怡的此段论述,与许渊冲的“才学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许渊冲认为:译者应有才有学,但才、学体现在一个译者身上的不同,导致了译文的不同风格。学高于才的人可以译得忠实,才高于学的人却可以译得有吸引力。如果才、学都高,译得既忠实,又有吸引力,既不失真,又能存美,那自然很好。但事实上,这很难

做到。比如，朱生豪才高于学，所以译文“信”不足而“雅”有余。有人从才与学的角度对许渊冲的翻译实践做出评价：“许渊冲先生也是这么一位有才气的以我为主的翻译家，不仅和原作者平起平坐，他的雄心壮志是试与原作比高低，因此提出的口号不是接受挑战，而是和原作展开竞赛——自然，胜利的一方总是归于感觉良好的许先生。我的努力是以学者型的译者自勉，而许先生则恐怕是以作家型的译家自诩——当然，许先生的学问是令人钦佩的。”（方平，2002）作家型的译者与学者型的译者，正体现了才与学的两个方面，也体现了文学性译诗与学术性译诗的两种策略。我们来看《诗经·出其东门》中的一个诗节及其三种英译：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中，聊乐我员。

英译一：

I went out at the east gate,
 Where the girls were in clouds.
 Although they are like clouds,
 It is not on them that my thoughts rest.
 She in 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grey coiffure,
 She is my joy!
 —Tr. James Legge(译者理雅各)

英译二：

I go out at the East gate;
 there are girls (numerous) like a cloud;
 but although they are like a cloud,
 they are not those in whom my thoughts rest;
 (she with) the white-silk robe and with the
 black-mottled grey kerchief,
 she will rejoice me.
 —Tr. Bernard Kalgren(译者高本汉)

英译三：

At the great gate to the East,
 Mix crowds,
 Be girls like clouds,

Who cloud not my thought in the least.
 Gray scarf and a plain silk gown,
 I take delight in one alone.
 —Tr. Ezra Pound(译者埃兹拉·庞德)

对上述三种英译,廖七一做了详细而到位的分析:“前两段译文出自翻译家之手,其译文不能说是不忠实。与庞德的译文相比较,很容易发现下面几个主要的差异。①前两段译文句子结构较为整齐匀称,庞德的译文长短错落,形成句式上的张力;②前两段译文忽略甚至无视原诗的韵律,用散文翻译,第二种译文甚至就是分段的散文,取消了每一诗行的大写,而庞德却精心设计了 abacc 的韵式,读起来朗朗上口;③前两段译文将原诗隐含的意义连接表层化,补充了‘although ... it is not ...’的结构,形成显形衔接,而庞德维持原诗的隐性逻辑联系,简洁、紧凑,‘great gate’‘mix crowd’‘girls’‘clouds’‘gray scarf’‘plain silk gown’等自然构成意象的并置;④前两段译文因袭原诗的用词,重复名词‘cloud(s)’,略嫌呆板;而庞德创造性地将表示‘云’或‘云状物’的名词‘cloud’与表示‘遮蔽’‘使黯然’‘使模糊’的动词‘cloud’并列,形成意义的互补,并用表示‘人群’‘众多’‘拥挤’,带有动感的‘crowd’协韵,相互映衬,不能不说较前两段译文出手高明,更具诗意。学者型翻译家与诗人翻译家在诗体、语言、句子结构、韵式和翻译技巧上的差异与优劣一目了然。”(廖七一,2006)

《诗经·出其东门》英译一和英译二的译者是学者型翻译家,而英译三的译者庞德,却是诗人翻译家。如果前两者英译属于学术性译诗的话,庞德的英译却正是文学性译诗。

7. 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的并存

学术性译诗亦步亦趋,在文字上束缚手脚,以便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各种信息。未能充分再现原作之精神、之气韵,往往是学术性译诗的致命弱点。创译者之所以能够放开手脚,发挥优势,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学术性译诗的缺陷;结果,其译文常常是一流的文字,正如原文是一流的文字一样。至于所谓译文的“不忠”“不信”,又当具体分析、具体研究。有的“不忠”,为文字层面上的“不忠”,精神气质却正吻合;有的“不忠”,是表达内容上的“不忠”,是因为译者把自己对原诗的理解,或者说译者在阅读、翻译原诗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联想,在译文当中表达了出来;读者在读原文时,如果没有与译者产生同样的联想,自然就会认为译文“不忠”,认为译者在天马行空、随意发挥,在以“翻译”之名,行“创造”之实。这样的读者批评意见,译者知道后,自然也不服膺。译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译作“不忠”,因为他只是把自己阅读原作时所产生的联想,非常“忠实”地传译出来。译者忠于自己的阅读体验,也就是忠于原作——除非译者阅读原作时,确实存在着误解和误读。诗无达诂,就是说在合理的理解范围之内,不同的读者对原作可以有不同

同的解读。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种不同的译文,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一千种译文当中,究竟哪些才算忠于原文?问题的答案,恐怕仍然是:有一千个评判者,便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因为,译文的评判者,毫无疑问地又成了译文的读者;而作为读者,如前所述,因其想象力的不同,因个人经历、个人感悟、世界观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往往人异人殊、见仁见智。

总之,诗歌文本的开放性与多解性,为译者提供了再创造的空间。学术性译诗重在追求学术上的正确性,虽然在语言层次上精确而忠实,却往往缺乏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感染力。文学性译诗重在追求诗歌的美感体验,自然充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因此,如果说学术性译诗可以满足学术研究之目的的话,文学性译诗却可以达到文学与文化交流之目的,并进而促进世界文学之繁荣。与此同时,学术性译诗所采取的大胆直译,有时却也可以给译文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给译诗带来浓郁的诗意。因此,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并存,以达多元互补之目的。

8. 小结

“正是通过翻译这个中介,每个民族都看到了本民族语言—文化系统的局限,都从对方民族的语言中借鉴、吸收了有益的成分,丰富了本民族语言的词汇,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扩大了精神视野,修正了传统思维方式,这样,翻译就为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转化、民族语言返回到‘普遍语法’、民族诗歌转化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可能性。”(张德明,1998)如果说庞德时代的汉诗英译令西方读者感受到一个没有语法、没有逻辑的优美意境的话,“五四”以来的英诗汉译,则让中国的诗人们看到了一个逻辑清晰、理性充盈的诗意世界。对于当前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汉诗英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至于翻译的策略,无论采取学术性译诗还是文学性译诗,都应该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并注重汉诗美感与诗性在英文中的再现。如此,则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 方平,2002.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0.
- 孔慧怡,1999. 翻译·文学·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廖七一,2006.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38-140.
- 刘若愚,1990. 中国诗学[M]. 赵帆声,周领顺,王周若龄,译.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许渊冲,1998. 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再谈发挥译文语言优势[J]. 外语与外语教学(6):35-39.
- 许渊冲,2003a. 诗书人生[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许渊冲,2003b. 汉英对照唐宋词三百首[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序 9-10.
- 张德明,1998. 人类学诗学[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306-307.
- 钟铃,2003.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智中,男,1966年8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典籍翻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研究方向为汉诗英译,发表相关论文11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10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项。专著《汉诗英译美学研究》和译著《唐诗绝句英译800首:中英对照》分别获天津市第十五届和第十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项目动态追踪

论《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事架构 和主题意义的提升^①

李建萍



摘要:基于对《红楼梦》原著语料库文本的分析,利用 AntConc 软件,以“节日”“春”“夏”“秋”“冬”为检索词进行检索,结果表明:《红楼梦》文本中对四季的“节日”以及相关的习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成为小说故事叙述的核心内容,其聚焦式和散点式的叙事架构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其中,以“三春”和“三秋”为中轴线的叙述突出了小说“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而对其他节日的白描式的叙述将故事悲剧性的演进过程置于自然而人性化的空间场景中,既对小说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又体现出作者对人物个体生命诉求的关注与同情,具有悲天悯人的生命意识与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节日习俗;叙事架构;主题意义;提升

On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the Customs of Seasonal Festivals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Promotion in Its Thematic Significance

LI Jianping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n corpus text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via retrieving the keywords “festival”,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it is found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ustoms of seasonal festivals in China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arration of this classical novel. The focused and scatt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highlights the theme of the works, which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narration of celebrations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a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ree time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s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narrative,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heme—A Feast Must be Dispersed while narration of the other festivals adds up to this very theme and reflects the author’s concern and sympathy for the individual’s fate with deep compassion and the spirit of humanism.

Keywords: customs of festivals; narrative framework; thematic significance; promotion

^① 本文为 2018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华传统节日诗词的‘中国故事’叙写分析及对外译介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18D54)的成果。

1. 引言

《红楼梦》的叙事研究一直是红学研究的热点,我国学者从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手法上对《红楼梦》的叙事特点进行了分析(王彬,1998;王平,2000;孙春旻,2001;魏颖,2019),拓展了《红楼梦》叙事研究的范畴。“以虚涵实”以及多个事件交织呈现的叙事架构使这部世情小说“盛宴必散”的主题更加凸显;既有对静态的锦衣玉食、雕梁画栋的叙述背景的频频聚焦,又有对吟诗作赋、节日庆典等活动的动态渲染,动静结合的穿插描述将贾府的兴盛在具体的介质中展现出来,而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岁时节令习俗”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亮点。小说在展现贾府的日常生活时,常常以“岁时节令”为重要的时间点,细致地刻画了贾府庆祝节日的习俗。李健彪(1993)指出,小说对“节日习俗”的描写生动细致,为人物的出场提供了特有的环境和氛围,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预见、渲染和铺陈的作用。基于对《红楼梦》原著语料库文本中“节日习俗”频次的统计以及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方式的分析,发现《红楼梦》文本对“节日习俗”的描写隐含了小说叙事的两个层级,构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双层叙事结构,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上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小说中四季更替所产生的天气、景观、人物心理感受上的变化既体现在以自然年为单位的“小循环”上,也体现在全书整体结构的“大循环”上(梅新林等,2013)。具体到《红楼梦》所描写的某一自然年中季节的“小循环”,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者将季节与红楼人物的情感变化、内在诉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季节和自然时序也因而产生了与人物心理相照应的作用(李英然,2013)。在《红楼梦》巨细靡遗的叙事中,季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人们熟知的气候学上的概念,即“循环出现的地理景观相差较大的时间段”,而由其自身的温、热、燥、寒等自然属性衍生出了一定的文学意义,与故事情节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刘奕男,2020)。从“大循环”的角度看,“春”“秋”已超越了季节上气候变化的意义,而是人物命运起伏、故事情节曲折变化的聚焦点。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岁时节令习俗”蕴含着人们对大自然春来冬去、寒来暑往最深厚的情感与对生命最真挚的体验。作者巧妙利用了节日承载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时间叙事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分布于春秋两季的元宵和中秋节,更成为《红楼梦》节日叙事中的焦点。在《红楼梦》“岁时节令习俗”的庆典中,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重点描写展示了贾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成为叙事的中轴线,而对其他节日散点式的描述既补充了小说“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又体现出作者对人物个体生命诉求的关注与同情,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小说主题意义升华的切入点。李广柏(2001)指出:“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以李贽、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最适宜称为人文主义。”“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放纵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反映到文学思想上来,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出人性的本然之真。”(罗宗强,2019)本文基于对小说的“叙事架构”的分析,探讨《红楼梦》这部世情小说超越“世情”的主题意义,即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个性解放,追求“至情”“至真”的人生境界。

2.《红楼梦》中“节日习俗”叙事的架构

《红楼梦》描写了清代中叶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俗风情,包括建筑、服饰、饮食、器物等物质性民俗;宗教、礼仪、岁时习俗等社会民俗和祭祀礼仪以及神话传说、梦兆解析、民间歌谣、观灯猜谜等精神性民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叶的社会民俗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态(刘盛昌等,1992)。其中,对“岁时节令习俗”的描写几乎贯穿于整部作品,《红楼梦》中记录的“岁时节令”几乎囊括了一年四季的节日,这些节日和季候的自然变化紧密关联,有着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和文化内涵。从“节日”出现的语境来看,对元宵节的叙写主要集中在对元宵家宴场景的渲染以及一家人制灯谜、猜灯谜过程的记叙,热闹非凡、其乐融融;而中秋节则聚焦中秋赏月、赏菊和赏桂宴会,因时即景、情景交融。笔者利用 AntConc 软件对《红楼梦》语料库文本进行检索,发现在所有的节日中,元宵节和中秋节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其他很多节日仅出现过 1 次,且散点式地分布于各章回中,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季节日”统计及在全书中的分布

| 节日名称 | 频次 | 章 节 |
|--------|----|---|
| 元宵节 | 10 | 第一回、第十八回、第二十回、第二十二回、第四十二回、第五十回、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九十六回、第一百零一回 |
| 中秋节 | 8 | 第一回、第十一回、第七十回、第七十二回、第七十三回、第七十四回、第七十五回、第七十六回 |
| 端午节 | 4 | 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 |
| 乞巧节 | 4 | 第四十二回、第四十四回、第七十六回、第七十八回 |
| 春节(除夕) | 3 | 第四十九回、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 |
| 重阳节 | 3 | 第四十六回、第八十八回、第一百零四回 |
| 清明节 | 1 | 第五十八回 |
| 芒种节 | 1 | 第二十七回 |
| 立夏 | 1 | 第二十九回 |
| 小阳春 | 1 | 第九十四回 |
| 寒食节 | 1 | 第十一回 |
| 腊八节 | 1 | 第十九回 |

从表 1 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节日习俗分布于 32 回中,约占全书的 26.67%,其中,“元宵节”和“中秋节”是小说叙事的核心,总共出现 18 次,其中,有 16 次出现在前 80 回中,贯穿于小说叙事的全过程,成为小说叙事的一条中轴线,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主题的展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其他 10 个节日出现的总次数为 20 次,其中,17 次出现在前 80 回中,自然而然地在某一个场景描述中显现出来,散点状地分布在故事发展

的场景中,成为叙事中一个个小小的亮点,点缀在主题叙事的大布景上。《红楼梦大辞典》中“诗词韵文”条目中列出的韵文前80回有215首,在岁时节令描写中出现或与岁时节令相关的有75首之多(冯其庸等,2010)。可以说,《红楼梦》中大量的节日描写使得整部作品的叙事风格带有一定的“泛节日”的特点。

“岁时节令习俗”来自民间,具有广泛性与通俗性的特点,在时间轴上则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吻合,体现出特定区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在的精神特质,因此,从庆祝方式上来说,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钟敬文,1998),同时每个节日都有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而又贴近民众。这些民俗活动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生动活泼的节奏感和愉悦感。因而,“岁时节令习俗”所特有的浓郁的民族气息和生活情趣使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周汝昌先生(2009)认为,《石头记》(《红楼梦》)中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特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也就是说,《红楼梦》有一个以“元宵节”和“中秋节”为中心的节日叙述架构,作者对“三春”与“三秋”的浓彩重笔具有定位叙事基调、串接故事情节、展现生活空间转换的功能,使之成为作品叙事的中轴线;而其他节日作为“岁时节令”变换的时间节点,更是一种心理时间、情感时间(唐援朝,1995),体现出作者对季候变换的内在感知和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进一步深化了主题,使这部世情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

3. “三春”与“三秋”:中轴线上故事情节的延展与主题的凸显

《红楼梦》的时间跨度很大,在年复一年的季候演进中,读者看到的是近乎静止的时间,而小说的起始正是情节时序变换的落脚点,杨义(2019)¹⁸³指出,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红楼梦》中的“三春”与“三秋”是整个故事叙述的关键点,而第一回中的“元宵节”和“中秋节”则是“岁时节令”的起始点。这两个节日在第一回中多次出现,既点名了“元宵节”看花灯的习俗,也引出了悲剧性人物甄士隐(谐音“真事隐”)和他的厄运,其中“丢失英莲(谐音‘应怜’)”是一系列厄运的起点;在这一回中,“中秋节”亦多次出现:“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第一回是全书的引子,为主要人物登场做好铺垫,其中,一僧一道对红尘中的乐事做出“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概括,将全文的叙事置于神话叙述的语境之中,在时间的刻度上呈现出模糊性特质,对全文的叙事基调进行了定位;而在时间的向度上,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使人们在作者的“满纸荒唐言”中,感受到作者的“辛酸泪”,也使整部作品显示出强烈的悲剧色彩(唐援朝,1995)。

除夕祭祀是这个钟鼎之家生活延续的基点,点明了家族祖上的荣耀和功勋,并以此泽披后世。“过年”是辞旧迎新的节日,是中国传统习俗的核心,因而成为叙事的落点。作者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对“除夕日”贾府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仪式的全过程

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突出了贾府作为钟鼎之家的家族历史及其祖上显赫的身份。“贾氏宗祠”里的对联写尽了这个家族的荣耀,如“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祭祀仪式庄重正式,男性先行、女性随后,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以第五十三回为例: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尾随着贾母至正堂上……作者将“过年”安排在第四十九回、第五十三回和第五十四回,正是贾府兴盛之顶点,“过年”庆典为贾府整体环境的展现提供了最为契合的时机和氛围,成为“三春”“三秋”叙事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基于此,作者对贾府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细节,包括过节的礼仪、场景的布置以及对人物活动的描写成为整部作品的亮点:丰盛的家宴、彩灯高挂的厅堂、以贾母为中心的系列活动,如喝酒行令、猜灯谜、吟诗作赋等,将这个钟鼎之家的奢华、繁盛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第十八回和第五十三回“元宵节”的庆典,将家族的兴盛渲染到了极致。

“元宵节”和“中秋节”的浓彩重笔是节日叙事的核心,串接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戴冠青(2007)认为,民俗文化活动是《红楼梦》叙事话语的基本立足点,其最突出的艺术精神是狂欢与消解,即通过节俗活动来营造团圆的气氛,巩固亲情的堡垒,制作心照不宣的快乐镜像。然而,“盛极必衰”像一个不可突破的魔咒,附在家族的命运上。

元宵节代表“春”,中秋节代表“秋”,分别象征盛与衰、荣与辱,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对其进行了描述。作者对“元宵节”的三次描述(元春省亲、荣府元宵夜宴以及元春薨毙)是从作者作为叙事人的“全知视角”进行的,而对“中秋节”的三次叙述则是通过视角的转换完成的:由不同人物述冤屈、闻悲音、作新词、感凄凉,通过抄检大观园、中秋夜祠堂发出悲音等事件,将贾府内部的混乱、家族必然的没落与衰亡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特别是在第七十六回中,原本热热闹闹、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秋团圆夜以极度哀伤凄凉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贾母期盼团圆却落空,黛玉、湘云联诗的不详预言,将中秋节的“寒凉空落”渲染到了极致。“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是大观园内极具才情的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春”之始,“秋”之尽,随着叙事中轴线的充分延展,叙事的主题越来越清晰,“盛宴必散”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清晰,如表2所示:

表2 “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主线

| 节日 | 回目 | 标题 | 叙事主线 |
|-----|-------|-------------------|------------------|
| 元宵节 | 第十八回 |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 元春省父母(天伦之乐) |
| | 第五十三回 |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 元宵开夜宴(热闹兴盛) |
| | 第九十六回 |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凤姐隐实情(危机四伏) |
| 中秋节 | 第七十三回 |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抄检大观园(秩序混乱,人人自危) |
| | 第七十五回 |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夜宴闻悲音(祖先震怒、大厦将倾) |
| | 第七十六回 | 凸碧堂品笛感凄凉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中秋作新词(不详预言、命运多舛) |

4.“其他节日”的点缀:个体生命历程的展现与主题的升华

从作品中“春”“夏”“秋”“冬”出现的频次上来看,“春”和“秋”出现了上百次,贾府中季节性的民俗活动也聚焦于“春”与“秋”的活动。然而,作者在对“节日习俗”的叙写上并不囿于“三春”“三秋”和“除夕”庆典的集体出场的正规仪式、大排场与热闹景象,而着意探寻这个大家族中个体生命的成长历程、情感诉求和生命活力。在此,作者将“春分”“清明”“端午”等岁时节令穿插于“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之中加以描绘,更多地贴近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流,叙事的视角属于“点聚焦”型,因而将红楼儿女“真性情”呈现在读者面前。李丽霞(2013)认为,作者在对这些节日的描述上,以情绪记忆为素材,以诗人的眼光反映人生感受,表达感伤情绪及对生命的追问,寄予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如表3所示:

表3 “散点式节日”的分布及主题寓意

| 季节 | 节日 | 事件 | 主题寓意 |
|----|-------|----------------|--|
| 春 | 春分 | 宝黛沁芳桥共读《会真记》 | 催生了宝黛觉醒的青春爱情 |
| | 清明 | 放风筝 | 远走高飞(探春远嫁) |
| | 芒种 | 宝钗扑蝶、黛玉葬花 | 饯花神,预示人物性格及命运 |
| 夏 | 立夏、端午 | 龄官画蔷、晴雯撕扇、宝玉挨打 | 夏日之骚动与无聊 |
| 秋 | 乞巧节 | 刘姥姥为“巧姐”取名 | 重点交代人物的结局(秦可卿、尤三姐、晴雯、黛玉先后死去,元春薨毙,探春远嫁,贾府被查抄),突出贾府的变故和至深至痛的儿女之情 |
| | 重阳 | 贾赦欲娶鸳鸯,造成母子嫌隙 | |
| | 小阳春 | 怡红院的海棠突然盛开 | |
| 冬 | 寒食 | 老太太提议办“消寒会” | 日常生活的片段,家常小聚 |
| | 腊八 | 宝玉编故事逗乐黛玉 | 宝黛和谐温馨的情感 |

春分时节,沁芳闸边,宝黛共读《会真记》,宝玉以“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首次对黛玉表明心迹。对此,纵使黛玉登时表示了愤怒,以“银样镞枪头”还击,但从后文的描写来看,黛玉心里也逐渐认同,自比莺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一旦被发现,必然少不了严厉的惩罚,而作者则寄予了“春分”这个万物复苏的时节以明亮的底色,映衬着宝黛美好的青春情感和生命物语;三月的大观园里一派花光柳影、鸟语溪声的景象,宝黛二人正是在春夏之交、万物萌芽之际,多年的两小无猜化生了儿女私情,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为对方心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两人的爱情正慢慢由暧昧走向明朗。

清明节的习俗是祭奠先人,在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作者用寥寥数语交代了这一天贾府的集体活动:这日乃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宁府的贾蓉也同族人各办祭祀前往。作者点明了清明节的习俗后戛然而止,而用大量的笔墨叙述藕官为菖官烧纸祭拜之场景

以及两人互怜互爱、惺惺相惜的戏中人生。菡官不幸离去，每到清明，藕官为菡官烧纸祭拜。作者用“假凤”和“虚凰”喻指两人的戏中角色，为“凤求凰”之意，宝玉听了故事后触景伤情、潸然落泪，突出了“红楼公子”的真性情。清明节的另一个习俗是放风筝，《清嘉录》中说：“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断鹞’之谚。”放风筝不仅是一种游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时人认为通过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有描述：当风筝放飞升高后就有意把引线剪断，让风筝远远飘去，据说可以带走晦气、烦恼、忧患和病痛。在红楼儿女中，作者对探春着笔浓厚，褒扬之词溢于言表。然而，她却远嫁他乡，与亲人骨肉分离，放风筝之寓意深刻，体现出作者对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同情与哀叹。

杨义(2019)²²⁸指出，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叙事作品所描写的某些独特的时间刻度，在中国作家笔下常常是生日和节日，是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带。《红楼梦》的叙事过程正是这样，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构成自然与人的成长在时间上的呼应与空间上的融合。最为典型的是黛玉生于芒种时节，而“钱花神”这一习俗与黛玉的前世后缘有着微妙的联系。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以“宝钗戏蝶”和“黛玉葬花”两个场景再现芒种节“钱花神”的习俗。特别是“宝钗戏蝶”一节让读者眼前一亮：只见那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迎风蹁跹，穿花度柳，引得宝钗蹑手蹑脚，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尽显妙龄少女的纯情与天性的活泼。作者着意描写宝钗青春舞动、陶醉于花丛中的一幕，将青春少女的生命激情与天真无邪展现出来，与平时罕言寡语、安分随时的形象判若两人；芒种前夜，黛玉去怡红院走访宝玉吃了闭门羹，伤心至极，以落花自喻，悲悲切切，令人怜爱。作者通过黛玉的悲泣落泪，将现实中的黛玉与前世的“绛珠草”联系起来，也借用了“钱花神”之俗喻时光易逝，人生无常，有着宿命论式的感伤。

腊八的习俗是吃腊八粥，《红楼梦》所记配方为各色米豆加红枣、栗子、花生、香芋等熬制，汇合众物之美，香气四溢，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在第十九回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腊八节前一天宝玉与黛玉躺在榻上，宝玉借腊八粥之俗，编了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哄黛玉开心，勾画出一幅两小无猜、两情相悦的画面，温馨感人，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春分到腊八，四季轮回，花开花谢，每一个节日习俗的叙写中都有着特定的聚焦和红楼儿女的喜怒哀乐，这些节日散点式地分布在多个章回中，对“三春”与“三秋”的主线进行了补充，而作者则将人物的个体情感与诉求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青春涌动的生命物语、家庭小聚的温馨场景、母子间隙的矛盾冲突、秋季海棠盛开的异兆等等，既串接了故事情节，又将民俗活动与人物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如诗如画、如梦如幻、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倾诉中，听到了人生的、生命的、人类的，乃至宇宙的恋歌和挽歌(白盾，2005)。

5. 结 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对深化小说主题、引领小说的叙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元宵节”与“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将“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主体结构展现了出来,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而其他节日民俗则意在表现“生命个体”在岁月的演进中的真实情感和生命感悟,展现出红楼人物的“真性情”。作者以“情”开拓出如泰勒所言的“内在空间”,建立以“情”为意义中心的内在价值,赋予“情”普世性的崇高力量(易洪宇等,2020),塑造出更具深度的个性自我,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感。作者对“节日习俗”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展示在读者面前,使得这部作品如同民俗风情的万花筒;同时对“节日习俗”的描写串联了故事情节、带动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转换、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既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又有着审美的意蕴,既突出整个家族“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又将生命个体在面对季候变化时的真情流露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将儒家价值观中通常被忽略或被鄙夷的“或情或痴,或才小微善”的女性生活经验,赋予道德权威与美学价值,为小说增添了人性的光芒,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意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升华。

参考文献:

- 白盾,2005. 悟红论稿:白盾论红楼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17.
- 戴冠青,2007.《红楼梦》叙事话语中的节俗文化精神[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1):44-46.
- 冯其庸,李希凡,2010. 红楼梦大辞典[M]. 增订本.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11-283.
- 李健彪,1993. 试论《红楼梦》中节日民俗的价值[J]. 唐都学刊(4):74-76.
- 李丽霞,2013.《红楼梦》岁时节令描写中诗意美浅析[J]. 渤海大学学报(3):93-95.
- 李广柏,2001. 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00-108.
- 李建萍,黄勇,2020.《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写及两个英译本对民族文化意象的传译: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分析[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172-177.
- 李英然,2013.《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J]. 红楼梦学刊(2):182-200.
- 刘盛昌,朱俊亭,1992.《红楼梦》的民俗描写与人物塑造[J]. 民俗研究(4):37-42.
- 刘奕男,2020. 论《红楼梦》叙事情节与季节的相关性:以“红楼十三年”宝黛爱情的发展为例[J]. 曹雪芹研究(4):98-106.
- 梅新林,纪兰香,2013.《海上花列传》的季节叙事及其与《红楼梦》之比较[J]. 红楼梦学刊(5):19-49.
- 孙春旻,2001.《红楼梦》诗性叙事探析[J]. 南都学刊(4):44-47.
- 唐援朝,1995. 论《红楼梦》的叙事时间[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28-33.
- 王彬,1998. 红楼梦叙事[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3.

- 王平,2000.《红楼梦》的网络式叙事结构[J].东岳论丛(5):123-127.
- 王平,2002.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明清章回小说叙事角度的演变[J].东岳论丛(2):72-75.
- 魏颖,2019.《红楼梦》的“形影叙事”与曹雪芹的自我形象[J].红楼梦学刊(2):185-200.
- 杨义,2019.中国叙事学[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易洪宇,木斋,2020.论明末清初人文主义思潮与《红楼梦》思想的源流关系[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85-95.
- 钟敬文,1998.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31.
- 周汝昌,2009.《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上海:中华书局:185.

作者简介:

李建萍,女,1968年4月生,浙江青田人,硕士学位,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

游戏本地化翻译策略比较研究

——以《守望先锋》为例

滕 梅 申 阳



摘 要:世界游戏产业发展迅速,中国近年来也成为最有潜力的发展市场,游戏的本地化翻译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本地化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倾向与特点,本文针对这一现象总结了其产生的种种因素,并以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以游戏《守望先锋》为例,对该游戏的本地化翻译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大陆)在本地化翻译中倾向于应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港台地区的本地化翻译倾向于异化为主,结合归化的翻译策略,此外,法规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语言使用习惯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可能对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的翻译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对该游戏的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游戏本地化翻译的特点与翻译策略的对比,对游戏等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翻译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游戏;本地化翻译;翻译策略;《守望先锋》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ame Localization:

Taking *Overwatch* as an Example

TENG Mei SHEN Yang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ideo game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tential markets, thu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re exists different tend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Aiming at the phenomen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phenomenon. Guided by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 *Overwatch*.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Mainland tends to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le Hong Kong and Taiwan inclines to combin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Besides, the factors of regulation and policy, market, language habits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may contribute to this discrepancy. B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ed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the game,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inspire more studies on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video game; localiz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Overwatch*

1. 引言

“本地化即对客户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项目的语言材料、程序、包装方案、用户界面等在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下进行翻译和改编设计,以适应特定国家和地域的市场需求的过程。”(苗菊等,2008)本地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本地化翻译,在将外来文化产品基于目标市场进行本地化的过程中,本地化翻译直接作用于目标市场中的用户群体,使文化产品满足特定的客户群体,消除外来文化产品本身的文化障碍,从而能够使文化产品在目标市场中吸引到更多的本地用户,进而融入目标市场。同时,“在本地化过程中,翻译活动与软件工程、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诸多方面融为一体,成为整个信息经济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具有提高效率、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的天然要求,翻译活动的经济属性凸显”(刘明,2013)。在跨国商业活动中,翻译活动与其他商业活动是相辅相成、共同发生作用的。因此,如何对出口产品进行本地化的翻译与加工,使其符合目的国家的客户和受众群体的需要,满足特定市场的用户对语言和文化适应和接受的特殊要求,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使得本地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的今天逐渐成为企业所关注的焦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多媒体娱乐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游戏产业蒸蒸日上,各种剧情饱满、画面优秀、玩法独特的游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中国的电子游戏市场也开始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一现象也伴随着不少问题。游戏的本地化翻译便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不同国家玩家对某一游戏产品的接受程度,更事关一款游戏软件的销售和利润。O'Hagan认为游戏也通常与软件程序相联系,这预示着本地化的重要性,因此决定一款游戏作品好坏的因素不仅与游戏本身的质量有关(如游戏的可玩性,画面质量,游戏声效、配乐、配音的质量,动画的演出效果,故事剧本的质量),还与游戏产品的本地化翻译质量有关(如游戏中的字幕、对话以及世界观背景的翻译水平、本地化语言配音质量等)。同时,游戏的本地化翻译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离完善还有很多路要走”(O'Hagan,2019)。这也决定了本地化翻译研究的迫切性和创新性。对中国来说,由于游戏进口审批制度的不同,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电子游戏引进是分别进行的,这也使得游戏的本地化翻译也是分别进行的。同时,由于文化、社会、语言使用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差异性,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翻译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本文将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指导下,以游戏《守望先锋》为例,对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本地化翻译进行对比,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2. 本地化翻译过程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策略体现着译者对翻译工作的整体感知和整体倾向,体现着译者对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理解,而译者在翻译策略上的总体倾向也是在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中逐渐形成的,因而通过对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窥见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一些因素。翻译策略在翻译活动中,是“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熊兵,2014)。作为最主要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2006)提出的两条翻译路径: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走向作者;要么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走向读者。后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正式提出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归化强调降低源语言中语言单位的陌生感,从而在翻译时更加贴近译入语文化中更为人们认同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行文更加流畅自然,能够将目的语语言的使用者对译文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增加目的语语言使用者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其缺陷则表现在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被剥夺欣赏异域语言、文学、文化的机会,而这“无助于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文化、文学的丰富和发展,无助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熊兵,2014),而且韦努蒂(2004)认为这还可能会强化强势民族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弱化弱小民族的文化身份。与其相反,异化翻译策略则将源语言中异域风情的元素保存下来,贴近源语言使用群体和文化的语言风格和特点,整体风格充满异国情调,从而能够使读者更好地贴近原作者,给予了目的语读者更近距离了解、感悟源语言文化和语言使用习惯的机会,这也更能彰显出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性。其优势主要有三点:一是异化翻译有利于促进目的语中外国文学的重构和本土文学变革;二是异化翻译有利于发展多元文化,促进全球文化的“百家争鸣”,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彰显文化多样性;三是传统的、倾向于归化的翻译掩盖了译者复杂的翻译工作,否定了其工作价值,而异化翻译有利于认可译者工作,提高译者地位。当然,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译文的可读性和译文与大部分读者的兼容性上,即译文“可能会生硬,不够地道自然,并因此影响译文在目的语接受者中的接受和传播”(熊兵,2014)。

在游戏本地化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策略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就“本地化”概念而言,其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语言文字的本地化翻译”,即所转换的语言文字必须符合目标语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表述习惯、法律法规要求和行业要求;二是“项目对象的本地化处理”,即对译文进行目标语国家或地区的适应性处理,使其呈现形式更符合目标文化的特殊要求。(管新潮等,2019)由于进口游戏等文化产品所涉及的题材广泛,可能会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社会、历史、习俗或特定的语言使用习惯,因此翻译策略的灵活选择和取舍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游戏本地化翻译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归化的翻译策略的应用可以将游戏文本中外来文化元素的陌生感降低,将某些

带有文化异质性的元素转换为译入语使用者文化中更容易理解的、在意义或文化上能产生相对对等效应的元素,从而使玩家产生一种共鸣感和认同感,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玩家融入游戏,提高代入感;而本地化中异化翻译策略的应用则可以将游戏中外来文化异域风情的元素保留下来,使玩家体会到异域文化的魅力和新颖,进而激起玩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产生一种新鲜感。

3. 法规政策因素

我国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对进口游戏进行统一管理,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针对广播电影电视颁布的《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在游戏产品的本地化翻译中国家“要求统一使用标准汉语,尽量避免在翻译中出现英文字母、不常见的外来词汇等妨碍理解的语言元素”(席敬等,2020)。相较于中国内地(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则没有对进口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翻译做出明确的要求与规定,因而翻译相对来说更为随意,经常会出现中英混杂、标准汉语与方言混杂的现象,译文也更加倾向于在形式上展现出源语言的特点。在这里,我们以游戏 *Overwatch* 的译名为例来进行分析。

首先,该游戏的英文原名 *Overwatch* 有看守、掩护、掩护射击的意思,其本意与游戏内容中的团队合作、射击等元素不谋而合,传达的是队友之间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的关系,从而使队友之间的团队合作能最大化地发挥出作用。同时,游戏的剧情背景是一个名为 *Overwatch* 的组织对抗越来越智能的机械所引发的一系列“智械危机”的故事,所以 *Overwatch* 的英文原名不仅是游戏中正派一方的组织名称,也诠释了游戏玩法的核心要素——团队合作。

就 *Overwatch* 的内地(大陆)版译名翻译而言,《守望先锋》很好地表达了“overwatch”这个词的本义,同时还表现了 *Overwatch* 这个正义组织在游戏剧情背景中的作用,即对抗智能机械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先锋军;其次内地(大陆)版译名的“守望”一词有守望相助、防守瞭望的意思,有为了抵御外敌,大家相互合作之意。这也与游戏 Logo 的设计不谋而合:Logo 中间仿佛两人击掌庆祝,有团结才能取胜的意思。因而内地(大陆)版的翻译结合了游戏原名的“overwatch”,同时为了使译名更好地贴近目标语玩家,命名为《守望先锋》,该译名在尽量表达源语言的含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归化处理,译名风格忠实,既符合了内地(大陆)标准汉语的表达习惯,又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进口文化产品名称翻译的政策规定。

而就 *Overwatch* 的港台版译名《斗阵特攻》来看,则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出与英文原名的关系。“斗阵”一词来源于闽南语系,其本意为“在一起、凑成一对”。在同性朋友之间,主要是指成为好朋友的意思,若是在异性朋友之间,则有成为情侣、夫妻的含义,“特攻”则是“特殊攻击”的意思,在游戏中,形色各异的英雄有着各种各样特色鲜明的技能,这些技能有攻击对手、防守进攻、强化队友以及控制对手等多种相对于普通攻击而

言的特殊攻击效果。因而综合“斗阵”与“特攻”两词来看,港台版译名阐释了游戏的核心玩法,也尽可能地将译名贴近译入语,即粤语语系及闽南语语系使用者的语言。可以看出,虽然内地(大陆)与港台在译名上都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最大化地将译名贴近目的语文化玩家的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但是内地(大陆)译名在传达源语言含义的基础上通过增译法来使语言更加贴近内地(大陆)标准汉语使用群体,而港台地区由于并没有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约束,其译名则采用了创译的翻译技巧,即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源语言自身含义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从而为目的语文化产品的接收者创作或改编一个适应目标语文化和语言习惯的新文本的翻译过程,译者创造性地将目的语特定地区方言元素融入游戏的译名中,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消费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进而拉近了源语言与当地游戏玩家的距离。

4. 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作为与游戏厂商有着直接关系的因素,对于游戏本地化翻译的影响较大。因为本地化从其定义来看,是“在一个区域市场(locale,以地域、语言和文化为标准界定)开发的数字化内容和产品进行改换,以便在另一个区域市场中销售和使用的过程”(Dunne,2006)。因而在市场因素中,不同地区文化产品市场的发展时间、发展规模大小以及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接受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不同地区本地化翻译倾向的重要因素。

首先,虽然中国内地(大陆)游戏市场蕴含着巨大潜力,但是由于在2014年才解除了施行14年之久的游戏机禁令,因此游戏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亟待发展和改善:①由于国产游戏存在高水平人才稀缺、开发资金不充足、开发技术不成熟等问题,导致国产游戏的质量参差不齐,游戏市场的占有率不高,而这些空缺就需要通过进口游戏来填补;②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内地(大陆)玩家对进口游戏的接受程度相对偏低。因而,进口游戏想打开内地(大陆)市场,除了游戏产品自身的高品质,还需要通过本地化翻译等各种手段迎合内地(大陆)市场,吸引消费者。

其次,中国港台地区的游戏市场起步较早,几乎与世界游戏市场的发展同步,与国际市场的接合程度相对较高,而且自身游戏市场发展速度较快,竞争较为激烈。同时,当地游戏玩家对进口游戏的接纳程度也更高,玩家群体中整体游戏氛围浓厚。因此,与国际游戏市场较好的接合程度以及玩家群体较高的接纳程度使得港台地区的进口游戏有着固定的粉丝群体,且群体数量也稳步增长。但是受制于港台地区游戏市场规模的限制,游戏产业的发展趋于平稳,发展势头存在不足。因此,港台地区为了吸引玩家,译者会倾向于使用标新立异、博人眼球的译名,从而在市场营销和玩家群体的舆论上使游戏获得足够的吸引力和注意力,进而潜在地提高游戏产品在同类游戏产品中的竞争力。

以上文中提到的 *Overwatch* 的本地化译名为例,内地(大陆)将其翻译为《守望先锋》,可以看出内地(大陆)的译名与英文原名的契合度更高,相较于港台版的译名也更

加正式,这也是与内地(大陆)游戏市场的发展时间短、发展水平欠佳等因素有关,内地(大陆)因此对原名采取了归化性的增译处理。而港台版的译名《斗阵特攻》则为了在自身发展稳定、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因而趋于停滞的地区市场中达到一种标新立异的效果,从而为了能够更加迅速地取得市场优势、得到玩家群体的广泛关注而另起炉灶,对译名进行了归化性的创译处理,给出了这一新颖的译名。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地区对一些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翻译采取市场优先的原则,这也会导致某些翻译出现过度翻译、甚至误译的情况,从而使某些文化产品在目标语市场中不仅得不到好的反响,反而获得一些负面的评价。例如1994年上映的电影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在进入香港和台湾市场时的译名分别为《月黑风高》和《刺激1995》,此类文不对题的翻译使得观众对电影的第一印象较差,从而导致了该电影在港台地区票房的低迷。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市场的发展时间、发展水平和发展态势的不同会使其翻译产生较大的差异,市场发展情况及其反响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往往会针对不同地区文化产品的译者在翻译策略上的倾向产生影响。中国内地(大陆)的翻译由于受到自身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的限制,对译文倾向于采用归化处理,译文更为稳妥、正式;而港台地区由于市场的发达和成熟,追求新颖的翻译,从而会对译文采取创译的处理,但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倾向上飘忽不定,甚至有时其翻译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牵制,过度追求新颖的译名,进而出现一些误译的情况。

5. 语言使用习惯因素

汉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具有各式各样的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使用习惯。在当代社会,中国内地(大陆)推行的是标准汉语和简体中文,而港台地区的通用语言由于多种原因,有普通话、粤语、闽南语和台湾普通话,而且其书面语言保持了繁体中文的书写习惯。

以香港来说,香港的英文普及率非常高,一些英文中的特定表达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粤语中,所以人们对英语和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在一些进口文化产品的翻译中会出现中英混杂、粤英混杂的情况。而台湾在日常使用的语言中混杂了闽南语,因此在对进口文化产品进行翻译时也会出现一些混杂着方言的语言表达。内地(大陆)由于方言使用群体的复杂,因而大力推行普通话,在官方语言的使用上十分规范且有章可循。其本地化翻译习惯以标准汉语为中心,使用归化的策略来降低内地(大陆)的人们对外来文化产品的陌生感,而港台地区不仅倾向于源语言的某些语言特点,还存在一些符合当地表达习惯的语言特征,地域性语言特色较为突出。在内地(大陆),人们对四字格的成语或者词语等构词方式情有独钟,在翻译上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将源语言所想传达的含义更加贴近标准汉语的使用习惯,也为了使源语言的意义更好更快地被人们接纳和吸收,在翻译时,四字格词语或成语的使用较多,例如, *Overwatch* 中的英雄技能术语的翻译就是如此,游戏中的英雄角色 Roadhog 的技能 Wholehog,大陆将其进行了归

化性的创译处理,译为“鸡飞狗跳”。其英文原名“Wholehog”,该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放手一搏,干到底,彻底,全部”。在这里内地(大陆)版的翻译对“Wholehog”进行了创译处理,由于该技能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敌人击飞,打乱敌人阵脚,场面一片混乱,所以译者将其处理为“鸡飞狗跳”,这一四字格词语符合内地(大陆)玩家在日常语言使用的习惯,同时该译名与该技能的自身特点非常符合,这一形象而生动的翻译使大陆玩家能够比较直观的理解到该技能的特点。而港台地区的译名则为“火力全开”,可以看到该译名与“Wholehog”的英文原义非常接近,取其“干到底”“彻底、全部”的意思,将原文采取归化的处理,既彰显其意义,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又例如游戏中另一名游戏角色的技能“Meteor Strike”,其原义为“流星撞击”,内地(大陆)版的翻译对该技能名称也采取了归化的处理方式,结合该技能释放时的特点,将其翻译为“毁天灭地”,这也是用了内地(大陆)习惯的四字格成语,降低了英文原名的陌生感。而港台地区,尤其是香港,在日常的语言表达上受到粤语使用习惯的影响,倾向于用三字格的方式对原文采取异化的处理,因此“Meteor Strike”被港台地区的译者处理为“流星坠”。首先在形式上,该译文采用了港台地区语言习惯中喜欢的三字格,其次,该译名在意义上也较为贴近原文,属于形式归化和意义异化的处理方式。又例如游戏中英雄角色“Roadhog”的翻译,港台地区将其译为“拦路猪”,“roadhog”一词的本义为“莽撞的司机、横冲直撞的驾驶员”,由于其性格莽撞,体格巨大,而将“road”和“hog”分别进行直译的处理,同时也巧妙地结合了“roadhog”一词作为整体词汇的本义以及该英雄外形像猪的特点,也顺应了港台地区多用三字格的表达习惯。而内地(大陆)将其处理为“路霸”,用两个字表现出该角色的原名意义和特点,翻译效果简洁明了且达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处理一些游戏的术语比如技能名称、角色名字的翻译的时候,内地(大陆)译者倾向于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均采取归化的策略,然后辅之以创译的翻译方法;而港台地区的译者则更加倾向于语言形式归化,意义异化的处理方式,从而将更为立体的形象呈现在玩家面前,这在港台地区的玩家群体中也有不错的反响。

6. 历史文化因素

从中国内地(大陆)来看,其大部分地区位于大陆板块内部,其语言使用习惯长期以来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开放程度相较于沿海地区差,对外来文化、外来语言的接受机会相对较少、程度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发达,内地(大陆)人们于外来文化、外来语言的接触机会和接受程度有所上升,但是依然存在外语普及度较低、外语使用人群较少,对外来文化现象不甚了解的情况,所以内地(大陆)的翻译为了整体考量,更加倾向于归化的翻译方法,从而让人们能够以自己熟悉的文化、语言使用习惯、语言表达方式来更好地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含义。而从港台地区来看,首先在地理位置上,相较于中国内地(大陆),中国港台地区由于其交通的便利性和开放性,使得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的频率更高、程度更深。因而经过历史长时间的变

迁和洗礼、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融通,这也在潜移默化中使得港台地区的语言使用习惯深受影响,所以港台地区的译者在处理外来语时倾向于贴近源语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以 *Overwatch* 中的台词来举例,游戏中某位角色的台词“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原意为“找错对象”。“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作为一句英语俚语,其来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猎人们在猎捕浣熊时,常在夜间依靠猎狗把浣熊驱赶至树上。猎狗会待在树根处狂吠不止,直到猎人赶来。如果浣熊不在那棵树上,那么猎狗就找错了对象,白费了功夫。基于这一解释,港台地区的译者将其翻译为“你吠错对象了”,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内地(大陆)相比更为深入,港台地区的玩家也很容易理解吠错对象的具体含义,因此港台版本的翻译对这句台词采取了异化的处理。而相对于港台地区而言,内地(大陆)由于本土文化氛围的浓厚,传统文化影响的深远,会在翻译中也加入一些本土文化元素,例如内地(大陆)的译者在翻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时将其处理为“黑狗吃食,白狗当灾”,这一谚语出自明代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指黑狗偷吃东西而白狗受到了惩罚,比喻代人受过。大陆将这句包含英语典故的台词巧妙地进行了归化的处理,用创译的翻译方法将传统典籍中的典故进行了移位,在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大胆地进行了等效的替换。相比于港台地区翻译的陌生化,内地(大陆)的翻译拉近了源语言含义与玩家的距离,从而让玩家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亲切感。除此之外,由于内地(大陆)本土文化的兴盛,尤其是近几年网络文化的发展,内地(大陆)版的翻译还会在译文中加入网络流行的文化元素,在 *Overwatch* 中,有一句台词的翻译就是如此,原文为“I tried my best”,内地(大陆)版的翻译对这句话也同样采取了归化的处理,译为“我使出洪荒之力了”。这句话中的“洪荒之力”最初来自《易经》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指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后来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中国选手傅园慧接受采访时说“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并配上傅园慧搞怪的表情,使其快速走红网络,“控制不了体内的洪荒之力”也成为网友调侃的常用语。从这两句台词的翻译可以看出,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中国内地(大陆)的译者在处理源文本时会归化地、创造性地采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或流行文化中的特定语言元素,以此来抵消一些外来文化的陌生感与距离感,同时也为目的语服务对象增加认同感和归属感。

7. 结 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游戏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稳步发展,国际的游戏公司越来越重视中国这一极具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大市场,而高质量的本地化翻译则是打开中国市场的一块敲门砖。在本地化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倾向与取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通过分析译者对不同翻译策略的倾向,可以总结和归纳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倾向的种种因素。与中国港台地区的游戏本地化翻译相比,中国内地(大陆)的本地化翻译刚刚起步不久,但是已经与港台地区的游戏

本地化翻译的倾向出现了差异。本文以《守望先锋》为例,总结了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本地化翻译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包括法规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语言使用习惯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对《守望先锋》的角色名称、技能名称、台词与对话的翻译的对比分析发现,内地(大陆)的本地化翻译更加习惯于贴近目的语,也就是内地(大陆)标准汉语的表达习惯,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注重归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一些内地(大陆)流行语的使用能使内地(大陆)玩家产生亲切感、归属感,拉近了源语言文化与玩家的距离;而港台地区的本地化翻译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法规政策、市场条件、外来语言对本地区方言的渗透性,倾向于贴近源语言的表达方式和习惯,采取异化为主、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本地化翻译的策略倾向虽然有所出入,但是孰优孰劣难下定论,因而中国内地(大陆)和港台地区要对双方的译文给予尊重和支持,在翻译中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以目的语服务对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使得进口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翻译工作和文化产品市场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管新潮,徐军,2019. 翻译技术[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30.
- 刘明,2013.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本地化翻译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3.
- 苗菊,朱琳,2008. 本地化与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J]. 中国翻译(5):30-34.
- 韦努蒂,2004.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87-272.
- 席敬,王靖锋,2020. 西方电影译名差异探析:以大陆及港台为例[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4):42-46.
- 熊兵,2014.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中国翻译(3):82-88.
- DUNNE K J,2006. Perspectives on Localiz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4.
- O'HAGAN M,2019. Game Localization: A Critical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Audiovisual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2019: 145-159.
- SCHLEIERMACHER F,2006.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25-238.

作者简介:

滕梅,女,1969年12月生,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申阳,男,1997年10月生,山东潍坊人,翻译硕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文学研究

《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①

陈俊伊



摘要:张爱玲被认为是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最有才华、最具风格的女作家之一。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色,戒》中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书写别具一格,甚至与张爱玲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也风格相左。张爱玲在《色,戒》中没有采用宏大的历史叙事策略,也不再关切庸常百姓在乱世中努力求存的生活图景,转而呈现了女大学生参加刺杀行动而命丧黄泉的悲剧与末世中繁华却又苍凉、夹杂着浓重失落感的上海形象。本文从《色,戒》的文本时间角度出发,剖析张爱玲作品中上海这一都市场域与挥之不去的“末世情结”的关联,同时思考张爱玲如何对沦陷时期上海形象的现代传统叙事进行瓦解,以及对乱世中女性自我表达实现的贡献性价值。

关键词:时间;张爱玲;上海;末世情结

The Textual Time in *Lust, Caution* and Eileen Chang's Apocalypse Complex

CHEN Junyi

Abstract: Eileen Chang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and styled female writer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books, *Lust, Caution* depicts the image of Shanghai during the Occupied Period with a unique style, which differs in the styles of other Eileen Chang's contemporary works. In *Lust, Caution*, Eileen Chang did not adopt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no longer cared about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troubled times. Instead, she presented the traged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assassination but died. The prosperous but desolate image of Shanghai in the wartime is mix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lo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background of *Lust, Caut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lingering “apocalypse complex” in Eileen Chang's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discusses

^① 本文系 2021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研究”(项目编号:N2021046)的结题成果。

how Eileen Chang dis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the image of Shanghai in the Occupied Period, and analyzes how this novel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female self-expression in troubled times.

Keywords: time; Eileen Chang; Shanghai; apocalypse complex

1. 引言

《色,戒》开始构思于1953年左右,张爱玲花费20多年来修改完善,直到1978年才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色,戒》无论是对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还是对“张迷”来说,都是张爱玲的诸多作品中最贵重的宝石,堪称是极品中的极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香港与上海是互为指代的两个空间,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的双城记并不少见。但在《色,戒》中,作者利用时间线索将两年前的香港与两年后的上海收拢在同一个叙述框架里,把整个刺杀事件写入了一个非线性的时间顺序中,时间便成为一个关键要素。女主人公王佳芝仿佛被裹挟在时间的洪流中,时间在文本中成了看不见的力量,却又无所不能,将她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卡瓦拉罗(2013)¹⁷³曾在《文化理论关键词》中说:“我们把握时间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王佳芝不自觉的强烈的时间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着她作为一个外来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知,她独自面对易先生体验刺杀行动的凶险,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一念之差将她推向了不可挽回、不可预测的末世。

2. 《色,戒》的历史时间

张爱玲曾在接受台湾作家水晶的访问时说过,她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在张爱玲去世后,其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明确指出,确是“各有所本”。因此,《色,戒》也被认为是“有所本的”。学术界对《色,戒》的解读历来争议颇多。

但如马家辉(2008)所言:“张爱玲是专业作家,从听来的故事里抽取出血肉,从读来的新闻中勾勒出框架,然后,像烹调金华腊肠一样,把血肉贯注入框架里面,制造出一篇好小说。”

根据宋淇的论述,《色,戒》的初稿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在张爱玲离开上海以后。此时的张爱玲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上海的生活经历依然是她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色,戒》的整个叙事都收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上海沦陷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为推动叙事以及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线索。张爱玲尽量虚化了故事背景,亦没有交代王佳芝的家庭背景。在《色,戒》中,张爱玲对历史的建构叙事“拒绝任何深层的结构或实证的意义”,其特点是“暧昧、混乱和颠倒无序”。(黄心村,2010)¹⁶³小说通篇没有交代太多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描绘的语言也晦涩难懂,背景虚无缥缈,省略颇多,

唯恐交代太多。张爱玲转而将笔墨集中在麻将桌上,用最不经意的笔触、最轻描淡写的冷峻态度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

小说以一场牌局作为叙事主轴,对于人物关系、故事背景的交代都隐藏在王佳芝与三位太太麻将局的对峙中。易先生一行人跟随汪精卫从重庆辗转香港出逃上海为一条时间线索,两年前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在岭南大学的话剧演出为另一条时间线索,王佳芝与易先生前两次约会的片段回忆为第三条时间线索。时间在小说中也不再被表现为一个直线发展的单一进程,相反,被打破成无数碎片。几个时间框架以错综复杂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叙事者的思想一再闪回,叙事时空在两年前的香港与两年后的上海之间跳跃。非线性的叙述方式,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并列与交叉,如同电影中“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打破了日常时间的顺序与持续。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手法,电影的叙事可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上取得极大的自由。张爱玲本就是电影迷,在她的其他文学作品中,能看到大量电影艺术技巧的运用。在《色,戒》中,张爱玲对“蒙太奇”的运用更是恰如其分、出神入化。文本中留下了大量的空隙与模糊、疑团,这也是张爱玲惯用的写作技巧,庄信正认为这是“西方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乔伊斯已经惯用的技巧‘藏闪法’”,文本中没有描写战争中常见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暗杀行动的刀光剑影,甚至连王佳芝被枪毙也只是一笔掠过,但正是这些留白与含混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猜想空间与解读角度,让人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当时紧张到令人窒息的诡异气氛。

小说通篇采用第三人称,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却在王佳芝的心理状态上耗费大量笔墨。在色诱易先生的过程中,在麻将桌上与三位太太的周旋时,王佳芝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张爱玲,2007)²⁷⁴ 张爱玲用大量篇幅细致地勾勒出牌局上三位太太的服饰打扮,却不曾详细展开故事背景与主题,字里行间仿佛在暗示什么,突如其来的“危险”也令初读者费解。张爱玲没有直指这一“危险”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交代何事的成败会牵扯到易太太。随着易先生的离开,王佳芝也“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说车在门口等着”(张爱玲,2007)²⁷⁴,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潜意识中推着王佳芝前行,每一次跟易先生约会都行色匆匆。

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

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回事了。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

(张爱玲,2007)²⁷⁶⁻²⁷⁷

王佳芝在几次约会中一直计算着、揣摩着时间,对易先生是否会准时赴约,她总在心里不停盘算猜测。“从心理学上来说,把时间划分为均匀的单元可以看作对付死亡知识的办法:似乎只要把那注定通向死亡的线路隔断,大限就会延迟。”(卡瓦拉罗,

2013)¹⁷⁶张爱玲关于时间文本的叙述策略,仿佛也在暗示王佳芝最终的命运走向。人的时间感常常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到具体心理状态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异常慢。因为焦急而精神集中,王佳芝才会有“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的恍惚,才会心神不宁。这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时间错觉使得王佳芝难以把握当下,也印证了卡瓦拉罗(2013)¹⁷⁶所说的“时间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统治着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地衡量时间,划分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最终控制时间”。王佳芝对自己每一次漫长的等待戏谑式的自嘲,也深刻反映出当时的女性,即使是在约会偷情的私人公寓也同样受制于男性权威而压抑自我的生存现状,易先生有意或无意让王佳芝等待,实则是对女性身心的操控和宰制。

再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张爱玲,2007)²⁷⁶⁻²⁷⁷

王佳芝始终带有不可推脱的时间意识,但她潜意识里明白不管自己如何处心积虑把控节奏,在与易先生的周旋中,她始终摆脱不了被摆布的命运,她也不过是老吴与她的同学们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的棋子。正是这种宿命的态度,才使得置身其中的王佳芝变得异常敏感,微小的细节都会被放大成“如同丝袜上一道裂痕”的“一种失败的预感”。作者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末世意识”就好像一切都在“来不及了”的急促中发生。时间像助推器、催化剂般让王佳芝始终置身于行色匆匆、焦躁不安的紧张感中,始终投身于时间的急流中,这急流把她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时间的逝去以及随之而来的“义不容辞”的不可挽回性也把她从香港推到了上海。在张爱玲笔下,“远行”似乎是她上海书写永恒的主题,在这场政治与情感交融的博弈中,读者能感觉到王佳芝对命运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深深无力感。即使是行动开始,王佳芝依然会揣摩易先生究竟是否“不拿她当回事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常常会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中,诸如曹七巧、白流苏,但她们心里又清楚男人不可靠,这也呼应了李欧梵(2010)在评论《封锁》时所提出的观点:“这里暗含了一个性别寓言,即‘正常的’时间和空间是由男人确立的,他们的历史直线演进观也左右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设大计。因此在她的小小说叙述结构里,通过让她的女主人公去争取克服男性主导的时间性,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借着她小说中的美学资源,也在试图超越她自身写作的历史境遇。”

与真实历史事件不同,张爱玲把暗杀地点从西伯利亚皮货店挪到了旁边的印度珠宝首饰店,选择在珠宝店进行暗杀,也更符合爱慕虚荣、想“敲竹杠”的情妇形象。此时王佳芝的内心比等易先生到来的时候更挣扎,竟有了“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的时间错觉,连楼下的橱窗也“随时都可以爆破”,只要“枪声一响,眼前的

一切都粉碎了”，如同末世般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这种幻觉反映了王佳芝内心的紧张继而转化为对现实的绝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到战争的隐喻性存在，也是对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的比喻。不安、悸动的心理状态化成“太晚了”的嗟叹，也呼应了上文中“来不及了”的绝望心理状态。作者的“末世情结”在此处显露无遗，她对王佳芝挣扎、焦虑、害怕、压抑的心理状态绘声绘色的描述，可以被解读成一篇末世寓言。王佳芝与她那微不足道的爱情随着枪响都将走向毁灭与死亡，她无力抵抗。这其实是同样作为“逃离者”“远行者”的张爱玲内心无力和绝望的展露，也是沦陷时期的上海女性生存困境的微缩写照。作为上海的书写者，张爱玲对沦陷时期的乱世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幻想是体现“末世”中人物内心压抑状态的具象展示，《色，戒》中也不乏似梦非梦的幻想书写：

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撒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搁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张爱玲，2007）²⁷⁵

在张爱玲的笔下，现实的上海成了似梦非梦的空间，她以虚写实的精妙手法展露了王佳芝内心极度压抑不安的心理状态，预见性地描绘了这段漫长的折磨即将结束的恍惚之感，处于极端危险中的主人公仍感觉到像棉被般的“温暖”错觉，也象征着王佳芝企图排解现实生存环境中积压的不安与焦虑，同时塑造了一个荒凉、令人窒息的末世。

3. 张爱玲的“时间感”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张爱玲，1996a）张爱玲在短篇小说集《传奇》再版序中如是写道。乍一看这段奇特的呼吁是张爱玲对迅速成名的急切渴望，毕竟成名是她的夙愿。纵观张爱玲同时期的作品，大都洋溢着与《色，戒》“类似的紧迫之感，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将一切抛诸身后，要挣脱，要逃离，要表现出她的不甘不愿”（黄心村，2010）²⁶²，想要在“末世”占领一席之地并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刻，这也是张爱玲在那个时代里最具个人色彩的时刻。张爱玲将个人声名与“末世”某种模糊的“荒凉感”联系在一起，这种对时间的论述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哲学意味。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1996a）

所谓“惘惘的威胁”，其实是人们无力改变的命运。“荒凉”暗示的是一种悲哀感，是对悲哀审慎的态度。张爱玲在这里传达的是一种迫在眉睫、箭在弦上的紧迫感以及力不从心、万般无奈的沧桑感。正是这种宿命的态度，使张爱玲预感到“更大的破坏”临近。当生存与死亡成了体验中心，作者笔下的王佳芝也是争分夺秒，即使作为上海的年轻“外来者”，却不甘做局外人，想要在乱世中实现“家国理想”。对于“末世”中浮世众生的生存境遇，张爱玲投入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王佳芝即是张爱玲，张爱玲从王佳芝的遭际中体会到生命的虚无与卑微，并将之投射到王佳芝身上。

“末世”即是黑暗、无法预知、无法控制的乱世。面对末世，张爱玲迫不及待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成全自己。即使是声名鹊起时，困扰张爱玲的始终是文明毁灭“这一令人沮丧的几乎末世般的图景”(张英进,2007)。正如王安忆(2003)所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文本策略上，张爱玲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直接暴露了她的世界观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其结果就是她所塑造的文学世界常是“荒凉”的，遍布着毁灭、废墟的乱世书写。这种“末世情结”的形成首先来源于张爱玲对战争的真切体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陷落。突如其来的战争将血淋淋的世界呈现在尚在读大学的张爱玲面前，她的良师死于战争，使她对个人命运的沉浮有了更深的迷惘。被迫中断学业的她逃离香港返回上海，此时上海也已沦陷。战争对人类个体生命的操纵与裹挟，让张爱玲意识到在社会的动荡与兵荒马乱面前，在战云密布的生存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如同草芥般脆弱、渺小、悲哀，只能听命于不可知的力量，根本无从掌控个人的命运。因此，她才“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张爱玲,1996b)⁴⁰这是张爱玲对战争最真实的体验，也呼应了她“出名要趁早”的观点。此时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迫切地需要写作、出版，不断讲述“末世”故事，因为战争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声音。即使《万象》杂志主编柯灵劝说她不要到处发表文章，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在“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张爱玲依然“等不及”了。她不顾友人的劝说，照旧以惊人的速度写作，毫无顾忌地在《杂志》(有汪伪政权背景)上发表作品，还“趁热打铁”将小说集交由《杂志》出版。甚至她笔下的王佳芝，在命悬一线的那一刻依然关心自己是否会因此出名。“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张爱玲,1996c)张爱玲潜意识里觉得若是再晚一点，上海的根基会在末日的分崩离析中都变成炮火的灰烬，只剩下断墙残垣的虚无。所以身在“末世”，个人的出名更重要。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英法租界，对于从小就生活在上海都市场域的张爱玲来说，上海的文化与她的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香港求学的经历使她的小说场景偶尔搬到香港。《倾城之恋》即“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上海与香港在当时是中国殖民地色彩最浓厚的两大都市，资本主义最早在这里生根。在张爱玲笔下，显然“香港一直是上海的一个补充，在她小说世界中的一个‘她者’”。(李欧梵,2010)张爱玲将《色，戒》前半部分故事背景放在香港也印证了此观点。张爱玲是

一位具有典型“末世情结”“末世意识”的作家，她最擅长用荒凉的笔触描绘“末世”，除了《色，戒》，张爱玲也在其他作品中探索关于“末世”的主题以及时代毁灭的表达。这些作品中时常晃动着动乱的阴影，到处弥漫着毁灭将至的危机感和阴霾感。《倾城之恋》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墙便是旧时代的遗物。靠在这堵墙上，花花公子范柳原用“地老天荒”去想象荒凉的世界末日，那时“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张爱玲，2009）¹⁸⁰ 只有到世界末日，他和白流苏若能再次相遇，才能相爱，因为在他看来“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张爱玲 2009）¹⁸⁷ 而在白流苏看来，范柳原这番说辞不过是想推托。如果感情非要等到世界末日才能确认，命运的威胁早已写在那堵墙上，即毁灭与死亡。李新民（2005）指出，“物欲、情欲、虚荣，对于人生一切物质层面上琐屑的计较、饱满的享受、热闹的追逐，正是基于精神深处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所以，才拼命想要攀住它们。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交织在一起，拥有与虚无彼此印证着，这就是张爱玲式的荒谬与苍凉”。对“末世”的恐惧与对未来的绝望，使得白流苏采取“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生存态度，此处张爱玲传达的依然是“来不及”的“末世意识”。因为身处“末世”，所以白流苏才急于抓住范柳原这根“救命稻草”，恰恰又因为“末世”，范柳原才决定和白流苏结婚。张爱玲在此处巧妙地以反讽的方式来表达对乱世的批判与讽刺。都市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的传奇，张爱玲颂扬了这个在满目疮痍的“末世”中最终获得胜利（婚姻）的女性人物，却愈加凸显了女性在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弱者的悲哀。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透露的浓重苍凉感以及悲观主义色彩，这与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联。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母皆出身名门。其母亲在她 4 岁时便远渡重洋出国留学，其父作为坐拥万贯家财的遗少整日沉迷于鸦片、堂子并再娶新妻。张爱玲曾因琐事与后母发生争执而被父亲毒打，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并将她监禁半年。从那时开始，张爱玲便对死亡威胁有了认识，也对人性的冷酷与亲情的虚伪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破裂的家庭、出走的母亲、冷漠的父亲给张爱玲的童年造成了极大伤害，构成了张爱玲“苍凉”的生命底色，影响并伴随她一生。对此，孔范今教授（1997）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家庭环境给予张爱玲的体验必然是双重的、分裂的：一方面那种众星捧月、悠游自在的生活使张爱玲比常人更能感受到一种实在的物欲的愉悦和温暖，使她更能理解琐碎生活中包含的生命情趣，这种体验形成了张爱玲思想中的世俗趋向与市民趣味；另一方面，笼罩着家庭的那种颓废没落、压抑、滞缓的气氛又使张爱玲切身地感到生活的虚无、荒诞以及命运的无常。”

在《色，戒》中，张爱玲隐去了王佳芝的家庭背景，即使王佳芝落得被枪毙的结局，也没人会惦念她。家人作为不在场者，如同张爱玲对她的亲人、家庭的感受，疏远而冷漠，她用文字揭露了内心生活的质感，投射到王佳芝身上便是“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的悲凉情绪。这种文学隐喻的运用有着纯粹的自我指代意味。不愉快的童年记忆决定了张爱玲成年后的心理走向与写作基调，她将这种悲观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寄托到笔下的人物上，借助人物形象的演示传递出来。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流露着的“末世情结”,无疑与“主流”中国传统文学基调不同,所呈现的上海故事也与茅盾等作家的小说有所不同。茅盾作为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责无旁贷地将爱国热情与民族使命感等主题融入上海书写中,始终以死亡、物资紧缺、社会动荡、革命作为统治性主题,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民族气节。张爱玲则无意于对沦陷时期的众生相作出道德审判,也无意于政治,她对“旧朝新国”有种本能的疏离,同时,具有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生姿态与价值观。身处“末世”的张爱玲强调的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关注战争背景下个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处境。平安大戏院的霓虹灯照旧亮起,电车的铃铃声不辍不休,“冷气玻璃柜”中的“西点蛋糕”依然香甜……身处“末世”的每个人都绝望而渺小,每个人都想攥紧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一切来抵御内心的恐惧与压力。在张爱玲笔下,“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1996b)¹³。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色,戒》中,张爱玲以怜悯又讽刺的姿态关注女性在乱世中的焦虑、渴望与自我救赎。张爱玲笔下的《色,戒》跨越了国家、民族、责任、道德等现代传统战争叙事元素,将这些宏大叙事全都隐遁于小说背景之后。作者无意于呈现如“时代的丰碑”那样的作品,而是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切入时代,使得处于“末世”的女性自我表达具有颠覆性意味。张爱玲以这种毫无英雄主义色彩可言的“末世”书写来精心描述沦陷时期的伤痛,实现了乱世中女性独特体验的自我表达。

参考文献:

- 黄心村,2010.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M]. 胡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卡瓦拉罗,2013.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孔范今,1997. 20世纪中国文学史[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946-947.
- 李欧梵,2010.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修订本. 毛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92.
- 李新民.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76-81.
- 马家辉,2008.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99.
- 王安忆,2003. 王安忆说[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321.
- 张爱玲,1996a. 传奇[M]. 大连:大连出版社:2.
- 张爱玲,1996b. 流言[M]. 大连:大连出版社.
- 张爱玲,1996c. 惘然记[M]. 大连:大连出版社:11.
- 张爱玲,2007. 色,戒[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张爱玲,2009. 倾城之恋[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英进,2007. 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 秦立彦,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52.

作者简介:

陈俊伊,女,1990年4月生,浙江绍兴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文学研究。

孤独·隐喻·悲悯:白先勇小说的另类生命悲剧书写

——以“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为中心^①

冯莹莹 黄爱华



摘要:白先勇是誉满海内外的当代华语文学的领军人物,生命悲剧书写是他始终不渝的创作取向。“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部小说关注生活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华人同性恋群体,在挖掘他们面对命运不公的孤独、无奈及自我救赎的同时,也隐含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小说运用疾病的隐喻、音乐的象征等艺术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立场,是白先勇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升华之作;且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纽约华人世界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文学镜像,颇具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白先勇的悲悯情怀源自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生命体验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源于童年经验、人生经历、文化接受及认同危机等多方面影响。

关键词:白先勇;生命悲剧书写;悲悯情怀;“Danny Boy”;“Tea for Two”

Loneliness, Metaphor and 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Tragedy of

Life in Bai Xianyong's Novels

—Centered on *Danny Boy* and *Tea for Two*

FENG Yingying HUANG Aihua

Abstract: Bai Xianyong is a leading fig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hose life tragedy writing is his undying creative orientation. *Danny Boy* and *Tea for Two* novels focus on the Chinese gay community in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liv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IDS epidemic. While exploring their loneliness, helplessness and self-redemption in the face of unfair fate, they also implicitly criticize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novel uses the metaphor of disease, the symbol of music and other artistic techniques to implicitly express their own emotional attitude and cultural stand, which is the sublimation of Bai Xianyong's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humanistic spirit. As a literary mirror image of the ugly history of the

^① 本论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资助项目成果。

Chinese world in New York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t is of great cognitiv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Bai Xianyong's compassion is derived from his profound lif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nd lif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tragedy formed therefrom.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his childhood experience, life experience, cultural acceptance and identity crisis.

Key words: Bai Xianyong; life tragedy writing; compassion; *Danny Boy*; *Tea for Two*

作为当代华语文学的领军人物,白先勇可谓誉满海内外,被称为“当代汉语文坛的旷世奇才”(陈瑞琳,2017)。在白先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对生命悲剧的书写是他始终不渝的创作取向。尤其是他的同志小说,以对心灵迷茫、命运沉沦的同性恋群体的描绘,直击孤独、死亡等人生命题,表现出其生命悲剧书写的另类性。《孽子》《青春》《月梦》等作品,都是深刻体现其生命悲剧意识的作品,特别是创作于21世纪初、收入小说集《纽约客》中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随着《纽约客》的广为传播而格外引人注目。不过,或许是由于题材的疏离与隔膜,这两部小说一直没能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本文即以此两部作品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深入解析白先勇进入人生成熟期后的另类生命悲剧书写,即对华人艾滋同性恋群体孤独无奈和悲剧命运的细致描画、对疾病的隐喻和对音乐象征等手法的巧妙运用,并进一步探究他文字背后浓浓的悲悯情怀及生命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外部原因,以深化白先勇小说和华语文学研究。

1. 孤独与无奈:艾滋情境下的世界

在异性恋文化中,同性恋者在东西方常被定义为“异端”“怪胎”。异性恋文化是借由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二元对立建构而成的,其构成的对立结构在认可男性权力行使的同时,异性恋规范也就随之得到认可,而同性恋则成了另类。出于对此的认识,白先勇的同志小说总是透露出命运不可把握的生命悲剧意识。存在主义认为,自由、孤独、死亡和无意义是生命的四大命题。孤独是与社会隔离、无所依傍、孤单无助,是个体生命面对外界的一种深深的疏离感。而“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由于是一群身患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其生命的悲剧底色又比白先勇前期同志小说浓烈、深重了许多,体现出更加刻骨铭心的孤独感与对群体悲剧命运的无奈感。

1.1 孤独灵魂:两难境地下的抉择

“Danny Boy”是白先勇于2001年发表于《中外文学》的中篇小说,故事以主人公吴云给表妹韶华写信的书信体形式呈现,塑造了一个为世所不容的孤独灵魂。小说的前一部分讲述了云哥在台北任教时爱上学生K,因向K倾诉爱恋之情遭到学校开除,后逃离至美国却染上艾滋病。他在“香提之家”(艾滋病患者的互助组织)遇见“Danny Boy”

(丹尼),无微不至地照顾丹尼直至他去世。最终云哥自己也在另一个义工大伟的照料之下,安然离世。小说的后一部分则是讲述韶华从台北来到曼哈顿,在云哥的床边为云哥和丹尼默祷,其间以韶华的视角插叙了云哥孤寂而又凄凉的身世。

云哥曾经是一个对学生体贴关怀、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不过他特别关爱的一般都是那些孤独寂寞、敏感内向的少年。云哥之所以只钟情于这类少年,在韶华对云哥身世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云哥实际上在寻找“另一个自我”。原来云哥出生不久父亲离世、母亲改嫁,他过继到韶华家中,被韶华的母亲视为累赘,只得忍气吞声。云哥在少年时期总是落单,以致其在成为教师之后格外怜惜那些性格内敛、内心孤独的学生。正如当代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2007)¹⁶⁹所说:“人对于他人所燃起的慈善火花,乃是因为触及其自身的悲苦、自身的表象、与自身的卑贱轻微的最深处。”云哥把自己的视线转向自己的“同类”——那些人群中落单的孩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同样的悲苦和卑贱,因而怜悯并爱他们。但这种不符伦理道德的爱,注定要为社会规范所不容。在遭学校驱逐之后,云哥自我放逐,选择去美国纽约打拼。但美国并非他想象中的自由天堂,他艰难地谋求生路,历经生活磨难,还不幸患上了艾滋病。白先勇通过韶华对云哥的回忆和怀念,也表明了自己的情感态度和立场:云哥是无辜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有着必然性与不可违抗性。正如他对“孽子”的“孽”所作出的解释——“孽”是“一种人性无法避免、无法根除,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刘俊,2009)²⁷⁰。而白先勇之所以要为云哥们安排个体死亡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借此揭示像云哥这样的人痛苦的根源——内心的孤独与无助,并以生命的毁灭把悲剧推向高潮。

纵观白先勇的同志小说,总是以人的内心情感为聚焦点,他擅长写人,而不是讲故事。白先勇感兴趣的不是同性恋故事本身的曲折离奇,而是同性恋者内心无边垠的孤独感和对命运沉沦的无奈。故他写人情,写人性,写灵与肉的冲突,特别是着重表现主人公忠于自己内心还是违心向社会回归的两难选择。所以在“Danny Boy”中,白先勇选择以外在行为与内心欲望的极端矛盾来构建小说主人公云哥形象——一个受众人尊敬的资深教师,却对同性充满着深刻怜悯与爱恋。白先勇借由云哥形象的塑造及其被驱逐结局的设定,突出了同性恋者没有希望的情感追求以及痛苦的两难抉择:要么抛弃特殊的情感向社会回归,要么因顺从天性而遭受放逐,在孤独和无助中走向死亡。对于这一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正是白先勇在同志小说中不断探索而试图找到答案的。

1.2 群体离世:艾滋吞噬下的无奈

继“Danny Boy”之后,白先勇又于2003年发表了另一部同样题材的小说“Tea for Two”。不同于前者,在“Tea for Two”中,白先勇深入不为常人理解的纽约华人同性恋圈群体,细致描绘了一个被社会边缘化、人人内心孤独惶恐、最后被艾滋无情吞噬的同性恋群体的世界。

小说开篇便向我们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纽约曼哈顿街上十分

走红的“欢乐吧”，一家名为“Tea for Two”的酒吧。在这里同性恋群体完全顺应天性而不必伪装自己。在位于餐厅之前的酒吧里，东尼的同性配偶大伟经常会为来客自弹自唱动人的流行老歌。相较于格林威治村酒吧的狂野，Tea for Two 酒吧多了一丝雅逊与温柔。正是在这里，“我”（即“罗”）结识了安弟、“胖爹爹”东尼、“大爹爹”大伟、黑里俏的珍珠、牛高马大的百合、秀媚可人的仔仔、大肉山名导演米开兰基诺，还有当过健美先生的调酒师金诺及他的伴侣小壮汉费南度等。在这样一个暂时获得自由放松的欢乐场中，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真正的自己，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20 世纪 80 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国出现并迅速在一些特殊群体中蔓延。“Tea for Two”没有回避同性恋群体遭受艾滋厄难的惨象，最能给读者造成冲击的莫过于人物形象的巨大反差——这些人物或在艾滋病的折磨下变得面目狰狞，或在疾病威胁下服药自杀。当“我”失去安弟后再次来到纽约，出现在眼前的是因金诺逝世而中风的东尼、苍老消瘦的大伟、面庞凸起肿瘤且眼皮长满肉芽的仔仔、脸颊发暗发乌的费南度，而东尼和大伟这对曾经让人羡慕的爱侣，也已因艾滋即将走向人生的终点。这样的前后对比与结局，暗示了同性恋者在艾滋吞噬下生命的支离破碎。相较于“Danny Boy”中主人公在遭到社会放逐后个体孤独死亡，“Tea for Two”更有一种集体离世的无助与无奈。作品中人物的一切行为动机，似乎都是出于内心孤独；因孤独从而寻找理解、抚慰而报团取暖，患上艾滋病只好离群索居直至去世。无边的孤独和对生命即将逝去的无助无奈，时时啃噬着他们的内心，强化着生命的壮烈和悲怆，只有死亡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面对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世界的满目疮痍，白先勇常常为笔下人物在历史与命运洪流面前的渺小和无助而感到痛苦悲哀。在那“谈艾色变”和同性恋还没有得到理解、包容的 20 世纪 80 年代，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在极其有限的自由之外，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生存无意义感。白先勇能做的，似乎只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尽量用温暖的文字细腻地描述他们的孤独和无奈，用悲世悯人的大爱去理解和尊重他们，用人性的光辉去照亮那个艾滋情境下的世界。当然，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其中也隐含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的美国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批判。

2. 隐喻与象征：情感立场的含蓄表达

白先勇的同志小说创作时间跨度长，早期作品因为多单篇短制，艺术手法较单一，人物形象也显得单薄而趋于平面化；中期代表作如《孽子》由于是长篇小说，包含的生活容量大、人物形象较丰满，更以深刻揭示台湾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力量取胜；而作为后期代表作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在艺术表现上又有了新的探索与突破，即在书写生命悲剧时，不再只满足于直接的社会批评和情绪宣泄，而是擅于运用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来含蓄地表达其情感态度和立场，不仅增添了作品的蕴藉美、音乐美，也增加了联想和想象的审美空间。

2.1 疾病隐喻:死亡威胁下的自我救赎

自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开始创作同志小说,其作品都在传达这样一种文化语境:正是由于对同性恋没有医学上的统一解释,也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才导致几乎不可能为同性恋争取到平等的生存权。而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白先勇不仅继续直面同性恋问题,还加入艾滋病这一核心元素,使得生命悲剧书写突破了常规,直接面向疾病与死亡的命题。而面对死亡的终极威胁,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尽管惶惑、惊恐、不安,但并没有丧失生的意志,而是互相帮助慰藉以实现自我救赎。这既是他们善良本性的表现,又是作者悲悯意识和情感立场的体现。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2004)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人们惯用借战争隐喻疾病,而这种形式就“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疾病看作外来的‘他者’,进而把疾病妖魔化,并将错误归咎于患者。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艾滋病不同于癌症、肺结核一类的疾病,其隐喻的特殊性就体现于以下两个层面:其一,艾滋病作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最早于1980年10月在美国的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这使得同性恋群体被视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者;其二,早期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传播,这一特殊途径使人们想到了具有很强传播能力的梅毒,致使人们“谈艾色变”。以上两个层面足以使同性恋者,尤其是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作为“疾病的牺牲品”,陷入被歧视、被迫害的生命困境。

“Danny Boy”和“Tea for Two”的故事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艾滋病肆虐美国的现实背景,在那个年代,同性恋群体在患艾滋病之后想要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帮助几乎不可能。白先勇在“Danny Boy”中努力去做的,就是试图为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寻求一条救赎之路。

云哥生活在纽约的“同性恋大本营”——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结果他毫无防备地被绑进了这场死亡游戏,成了艾滋病的牺牲品。细读文本,所谓“黑夜里的街”“人挤人的酒吧”“肉身碰撞的土耳其浴室”“公园丛林的幽深处”(白先勇,2015)⁸⁶等含蓄的话语,实则隐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HIV病毒在纽约的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这不是对现实场景的真实摹写,更多的是世人对同性恋群体道德堕落的隐喻性想象。为此,作者借助“香提之家”的经营模式,提出了救赎这一类群体的方式——通过救人以实现自我救赎。云哥到美国后并未被社会所接纳,他犹如行尸走肉,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他者”,更是性取向的“他者”。然而,正如歌曲“Danny Boy”是一位父亲为死去儿子所作的挽歌,在“香提之家”,被驱逐至纽约的云哥得以建构“父亲”身份,寻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对Danny的照料不是为了今后自己能受到同样的照顾,而是借此自我救赎。在“Tea for Two”中也是如此,面对汹涌而来的艾滋病,后得病者无私地抚慰先得病者,病情尚不严重的照顾病情严重的,让每个孤独的灵魂在走向死亡之前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精神慰

藉。通过这种接力救助模式,云哥、大伟等人实现了由放纵到互助、由遭人唾骂向自我救赎的跨越和升华。

白先勇通过疾病的隐喻,表达了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深层困境:他们作为艾滋病的受害者、“疾病的牺牲品”,遭到社会的歧视和唾弃而不得不忍受孤独、离群索居,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与以往创作的同志小说不同,白先勇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都淡化了为同性恋争取平等生存权,而转向同性恋者的自我救赎。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但也是真实而无奈之举。因为对于身患绝症的同性恋群体来说,活下去已然成为一种奢望,只有自己互爱互助、自我救赎,才能使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多一点温暖和光亮。死亡威胁下的自我救赎,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对社会和命运不公的抗争。这也正是白先勇力图通过文字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立场。

2.2 音乐象征:悲剧性叙事空间的建构

“Danny Boy”和“Tea for Two”的艺术探索,除了隐喻,还突出地表现为音乐元素的融入,即借悲剧性音乐叙事空间的建构表达作家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立场。这两部小说的音乐象征是非常明显的,甚至直接以歌曲名作为作品名。白先勇之所以会选择以音乐元素建构小说意义,是因为“听觉像视觉一样是一种认识性的而不是实践性的感觉,并且比视觉更是观念性的”(黑格尔,1981)。音乐元素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并非单纯用于情绪与氛围的营造烘托,而是小说创作的手段与目的之一。他会使音乐元素在作品中作为一种多情境符号,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下参与小说意义的建构。

“Danny Boy”和“Tea for Two”在作品中皆有两层含义。它们既是歌名,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含义:前者取自丹尼(Danny O'Donnell)的昵称,后者则是男同性恋酒吧名。以著名歌曲作为小说题名,应该说是白先勇欲借歌曲略带忧郁的情绪氛围来奠定作品低沉感伤、哀切动人的基调,而“Tea for Two”所蕴含的悲剧意味,明显比“Danny Boy”更为浓烈。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音乐是一种象征,它把历史的时间推衍,变换成了一种社会空间的生成”(陆正兰,2017)。在小说“Tea for Two”中,音乐“Tea for Two”曾四次参与小说意义的构建:前两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叙事空间中,使得他们的欢乐达到高潮,而后两次则是借助音乐所构造出的音乐空间形象,使得虚构空间与现实世界形成巨大反差,由此传达出作者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与文化立场。如在文本开始所构筑的音乐空间中,大伟与东尼在庆祝他们在一起四十周年的纪念派对上对唱,并表演了一段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喜剧电影“Tea for Two”中桃丽丝·黛和戈登·麦克瑞合跳的踢踏舞。由此便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中奇特的音乐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欢愉而略带疯狂的纽约“欢乐时代”。在逃离纽约五年之后,当“我”在小木屋中听到收音机中桃丽丝·黛甜丝丝的磁性歌声时,音乐第三次进入叙事空间,并成为人物命运的情境符号。借由音乐“Tea for Two”所建构出的叙事空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

“欢乐时代”,而现实空间显然已转移至 80 年代中后期,此时的纽约已经成了同性恋群体的“坟墓”:以安弟因被抢劫而遭遇车祸为铺垫,小说中的同性恋群体支离破碎,角色依次谢幕。两个空间所构筑的巨大反差在收音机放出“Tea for Two”时瞬间融合,小说所构成的生命悲剧氛围也于刹那间达到高潮。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白先勇对同性恋群体的悲悯与同情——他们在遭受世人唾弃与失去挚爱之时,仍惨遭病痛的非人折磨。

“Tea for Two”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末尾:“突然间,几乎同时我们一齐唱起“Tea for Two”来。可是我们一边唱一边却拼命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生怕一掉泪,正在踢踢踏踏跳往‘欢乐天国’的大伟和东尼会被我们拖累,跳不上去了。”(白先勇,2015)¹⁴⁹在艾滋病的死亡氛围中,他们尽情歌唱走向狂欢,“Tea for Two”作为他们曾经幸福的情境符号,搭建起了未来与昔日之间的桥梁。在这里,反复出现的音乐建构起了悲剧性的叙事空间,其所传达的情绪不仅仅含有人道主义的悲悯,更隐含着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和同性恋群体的美好祝愿,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立场。

3. 悲悯情怀及生命悲剧意识探源

悲剧是一种强力撞击心灵的悲怆的艺术,隐含诸多人生哲理和命运的无奈。如果说悲剧可以分级的话,生命悲剧无疑是悲剧的最高级。白先勇笔下的同性恋群体的悲剧命运所以能拨动读者心弦,撞击人的心灵,除了悲剧自身的艺术审美魅力之外,其中还有其独特的精神含量和风骨,这就是我们在作品中读到的作者那种与他的情感立场相契合的深微而凝重的对他人、对生命的悲悯情怀。悲悯情怀是一种普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及人性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一种最温柔也最有震撼力的情感和大爱胸怀。

3.1 悲世悯人的博爱情怀

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正因为有同情,人类才告别动物性而有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乌纳穆诺(2007)¹⁷⁰认为:“怜悯是人类精神之爱的本质……有爱才有怜悯。爱之愈深,怜悯亦愈深。”白先勇作为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就是这样一位心存善念,别具悲悯之心和博爱情怀的人。他说:“我不能忍受别人的痛苦:别人的不快乐,连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好受。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今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先勇,2011)故而他能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作为其贯穿一生的写作宗旨,甚至把向来被人忽视、遭人不齿的同性恋群体作为书写对象,对他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进行细致描绘,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关照,给以温暖,透露出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悲世悯人的博爱情怀。

在白先勇看来,同性恋者理应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尊重,他以一颗感怀时世、同情弱者、怜惜苦难的悲悯之心,去观照人类的痛苦、孤独与无助,通过“Danny Boy”和“Tea for Two”向世人呼吁,不应把艾滋病患者妖魔化,其本身也是牺牲品。这正是白先勇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升华,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大爱胸怀。笔者认为,白先勇的悲

悯情怀,源自他对世界、对人生深刻的生命体验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源于童年经验、人生经历、文化接受及认同危机等对他的多方面影响。

3.2 童年经验与同性之爱

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的先在意象结构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建立,因而童年经验或多或少都会作为先在意象结构对作家性格乃至其创作风格产生影响。白先勇生于1937年,整个童年几乎都在战乱中度过。令他记忆深刻的是母亲马佩璋带着全家从南宁辗转逃难到桂林,落脚在破旧阴森的铁佛寺。在这样的时代动荡和家庭遭际之下,“长辈关于老屋的鬼故事、作为空袭信号的红气球、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泥水匠、房子中冷不丁出现的蜈蚣、壁虎和蝙蝠”(刘俊,2009)³,便是白先勇对世界的最初感知,给他的童年记忆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白先勇从小体弱多病,7岁不幸患上肺结核,被隔离在一个小山坡的房间里。长达4年的幽居和孤寂无聊,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孤独、无助与被抛弃。童年时期缺乏情感安全感,使白先勇的性格变得愈加脆弱、孤僻、内向,也培养了他易于感知他人痛苦的细腻心理和共情能力。童年经验造就了白先勇聪慧、敏感的性格和感性气质,为他多舛的人生命运铺垫了一层灰暗的底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感知,也为其之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倾向和风格基调。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白先勇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感经历。白先勇终其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却有一个生死契阔、相伴一生的挚友王国祥。从1954年高中时两人结识成为知己,到1992年王国祥在美国因病去世,两人保持了长达38年的同性感情。白先勇在《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文中,用写实手法平实地记录了他们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患难与共的风雨人生,感人至深。20世纪80年代末,白先勇在接受《花花公子》记者采访时,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这终于使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得以拨开。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性之爱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最爱的母亲、姐姐、父亲、挚友的相继离世,让白先勇经历了一次次铭心刻骨的生死体验,使从小埋下的生命悲剧意识的种子得以催生,并不断得到强化。也引发他对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的思考,认识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悲凉与绝望,从而对生命悲剧和死亡的意义有了自己独特的认知,因而他选择悲世悯人,选择与死亡和解。

3.3 文化接受与认同危机

除了童年经验、同性之爱及对生死的感悟,白先勇的悲悯情怀及生命悲剧意识形成的动因,还与他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及认同危机有关。正是传统文化的深层滋养以及双重的“他者”的身份,促成并强化了白先勇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白先勇持久、深远的影响。白先勇与传统文化的结缘,始于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即童年患病期间照顾他的厨子老央。老央给他讲的《说唐》《薛仁贵征东》等古代英雄传奇故事,引起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最初想象。传统文化和文学慰藉了白先勇孤独的童年心灵,也使他后来对饱含情感美和蕴藉美的中国

古典文学和戏曲情有独钟。他数十年来对小说《红楼梦》和昆曲《牡丹亭》近乎痴迷的爱,早已超越了一般爱好者和研究者,完全是一种心灵的相通和相契。中国古典美学讲求“以悲为美”,无论是诗词曲赋还是演义小说,都以悲剧审美取胜。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少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悲剧精神,有的大多是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底色,而悲悯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情感。毋庸置疑,白先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孜孜渴求与对古典文学名著的大量涉猎,使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悲剧意识、悲剧审美,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其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的萌生、滋长和强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丰厚的艺术审美营养。

其次是双重的“他者”身份,强化了白先勇的文化认同危机。白先勇于1963年赴美求学,长期的异国他乡生活,使他除了文化乡愁,更多的还有作为留美华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差异,导致了白先勇在文化、情感、语言方面的多重“他者”属性。这种种“他者”属性积聚起来,深化了白先勇的生命悲剧意识。更可悲的是,作为留美华人的中国人,他们不仅仅是异国的“他者”,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成为自己祖国的“他者”。白先勇笔下的海外华人同性恋者,几乎都是悲剧性结局,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与异质文化难以完全相融,产生认同上的失落和冲突。而由于久居海外,他们的文化建构中又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异质文化成分。因此,在主观上,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在客观上他们同样不完全是中国人。双重的“他者”身份及文化认同危机,无疑强化了白先勇关于人在命运和历史面前异常渺小无奈、只有与死亡和解的生命悲剧意识,同时也深化了他的悲世悯人的博爱情怀。

总之,白先勇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部小说突破了他前期同志小说对普通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情感描写,而关注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华人同性恋群体。在挖掘他们面对命运不公的孤独、无奈及自我救赎的同时,也隐含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小说运用疾病的隐喻、音乐的象征等艺术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尤其是借由音乐空间形象的生成传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尽管还存在一些局部不足,“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部小说仍然称得上是同志小说中的精品,是白先勇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升华之作,且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纽约华人世界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文学镜像,至今仍然具有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白先勇,2015. 纽约客[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白先勇,2011. 树犹如此[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64.
- 陈瑞琳,2017. 童年、戏剧与同性之爱:白先勇创作人格成因浅析[J]. 名作欣赏(1):27-30.
- 黑格尔,1979. 美学:第三卷 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331.
- 刘俊,2009. 情与美:白先勇传[M]. 广州:花城出版社.
- 陆正兰,2017. 论白先勇小说中音乐一空间的社会象征意义[J]. 当代文坛(3):71-73.

桑塔格,2007.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07.
乌纳穆诺,2007.生命的悲剧意识[M].段继承,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作者简介:

冯莹莹,女,1997年3月生,浙江宁波人,文学学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20年毕业,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黄爱华,女,1962年12月生,浙江温州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研究。

鲁迅的诗歌创作浅探

林 伟



摘 要:鲁迅先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除了旧体诗,还有开风气之先的新诗。本文旨在全面地探讨鲁迅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就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所受的文化传统影响、诗歌的创作成就及影响、诗歌理论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粗浅的探讨。鲁迅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越文化的熏陶,为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旧体诗创作具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创造性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受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艺术上具有意蕴丰富、风格沉郁顿挫、构思雄奇独特等特点,也有典出僻冷、令人索解为难的地方。他的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具首创之功,言之有物,寄寓深刻,又冷隽尖刻,幽默泼辣。

关键词:鲁迅;旧体诗;新诗

On Lu Xun's Poetic Creation

LIN Wei

Abstract: Lu Xun has written many popular poems, in addition to the old style poems, there are also new poems that pioneered the trend.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Lu Xun's poetry achievements, an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uperficial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on his poetry creation, his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in poetry, and poetry theory. Lu Xu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ce childhoo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poetry creation. His old style poetry creation has the taste of a traditional literati doctor, creatively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in China, influenced by Qu Yuan, Li Bai, Li He, Li Shangyin, Gong Zizhen and other people, and the a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meaning, the depressed style of pause and Transition, the magnificent and unique conception and so on, and there are also secluded and difficult places. His new poems are Pioneering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y are substantive, profound, cold, and humorous.

Keywords: Lu Xun; classical poetry; new poetry

鲁迅先生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小说、杂文和伟大的思想都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而他“偶尔玩玩”而创作的诗歌,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诗,也都如星辰在河汉熠熠发光,值得我们吟咏、咀嚼和探讨。鲁迅的诗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受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人影响,具有意蕴丰富、风格沉郁顿挫、寄托遥深、构思雄奇独特、峭拔深远、凝练等特点,当然也有典出僻冷、令人索解为难的地方。本文尝试对鲁迅的诗歌创作进行粗浅的探讨,兼及鲁迅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

1. 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底,为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鲁迅生于1881年,那时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未废除。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仍是读书人的正道。特别是对于当时正在任京官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来说,希望长孙鲁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振兴家业,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鲁迅于1887年入本宅私塾学习,12岁又入三味书屋,开始了严格的旧学学习。

对于当时的私塾学习生活的严厉、枯燥,鲁迅在《朝花夕拾》的文章中进行了回忆。除了私塾,父亲对他的教育的严厉也使他终生难忘。比如有一次,年幼的鲁迅要到期待已久的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正笑着跳着催促家人快点搬完东西,好赶快去看会,父亲却令他在背完《鉴略》中的二三十行书后,才让他去逛会。这种严格的、剥夺儿童快乐身心的私塾学习和家庭教育,使鲁迅在幼年即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到了三味书屋时期,他读完了《鉴略》和《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一经。《楚辞》《文选》《诗韵释音》《唐宋诗醇》《二十四孝图》《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他也认真攻读过,还看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诸多旧小说。戊戌年(1898)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所购阅的书还有《世说新语》《壶天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唐人全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汉魏丛书》《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曲园墨戏》《李长吉昌谷集》等。其中《诗韵释音》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寄回,要求鲁迅的父亲指导儿子学习的。后来周福清在杭州狱中寄回的《唐宋诗醇》中,夹有一张“示樟寿诸孙”的字条,指示:“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种学做旧诗门径虽不比别人高明,但对鲁迅后来的旧体诗的学习和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在维新派、洋务派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鲁迅也不得不与旧学打交道。而在东京时期,鲁迅又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使他的旧学境界更上一层楼。

越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而又有特色的文化的一部分,对鲁迅产生了影响,使他的诗歌创作既能发扬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又能张扬个性。与在童年、少年时期的近乎被动接触不同的是,鲁迅自青年时期对越文化是主动接触、辩证接受的,他对越

文化传统的强烈的、主动的认同感,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越文化成为鲁迅精神的基础之一。作为鲁迅出生地的绍兴,地域上属越文化的中心区,自古人杰地灵。绍兴在浙江省内,河网密布,使得生长于斯的人民“陆事寡而水事众”,在水中谋生的风险,养成了越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慷慨的气节。“智者乐水”,河网密布的乡土特色,又赋予越人机敏的性格,文化上重视独立个性的倾向又十分明显。自幼在绍兴长大的鲁迅,正继承了越人这样的禀性。

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对越文化传统表现出了有意识的了解和接触,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主动的越文化认同感。冯雪峰(1981)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根据鲁迅本人的自述,别人的追记,以及我们已经得到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在这十二个年头中读了不少的中国古籍。他不仅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并且每每有新颖的见解,而对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教社会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见的勇气。同时在所谓正统的经、史之外,对野史和杂集之类是有特别的兴趣。因此搜寻、阅读以及抄录也特别的勤快,而且,少年鲁迅也曾经勤于寻访绍兴的文物遗迹,抱着诚敬爱慕、敬仰的心情去对待绍兴府属的先贤们。而对于这些先贤中的有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诗人、文士与学者的著作的搜寻也更为热诚。”

这种对越文化传统的主动了解、接触,使鲁迅对越文化的认同感极强。鲁迅在晚年致黄莘荪的信中,就以越人自居,并多次强调“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感叹“会稽往往出奇士”(鲁迅,2015a),对越中先贤的赞叹是溢于言表的。他又有感于“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鲁迅,2015a)以会稽书肆概括中国文章,认为家乡书肆的没落状况,可概括见出中国文章的陨落,这又是对越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的表现。因此,鲁迅广泛搜集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汇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并于1915年印刷发行,这既体现了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认同,也是他对越文化的贡献。

除了主动地接触越文化,少年鲁迅还受其祖父周福清(号介孚)的影响。介孚公,为当时有名的翰林,才学不错,但恃才傲物,与时宜不合。他在仕途中,无论是外放时,还是在做居京的京官的时候,都不很得意,故牢骚很多,有名士气,时常骂人,骂人的风格很有绍兴刑名师爷的习气。周作人曾说介孚公的骂人,是家里人最痛苦的事。这也是导致了鲁迅从少年时就有孤独抑郁的心境的一个原因。而介孚公对子孙要求的苛刻,对子孙的教育的干预,都以越人士大夫的家风影响着鲁迅。1899年11月,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恭敬地抄录完毕介孚公手书的《恒训》一卷(《恒训》的内容是关于治家的种种格言,其中有关于周氏家族兴衰历史的家鉴)。

古越传统文人对鲁迅的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末年的王充(会稽上虞人),他的思想风格和鲁迅最相似。王充著《论衡》,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通过尖锐和犀利的分析,剥去他们的外衣,暴露各家显学的弱点,倡“疾虚妄”“归实诚”;在文学上,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虚妄,重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主张华实相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以达到文学“劝善惩恶”的目的。这都与鲁迅的大胆揭露“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身体

力行、以文学疗救国民的魂灵的观点一致。同时,《论衡》在文字的尖锐、犀利方面,又与鲁迅的杂文风格一致。尽管“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讥讽鲁迅兄弟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但毋庸讳言,鲁迅的杂文的犀利泼辣,的确有这种传统文风的影响,并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体现。这种文风,犀利、坚韧,精细而又显刚性,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评之为“冷隽尖刻”。影响在鲁迅的诗歌中的,如《赠邬其山》《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教授杂咏》等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诗中辛辣的讽刺、直斥现实的勇气,都体现了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犀利泼辣的风格,令人赞叹!

越文化传统对鲁迅的影响,还有越人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越之先贤,多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徐渭在绍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大名不可能不为鲁迅所注意。徐渭为不第才子,怀才不遇,只得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曾亲自深入前线,研究抗倭之法,并屡建奇功。又比如徐渭更早的南宋诗人陆游,其爱国热情至死不渝。爱国、爱家,以天下为己任,这些都是越人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的《自题小像》中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积极入世精神的由衷表现。

章太炎是鲁迅所最钦佩的老师,对鲁迅的爱国精神也有深刻的影响。鲁迅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对老师的革命爱国精神的赞叹是由衷的、充满激情的。其他如王思任、张岱、章学诚、李慈铭等,也都为越人中的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鲁迅有所影响。

另外,鲁迅在外求学、谋生时同乡观念也很强烈,其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同乡交游圈,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日本东京时期,鲁迅结识了许多绍兴及浙江老乡,如许寿裳、范爱农、陶成章等,且于1902年11月与许寿裳、陶成章、厉绥之、张邦华等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在东京组成了浙江同乡会,并出版月刊杂志《浙江潮》。在北京期间,鲁迅有一段时间还住在绍兴会馆,接触的大多是以绍兴同乡为主的浙江人。这些交游和经历,都使鲁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并成为他思想及性格的基础。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越文化的学习和浸染其中,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撰著了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在考据、校录及古籍整理中也体现了扎实的传统功底,并使鲁迅在新旧文化、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之中底气十足,功绩斐然。其所创作的旧体诗歌,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无论在表达爱国爱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反对黑暗统治、反抗权势等方面,还是在表达个人的情怀,如赠别、友爱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扬;同时,又能不落窠臼,张扬个性,体现了冷峻尖刻、幽默讽刺的一面,并于极冷静的写实之中体现出极其火热的感情,犹如冰水之中包裹着烈火。

2. 鲁迅的诗歌创作受到了《楚辞》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源头在先秦。先秦诗歌有两大高峰,一是以《诗经》为大宗,一是以《楚辞》为代表,其共同的源头为先秦歌谣,此后以“诗”“骚”二体,影响着后世诗人,衍演为中国数千年的诗歌传统。鲁迅的诗歌主要受到了《楚辞》的影响。

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并且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书香礼义之家,所以鲁迅于旧体诗歌的写作,其出发点应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情调,他的写作旧体诗歌,是一种表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方式,是一种审美爱好和生活趣味,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也是“积习难除”之一种。这种“积习”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出世入世之间,或为仕途之手段,或为酬酢之方式,其中有抒情言志,有抒发愤懑,有情深意切。

鲁迅早期的旧体诗歌的写作,就有这种“积习”的表现,在应和唱酬之间,有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在1900年写的《莲蓬人》:

芰裳苕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这首诗歌咏赞美荷花的果实莲蓬的高洁的气质,很明显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1900年8月4日,在南京的鲁迅托返乡亲戚捎书给家中诸弟,内有张伯行刻的《周濂溪集》4本),但它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以香草美人寄托自己的高情雅意,体现了中国骚赋文学传统的主题和情调。这种崇尚高洁的情调,和爱国思乡、抒情述怀等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一样,在鲁迅的旧体诗中占相当的比重。《别诸弟》组诗,则表达了兄弟惜别之情。又如鲁迅后期创作的诗歌,有些是赠人之作,有些虽非专为赠人而作,但写好后以条幅的形式赠人,也是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那些赠人的诗及条幅,应日本友人的索求为最多,又有应友人如郁达夫、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的索求而写作或书写的。而鲁迅自己也对中国传统诗画有浓厚的兴趣,他收集古代艺术品、今人字画,这都是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创作诗歌、收集诗画以及题咏赠人等这些能体现传统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行为,对于鲁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业余怡情的、积极的休息之法。

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诗歌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屈原的影响。鲁迅早年就喜欢屈原的作品,在日本弘文书院时,除了阅读大量的日本文的西方文学书籍外,就是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并对许寿裳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许寿裳,2015)

鲁迅的《祭书神文》作于1901年2月,此骚体诗文辞典雅,想象丰富,体现了与钱神绝交、矢志读书的浪漫而清高的情怀,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又如《无题》诗:

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此诗全用屈原辞赋中的意象,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是歌咏赞美屈原的;从此诗的深层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屈原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屈原是相像的。鲁迅其他的诗如《自题小像》《送O.E.君携兰归国》《湘灵歌》《送增田涉君归国》《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等诗,不但在遣词造句上学习屈原的辞赋,而且在诗歌的意境和意象的创造上也学习屈原。

在屈原之后,凡受到楚辞影响的古代重要诗人,都成为鲁迅诗歌所取法、学习的对象,如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龚自珍等。鲁迅在青年时代曾喜欢李贺的诗,并与其弟周作人购买了《李长吉昌谷集》;1911年还曾致信许寿裳,托许代为寻购李贺诗集。鲁迅在1935年致日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道:“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李贺的诗歌,在反映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如反对藩镇割据,抨击宦官专权,揭露官僚豪奢,讽刺皇帝求仙,同情人民疾苦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在抒发个人壮志难酬的情怀、发泄抑郁的情绪时,则表现为感伤和愤激。李贺的诗继承了屈原辞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诗缺点是有时过于晦涩难懂,但却想象瑰丽奇诡。李贺的诗,杜牧评论为“骚之苗裔”,与鲁迅的诗歌风格是相通的。李贺的诗在深沉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并稍显奇耸的美,鲁迅的诗歌在李贺诗的影响下形成了深刻、沉郁而苍凉的韵味。李贺为浇胸中块垒,抒所积的不平之气,多表现出愤激和痛心的心情,在这一点上,二人是相通的,但鲁迅摒弃了李贺的悲观、孤寒的内容及晦涩难懂的艺术表现手法。鲁迅的《无题》诗,是其诗中较能体现李贺诗风影响的一首: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李贺的诗在炼句上颇下功夫,故其诗多有名句,发唱惊挺,耐人吟咏,如“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等。鲁迅的诗歌中的名句也为时人所称道,亦可见其锻字炼句的功夫,如“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

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

至于其他的古典诗人对鲁迅的诗歌的影响,有的注家认为鲁迅的诗歌受到了龚自珍、陆游、李商隐、杜甫等的影响,这也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教育的人来说,对于古代诗人作品的领会和歌咏,终至于融会贯通,汲取各自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也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认为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并说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评价鲁迅,鲁迅先生并未反对。这从鲁迅的诗歌中,我们也可约略窥见这种影响的存在,他的诗歌受到魏晋诗人,特别是建安诗人的影响,亦具悲凉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毕竟,在魏晋的时代氛围和鲁迅在杂文中所揭示的时代氛围,具有相同之处,那是一个言行受到压制的沉闷的年代,鲁迅深深地体会到曹植、王粲、阮籍、嵇康等人在诗文中表现的情感。

3. 鲁迅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民不聊生的现状,使得首先清醒的爱国人士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在民主、民族、人文思想方面启蒙、开拓,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首先推崇具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和诗歌,但鲁迅写作的诗歌不多,现所收集到的有71首(包括组诗,笔者将组诗计为1首),其中旧体诗歌51首,占绝大部分(旧体诗的创作可以说是伴随鲁迅的一生的,但其中有两次很长的时间间隔,其间没有写诗),其他为新诗和打油诗式的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大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表现了鲁迅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主、民族思想以及孤独的战士的形象。

根据鲁迅诗歌创作的年月,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

前期是从1900年至1912年。这一时期主要包括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日本留学时期和回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不多,计有旧体诗8首,新诗和讽刺诗1首。诗歌多为述怀言志之作,有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有对兄弟情深的表达,有清高自守的述怀和爱国的慷慨热情,以及对友人的不幸的哀悼和愤慨。在创作手法上,大多严守格律诗的规则,遵守格律和用韵。在这一时期,鲁迅的传统文人趣味的表露是很明显的。

这一时期的诗以兄弟唱和、以诗言志的特征较为明显。《别诸弟》《别诸弟三首》表达了作者只身去异乡求学时,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和独在异乡的孤独情怀,表达了“兄弟怡怡”之情。《莲蓬人》和《祭书神文》则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志趣高洁的情怀。《莲蓬人》赞颂了莲蓬出淤泥而不染,傲立严寒之中的高洁形象,是作者的自况;《祭书神文》则对少年鲁迅及其两位弟弟来说,是神思俊逸的千古奇文,表达了兄弟们以读书、爱书、敬

书,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志趣,全诗以骚体形式,以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想象表现出来,深得屈原辞赋神韵。《庚子送灶即事》表达了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惜花四律》是一首唱和之诗,表达了爱花惜花之情,文辞典雅。《哀范君三章》则表达了对挚友英年早逝的不幸的哀悼,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愤激之情。《宝塔诗》是一首在形式上创新的新诗,讽刺了日本成城学校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辫子盘在头上,呈宝塔状,在日本留学时表现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鲁迅的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通过对这种神态的描写,笔触辛辣而又不失幽默。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诗作是《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一诗,是鲁迅的述怀之作,表达了诗人立志报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激昂的感情。“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作者一生的座右铭,为鲁诗名句,大大激励了后人。此诗用典深曲,又受屈原《离骚》的影响,虽然在诗意的理解上,后来的注家多有不同的诠释,并对其创作的年月也有不同的见解,但丝毫不能改变后人对作者在此诗中所包含的爱国热情的理解。从这首诗中可见出,鲁迅前期的诗的内容,从兄弟唱和、托物言志、愤世叹时的文人士大夫式的思想感情的表露,发展到对国家民族的献身情怀,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个性解放的追求,进而达到了要唤起民众、疗救国民灵魂、拯救国民的高度,并敏感地感受到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感受到了民众的麻木和“故园”的黑暗,这都体现了作者早期思想的升华。

后期是从1918年到1936年。在前期到后期之间,作者有6年的时间没有写诗(或者是后人没有发现,并且鲁迅本人又没有相关的记录)。后期的诗歌创作,鲁迅是从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的革新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的白话诗的“尝试”开始的。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这是《新青年》第一次刊载新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发表新诗。之后,《新青年》第四卷刊载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3个人的9首新诗,并最早显示出了用白话写新诗的实绩来。鲁迅也加入新诗开拓者的行列,在1918年5月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他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新诗。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新青年》的写作新诗的情况,他说: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1915年9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赅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

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鲁迅,2005d)

这可见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新诗写作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新诗同鲁迅同期的小说、杂文中表现的思想一样,分别探讨了鲁迅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人生的现实问题。1918年5月写作,并发表在同一期的《新青年》杂志上的3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分别探讨了梦与希望、真的爱情、人与人之间平等及正确对待批评等的问题,用极口语化的语气直白地写来,虽显幼稚,但运用了隐喻、象征等技巧;虽明显地具有以诗说理的倾向,却寓有丰富的哲理性,耐人寻味。在《他们的花园》一诗中,鲁迅暗喻了时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盗火者”的悲哀境地;《他》探讨了爱情和自由的问题;《人与时》是一首探讨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态度问题的诗,哲理性较强: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在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应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鲁迅在这里通过明白如话的语言,做了明确而独特的答复,即人生要着眼于现在。

鲁迅的新诗写作,是与当时的新诗创作者采取同一步调的。因为一方面要极力冲破旧体诗的桎梏,一方面又要急于在形式上得到创新,所以大多新诗创作者只是用白话来入诗,有草创和新解放的痕迹,形式上也不是很成熟,只是在思想表达方面反映了当时民主和科学的革新意识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提出了那个时代最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人生的现实问题。即便如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对诗的形式和语言的大胆探索,虽存在以诗说理来探讨人生的问题的迹象,在意象营造、诗歌语言和内涵方面也缺少一些深层的蕴蓄美和表现力,却以新诗创作的实际行动和丰硕的成果,给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榜样,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都是新诗创作的先驱者。但鲁迅认为自己的这些新诗“幼稚”,所以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

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2005)

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歌的创作,可说是成果丰硕。特别是从1931年到1935年的短短5年间,鲁迅写了近40首旧体诗,其中的名篇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创作手法上,不拘格调,无论是用典,还是炼字造句,都是信手拈来,成熟圆融。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家、思想家,对国家和民族、民众的命运的关注、对政治黑暗的大胆揭露,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或直白大胆,或深沉含蓄。直白大胆的如《赠邬其山》,诗云: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此诗写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20年间,政客们的丑恶行径。他们一旦失势则或称病,或读书;一旦上台则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杀人如麻;再次下台,则又宣称遁入空门,露出假慈悲忏悔的虚伪嘴脸。《题赠冯蕙熹》一诗也揭露了军阀统治者杀人如麻的暴行。其他还有如《二十二年元旦》《无题·禹域多飞将》等诗。

深沉含蓄的风格则表现在对于统治的黑暗的揭露和描述,鲁迅用沉痛象征的笔法写下了“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殒”(《赠画师》)的名句。尽管政治是如此的黑暗,但作者并不灰心,如《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上联表达了作者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野草》语)的强大的力量和对未来必胜的信心。下联则描写了政府当局政治没落的现实。两相对照,显示了作者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在鲜血淋漓中看见了希望。又如《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这时,政府却准备放弃北平,将北平的重要文物迁往南京。为此鲁迅写下了《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两首诗进行了尖利的讽刺,抨击了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在黑暗统治和对文化的严酷的恐怖政策高压下,文化界出现一片萧条、寥落的状况。鲁迅的诗歌对这种状况多所表现。如《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统治者对革命者的残酷虐杀,后半部分描写了文坛寂寥的现状。这首诗深受屈原《离骚》《九歌》的影响,借用湘灵的所见、所闻,用比喻、象征手法刻画了统治者在军事、政治、文艺上的残酷虐杀和打压,使得大地成血腥的屠场,文坛成寥落荒丘的现实。全诗沉郁愤激,诗中血染湘水的景象令人震惊,使人印象深刻。关于描写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的寂寥状况的诗,还有《送 O. E. 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偶成》《题〈彷徨〉》《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等。

除了严酷的书报查禁制度外,统治者对进步人士和作家的残杀也是变本加厉的。鲁迅的友人如杨铨、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丁玲等人惨遭杀害或逮捕(丁玲被逮捕后,鲁迅曾听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沉痛地写下了《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悼杨铨》《悼丁君》等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于悲痛沉郁之中见愤怒,读来又觉得哀婉动人: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沉痛地哀悼了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于泪眼依稀中见到了慈母的白发和眷眷之心,也看到了强盗们的狰狞的面目。吟罢而无写处,只得长歌当哭,其情何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对鲁迅来说可谓是近在咫尺,他的家也受到了枪弹的打击,鲁迅为此避难多日。在他的诗中,对这次战争给自己及亲友和中国百姓的侵害作了描写,如《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所闻》《题三义塔》等,此外,描写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的,还有《赠人》等诗,这些诗都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给民众造成灾难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在《题三义塔》一诗中,作者写道:

奔霆飞燹殄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诗的前半部分写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伤害,并殃及禽鸟的状况;后半部分写了侵略战争终将激起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誓死反抗,在末句中则表达了作者的宽广胸怀,认为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终将共弃前嫌,继续一衣带水的情谊。

对于残暴者的怒目冷对,对于家人、亲友和人民群众的殷殷之情,在鲁迅的《自嘲》一诗中得到深沉而热烈的表达: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运交华盖、漏船中流的危境之中,作者犹自心怀天下,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继续实践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令人感叹。同样,在鲁迅的诗中有对幼子的护犊之情,如《答客诮》;有对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深情,如《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有对挚友的关怀和期许,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在这些诗中,无不表现了对仇者恨、对亲者爱的深情。

这一时期,鲁迅创作的对政治时事的讽刺,对文坛怪象的讥嘲的诗歌,也很有特色,这些诗大胆辛辣,直言痛斥,充分表现了鲁迅“冷隽尖刻”的杂文风格。这些对统治者的政治丑剧和政客争权夺势的丑态的揭露,还表现了作者的大无畏的精神,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诗,是根据当时报章对时事的报道文字,鲁迅敏锐地抓住典型性的细节,对国民党四大、四届一中全会中政客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的丑剧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这几首诗和他的杂文一样,如匕首、投枪,深刻针砭了时弊和政治黑暗,是鲁迅力图唤醒民众的思想的体现。

对于社会的和文化教育界的怪现象、怪调,鲁迅也以“砭痼弊取其一端”的方法进行尖利的讽刺。《我的失恋——拟古的打油诗》讽刺了当时文坛盛行失恋诗的现象,讽刺了无真爱导致的失恋的现象;《替豆腐伸冤》和《吊卢骚》则讽刺了教育界的怪现象,分别讽刺了以杨荫榆和梁实秋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4首《教授杂咏》,通过对4位教授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谢六逸分别在教育和教学、翻译、编辑出版等方面暴露出的弊病和言论,进行了尖刻的讽刺,亦庄亦谐,幽默风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赠日本歌人》则讽刺了文坛演艺界的媚俗现象。

鲁迅的诗,有些是赠人述怀之作,其中有文人士大夫的情趣的表露,更有鲁迅一生孤独的情怀的表露和抒发。关于传统文人情趣的表露,在鲁迅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表达。在其后期,这种情趣在诗歌中的表现则显得成熟、深沉,也不再囿于个人情怀的简单流露。《送增田涉君归国》回忆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华年”,其中的感慨寄寓在对“扶桑”风光的描写之中,此时的鲁迅的心情是明朗的。又如《无题·故乡黯黯锁玄云》表达了对故乡的怀念,《无题·皓齿吴娃唱柳枝》则是对过去旧梦的追忆,二诗含

蓄蕴藉,深得古诗的韵致。

孤独情怀,是伴随鲁迅终生的。鲁迅从小就感受到家庭“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过程中的世态炎凉,感受到家道败落过程中族人的势利。再加上祖父长期在杭州大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作为长子的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使他的孤独情怀得以萌发。后来,鲁迅在南京求学、日本留学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使鲁迅的思想文化观念“开始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从传统向现代进行转换的精神历程,获得新的文化创造的灵感和原创动力。因此,这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换与意识构成的‘超前性’,就使鲁迅与整个中国社会实际滞顿状态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对立状况,表现出一种早年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激昂的崇高理想,与淹没在黑暗、腐朽、愚昧、落后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孤独意识。”(黄健,2001)因此,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意识到并引用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说:“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又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种孤独的情感体验是悲凉而崇高的。

这种孤独的情怀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深沉的体现。如《无题》: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沈醉起,无处觅菰蒲。

这首诗既有传统文人士大夫对归隐荒村的闲适生活的追求,又有无以为家的孤独情怀的表露。又如《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此诗中“无处觅菰蒲”的感慨依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评此诗:“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许寿裳,2017),这的确是知音之语了。这是鲁迅写的最后一首诗。

在《题〈彷徨〉》一诗中,鲁迅写道: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诗中所表现的,正如鲁迅在《野草·这样的战士》中所刻画的处于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形象:虽孤独而战斗不息。

鲁迅后期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状,表现了作者一生的战斗经历和心路历程及内心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民生的思想,堪称“诗史”,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

至于鲁迅在诗歌中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则在上文中都已说到,兹归纳而言之,则有:第一,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序》中所概括的“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笔者认为准确的,鲁迅的诗即事抒感,以小见大,抓住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通过精炼、深刻的表达,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深沉的民族爱国情怀,情感深沉炽热,而又显愤怒、激越,在诗歌中融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第二,在针砭社会和政治黑暗的诗歌中,既体现了“冷隽而尖刻”的讽刺,如《替豆萁伸冤》《教授杂咏》等,而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如《我的失恋》;诗中有直白大胆的揭露,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体现了诗歌中的杂文笔法,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政治性,使诗歌如匕首,如投枪,笔锋犀利,战斗性极强。第三,深受屈原辞赋和《楚辞》的影响,无论是利用骚体,还是使用“香草美人”的比喻,都体现作者对屈原《离骚》《九歌》等的学习和吸收利用,并以屈原的独醒的形象寄寓了自己的孤独情怀,如《悼丁君》《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洞庭落木楚天高》等;同时,鲁迅还广泛吸收、学习受屈原和《楚辞》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李商隐、李贺、龚自珍的创作手法,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第四,由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者残酷的高压政策,鲁迅在诗歌中不乏对社会的揭露性描写,体现出含蓄深厚的风格;有时用双关、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并引用典故,如《湘灵歌》《赠画师》等;有时又用反衬和对比的手法,如《悼杨铨》《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诗。第五,诗句中对所要表达的感情和思想进行高度的概括,又常发唱惊挺,以豪语新意入诗,寓精深透辟的议论于充满感情的叙述之中,具有意义深远、体味无穷的特点,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六,如许寿裳先生所归纳的,在旧体诗中运用口语入诗,如《自嘲》诗中“碰头”“管它”;《二十二年元旦》中“到底”“还是”等。在白话诗和政治讽刺诗中有时运用方言,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而又能使人于讽刺中体味到趣味,如《“言词争执”歌》《公民科歌》等。

由于鲁迅是从旧阵营中出来,以旧社会的“逆子贰臣”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深受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影响的旧体诗歌的创作,在同时代人中,成就是很高的。柳亚子评鲁迅的诗:“追踪汉魏,托体风骚,实在和太炎先生差不多是异曲同工吧。”鲁迅的另一塾师寿洙邻(寿镜吾之子)评曰:“鲁迅绝少作诗,偶一为之,戛戛独造,硬语盘空,却少和婉之气。”郭沫若先生也赞许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独怪,或则肝胆照人。”至于鲁迅的白话诗,在哲理中抒发了浓郁的情感,在写法上又有欧化的创新,其在白话新诗上的大胆创新,以其坚实的创作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也作出

了巨大贡献,朱自清先生在编辑新诗集时,还收录了鲁迅的几首新诗。他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

同时,鲁迅在诗歌理论方面的见解也高屋建瓴,强调诗人对社会的关切,提倡诗歌应易唱易诵、言之有物,对事物冷静观照,他的诗歌创作,也是他诗歌理论的体现。

参考文献:

- 冯雪峰,2016.冯雪峰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56-257.
- 黄健,2001.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M].北京:作家出版社:62-63.
- 鲁迅,2005a.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31.
- 鲁迅,2005b.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545-547.
- 鲁迅,2005c.致山本初枝[M]//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612.
- 鲁迅,2005d.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38.
- 鲁迅,2005e.集外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
- 许寿裳,2015.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7.
- 许寿裳,2017.《鲁迅旧体诗集》跋[M]//鲁迅传.北京:九州出版社:181-182.

作者简介:

林伟,字心斋,男,1969年11月生,浙江镇海人。1988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原中文系(现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著有《鲁迅诗歌注析》《唐弢年谱新编》《唐弢评传》。现为镇海区作协主席、浙江省辞赋学会会员、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

曼努埃尔·里瓦斯作品中的记忆元素

——以《蝴蝶的舌头》为例

徐 恬



摘 要:西班牙作家曼努埃尔·里瓦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关于记忆的作品以文学形式开启了加利西亚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反思,反映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正逐渐融入加利西亚人的文化记忆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他的短篇小说《蝴蝶的舌头》是一篇带有成长小说色彩的、讲述西班牙内战期间创伤记忆的作品。本文将从文学的记忆媒介功能和选择叙述策略的优势两个方面来分析该作品,通过文本细读揭示西班牙人有关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记忆的存在方式,探索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试图解答“创伤记忆是如何被重建的”以及“为何要重建创伤记忆”这两个问题。

关键词:西班牙语文学;曼努埃尔·里瓦斯;《蝴蝶的舌头》;记忆

Memory as the Element in the Works of Manuel Rivas:

Taking *La lengua de mariposas* as an Example

XU Tian

Abstract: Spanish writer Manuel Rivas' works on memory published in the 1990s opened the Galician reflections 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literary form, showing that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was gradually integrating into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Galicians. Therefore, his works are of great academic, aesth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a lengua de mariposas* is a short story equipped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Bildungsroman, concerning a boy's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work from two aspects: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works as media of memory and the advantages of literature at the moment of choos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way of existence of the Spaniards' memories regarding the Civil war and Franco's rul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collectiv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trying to answer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how traumatic

memory is reconstructed” and “why should it be reconstructed”.

Keywords: Spanish Literature; Manuel Rivas; *La lengua de mariposas*; memory

曼努埃尔·里瓦斯(Manuel Rivas, 1957—), 当代作家、诗人、散文家和记者。里瓦斯 1957 年 10 月 24 日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拉科鲁尼亚省, 他以加利西亚语^①为创作语言, 被视为加利西亚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作家。至今, 里瓦斯创作了 19 部长篇及短篇小说集、10 部诗集、11 部散文集和 1 部剧作。

短篇小说《蝴蝶的舌头》选自短篇小说集《亲爱的, 你想要我怎么做?》(*¿Qué me quieres, amor?*, 1995), 后者是曼努埃尔·里瓦斯用加利西亚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 出版于 1995 年, 并于次年由多洛雷斯·比拉韦德拉(Dolores Vilavedra)翻译为卡斯蒂利亚语。这部短篇小说集甫一出版, 就获得了 1995 年托伦特·巴列斯特叙事文学奖^②和 1996 年西班牙国家叙事文学奖^③。《亲爱的, 你想要我怎么做?》是里瓦斯文学生涯中一块重要的基石, 巩固了他在加利西亚文坛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坛的地位, 同小说家的大部分作品一样, 这部小说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及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记忆”。事实上, 1996 年起, 有关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时期的回忆才逐渐“从家庭记忆领域进入社会讨论领域”(Prieto, 2012)¹³⁹, 在这个背景下, 文学成了再现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 表达了社会对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和解的需求。曼努埃尔·里瓦斯的叙述作品不仅以文学形式开启了 20 世纪 90 年代加利西亚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反思, 也反映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正逐渐融入加利西亚人的文化记忆中(Vilavedra, 2015), 因而可以作为研究“文学演示记忆现象”的案例^④, 也可以作为解答“创伤记忆是如何被重建的”以及“为何要重建创伤记忆”这两个问题的钥匙。

本文将莫里斯·哈布瓦赫、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 运用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论断, 从文学的记忆媒介功能和在选择叙述策略时的优势两个方面来分析曼努埃尔·里瓦斯的短篇小说《蝴蝶的舌头》; 同时, 通过文本细读, 揭示西班牙人(加利西亚人)有关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记忆的存在方式, 探索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

① 加利西亚语(gallego)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 是西班牙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② 托伦特·巴列斯特叙事文学奖(Premio Torrente Ballester)是每年由拉科鲁尼亚省议会颁发给优秀的、用卡斯蒂利亚语或加利西亚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的奖项, 为了纪念作家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而命名。《亲爱的, 你想要我怎么做?》是 1989 年此奖项创设以来获奖的第二部加利西亚语作品。

③ 西班牙国家叙事文学奖(Premio Nacional de Narrativa)是每年由西班牙文化部颁发的奖项, 旨在表彰在上一年度在西班牙出版的最佳叙事作品(包括用卡斯蒂利亚语、加利西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写成的文学作品)。

④ 需要指出的是, 里瓦斯对记忆的关注与欧洲社会思潮密不可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受到法国、德国等国的影响, 历史记忆(尤其是关于西班牙内战和战后创伤记忆的问题)在西班牙学术界和文坛引发热潮。

1. 文学作为记忆的场所^①

首先,我们有必要厘清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这四个概念。它们并不是互相区别的个体,而是各自有所侧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个体记忆指的是个体自身的记忆,所“能够引用的首席证人”只有自己(哈布瓦赫,2013)⁴⁷;集体记忆是指记忆作为“集体框架之内的互动”(哈布瓦赫,2013)⁴⁹,即社会上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记忆;历史记忆是相对个体记忆而言的,前者来自外部,后者来自内心,历史记忆相对个体记忆而言囊括的内容更加全面,也更加紧凑扼要(哈布瓦赫,2013)⁶⁸⁻⁶⁹;文化记忆则是“为再次接收某些信息和机制的总体”,是为了“稳定表达、流传、循环和再次接收的过程”而被保存下来的记忆(阿斯曼,2013)⁹。

事实上,“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这个概念是由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扬·阿斯曼(Jan Assmann, 1938—)在发展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集体记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只能在集体的框架下进行,记忆的发生不仅需要他人,也反过来作用于他人,如此便形成了一种集体框架之内的互动(冯亚琳等,2013)¹²⁻¹⁷。之后,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1947—)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将“集体记忆”的概念扩展到了文化范畴,他们认为,文字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之一,而文化记忆又具有集体(民族)同一性构建功能,因此应该在文化整体结构和历史传承中考察文字所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冯亚琳等,2013)³⁶⁻⁴⁰。阿莱达·阿斯曼还提出了“文化文本”的概念,把文学文本纳入文化记忆考察的范畴,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阈。在这一视阈中,迄今为止从未得到认真关注的文学所具有的传递文化、民族或宗教同一性纲领以及集体价值的功能有了更好地得到挖掘和照亮的可能性(冯亚琳等,2013)⁶³。之后,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进一步发展了阿莱达·阿斯曼的理论,强调了通俗文学作为集体记忆循环媒介的优势,还总结了文学作为记忆循环媒介的三个功能,即存储、循环和调用功能(冯亚琳等,2013)⁷¹⁻⁷²。我国学者冯亚琳在梳理埃尔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文学充当记忆循环媒介的三个优势,分别为虚构优势和约束(Restriktionen)、跨话语性(Interdiskursivität)和多配价性(Polyvalenz),这样一来,文学不仅能够以虚构的方式关照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创造”虚构的过去对现实进行批判,还能够用不同的言语和话语方式展示高度综合的、充满矛盾的对过去的描写(冯亚琳等,2013)⁷⁵⁻⁷⁶。正因为文学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化文本的特点和优势,才可以通过隐喻、对回忆的“模仿”、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等对记忆所包含的各种矛盾进行“演示”并参与“同一性构建”。

^① 有关“文化记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本文参考了以下两部作品的梳理:《文化记忆理论读本》,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编,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冯亚琳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非典型成长小说与记忆

《蝴蝶的舌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童年时的经历,是一篇带有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色彩的短篇小说。阿斯特莉特·埃尔在《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概述》中指出“文学体裁的存在是一种文学内部通过互文关系构建起来的记忆现象”(埃尔等,2013)²¹⁶。她进一步解释道,约定俗成的文学体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读才得以实现的产物,因此具有文学体裁特点形式的文学都属于社会的共同知识,且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与之相对应的期待值体系,同时,文学体裁的特点为意义的创造和期望的达成指引着方向(埃尔等,2013)²¹⁶⁻²¹⁷。从这个角度来看,里瓦斯在写作《蝴蝶的舌头》时选择成长小说这个人们熟悉的文学体裁,绝不是出于偶然。

《蝴蝶的舌头》的主人公“我”在故事开始时是一个不到六岁的男孩,在童年时期遭遇了西班牙内战,有着痛苦而压抑的记忆。成年后的“我”在叙述这段记忆时选取了两个看似并无联系的片段——对上学充满恐惧的“我”第一天上学的经历,以及目睹敬爱的共和派老师(“我”的引路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押往刑场——重新建构了记忆中的童年。这两个片段共同组成了成长小说一纵(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一横(社会发展过程)两个互相交织的维度,目的是“将一种无法言说的经历融入已知的认知系统中,并寻找其中的意义,明晰自己的感受”(王欣,2013)⁵³。事实上,成长小说通常着力于表现年轻的主人公在经历一系列的历练后完成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然而,在《蝴蝶的舌头》中,主人公的成长随着西班牙内战的开始戛然而止。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不仅依旧选择了成长小说作为体裁,还采用了短篇小说的形式,试图对成长小说经典模式作出“修正”和“反叛”,以体现成长中的个体因社会急剧变化而感受到的断裂。

以“我”的回忆重构的童年隐含着“我”自身的身份建构与认同,然而,在《蝴蝶的舌头》中,主人公蒙乔的名字一直到小说近结尾处才被揭示,在这之前,他一直被称作“麻雀”(Pardal)。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说,这和主人公在小说前半部分缺乏认识和检验自我、寻找自己存在本质的手段有关。值得指出的是,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的身份被指认,名字赋予他存在的合法性,矛盾的是,这种合法性将他与敬爱的老师置于对立的双方,这与他的个人意志并不相符,也直接导致了他认知的紊乱,于是,记忆产生了断裂,叙述戛然而止。

相应地,尽管我们能够看到成年的“我”试图通过重构童年的方式将内战期间的创伤记忆纳入自身的人生轨道中,这种努力却被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内,这个框架是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也与“我”仍然无法坦然面对童年的记忆有关。成年的“我”在回忆儿时对上学的恐惧时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有意识地强化了童年时期的各种情感体验——入学前的恐惧、在学校尿裤子的羞愧、“逃亡”时的惊慌和独自坐在山顶时受到的惊吓。与此相反,在记述涉及西班牙内战的记忆时,成年的“我”和童年的“我”的视角似乎完全重合了,成年的“我”丝毫没有设身处地之感,仅限于像旁观者一样“客观”地陈述当时发

生的事：一名警卫将门开了一半，环视人群，再将门打开，手一挥，囚犯们在其他警卫的押送下，从黑乎乎的楼里鱼贯而出，手脚捆着，串成一行，默默无言。”（里瓦斯，2014）²⁰

综上所述，虽然《蝴蝶的舌头》大体遵循了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拥有成长小说的基本特征，如：情节安排按照时间顺序推进、纵横两个维度并存、带有自传特征等（谷裕，2013）⁴³⁻⁴⁴。但它又对成长小说的基本结构进行了修正。和典型意义下的成长小说不同，在《蝴蝶的舌头》中，纵横两个维度并不是并重的，纵向的维度被回忆者有意提升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在这个维度中，主人公是作为主动的参与者而存在的；相应的，横向的维度则被削弱了，更确切地说，是被平面化了，主人公在其中只能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或旁观者。《蝴蝶的舌头》中纵横两个维度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之间存在冲突——突然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改变了“我”的成长轨迹，充当引路人的老师被押往刑场，而“我”出于懦弱、恐惧或其他原因屈于父母的规训，背弃了老师，这也使得“我”在回忆时刻意弱化了本应作为自身认识和检验自我媒介的横向维度，展现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我”对个体身份的隐而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人公并未克服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同一性”危机，个体“社会化”因童年时期遭受的危机戛然而止。

3. 互文性与记忆

《蝴蝶的舌头》中存在大量的互文性，就像阿莱达·阿斯曼（2016）¹³⁻³⁵ 指出的那样，在作为织物^①、记忆空间^②和二次书写的羊皮纸^③的文本中出现互文的隐喻技巧，便使得文本成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交流的媒介。互文性这个概念由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 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提出，随后被引入文学研究中。就广义而言，互文性包括一篇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及非文学文本之间的所有关系，是用来理解文本间相互结合或相互关联的最常用的概念（沙伊丁，2013）²⁵⁸，鉴于互文性研究和记忆研究都使用了隐喻技巧，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利用，二者的结合具有其恰当性（沙伊丁，2013）²⁶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蝴蝶的舌头》视作带有意义编码的系统，进一步加以分析：成年的回忆者“我”通过提及在加利西亚文化记忆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形象——阿卜杜·克里姆（Abd el Krim）、捉孩子的人（Hombre del Saco）、该隐（Caín）和亚伯（Abel），阐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并将之生动、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接下来，本文将一一分析这三个元素。

① 这个概念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 1973 年首次提出。

② 这个概念由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于 1966 年首次提出。

③ 这个概念由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蕾娜特·拉赫曼（Renate Lachmann）分别于 1982 年和 1990 年在各自的著作中进行阐释。

3.1 阿卜杜·克里姆

阿卜杜·克里姆是里夫共和国^①著名的反殖民统治首领,他率领里夫人反抗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统治,在1923—1926年间任里夫共和国总统。这个名字对21世纪的我们——远在太平洋这一端的居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里瓦斯却让主人公蒙乔提及这个看似和故事内容无关的北非反殖民统治领袖。《蝴蝶的舌头》这样写道:

丑八怪老师拿教鞭指着我。小小的木头教鞭,对我而言,是阿卜杜·克里姆手中的长矛。

(里瓦斯,2014)^②

“我”把老师手中“小小的木头教鞭”比作阿卜杜·克里姆的长矛。乍一看,“我”似乎只是在叙述自己当时的恐惧,木头教鞭在“我”眼中幻化为沾满鲜血、可以立刻取人性命的尖利武器。但是,阿卜杜·克里姆这个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或者说,文化隐喻却远不止这些。

与阿卜杜·克里姆反抗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要求里夫独立有一定的相似性,加利西亚政府要求学校教授加利西亚语、要求人们使用加利西亚语书写和说话。但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加利西亚自治区的人们却被禁止使用加利西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者“我”在回忆时仍把反殖民统治的英雄归入“孩子的梦靥”,这几乎可以算得上一个悖论:尽管从本质上看,阿卜杜·克里姆的形象有利于塑造加利西亚人的身份认同,但是在刚入学的孩童的认知体系里,阿卜杜·克里姆却被归入“恶”的范畴。1936年,主人公蒙乔才7岁^②,他对阿卜杜·克里姆的形象的记忆只可能源于外部——学校教育、阅读或他人的讲述。里瓦斯自然地、不加任何解释地将阿卜杜·克里姆一笔带出,说明官方教育或社会舆论已经使这个冷酷无情的屠杀者形象深入人心,它不单单是蒙乔的个人记忆,也是那个年代加利西亚人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它成了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成了一个符号,他人的记忆才促使蒙乔加强了对这个“恶”的形象的确信,因此,他才不带丝毫犹疑地在阿卜杜·克里姆和屠杀者之间画上了等号。

阿卜杜·克里姆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阐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渗入个体记忆中,集体中他人的个体记忆又使得集体记忆得到再次的确认和巩固。然而,由于《蝴蝶的舌头》是一篇回忆作品,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将阿卜杜·克里姆等同于屠杀者的人到底是回忆者“我”还是经历者“我”,或者说,是20世纪

^① 里夫共和国(全名为里夫族联邦共和国,阿拉伯语:الريف جمهورية)是居住在西属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建立的国家。

^② 《蝴蝶的舌头》中提到,蒙乔刚上学那年是6岁。过了一年之后,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由此推断1936年时蒙乔应为7岁。

30年代的加利西亚人还是已经处于民主过渡进程之中的加利西亚人,或是活在更早年代里的加利西亚人。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对阿卜杜·克里姆消极的评价证明了加利西亚人受到的外部影响非常深,正如哈布瓦赫(2013)⁵⁵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中阐述的,“曾经或现在属于某个团体的那类人,至少在远处还能受到他们的影响”。至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对于以蒙乔为代表的加利西亚人而言,阿卜杜·克里姆不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冷酷的屠杀者们集合而成的形象。成年后的蒙乔在叙述童年经历时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个形象给童年的他带来的恐惧,很可能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吧西班牙内战及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记忆与这个形象联系起来了。

3.2 捉孩子的人

我逃走了,像长了翅膀的小疯子,拔腿就逃。我逃啊逃,像梦中那样,有捉孩子的人在身后。我坚信,老师就在身后,一个劲地追我,脖子上能感觉到他和孩子们的呼吸,像一群狗在猎一只狐狸。可是,等我逃到音乐台,回头一看,发现没人在追。我孤身一人,吓破了胆,又是汗又是尿。音乐台是空的,没人留意我,可我觉得大家都在装,十几双眼睛在窗户后头盯着,窃窃私语,消息会很快传到父母那儿。腿替我做主,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迈向西那伊山。这次,我要一直走到拉科鲁尼亚,混上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船。

(里瓦斯,2014)¹⁰

这段引文中出现了“捉孩子的人”(Hombre del Saco)这个带有文化记忆的隐喻。在西语世界中,“捉孩子的人”是一个扛着大袋子、在夜晚的街道游荡的人,看到没回家的孩子,他就会把他们塞进袋子,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为了让孩子尽早回家。父母常常用这个形象吓唬他们。^①

尽管主人公“我”感到“捉孩子的人”就在身后,但还是一个劲儿地跑向西那伊山:“我”想逃离学校、逃离家庭,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捉孩子的人”这个带有文化记忆的形象存在的目的本是让孩子们在夜幕降临前乖乖回家,但是,在遭遇“捉孩子的人”时,“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作为庇护所的家中,而是选择逃往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这个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在心理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缺乏自我判断、盲目听从他人话语的孩子,也表明对于“我”来说,家庭不再是一个百分之百安全的庇护所。值得指出的是,“我”当时还只是一个6岁的孩子。

在阅读成年的回忆者“我”对孩提时期的追忆时,不难看出“我”有意把第一天上学时因恐惧而尿裤子的个人经历和在杨树林大道(“我”的游乐场和庇护所)上亲眼看见共

^① 有关“捉孩子的人”的信息由笔者译自 *Visiones 2006: Antología Española de Fantasía, Ciencia Ficción y Terror*(TEJEDOR et al, 2006)。

和派(其中就有“我”敬爱的老师堂格里高利)被装上行刑车这一历史事件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捉孩子的人”这一形象使蒙乔意识到家已不再是他的庇护所,而目睹熟悉的、被冠上“共和派”身份的人被押上刑车这一经历则让他失去了杨树林大道,进而失去了所有的安身之所。尽管后一个事件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和“捉孩子的人”类似的“助推剂”,但从上下语境来看,西班牙内战无疑扮演着这个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捉孩子的人”这个形象中蕴涵的互文性可以被视作连接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纽带,而文中这两段平行叙述的经历则可以被视作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互相渗透的体现。一方面,回忆者“我”把看似微不足道的对上学的恐惧(个体记忆)提升到了和对战争的恐惧(历史记忆)同等的位置;另一方面,回忆者“我”又含蓄地用这段个体记忆丰富了受时代的大环境限制而难以言说的历史记忆,将生动的细节和动人的情感注入官方“僵化”的历史记忆中。

3.3 该隐和亚伯

《蝴蝶的舌头》中两次提到该隐(Cain)和亚伯(Abel),一次是罗玛尔多在堂格里高利的课上朗诵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的《童年回忆》(“Recuerdo Infantil”),“冬日里一个阴冷的/下午。学生们/在学习。玻璃窗上,/雨声单调。/这是课堂。挂图上/是逃跑的该隐/和死去的亚伯,/亚伯躺在鲜红的血迹旁……”(里瓦斯,2014)¹²另一次则是在主人公蒙乔家中,妈妈边熨爸爸白天做好的衣裳边问:“祈祷过没有?”(里瓦斯,2014)¹³蒙乔不太肯定,“祈祷过,提到了该隐和亚伯。”(里瓦斯,2014)¹³

该隐和亚伯^①是《圣经》中的人物,是一对亲兄弟。然而,由于耶和华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却没有接受该隐的,该隐心生怨恨,在田间杀死了他。该隐和亚伯的形象都让人联想到加利西亚:死去的亚伯是牧羊的,他献祭给耶和华的是最肥美的羊羔,而加利西亚自治区历史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就是家畜饲养业;该隐也与加利西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杀死亚伯后,耶和华没收了该隐所有的土地并流放了他,而流亡也是加利西亚文学中常出现的元素之一。克里斯蒂娜·莫雷伊拉斯·梅诺尔(Morieras-Menor,2011)指出,加利西亚人的特质之一就是异乡人所独有的忧伤,这种忧伤会一直伴随他们,直至死亡。可能就是因为想摆脱这种宿命般的忧伤,加利西亚人才迫切地想离开这片土地。正是因为如此,在《蝴蝶的舌头》《雾中的萨克斯》以及里瓦斯的其它作品中,移民南美洲成了加利西亚人挥之不去的执念。对于《蝴蝶的舌头》的主人公蒙乔来说,通向美洲的路是一条安全的逃生通道,人们可以通过去美洲逃离一切不想面对的事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的两个舅舅为了逃避逢五抽一去摩洛哥打仗,移民去了美洲。而我为了逃避上学,也梦想着去美洲”(里瓦斯,2014)⁸。对于《雾中的萨克斯》中的“我”来说,美洲意味着繁华和财富:“传说如果能拿到合同,去蒙特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保管会赚得盆满钵满,戴着宽檐帽衣锦还乡。工地上

^① 关于该隐和亚伯的介绍参考《圣经·创世纪》第四章。

有人告诉我：要是提着水罐在那儿做小工，一天一夜才能跑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大街，水罐里都能养出青蛙”（里瓦斯，2014）²⁵。总之，美洲是1949年只有“汤，乌七八糟的菜，黑面包”（里瓦斯，2014）²⁵的加利西亚的反面，因此才“有人急着筹钱，购买去美洲的船票”（里瓦斯，2014）²²。

除此之外，发动了西班牙内战、实行独裁统治长达30余年的弗朗哥正是加利西亚人。他不仅发动了加剧了加利西亚的贫困的战争，还在独裁统治期间禁止加利西亚人使用加利西亚语。他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加利西亚严重打击，还把卡斯蒂利亚—莱昂的传统置于加利西亚传统之上，禁止使用加利西亚语、强行推广卡斯蒂利亚语来消解加利西亚人——他的同胞——的身份认同。该隐和亚伯这一组意象也和《蝴蝶的舌头》中叙述的事件形成了呼应和互文：属于共和派的父亲在关键时刻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在杨树林大道上用恶毒的言语辱骂他曾经的“同志”；无力改变任何事物的蒙乔亲眼看见敬爱的老师堂格里高利被押上行刑车。这几个事件之间的互文使读者得以窥见回忆者“我”对于自己的行为、父亲的行为以及弗朗哥的行为的评价——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弑亲与背叛。

该隐和亚伯的形象与个人的、民族的、宗教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隐喻意味，是加利西亚人、西班牙人乃至西方世界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回忆者“我”在叙述中有意设置了罗玛尔多在堂格里高利的课上朗诵安东尼奥·马查多《童年回忆》的场景，在文本中插入另一个文本，通过该隐和亚伯这两个带有文化隐喻的形象对自己童年的创伤经历作出相应的思考和评价。这在一方面说明了童年的记忆对回忆者“我”的影响之深，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调用已经不足以解释童年的所见所闻及行为，因此，“我”不得不动调记忆中更深层次的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个带有文化隐喻的形象可以起到回忆激活器的作用，引发更多关于西班牙内战和弗朗哥统治时期的回忆。

这一节通过《蝴蝶的舌头》中三个带有互文意义的文化形象，总结了这篇短篇小说展现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没有记忆是纯粹的个体记忆，正如哈布瓦赫指出的，总有一些社会或是集体的框架影响着个体记忆。同时，个体记忆也会丰富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甚至文化记忆。除了这三个文化形象之外，《蝴蝶的舌头》中还存在大量的互文性，包括文本自身的互文和文本与其他文学、非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例如，有关“蝴蝶”和“麻雀”的比喻在整篇文章中都有体现，分别和老师告诉我们的知识和“我”的绰号相呼应，同时，这两种动物在文中也是自由的象征；文章中还提到了老师用沉默来表示愤怒，这也让人联想到弗朗哥统治时期和民主过渡初期对于内战相关记忆的沉默，等等。这些丰富的互文现象使读者得以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读到无限的内容，大量象征手法的使用也要求读者在阅读时采取主动的态度，积极地对文中出现的文化形象做出解读。

4. 结论

综上所述,曼努埃尔·里瓦斯的作品很好地展现了文学在充当记忆循环媒介和在演示记忆现象时的优势,尤其是文学在重新回忆、组织、叙述个体和集体的创伤记忆时的优势,以及在演示记忆时所具备的潜能,即文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唤醒社会上沉默者的记忆,鼓励他们发声,从而实现恢复回忆多样性的政治诉求。通过《蝴蝶的舌头》,我们观察到,文学同时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媒介,它不但体现了这些记忆,而且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它们;同时,通过对体裁、叙述策略的选择和对互文性的运用,文学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在虚构和现实之间游走,用不同的方式赋予一个事件以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它不仅能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向读者展现主人公高度综合、充满矛盾的过去,同时也给主人公“构建选择性真实”(冯亚琳等,2013)⁷⁵的权利。因此,研究曼努埃尔·里瓦斯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其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关于记忆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蝴蝶的舌头》在加利西亚社会造成的影响符合里瓦斯谱写个体和集体创伤记忆的初衷:通过唤醒处于沉默状态的亲历者发声,使创伤记忆得到叙述、使被官方压制的记忆得到释放、使人们找回丢失的身份认同,从而用一种平缓的方式达成社会中持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的和解。

参考文献:

- 阿斯曼,2013. 文化记忆[C]//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19.
- 阿斯曼,2015.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文化记忆[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阿斯曼,2016.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埃尔,纽宁,2013. 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概述[C]//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9-226.
- 冯亚琳,等,2013. 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谷裕,2013. 德语修养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哈布瓦赫,2002.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哈布瓦赫,2013.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C]//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里瓦斯,2014. 蝴蝶的舌头[M]. 李静,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沙伊丁,2013. 互文性[C]//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石岩,2006. 西班牙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68-278.

- 王欣,2013. 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张国龙,2013. 成长小说概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张绪华,1997. 20世纪西班牙文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98-106.
- ÁLVAREZ-BLANCO, PALMAR, DORCA T, 2011. Contornos de la Narrativa Española Actual (2000-2010)[C]//MORIERAS-MENOR, CRISTINA. Narrativa gallega contemporánea y memoria cultural. Madrid: Editorial Iberoamericana: 151-162.
- GARCÍA, JORDI, 2000. Historia y Crític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9/1 Los Nuevos Nombres: 1975-2000[M]. Barcelona: Crítica.
- SOLDEVILA D, IGNACIO, 1982. La Novela desde 1936[M]. Madrid: Alhambra.
- TEJEDOR D C, ALBERTO, 2006. Visiones 2006: Antología Española de Fantasía, Ciencia Ficción y Terror[M]. Españ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Fantasía, Ciencia Ficción y Terror.
- MANUEL R, 2000. ¿Qué me Quieres, Amor? [M]. Punto de lectura.
- PRIETO F, LOURENZO, 2012. Nomes e Voces. Memoria de Guerra y Cultura de Paz en el Siglo XX. De España a América, Debates para una Historiografía[M]. Gijón: Ediciones TREA.
- VILAVEDRA, DOLORES, 2011. La obra literaria de Manuel Rivas: notas para una lectura macrotextual[J]. Romance Notes (51): 87-96.

作者简介:

徐恬,女,1994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研究。

原型理论视角下的《土生子》中比格的自性化历程^①

杨晓丽 胡启平



摘要: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是黑人文学的里程碑,小说中的主人公比格的矛盾心理及性格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性化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指心灵成长的过程。本文通过自性化理论来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比格的精神状态和暴力根源,即分析比格的种族情结、自我的面具和阴影、女性意象和男性意象之间的冲突与调节。在两次犯罪中,比格的种族仇恨情结得以缓解;恭顺而暴戾的人格面具与愤怒的阴影在矛盾激化与深入自省中得以调和;内心被压抑和摒弃的女性意象和专横的男性意象得以整合,展示出比格真实的自我,实现其自性化的过程。

关键词:自性化;情结;面具与阴影;女性意象和男性意象

Individuation of Bigger in *Native 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Theory

YANG Xiaoli HU Qiping

Abstract: Richard Wright's *Native Son* was a milestone in black literature. Bigger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The hero's contradictory psyche and character have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dividuation as a core concept of Carl Gustav Jung's psycholog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mental growth.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ividuation aims at analyzing Bigger's mentality and the sources of his violence, i. e. his racial complex, his ego's persona and shadow, as well as conflicts and mediation between anima and animus. During the two crimes Bigger committed, his complex of racial hatred is relieved; his contradictory persona being obedient and violent and the shadow of his anger are media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 as well as deep meditation; his inward anima depressed and discarded is integrated with his despotic animus, which indicates Bigger's real self and realizes his individuation.

Key words: individuation; complex; persona and shadow; anima and animus

^① 本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 2021 年度外语研究课题“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华历史与文化教学中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1WYJYYB01)的研究成果。

1. 引言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Native Son*)被认为是黑人文学的里程碑。《土生子》中的比格与哈利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笔下的汤姆叔叔(Uncle Tom)截然不同,他是新黑人形象的代表,承载着无数当代黑人的反叛、愤怒、疏远和孤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懦弱与暴力、渴望与绝望、顺从与残忍的矛盾体,一度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焦点,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轰动。

作为无数黑人青年的缩影,《土生子》中的比格生活在黑人区。他的五口之家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贫困和绝望无处不在。他经常和几个黑人伙伴在街上闲荡。在他們和周围的繁荣富足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无法被打破。墙的另一边的白人过着体面舒适的生活,享受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丰富成果,有无限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怀特·道尔顿的家,安静、温暖、干净、富有,那里的床又软又舒服,他看到周围的白人过着奢侈、舒适、安全、有目的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任何目的。比格只能看着道尔顿家的财富,却不能参与其中。正如艾米莉·狄金森所写:如果我没有见过太阳,我可能忍受黑暗;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比格对白人生活的长期窥视与对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张力,最终打破了他在一种既可怜又可怕的极度恐怖状态中脆弱的平衡。正是在这一突破中,比格消除了躁动和怨恨,对周围的一切都盲目拒绝和反叛,他既憎恨白人文化又排斥黑人传统,在痛苦和挣扎中经历了自性化的过程。

自性化(individuation)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范红霞等(2006)认为荣格所称的自性化是指自性在心灵结构与意识中的浮现。自性化这个概念是用来表达个体心理成长的一种过程。具体说来,自性化过程是围绕以自性为人格核心的一种整合过程。“就是使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他或她在哪些方面具有独特性,同时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女”(申荷永,2004)。荣格分析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其生命中所经历的自性化过程是从自我意识的表层到灵魂的内部逐渐深入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首先面临的是情节,其次是面具和阴影的冲突,然后是阿妮玛和阿妮姆斯(anima and animus)的相遇,最后是情结、面具、阴影、阿妮玛、阿妮姆斯的整合,直到自性的出现。本文通过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自性理论来分析《土生子》中的主人公比格的自性化过程。

2. 比格的自性化与种族情结

荣格曾经说过:“情结通常是一种隐藏的心理内容,以特定的情感或痛苦的情感聚集为特征”(沈德灿,2005)。情结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感、思想、感知和记忆的集合。换句话说,情结是潜在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人创伤经历交织在一起的综合体。

在小说中,比格在一个贫穷的黑人区长大的,生活在贫穷、羞辱和恐惧中,他觉得自己

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公正,使比格成为一个弱势种族和下等阶级,即使没有白人,他也会感到自己被困住了。种族歧视深深印在他的灵魂里,他的血液里充满了胆怯和仇恨。比格看着他的同胞们在死亡中挣扎,向白人鞠躬,却没有勇气直视他们的眼睛。如果他要抢劫商店,他只会抢劫黑人。当比格第一次来到道尔顿家并真正与白人相处时,他进入富丽堂皇的道尔顿家,从来不敢抬头看道尔顿先生。第一次与白人亲密接触,比格感到惊讶和不舒服,他讨厌自己的胆怯,他感到他身上每一寸黑皮肤都让他感到自惭形秽,对自己的黑和无助的抵抗使他无可奈何地愤怒起来。

种族歧视对一个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许多遭受歧视的人在片刻的麻木、恐惧和困惑之后,会感到强烈的孤立感、羞辱感,然后是无法控制的愤怒。主体间性精神分析表明,被表达、听到和理解的强烈痛苦可能不会造成创伤。因为你在表达——在倾听和理解的过程中,同理心的环境,创伤的能量被转化和消散。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未被表达出来的伤害,或者那些后来没有被回应或理解的伤害,才会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

他的家人对当下的处境逆来顺受,他们只能做一些最低等的工作,出卖自己的体力,获得的微薄收入最终又流回了白人的账户。惨淡的生活现状和充满活力的青春助长了比格被压抑的怨恨,这种怨恨吞没了他的生活。在小说的序言中,赖特写道:“把比格·托马斯乘以一千两百万,你就可以得到黑人种族的心理”(Wright,1940)⁹⁸。从出生起,比格就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中。他把白人视为一种模糊的“白色”神秘,强大而令人生畏,使他无法抗拒。种族仇恨的情节具有磁性效应,这使得比格将许多痛苦的经历与之联系在一起。它具有强大的能量,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当比格将醉酒的玛丽送回其卧室时,道尔顿夫人的出现像幽灵一般使比格不知所措。在道尔顿夫人的“白”的描写中,也在侧面描写了“白”对比格的压迫。与其说种族歧视使他丧失了良知,不如说比格没有意识或认识到存在于他潜意识中的种族仇恨,因此只能任由他的种族情结摆布。比格无意中导致了玛丽的死亡,他的恐惧驱使他销毁了她。荣格认为,当与情节相对应的原型被激活时,隐藏在原型中的爆炸性力量就被释放了,其结果是“受原型控制的人一定会成为精神错乱的受害者”(荣格,1987)¹⁰⁰。要实现自性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特而和谐的人,就必须实现个人内心世界的整体整合,直到他们展现出真正的自我,即自性。正是在这次误杀事件中,比格无意识的种族仇恨被极度的恐惧所点燃,被压抑的愤怒释放出了史前的力量,摧毁了他周围的一切。但同时,比格似乎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他觉得不再是一个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他开始觉得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他成了“白色”神秘——种族歧视的挑战者,开始了艰难的自性化过程。

3. 比格的面具和阴影

人格面具和阴影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两个重要的原型形象。其中,阴影是荣格对我们自己深层的、隐藏的或无意识的心理方面的描述;在分析心理学的意义上,人格面

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也就是我们在别人眼中所代表的东西。“人格的面具和影子是相对应的原型形象。当我们用一张美丽的人格面具来识别自己时，我们的阴影也会变得越来越深”（荣格，1991）⁷⁸。比格把他那冷酷而狂暴的心藏在压抑而沉闷的外表后面，因此他在道尔顿家表现得非常恭顺，赢得了道尔顿家的认可和信任。

弗洛伊德认为梦表现的是人被压抑的欲望，因而梦具有象征意义；梦显现的是潜在的意识通过伪装或象征的内容。梦是幻想，而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荣格认为阴影是无意识范畴的内容，但我们可以通过梦境分析、紧急情况 and 事故来观察它们，并通过无意识投射的原理来了解它们。可见，弗洛伊德和荣格在梦与意识的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比格误杀玛丽后的真实感受反映在他的梦境中。在梦里，他怀里抱着一个包裹，在红色的黑暗中跑开了，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比格慌忙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有自己的头：黑脸、白牙和鲜血浸透的头发；但他并不在乎发生了什么，当白人包围他时，他把血淋淋的头从手臂上扔到他们的脸上。比格梦中的无意识行为解释了他隐藏的愤怒和渴望，所有梦中的景象都指向危险和死亡。红色象征着危险，黑暗象征着主人公的无助与盲目。但他勇敢地或必须勇敢地——即使盲目地——与白人战斗到底，种族压迫的阴影在比格无意识的梦中被揭示和释放。即使在梦里，比格内心的恐惧也无法掩饰他对必定面临处罚这一结果的清醒认识。

“个体的阴影是与个体相关的那些被压抑的、未知的、邪恶的经历”（宋保平，2005）。小说中多次用白色的“墙”“云”“幕”来描述比格内心的压抑与恐惧，它们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一样使比格狂躁、窒息。白人根深蒂固的特权和歧视使黑人永久地陷入黑暗、暴力、软弱和盲目之中。比格认为黑人男性和女性是软弱和盲目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白人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认为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做白人告诉他们做的事——卑躬屈膝、丧失自我。“如果我不饿，我就是在生病；如果我没有生病，我就是在倒霉”。比格的女友贝茜从早工作到晚，像条狗一样，从来没有乐趣。比格的妹妹弗拉是一个善良、听话、品行端正的人，她没有任何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她唯一关心的是缝纫课，因为学习缝纫总有一天会使她能够谋生，并在白色的世界里小心翼翼地生存下去。在逃亡的过程中，比格遭到了黑人男性的排斥和怨恨。因为比格的行为，黑人男性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种族歧视，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探索苦难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只有当黑人受到死亡的威胁，只有当他们在恐惧和羞辱面前被逼得走极端时，黑人才会团结起来。在更大程度上，种族歧视从内部瓦解了黑人社区，并助长了他们自身的种族劣势。比格的黑色血统使他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并促使他到黑暗的森林里寻求幸福。比格所代表的黑人群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愚昧、落后和暴力的代名词，长期的被掠夺、被压迫使得黑人难以有发展的基础。而且伴随着暴力与犯罪，使得黑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

当他误杀玛丽时，比格开始显现并认识到他的真实自我。在两次谋杀和逃跑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质疑，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无名的愤怒的根源，“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在他的黑皮肤之下，思想和感情、意志和知识、期望和满足是两个从来没有

统一的世界”(Wright,1940)²²⁵。比格被困在一个奇怪的迷宫里,周围一片混乱。只有闭上眼睛,在愤怒的驱使下盲目的攻击,才能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即使是短暂的,也能照亮自己内心的阴影。比格的自我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分裂的自我。他表面上越谦卑顺从,内心更傲慢反叛。在误杀和谋杀之后,比格意识到,在他的意识的最深处,他曾经有过几次杀人的冲动,只有两次这种冲动成为现实——过失杀人与蓄意杀人。比格采取了杀人这样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他最真实的本我。

4. 比格的女性意象与男性意象

荣格用阿尼玛来描述男性内在的女性原型形象,即女性意象。她不仅是男性中的一种女性原型,而且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个人情结。阿尼姆斯是一个与阿尼玛相对应的概念,象征着女性体内的男性元素,即男性意象。“在生理上,两性都有男性和女性荷尔蒙,但数量不同;从心理上讲,男性可以表现出女性特征,女性也可以表现出男性特征”(郭永玉,2007)⁹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这使得男人和女人在爱情中融合成为可能,但当一个人在心中对某种性别过于认同时,就会出现适应问题。

在逃亡和被捕的过程中,比格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最初的冷漠和轻蔑到同情和怜悯,无意识地释放被压抑的、摒弃已久的女性意象,成功地整合了潜藏在其内心的女性意象和男性意象,促使比格接受自己心中的另一个性别,让他以一种更平衡、更和谐的方式生活和成长。

起先,比格鄙视自己的妹妹,对妹妹学习缝纫以便以后能够有为白人工作的资格而嗤之以鼻。全家人拥挤在一间屋子里,他以老鼠戏弄和恐吓她。比格鄙视周围的黑人女性,认为她们胆小、盲目、被白人吓倒。他的妈妈常这样抱怨:“比格,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生下了你。”或者“真的,比格,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没用的男人!”(Wright,1940)¹¹。母亲的责怪与唠叨使得比格对自己的母亲不怎么尊敬,甚至当托马斯夫人跪在白人面前求他们饶他一命时,他只感到屈辱和轻蔑。比格拒绝母亲最后的请求——忏悔。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与追求。比格从不去教堂、拒绝忏悔,欲与自己的黑人群体划清界限。比格对贝茜更残忍。他并不爱贝茜,他追求她只是因为他认为他配得上一个女人。事实上,贝茜对他来说并不比妓女好多少。她用自己的身体换取葡萄酒,这才是比格真正感兴趣的。正如贝茜所说,“自从我们认识,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把我灌醉,然后你就可以拥有我”(Wright,1940)²¹⁵。可见,比格和贝茜只是彼此痛苦压抑的现实生活的慰藉而已。在比格逃亡的过程中,贝茜的懦弱和退缩,以及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加剧了比格的厌倦和恐惧。最后,比格牺牲了贝茜的生命,以减轻自己逃跑的负担。

在简和马克斯的帮助下,比格开始深刻反思自己行为的起源和对周围女性的态度。

当贝茜的尸体被作为有罪证据呈上法庭时,比格对贝茜产生了更深的同情,并与她重新建立了感情纽带。在他被处决之前,比格让马克斯告诉他妈妈不要担心他,他很好。在被捕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但现在他明白了,他并不孤单,他的所作所为给别人带来了痛苦。不管他多么希望他的家人能忘记他,他们却不能。他的家庭是他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在血缘上而且在精神上是不可分割的。在比格的无意识中,他其实一直都关注和关心着自己的家人。否则他不会对简送回自己的小伙伴与家人而心存感激,自始至终,比格下意识里不愿他的家人受到自己的牵累,对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看似无动于衷,其实,更多的是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

事实上,潜藏在比格内心的女性意象一直都在,只是他有意识地压抑和排斥了它。比格知道他的母亲和妹妹正遭受着贫穷和屈辱,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们的悲惨处境不断地提醒着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无能和失败。他感到内疚、悲伤,甚至怨恨,因为他们对他的期望是他在这个社会不能得到的。他恨他的家人,因为他知道他们在受苦,而他却无法帮助他们。他知道,一旦他被允许充分欣赏他们的存在,他们生活的耻辱和悲伤,他将被恐惧和绝望震惊。这也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行为,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面对不可控的种族歧视,比格产生了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5. 原型整合——比格的自性涌现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荣格认为,“在心灵的每一层意识中,都有许多具有不同功能和相互联系的单位,包括情节、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等”(李曙光,2009)。只有充分整合这些单元,展现真实的自我,个体才能成为一个独特而和谐的人,即自我化的过程。在加剧冲突的过程中,比格融合了仇恨白人的种族情结和排斥黑人的自卑情结。与此同时,比格逐渐重新认识身边的世界,直面自己的内心,客观地看待自己内心种族仇恨的阴影和现实中因恐惧而戴上的人格面具,从而缓解了他们之间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张力。

在律师马克斯的帮助和指导下,比格逐渐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在自我反省和质疑中,他开始认真思考和分析自己暴力行为背后真正的心理动机。比格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盲目的、罪恶的,逐渐模糊而客观地看待种族问题的实质与思考解决种族问题的途径:种族歧视有着悠久的历史,黑人社区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逃亡期间,比格听到并看到了他的黑人同胞的遭遇,他的妹妹因他而失去了缝纫课,他的母亲因失望而不得不依靠宗教。比格有罪,但他不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对他来说,认罪和祈祷都是懦弱的表现。监狱中新的黑人囚犯让比格反思了他的黑人同伴的经历,唤醒了被抛弃已久的种族友谊,为他与同伴沟通和解搭建了桥梁,重建了他的种族归属感。

此外,在与简的互动中,比格努力思考个体存在的状态。在法庭上,比格感受到了简的善良、宽容和理解,理解了简即使被白人律师引诱也要努力维持客观事实的态度。他不愿在公众和白人群体的压力面前妥协,也不愿误导观众憎恨比格。简失去了女朋

友——玛丽,虽然比格被误认为是简的同谋,但简从来没有批评比格或他的家人,而是选择帮助比格联系辩护律师马克斯。故事开始时,简对比格和黑人生活的无知和关注无意中加剧了比格的自卑,伤害了他的自尊,但简总能平等地对待比格和其他黑人。后来,简主动去救比格的黑人朋友,开车去看望他的家人。简的真诚逐渐赢得了比格的信任和理解。最后,在他被处决之前,比格让马克斯向简致意,作为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回报,并真诚地告别。比格是一个人格失调患者,人格失调患者不愿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外界发生矛盾时,患者往往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在去道尔顿家工作之前,比格并不情愿接受这份工作,不愿承担养家的责任,因迫于母亲的请求与生存的困境而勉强为之。在过失杀人之后,又将自己杀人的错误归咎于种族原因。

比格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恐惧。他害怕抢劫白人商店和黑人商店,害怕失去道尔顿家司机的工作,害怕人们怀疑他强奸了玛丽,最重要的是,害怕人们会发现他的恐惧。他被困在种族情感的笼子里,恐惧主宰着他的心,他就像一只被困的动物在对着笼子的墙壁绝望地挣扎。恐惧使比格有意识地隐藏自己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迫使自己戴上冷漠和轻蔑的面具来掩饰自己真实的心理。通过观察简的真实意图和自我反省,比格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盲目伤害了别人,并向玛丽和贝茜坦白了自己的愧疚。“他感到一种冲动,一种极度的需要……他杀死了玛丽和贝茜,使他母亲和妹妹痛苦不堪,使自己濒于死亡的边缘”(Wright, 1940)³³⁵。经历了恐惧、误杀、逃跑和被捕之后,监狱的遭遇和死亡的逼近渐渐平息了比格极端的情绪。在绝望的境遇里,他追求并面对真实的自我,逐渐平息内心的狂躁和仇恨,接受最真实的自我。在简和马克斯的帮助下,比格的种族仇恨得到了缓解;在矛盾的加剧和比格深刻的内省过程中,他顺从而暴力的人格面具与愤怒的阴影最终得以调和,内心被压抑被抛弃的女性意象和男性意象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比格的真实自我、实现了其自性化的过程。

6. 美国梦的破灭

美国梦最早是在《独立宣言》中明确表述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在美国,贫富差距大,种族歧视严重。美国梦只是一个实现白人价值的梦,而印第安人、被奴役的黑人、华裔等没有权利实现自己的梦想。比格一家带着自由的梦想从种族隔离的南方来到北方,因为北方曾经是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地方。从乔治·哈里斯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逃往北方的故事可以看出,北方是美国黑人最向往的地方。然而,在芝加哥,比格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和比格住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尔顿家族的荣华富贵使比格家的贫贱相形见绌,黑人的苦难成为一种无声无息的存在。几百年来,黑人的历史是血泪斑斑的受难史,长期的被侵略、被镇压、被剥削造成了黑人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压迫和心理上的创伤。比格以怯懦和拖延的方式隐藏种族仇恨,而仇恨只会滋生仇恨。

当时黑人的命运如同小说开始时那只被比格杀死的老鼠的命运一般,为了生存忍气吞声,迫于实现梦想而仰慕白人,祈求白人的恩赐与施舍。恐惧与蓄积已久的仇恨之间的脆弱平衡一旦被打破,其破坏性与毁灭性便势不可挡。比格的奋力挣扎与抗争最终摆脱不了自我毁灭的悲剧,他的梦想破灭了,如同鱼的一滴眼泪消失在水中,无声无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把美国历史上的不光彩和社会发展中的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掩盖起来,如同阳光下绚丽的肥皂泡终究是一场虚幻的梦。

7. 结语

比格的行为无疑是血腥和暴力的,不仅伤害了许多试图帮助他的白人,也伤害了他自己的家人和更多的黑人同胞。与此同时,比格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比格意识到,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杀了无数人;比格·托马斯只是众多黑人的一个缩影,所有这些比格·托马斯们,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是紧张、恐惧、压抑、歇斯底里和焦虑的。看似偶然的过失杀人,其实包含着一点一点积累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过失杀人触发了比格心中长期积累的怨恨。他摆脱了懦弱的束缚,挖掘出真实的自我,实现了人格的自性化过程。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本我最真实的再现,用理性的态度,不要过度压抑它,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它一个释放的出口,使我们的人格完整和充实。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接受自己的理性的正面和负面,当它们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时,我们就要适当地调整它们的位置,让心灵中的每个部分都恢复自然秩序与和谐,这就是卡尔·荣格说的人类发展目标——自性,这个过程就是“自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艰辛,它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道,而是荒芜沙漠里的一条小径,遍布荆棘和砾石。我们只有勇敢前行,不断超越自我,才能迈向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 范红霞,高岚,申荷永,2006. 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人”及其发展[J]. 教育研究(9): 70-73.
- 郭永玉,2007. 人格心理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98.
- 李曙光,2009. 荣格自性化理论视角的人格双性化现象阐释[J]. 当代青年研究(1): 24-27.
- 荣格,1987. 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苏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00.
- 荣格,1988. 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 刘国彬,杨德友,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32.
- 荣格,1991.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 成穷,王作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78.
- 荣格,2012. 象征生活[M]. 储昭华,王世鹏,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58.

- 申荷永,2004. 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3.
- 沈德灿,2005. 精神分析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65.
- 宋宝萍,魏萍,2005. 荣格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健康教育[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35-138.
- WRIGHT R,1940. Native Son[M]. New York:Harper & Row.

作者简介:

杨晓丽,女,1978年6月,新疆沙湾人,文学硕士、新疆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胡启平,男,1958年4月,湖北武穴人,本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教学与研究。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 的“秘密”主题^①

赵羚洁



摘要:《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利亚斯的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揭秘过程。吸引读者的不仅是对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作者表达出的深深扎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的不安和焦虑情绪。在功利为主、自我意识高涨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下,不确定性充斥在个人认知的各个层面。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从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历史三个层面解读分析小说的核心主题:秘密。在后现代主义大潮冲击下,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怀疑;人际关系变得微妙和不确定;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对历史意义的消解随之产生。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主题;秘密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Secret of *Corazón tan blanc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ZHAO Lingjie

Abstract: *Corazón tan blanco* is a novel with postmodernism by contemporary Spanish writer Javier Marías, which tells the protagonist's process of uncovering the mystery of Teresa's suicide that happened 40 years ago. What attracts readers is not onl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ystery of Teresa's suicide, but also the anxiety expressed by the author deeply rooted in the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society. In the post-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utilitarianism is the main factor and self-awareness is high, uncertainty is rife at all levels of personal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the article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the core theme of the novel: secret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 ident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①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20年校级科研一般项目“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的核心主题——秘密”(项目编号:N2020007)的研究成果。

the individual and others, and the individual and histo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ide of postmodernism, individuals have doubts about their cognition of self-ident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become subtle and uncerta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as followed.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theme; secret

《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最著名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小说以主人公胡安的婚姻为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揭秘过程。在这个核心秘密之外,小说还构建了几个与胡安的家族秘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秘密和故事,在时间上将过去、现在、未来互相投射,并通过意识流的手法,不断加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使小说在离题和点题之间循环往复,更加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表面上对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叙述者在其中的反思,当我们分析这些反思的时候,会发现作者表达出了深深扎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的不安和焦虑情绪。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后现代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其丰富,但现代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却并没有收获安全感。在功利为主、自我意识高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除了对于现实的焦虑,小说还反映了后现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和过去的态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2014)曾说:毁掉过去,或者说,毁掉那些与前代人的个人经历相联系的社会机制,是20世纪后期最典型和最使人担忧的现象之一。本文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从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历史三个层面解读分析小说的主题——秘密。

1. 自我身份的确立

后现代语境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甚至催生出了一种纳西索斯式的自恋心理。这在文学中的一个表现是:小说主人公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自认为凌驾于其他人物之上,当他将一些自己鄙夷的社会人物纳入自己严格的目光之下审视时,这种虚荣的自恋心态会更加膨胀。《如此苍白的心》的主人公胡安就是这样的人物,当他在描述自己的翻译工作时,他认为自己高于世界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眼里这些人可笑滑稽,时刻期待翻译员来翻译他们不懂的内容,也认为当自己作为口译人员的时候,高于自己的笔译同行。这种自负的心理是胡安大胆欺骗英国、西班牙两国领导人,操控他们对话的动因之一。一方面,自视甚高的胡安对自己不能在这场高层对话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感到有些失望,另一方面,他觉得译员是最有权利和能力介入当事人对话中来的,他们可以利用语言来操控他们的对话,省略或是调整某些内容,尤其当他篡改内容,背叛当事人的

时候,译员这种控制场合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路易莎的不干预态度纵容了他的行为,她成了他背叛自己职责、背叛两国领导人的“同谋”,与胡安之间达成了一个要保持沉默的默契约定。这种通过译员介入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在小说最后一章再次出现:路易莎利用自己外交官般的语言技巧,迫使兰斯讲出了过去的一切,而胡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个孩子一样,听到了这场对话。可以说,由于路易莎的出现,也就是新的关系的出现,胡安的自我身份变得不再那么确定,自恋的心理将不再占主导地位。他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小说最后产生新的变化,小说展示的其实是主人公建立自我身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两个变化:一是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状态,对婚姻关系的持续思考是胡安心理变化的重要线索;二是知晓了父亲的秘密,儿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不了解是这部小说中很突出的一个现象。父亲往往是儿子的榜样,影响着儿子的自我认同和对世界的看法。因为父亲的秘密是与婚姻相关的,所以这两个变化在本质上是相关的。

从恋爱到婚姻,胡安与路易莎的关系水到渠成,但是对于新婚,男人与女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当路易莎积极为两人的爱巢做布置的时候,他却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对于刚刚结婚的胡安来说,婚姻像是一个消极意义的决定,像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共同的生活不仅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还会擦除掉他的身份,因为缔结婚姻实际上是一种压抑旧我、摒弃旧爱的证明,他不得不把称谓从“我”变成“我们”。结婚使他有一种“一切到了尽头的感觉”,这种到达尽头的感觉意味着离开了自我,离开了自由,两人别无选择地共享一切。也意味着过去和将来都被抹去了,抽象的、未被决定的、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消失了。在胡安看来,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取决于那些未被决定的可能性,那些未知数,一如他在结婚前一天的感慨:从明天起,将不会再有小小的未知数,尽管过去将近一年以来它们都充斥着我的生活,让我们在空等与模糊的未知之中以最好的方式度过时光。然而婚姻就这样抹去了他的身份,所以胡安用了“致命的疾病”“剧烈的变化”“让人无法呼吸”“终点”“歼灭”等这样与死亡相关的词汇来形容婚姻。

在小说最后,他决定减少出差,因为每次出差回来,家里的新变化都使他感到陌生,他越刻意回避对新生活的参与,新生活就越不留情地吞噬他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他想承担起经营婚姻的责任,与路易莎共同建设婚姻这座大楼设计未来,他不再害怕“我们”这种称谓,因为路易莎使他意识到,“我们只是改变了身份状态,而这个改变目前并不严重,也可以估量”。婚姻中的秘密有时使他们分离,但更多的是使他们形成一个联盟,在听到家族的秘密后,他们将达成新的协议,将一起保持沉默或者遗忘。虽然他再也不能以孩童的身份来保持单纯和自我,但由于路易莎的作用,他担心的过去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威胁性了,虽然过去的秘密将他的生命与一桩罪行紧密联系起来,使他自恋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但与婚姻的和解使他在家庭中找到自我,也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胡安与自己婚姻的和解发生在小说最后一章:当他听完父亲揭晓的秘密后,他的不适感平息下来,对未来的预感也不再那么可怕。与此同时,他与自己的父亲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他与兰斯并没有矛盾,然而他的生活中却时时刻刻受到兰斯的影

响,他继承了兰斯的外貌特征;他的中产阶级身份与兰斯的财富有关;他的新家充满了兰斯的元素;他听从兰斯给出的忠告。似乎兰斯长时间以来保持年轻的状态就是为了给胡安打点一切,他把秘密保守四十多年也是为了保护想要像孩子一样无辜的胡安。一直都“无意探究事实”的主人公,在自己的家庭中,从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角色,心甘情愿处在未知的位置,不去探究秘密,也就不去承担秘密的后果。然而随着路易莎的介入,兰斯最终讲出了自己婚姻的秘密,从此,胡安眼中的兰斯终于不再是那个优雅甚至完美的父亲了,对过去的回忆使他和一个普通老人一样了,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也没有什么要保护的,路易莎将替代他成为胡安家庭中的主导者,而胡安的身份将摆脱兰斯的烙印。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兰斯,他甚至想让自己的胡子再长长一些,这是一种迟到的“叛逆”,也是一个儿子自我身份确立的过程。围绕在父亲身上的秘密使胡安最初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确定的心理,而当这些秘密被解开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罪犯的儿子而怀疑自我,父亲与过去和解,他与父亲“和解”。小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胡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们只知道他是叙述者,是兰斯的儿子。这种设置体现了后现代小说的一个特色,叙述者虽然在讲述自己的事情,但倾向于与叙述对象保持距离,采用一种冷漠的旁观者的视角,仿佛在讲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到最后,胡安这个人物才获得姓名也是其愿意接受这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象征,这也是知道真相对他来说不再具有威胁性的原因之一。

2. 悲观主导下的人际关系

后现代的小说家们在写作时更多地表现生存的虚妄与人生的虚无,这类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确定的社会关系不同,它们表达的是对传统权威确立的规范、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反叛或背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不确定。

《如此苍白的心》通过主线故事以及一些表面上离题的分支故事描绘了一个由悲观和疑虑所主导的世界。哈维尔·佛尔尼丝(2003)认为,造成这种悲观和疑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主人公身边与他密切相关的人引起了他的不信任感。对于追求个人自由的胡安来说,“他人即是地狱”。第二,社会条件产生的习惯、义务和束缚造成了这种不安和忧虑。社会条件包括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所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群体等。

胡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不信任主导的,我们很难知道那些围着我们的人的真正目的。“一个人永远都无法确定别人的作为;没有人可以信任”。这种对彼此的未知会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尤其糟糕的是,危险会出现在我们最私人最亲密的关系里,我们以为最亲密的关系空间是我们对抗外部世界的避风港,期待它为我们提供安全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一种情感的纽带或者结合——不管是友谊、婚姻还是家庭,都不能构成一个安全的港湾。在哈瓦那,偷情的吉列尔莫向米丽娅姆提出了谋杀他妻子的计划。胡安也在他最亲近的圈子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危险。妻子路易莎可能对自己

隐瞒了一些事情,甚至可能背叛过自己,与自己同床异梦。伴侣可能并不像表面一样可靠,没有任何一座婚姻的围城是坚不可摧的;小古斯塔尔多易,他童年的朋友,很有可能与路易莎有暧昧关系,从而成为他婚姻中的威胁,同时,这个人深受兰斯的喜爱,会跟他争夺父亲的好感,胡安因此感慨,“谁没有过猜疑,谁没有怀疑过他最好的朋友,谁没有见识过背叛和童年的告密”。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的父亲兰斯,他是个和蔼可亲、优雅得体又热情慷慨的人,却也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谋取私利的人,更严重的是,他是为了与特蕾莎在一起谋杀了自己第一个妻子的人。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我们或许熟知家人的生活方式、性格面貌,但是对于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和骇人经历,我们往往一无所知,表面平静璀璨的海水,在更加深入的海底波动诡谲,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父亲是胡安最亲近的人,但也是给他带来最重的危机感的人,未知带来的是被排除在外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意味着生存的危机感。

这种危险不仅出现在我们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身上,同样发生在那些最私密的地点和时刻,那些是我们最信任的地方或时刻,例如卧室和睡梦。杜肯国王是在睡梦中被麦克白杀害的;兰斯是在妻子熟睡的时候杀了她;吉列尔莫和米丽娅姆在房间里谋划杀害妻子的阴谋。当英国首相被迫下台的时候,她遗憾自己被她最亲近的同僚所背叛,所以,她给在场的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沉睡,那些安全的岁月邀请我们在其中高枕,我们习惯于平安无事,有一刹那我在其中入眠,而现在您看到我身上所发生的事了”。

3. 对历史的“遗忘”和消解

3.1 “遗忘”的意义

在后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过度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个体被从一个庞大、综合的历史和社会网络或系统中分离出来,致使其更容易抹杀自己的过去,走上背离传统的道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繁荣,人们渐渐意识到以往深信不疑的有关历史的说法只不过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从这一观点出发,任何人都有权利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表见解、提出质疑,历史将不再是单一封闭的结构,所以许多后现代小说中都有反历史的特征,它们或者不谈论历史,或者将对历史的讲述浓缩在日常化的叙述中,然而这种叙述主要不是为了反思,而更多的是追求对历史的消解。

围绕秘密,小说主人公最鲜明的态度是隐藏真相,拒绝知晓真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秘密代表着过去,代表着父辈人的历史,探究这样的秘密意味着回顾历史,承认过去,也就意味着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让历史依然在今天发挥影响,而这是后现代主体不希望的,他们对过去和历史不感兴趣,采取冷漠甚至遗忘的态度。虽然并没有直接谈到社会历史背景,但小说中部分细节还是透露了小说故事涉及的时代,小说将历史融进了自己的虚构里。在199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兰斯不仅经历了西班牙内战、战后

独裁,也经历了民主的过渡,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近代历史的一部分。胡安的童年是在佛朗哥时期的马德里度过的,然而他对这段历史的遗忘多于记忆,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年幼,更主要的是出于主动地遗忘,因为他的父亲在内战后是胜利的一方,而且是佛朗哥统治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小说可以说是从战胜者的视角讲述的。

兰斯的财富得益于佛朗哥时期的机构腐败,他退休前曾是普拉多美术馆的专业鉴赏人员。凭借自己的能力,他同时是好几家美国博物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的顾问,“他越来越有钱,不仅靠他的佣金和在普拉多美术馆的专家薪水,也得益于他的贪腐舞弊,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买卖双方立场间切换,代表卖方利益而不能让买方知道,因为通常都是买方聘请鉴定专家的”。兰斯致富的第二种方式便是“提供意见并指导伪造者,让此人的仿冒作品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境界”,而当他的伪造者朋友被逮捕后,不久便被释放,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的父亲从他普拉多美术馆的办公室里打了几通电话给几位在佛朗哥死后仍然拥有影响力的人士”。兰斯的这些私人关系不仅证明了佛朗哥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政治机构对腐败的漠视,这种漠视继承自独裁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兰斯是佛朗哥时期甚至也是民主过渡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大笔财富将会成为胡安继承的遗产,前提条件是胡安对这些金钱的来源保持沉默,对他来说,不知道父亲财富的秘密是一种保障,而当他已经知道了后,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甚至忘记过去,只有这样他才能没有愧疚感地接受这笔财富。因此,胡安避免知道过去,避免回忆过去,甚至用一种遗忘的精神,以一种孩童的目光看待过去:像孩子们一样,这些男人和女人们相信,世界是从他们出生开始的,他们从不询问在他们踩踏的土地上是否之前就有过足迹。

在胡安看来,金钱可以改变别人的行为和决定的能力使他获得安慰感,成为他隔绝过去的原因和手段。主人公利用钱消除了具有过去意味的痕迹,而金钱与时间的关系还不止这一点。“一个人呈现的年纪和外表,可以取决于任何他感兴趣的人和自己拥有的金钱”。胡安少年时代暗恋的文具店女孩已经变得不再年轻漂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只是远远地爱恋却没有与她交往,没法给予她比现在好很多的生活;兰斯的年轻光彩也与此有关,他不仅有钱,而且要守护自己金钱的秘密,以及自己婚姻的秘密,在他讨人喜欢的外表下,有他在古巴犯下的杀人罪行,也有他在本国不正义的敛财行为。多年来对秘密的沉默使他觉得有些事已经遥远到似乎不曾发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他能隐瞒这些往事,他就能保持年轻,如果他能保持年轻,胡安就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孩子角色,所以两人心照不宣地有一个要保持沉默的约定。

3.2 在叙述中“遗忘”

对于年轻一代的胡安来说,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值得记忆的,要避免这种记忆,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不讲述,不讲述就可以不知道,在主人公坚持自己的孩

子角色的时候,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他拒绝知道,忽视过去。然而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我们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事实,小说是在他已知过去的基础上叙述的,因此他遗忘过去的心愿只能通过第二种方式,也就是采取合适的叙述方式来弱化过去。后现代小说家们不否认历史的存在,又主张没有可以直接接触这个真实世界的途径,唯一可用的只是讲述这个世界的各类话语和话语结构。第一个途径是我们在第二节提到的不确定性,他要面对过去已经是一个他并不熟悉而且也无法再进入的过去,所以他只能依靠着不确定的记忆去叙述过去,这可以使他淡化历史的沉重色彩。第二个途径是在叙述中不断地离题,插入一些与主线并不直接相关的新故事以及自己一些随意的思考,这些离题的故事和漫无目的的思考使过去发生的事情变得越来越中性。例如,我们在小说最后会发现,兰斯的故事与之前吉列尔莫和米丽娅姆的故事其实是平行的,在已经听说过吉列尔莫的预谋后,兰斯谋杀妻子的揭秘变得不让人那么震惊,过去的重量被主人公有意识地减轻了。

主人公在纽约的经历是一处弱化社会历史背景的离题设置。这个故事既没有发生在马德里,又没有发生在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但处处体现了主人公对历史和过去的思考。当贝尔塔和比尔约会结束后,在外游荡了几个小时的胡安回到住所,第一件事便是取出自己在外购买的东,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为了“加速忘记我曾经旅行过,让平静重回生活”。除了强迫自己加速忘记过去,主人公还喜欢模糊记忆,让记忆变得模糊,不可分辨,它便不再具有说服力,不再具有威胁性,所以胡安认为录像带是个可恨的发明,因为“杜绝了自欺和将事物以不同于事实的方式描述出来的可能性。”

当我们把主人公的经历放大到西班牙的历史中去,就会发现这种遗忘并不只是个人选择,或者只是战胜方的选择,它是西班牙现代史的一个选择,所有历史选择都有它的意义。虽然主人公与作者同为翻译,出生年份也较为接近,但《如此苍白的心》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它也不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是一部融合了真实和虚构的后现代小说。作者并没有直接谈及历史,但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历史的文学化表达。我们无法避免历史被讲述,但我们可以把握历史被讲述的方式。小说成书于1991年,因此主人公胡安代表的是在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弗朗哥死后,他的部长和国王成为新的民主的代言人,他们制定了新的宪法,推动政党合法化,实施大赦,使得没有人因为过去的罪行被继续追究。年轻一代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仍然在适应和认识自己的国家,就像胡安每次出差归来他都需要对自己的家重新适应一样,这里的家与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胡安的家里有兰斯的设计,有兰斯想要维持的旧秩序,就像这个国家也保留着过去的痕迹一样,不管是胡安还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努力与过去的痕迹和解。

小说将主人公设定为一名翻译并不是偶然的,作为翻译人员,胡安经常在外国工作,但在小说最后,他决定更换工作,减少出差,更多地留在马德里,在某种程度上,他象征着那些在远离了自己的国家后又重归故土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国家,选择与历史和解,使过去变得就像一部文学作品,其中的故事变

得宽容和可接受。在后现代的理论框架中,历史不存在唯一性和确定性。遗忘使历史变得中性,当那些羞愧的、不正义的时代真正远去,人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这是后现代群体的历史观和历史选择,虽然小说的视角是战胜者的视角,但作者的态度是中性的,并无意批判,而只是以文学的形式将历史呈现出来,以此消解了历史。

4. 结 语

《如此苍白的心》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者巧妙的文学构思和高超的创作技巧,也得益于作者赋予了作品引人深思的思想主题和内涵。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在小说表达的主题上,但并非是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僵硬照搬。小说以秘密为切入点,通过人物关系,描述了婚姻中、父子间和社交生活中的秘密,构建了充满“秘密”的平凡生活图景,深刻地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点。由于各种各样秘密的存在,更由于这些秘密是不可言说或者不可知的,人际关系变得微妙,变得不确定,不仅使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怀疑,也会使得他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怀有敌意或是充满威胁的世界。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是无法被抹去的,一如主人公一直抗拒知道过去的秘密然而最终却还是要面对它一样,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历史,都是无法回避的。然而,对经历过重大历史创伤的人来说,历史是个沉重的玩笑,如何担负起这个玩笑,是否负担得起,负担起之后又是否会减轻该有的沉重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后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群体对历史不再那么有兴趣。后现代小说表达了这样的历史观,它们不仅质疑着历史,也质疑着历史所能提供的意义,笼罩在历史上的神圣、权威的光环被驱散,其曾经拥有的指导和象征性价值在被抽去,它倾向于被降解为在人的主观意识的驱动下构筑的符号话语体系,人们借助它编制过去的意义,服务于某一特定的目的。在《如此苍白的心》中,“秘密”是一把通向过去的钥匙,叙述者消解秘密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消解历史。小说没有直接讲述历史,但作者在虚构之中加入了真实的西班牙历史背景,对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在自己的叙述艺术中消解了历史的意义,表达了后现代群体的历史观。消解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遗忘”。这种“遗忘”并非是真的遗忘,更多的是与历史的和解。

参考文献:

- 哈桑,2015.后现代转向[M].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3-36.
马利亚斯,2015.如此苍白的心[M].姚青云,蔡耘,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莎士比亚,2009.麦克白[M].朱生豪,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沈石岩,2006.西班牙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21-322.
曾艳兵,2006.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22.

- ALEXIS G, 2002 Coming into one's own: the nove listic development of Javier Marías [M]. Amsterdam: Ropodi:204-206.
- FRANÇOIS L J, 1993. La Condición Posmoderna[M]. Barcelona: Planeta: 101-102.
- ISABEL C, 2004. El espectro de la herencia; la narrativa de Javier Marías[M]. Amesterdam: Ropodi:36-38.
- MARÍAS J, 1994. El Corazón Tan Blanco[M]. Barcelona: Anagrama.
- ÓSCAR C, 2002. Memoria, olvido e historia en Corazón tan blanco de Javier Marías [J]. Ciberletras: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y de Cultura (6) :89-93.

作者简介:

赵羚洁,1992年1月生,河北邯郸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国家文学。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汉诗对偶英译的审美经验与美国诗学进程^①

——以庞德与斯奈德译文为中心

蔡正伍 杜 磊



摘 要: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特色之一,对偶的语言形式之下蕴含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涵。在“新诗运动”的影响下,不少美国诗人意图借汉诗养分促进本土诗学发展,其汉诗英译因而呈现出诗学杂合的特征。本文以庞德《华夏集》与斯奈德《寒山诗》中的对偶诗句英译为研究对象,取阅读进程、空间想象与世界图式等三个维度,在审美经验视角下比较两人的翻译方法差异。这种差异既源于译者主体不同的诗学认知,亦体现了“新诗运动”下美国本土诗学的发展情况。基于两个译本显现出的审美经验差异,可以管窥四十余年间汉诗英译对美国现代诗学的反向推动作用,进一步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中现代性因素中的世界文学意义。

关键词:对偶英译;审美经验;诗学进程;庞德;斯奈德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tithetical Verse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Poetics: A Case Study of Ezra Pound's and Gary Snyder's Versions CAI Zhengwu DU Lei

Abstract: As a principal fea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tithetical verse contains beneath its linguistic surface a reflective pattern full of aesthetic connot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sway of the New Poetry Movement, many an American poet intended to derive nourishment from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or the progress of the poetics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us assumed poetic hybridity. Taking the translated antithetical verses in *Cathay* by Ezra Pound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by Gary Snyder as object of study, the present paper compares their vers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①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且系2021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MTI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MTIJZW202114)的阶段性成果。

reading process,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world schema.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ifferences were borne out of the divergent poetic perceptions of the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etics during the New Poetry Movement. Based on these discrepancies in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two versions have betrayed, it is possible to capture how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ave served to propel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ics over the forty-odd years, illumin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factor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tithetical verses; aesthetic experience; poetic process; Pound; Snyder

20世纪初期,美国“新诗运动”(New Poetry Movement)在对破旧立新的艺术追求之中开启了海外现代诗学的进程^①。新诗诗人因不满日渐僵化的维多利亚(Victorian)诗风,纷纷将视线转向异域的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诗学,以期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探寻诗学镜鉴,为诗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此,不少新诗诗人投入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中,为英语世界带来了大量汉诗英译作品。

作为“新诗运动”影响下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代表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与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在这场“中国影响的大循环”中分居首尾(赵毅衡,2003)⁷²。庞德于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Cathay*)既是其诗学和译学趋于成熟的标志,又是“汉诗英译和现代英语诗歌创作双重意义上的圭臬”(王贵明,2004)⁸⁶;斯奈德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于1958年一经发表就成为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②,确立了其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地位,甚至还触发不少美国作家在小说、诗歌与散文中竞相书写“寒山”的热潮(耿纪永,2019)¹⁸³。就翻译动机而言,两位诗人均意在以文本为载体,通过翻译传递自身对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与感悟,服务自身诗学的意图十分明确。因此,通过充分汲取原诗养分基础上的大胆改译,两位诗人的译文一方面成为英语世界中的汉诗经典,另一方面又发挥出了建构美国本土诗学的重要功能。这种以创作为取向的特殊翻译现象(李林波,2010)¹⁸³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构,其内在呈现出了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诗歌相杂合的诗学特点,折射出了中国文学给美国诗坛带来的重要影响。

① 作为美国现代诗歌的起点,“新诗运动”开始于1912年底哈丽特·蒙罗(Harriet Monroe, 1860—1936)创办杂志《诗刊》(*Poetry*),终止于1922年底。尽管持续时间短暂,“新诗运动”却影响了从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到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的一大批新诗诗人,意义极其深远。

② 该译本被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 1925—)收录进《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集选取的作品范围广泛,体裁多样,历史跨度从周朝至当代,是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英译选集,获得收录是译作得到汉学界主流肯定的标志。与施耐德一同被收录的汉学家还有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霍克斯(David Hawks, 1923—2009)以及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等。

1. 超越形式的对偶审美经验

在庞德和斯奈德“中为西用”的总体翻译观念中,中国古典诗学并不具有与美国现代诗学的平等地位。在翻译的诗学互动中,“扬弃”(德语:aufheben)成为必然的“主旋律”:中国古典诗歌中不符合美国现代诗学的要素必须接受严格过滤,而与之不谋而合的成分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对偶作为“中国文学最明显的特色之一”(浦安迪,1996)⁴⁸,蕴含着中国古典诗学独有的异质性审美要素,其英译是用个体审美经验去消化这种异质。然而,对庞德和斯奈德而言,对偶诗句首先几乎是“不可译”的。这是因为,对偶依赖汉语字数一致、音节相等、平仄协调的视听平衡体验(李生龙,1999)²²难以在英语中“复刻”。更为重要的是,主观上,他们也“不愿译”对偶,“新诗运动”的精神本就是要反叛刻板格律,反对精心结构、字斟句酌、华而不实的语言(张强,2001)³⁹。这样一来,运用自由诗体重构原诗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的对偶语言结构就成了两人翻译的主导文体策略。

在“新诗运动”的历史语境下,对偶因其形式之故而表现出了极强的抗译性,但是这种“不可译性”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偶的审美要素一定会在翻译文本中遭到解构而消失殆尽?陈望道(1976)⁴⁰曾指出,辞格虽“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若不忘记它们的关联作用,却又未尝不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说”。修辞,就其形式与内容而言,并非完全不可分离。就对偶而言,形式不存、审美要素却得以传达的翻译特殊效果在修辞理论上是可能的。不可否认,形式要素是对偶辞格审美的“入口”,但对偶的审美身心体验也有相对独立于其形式的一面,也就是说,包蕴于对偶中的审美经验完全有可能跨越语言障碍,换一种语言形式获得再现,形成与对偶相似或相近的审美效果。

与一般的对偶英译研究不同,本文以《华夏集》和《寒山诗》中的对偶诗句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要分析庞德与施耐德的译文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对偶的形式。作者意在超越形式,从杂合化英译过程中的审美经验出发,基于阅读进程、空间想象、世界图式等三个维度考察庞德和斯奈德采用的不同翻译处理手法,揭示居于对偶语言表层形式之下深层的审美经验在语言间流动与传达的语言现实,并从这一角度对比探讨过去研究不曾触及的两位译者审美经验的差异。

2. 阅读进程:流动与凝滞

在一般的诗歌阅读过程中,意义通常如流水般线性向前发展^①。与之不同的是,对偶使诗句成为“静止的聚集段”(江弱水,2009)²⁸,中断了“线性的阅读进程”,形成“封闭

^① 以杜牧的绝句《泊秦淮》为例,“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四句诗具备清晰的语义发展链条:首句中意象“月”字自然带出颌联中的动作“夜泊”,第二句的地点“酒家”再引出第三句中的人物“商女”,至此,第四句“犹唱后庭花”的讽喻便水到渠成。

空间”,使阅读成为“不断回顾和旁观的运动”(高友工,1996)⁸⁹。以刘禹锡所作“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为例,上下两句分别选用“沉舟—千帆”“病树—万木”两组互为对比的意象,并以“沉舟—病树”“千帆—万木”的语义关联相互吸引,构成结构封闭、往复回环的审美对象,以此牵引阅读注意,使读者产生“立定回嚼之感”(童山东1990)⁸⁷(如图11.1所示)。从审美经验的角度看,对偶通过选择充满张力的语词,并将其组合于对称循环的封闭结构中,打破读者对语义线性向前发展的心理预期,使审美注意停留,审美过程延长,带来一种凝滞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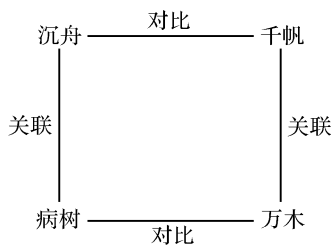


图1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封闭结构

庞德不懂汉语原诗,只凭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笔记作为底本,很难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对偶原诗所产生的凝滞美感。由于对这种依存于形式的语义特征缺乏了解,庞德往往在无意间拆解了对偶的张力结构:

| | |
|---|--|
| 仙人有待乘黄鹤, 海客无心随白鸥。 (李白,2017) ¹²⁸¹ | Yet Sennin needs A yellow stork for a charger, and all our seamen Would follow the white gulls or ride them. (Pound, 1915) ⁸ |
|---|--|

从形式上看,庞德将两句对偶的汉诗化为三行英译,对偶上下对照的形式就荡然无存。本分属两句的“黄鹤”(a yellow stork)与“海客”(all our seamen)被置于同一诗行,对偶循环审美的主客体框架被完全打破,英语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也不会如汉诗读者一般停留。在部分译文中,庞德甚至切开对偶:

| | |
|---|--|
| 屈平辞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2017) ¹²⁸¹ | Kutsu's prose song Hangs with the sun and moon. King So's terraced palace Is now but barren hill, (Pound, 1915) ⁸ |
|---|--|

原诗本是一组工整的对偶,译文尽管使两句句法结构大体维持一致,却将每句分拆到了上下两个诗节中,读者停留、回顾的可能性因而也大大降低。“空山丘”(barren hill)之后的逗号则暗示了读者阅读的未竟,凝滞的阅读进程也就难以实现。然而,在极少数对偶诗中,庞德却实现了凝滞的美感:

| | | |
|--|--|---|
| 芳树笼秦栈, 春流绕蜀城。 (李白,2017) ¹³⁵ | | 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ved way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oku, a proud city. (Pound, 1915) ²⁹ |
|--|--|---|

译文中,“paved”“paving”“burst”“bursting”等具有相似音节的词语反复出现,以重复的音响效果形成前后呼应,实现了使读者注意力停留的审美效果。实际上,庞德在翻译中使用相似音节与“新诗运动”时期的“绝对节奏”(absolute rhythm)主张不无相关。作为用音乐传达情绪、表现真实的尝试(张曦,2013)⁷²⁻⁷³,绝对节奏是“一种写作方法,其中每个词语都应该承担一定的重量,并为总体效果做出一些特殊贡献”(Pound, 1973)²⁷。相比之下,斯奈德译文中的凝滞效果,不仅来源于音韵在“绝对节奏”的作用下相互牵引,也体现在其对汉诗对偶结构内在张力的关注与还原:

| | | |
|--|--|---|
| 凋梅雪作花, 机木云充叶。 (寒山,2019) ³²⁹ | | On the bare plum, flowers of snow On the dead stump, leaves of mist. (Snyder, 2013) ¹⁴ |
|--|--|---|

与庞德的“绝对节奏”主张相似,斯奈德将“凋梅”改写为“机梅”(bare plum),又将“机木”改写为“凋木”(dead stump),其实也是出于对音韵美感的考虑:“bare plum”中[b]与[p]发音相似,“dead stump”中[d]音连续出现,形成“绝对节奏”。又例如:

| | | |
|--|--|---|
| 月照水澄澄, 风吹草猎猎。 (寒山,2019) ³²⁹ | | When the moon shines, water sparkles clear When the wind blows, grass swishes and rattles. (Snyder, 2013) ¹⁴ |
|--|--|---|

听觉上,译文“grass swishes and rattles”连续运用瑟瑟作响的[s]音,模拟出风声猎猎的听觉效果,是强化音韵、吸引注意的手段;视觉上,两句译诗句法一致,均是前置时间状语从句后接主谓结构主句,两个“when”放置句首互为映衬,吸引读者回顾。需要承认的是,在个别译例中,斯奈德通过改写有意削弱了凝滞效果,例如:

| | | |
|---|--|---|
| 住不安釜灶， 行不赍衣衾。 (寒山, 2019) ³³² | | His shack's got no pots or oven, He goes for a long walk with his shirt and pants askew. (Snyder, 1958) ¹⁵ |
|---|--|---|

此例中斯奈德对原诗进行了明显的美国化和当代化改写,意在隐藏中国形象,凸显美国声音,借寒山之形象摹写“垮掉派”(the Beat Generation)之生活状态,强化译者所代表的文化身份(胡安江,2005)⁶⁴。在此,斯奈德服务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盖过了诗学上的主张,译文在内容上明显流露出改写的痕迹,在形式上也没有保持句法一致。作为改写而非翻译,此处对中国要素的删除,从反面体现出斯奈德对汉诗的对偶结构及其凝滞效果的尊重。

尽管都提倡诗歌张力,庞德与斯奈德在翻译方法上却存在较大差别:前者只在个别地方通过重复相同音节来制造句内张力,牵引阅读注意,却忽略了对偶本身的句际凝滞手段;而后者既关注音韵配合,又极力保留句际的语义张力,有效再现了汉诗对偶的循环结构和凝滞美感。

3. 空间想象:平面与立体

中国古典诗歌期望在有限和瞬间中实现无穷和永恒^①。面对此时此地转瞬即逝的场景,古代诗人往往运用对偶手法,根据时间上或空间上的两点为坐标,创造时空开阔的诗歌世界,增强语义张力,成就千古文章(杨星丽,2014)⁵¹。出于营造开阔意境的考虑,对偶诗句常常将坐标确立为空间距离遥远、对立鲜明,而隐喻天地万物、囊括大千世界的一对代表性意象。以王维所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为例,一方面,诗句选取的边塞意象本身就是“千古壮观”:静寂“大漠”与奔流“长河”的动静对比,冷色“孤烟”与暖色“落日”的颜色冲突,加上“直”与“圆”的几何差异,构成强烈的视觉对冲,烘托出边塞荒漠辽阔壮美的景色;另一方面,对偶将这些平面意象进行了立体空间构建,构成了开阔的意境:“大漠”在横向(x轴)上无限延展,“长河”流淌至纵向(y轴)的极远处,“孤烟”直上与“落日”坠下的反向空间运动(z轴)将立体空间引入眼前平面的荒漠,激发起读者立体的空间想象认知,反衬出诗人行至边塞时感到的渺小和孤独(如图2所示)。

^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为此,古诗往往追求开阔的意境,以求“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领悟和感受”(叶朗,1998)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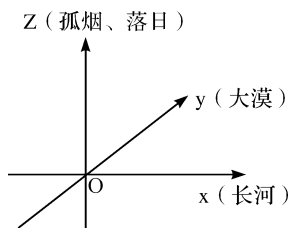


图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空间构建

从审美经验的角度看,诗人营造开阔的意境,并不刻意选取壮观的意象^①,而是通过对偶手段,将在空间概念上相互对立的一组代表性意象进行组合、重构与凸显,将读者的审美想象从“点”与“面”引向充满内在张力的“体”,以此激发空间想象,传递立体美感。

尽管不懂汉语,诗人庞德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诗中常用对偶句,把抽象和具体描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意象巧妙地连接在一起”(王军,1988)⁵⁵。因此,庞德在翻译时重点关注意象的表现力,尤其还原强视觉性意象间的对照关系,但对立体美感的再现不足。例如:

| | |
|--------------------------|--|
| 仗出金宫随日转, | The imperial guards come forth from the golden house with their armor a-gleaming. |
| 天回玉辇绕花行。 | The Emperor in his jeweled car goes out to inspect his flowers, |
| (李白,2017) ³⁷⁰ | (Pound, 1915) ¹⁰ |

译文中“金”(golden)与“玉”(jeweled)的意象得到保留,然而“日”被改写为了更加夺目的“闪闪发光的铠甲”(armor a-gleaming),致使地上之“花”(flower)失去与天上之“日”的空间对照,难以构建立体的空间结构。

尽管庞德的译文往往忽视意象在对偶组合下形成的意境空间,但其格外关注意象本身,采用意象叠置技法,使不同平面形成关联,产生蒙太奇效果,不失为立体构建的一种尝试(叶维廉,2019)⁵⁵。例如:

| | |
|--------------------------|--|
| 荒城空大漠, | Deserted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
| 边邑无遗堵。 | There is no wall left to this village. |
| (李白,2017) ⁷³⁸ | (Pound, 1915) ¹⁶ |

^① 开阔的意境与壮观的意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张若虚所作“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一联中,“鸿雁”与“鱼龙”意象本身并非壮观,只是由于前者翱于天上,后者潜于水中,空间距离相隔遥远,成为万物的隐喻和天地的坐标。广阔宇宙中善于遨游的万物都难以寄托相思,衬托出诗人的思念之苦。

译文着力于处理上半句的意象,将动词“空”转变为“天空”(sky),配合“荒城”(deserted castle)和“大漠”(wide desert),共同组成了一幅浩瀚荒漠的立体画卷:天空与大漠处于不同平面,在横向无限延伸,大漠天地的辽阔正反衬出荒城的渺小与孤独。类似误译所形成的立体美感还体现在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并置,从而“形成一种空间的玩味,互为修饰互为表意”(叶维廉,2019)⁵⁵,例如:

| | |
|--------------------------|---|
| 惊沙乱海日, | Surprised. Deserted turmoil. Sea sun. |
| 飞雪迷胡天。 |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aven. |
| (李白,2017) ⁷³⁶ | (Pound, 1915) ³¹ |

原诗上句本是由“惊沙”“乱”“海日”三个词语组成,庞德却将其破碎重组为“惊”(surprised)、“沙乱”(deserted turmoil)、“海日”(sea sun),并采取意象叠置的技法,将人的惊讶情绪与分属不同空间的沙漠、混乱、海洋、太阳组合起来,构成抽象的立体美感,尽管这与对偶本身并无关系。

相较而言,斯奈德对意象在对偶组合下所形成的空间美感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在译文中极力还原,乃至使用创译手段进行强化。例如:

| | |
|--------------------------|------------------------------------|
| 旭日衔青嶂, | Morning sun drives over blue peaks |
| 晴云洗绿潭。 | Bright clouds wash green ponds. |
| (寒山,2019) ²⁸⁷ | (Snyder, 2013) ¹³ |

原诗描绘了朝阳遥挂青山上,白云投影绿潭中的自然景色,特别是“晴云洗绿潭”一句,天地相映成趣,纵向拉伸感十足。“旭日衔青嶂”一句中“衔”本意为“用嘴含”,而斯奈德译为“驶上”(drive over),巧妙暗示了“旭日”自下往上的运动过程,加强了纵向拉伸的立体美(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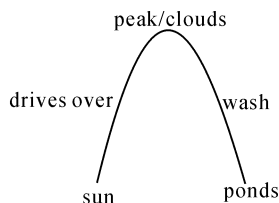


图3 斯奈德“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译文的空间构建

斯奈德对空间概念比较敏感,往往在译文中加以凸显,例如:

| | |
|--------------------------|---|
| 渐减如残烛, | Slowly consumed, like fire down a candle; |
| 长流似逝川。 | Forever flowing, like a passing river. |
| (寒山,2019) ¹¹⁵ | (Snyder, 2013) ¹⁰ |

原诗引入“残烛”和“逝川”的意象来比喻人生的短暂,译文用“down”(自上到下)来译“残”,用“passing”(自迩及远)来译“逝”,形成纵横两向上一对矢量,强化了空间构建,带给读者立体的审美想象。

庞德和斯奈德关于空间立体美的审美经验不尽相同,因此在翻译方法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庞德译诗的立体美感主要来自意象叠置技法的运用,与对偶关联度较小;斯奈德着力保留甚至有意强化汉诗对偶所建构的立体空间想象。换言之,庞德的译诗尚居于意象层面,而斯奈德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和哲学,领会到对偶各意象所划定的广大空间,将意象组合形成意境,以此激发诗歌的立体美。

4. 世界图式:对立与和谐

受老庄影响,中国传统宇宙观认为万物皆源于气,万物在气的流动中分化,但仍然保持着和谐的关联^①。古代诗人通过观察“世界中的秩序”(宇文所安,2013)⁵¹,利用对偶将“自然世界的结构”进行“语言形式上的显现”(宇文所安,2013)⁵²,再现万物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的关系,以文学材料对世界的模拟来承载“阴阳交替”的宇宙哲理^②。也就是说,对偶中“每个符号召唤其相反者或互补者(它的另一个);而所有的符号,在互相协调或者互相对比中引发意义”(程抱一,2006)⁶³,最终使诗句形成阴阳变易下“一个稳定的自在的宇宙”(程抱一,2006)⁶⁴。从审美经验的角度看,对偶通过构建和谐的世界图式,激活中国读者文化认知中的和谐美感。然而,这种和谐美感基于东方“相辅相成”的哲学观点,与西方“分解对立”传统存在根本差异(周来祥,1998)⁴,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与文化个性,往往难以补一般的西方读者和译者理解。

作为美国文化语境下的译者,庞德和斯奈德对和谐美的体验和再现差异明显。由于没有深入了解过中国哲学,庞德的译文难以再现原诗对偶中蕴含的和谐世界。例如:

| | |
|--|---|
|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李白,2017) ⁶⁵⁵ | Flowers and grass Cover over the dark path where lay 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Go. The 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 of Shin Are now the base of cold hills. (Pound, 1915) ³⁰ |
|--|---|

① 《淮南子》有道:“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刘安,2010)¹⁷⁴宇宙本为同一整体,通过不断地二分为阴阳、天地等对立项,最终分化形成世间万物。和谐共生正是中国哲学、文学中气本体论的内在要求。

② 例如,王维所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程抱一(2006)⁶²看来,“实际上再现了任何一种生活的两重维度”:“行到—坐看”之行动与静观,“穷—起”之死亡和再生,特别是“水—云”之间暗隐的周而复始的宇宙转化,宇宙的阴阳两面全凭诗歌文本表现出来。

此联隐含着诗人李白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自然对人类作用的思考。前半联写繁花草的生命,后半联说辉煌往昔的消灭,人世总是转瞬即逝,而自然却能延续活力,人类与自然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仿佛不可调和。然而,自然在销毁人类历史(“埋幽径”)的同时,也在造就不朽的过去(“成古丘”),并将其融入自然本身。与其说自然毁灭人类,不如说自然与人类“相毁相成”,而世界正是如此相克相生。庞德的译文没有感悟到,也自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宇宙观念,只是将重心放在了音韵的处理上:“cover over”及“bright”的重复出现将译诗的“内在情绪贯穿起来”(余苏凌,2015)³⁷⁶,吸引了读者的大部分注意力,而对“埋”(cover)和“成”(are)这两个充满寓意的动作只做相对简易的处理,致使原诗中蕴含的和谐认知美感难以传递。又例如:

| | | |
|--|--|--|
| 一溪初入千花明, 万壑度尽松风声。 (李白,2017) ⁷⁷⁶ | | Into a valley of the thousand bright flowers, That was the first valley; And into ten thousand valleys full of voices and pine-winds. (Pound, 1915) ¹⁹ |
|--|--|--|

原诗展现了溪行山间从“初入”到“度尽”的全过程:画面始于明媚新生之“花”,收于沉静苍老之“松”,画面由“一”至“千”后至“万”后,视觉上的万般颜色倏尔消灭,取而代之的只有渺渺“松风声”,看似绚烂夺目的大千世界最终归于空无。与原诗中由纷繁转向沉寂的世界相反,庞德的译文恰恰越发纷乱:从“第一条峡谷”(the first valley)到“一万条峡谷”(ten thousand valleys),再到“充满声音和松风”(full of voices and pine-winds),使读者耳边充斥着喧嚣嘈杂,难以体验到万物归于空寂的和谐宇宙观。

相比而言,斯奈德寄情自然山水,接受了旅美中国文学大师陈世骧(1912—1971)的指导,又曾赴日本学禅,从庄子、老子和禅宗得益不少,因此对东方特色的和谐美具有相对充分的了解和体验。这自然表现在其译诗中,例如:

| | | |
|--|--|--|
| 沓嶂恒凝雪, 幽林每吐烟。 (寒山,2019) ¹⁵⁹ | | Jagged scarps forever snowed in Woods in the dark ravines spitting mist. (Snyder, 2013) ³ |
|--|--|--|

原诗中,山间凝雪与林中烟雾本是水的不同物理形态,而水分在“沓嶂”与“幽林”的高低相对间往复循环,因为温度的差别或内“凝”成雪或外“吐”化雾,在充满矛盾的自然间富于变换,生生不息。统一蕴于对立之中:若无树林“吐烟”,便无山巅“凝雪”;若无洁白积雪,便不能衬出“幽林”之阴暗。“恒”乃静止的永远,“每”涉间断的时间,万物也在永恒与瞬间的对立中生机无限。斯奈德显然认识、体验到了蕴含于此对句间的相生相克、循环生息之道:为对照高耸之“沓嶂”(scarps),有意添加深谷意象(ravines);通过显化时间概念,以过去分词表“凝”(snowed)的状态,以现在分词表“吐”(spitting)的进行,一静一动相映成趣。又例如:

| | |
|--|--|
| 溪长石磊磊， 涧阔草濛濛。 (寒山, 2019) ⁶⁹ | The long gorge choked with scree and boulders, The wide creek, the mist blurred grass. (Snyder, 2013) ⁸ |
|--|--|

原诗描绘了一幅溪涧风光图：流水一度为乱石阻遏，诗人复前行，方见水汽氤氲、岸草濛濛。在上下两句的对比之中，画面境界由狭窄转为开阔，画面内容由坚硬的岩石过渡为柔弱的溪草，诗人眼见之“石磊磊”（从字形上看，七个“石”字的堆叠格外清晰夺目）渐被水汽中迷蒙的青草取代，所传达的心境也由紧张转为轻松。原诗句中的石草对立暗含了诗人的悟道过程，表现出以柔克刚、归于混沌的世界规律。斯奈德译文中传达的审美体验亦然如此：“choked”（被窒息的）一动词强化了乱石阻塞所营造的压抑感，与“blurred”（被模糊的）形成对比；将“石磊磊”译为形象清晰的“scree and boulders”不只是回应译者自己“具象化、再次具象化”（钟玲，2001）⁸⁹的创作诗学，更是有意与后半联“blurred grass”的模糊感形成对比，以期表现万物在刚与柔、阳与阴的对立中归于一体的意境。

尽管都是新诗诗人，斯奈德却比庞德更能在翻译过程中体悟、传达出汉诗对偶中和谐的世界图式。意象派诗学要求诗歌“精准地表现细节，而不是与笼统的普遍性打交道，不管这种普遍性多么庄严和宏大”（余苏凌，2015）¹⁴⁸，因此庞德将注意力集中于意象的创造和情绪的传达，而忽略了对偶中的中国世界观；而斯奈德的诗学主张却尽显其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世界的反思，倡导万物之间无碍贯通的关系，因此，其译文往往能展现对偶蕴含的和谐世界图式。

5. 审美经验差异的诗学解释

上文分析了汉诗对偶在审美经验层面的三重特点，即凝滞的阅读进程、立体的空间想象、和谐的世界图式，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庞德与斯奈德的不同翻译方法，发现两位诗人虽同受“新诗运动”影响，却在对偶审美经验上呈现较大差异。这种审美经验的差异，实则受到个人诗学认知和时代诗学进程的双重影响。

从个体层面看，两位诗人译者的诗学认知有着极大的差异。由于语言水平不同、可接触材料相异^①，庞德和斯奈德对中国文学和诗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庞德虽期盼在中国文学中找到改造西方世界的良方，但决定他对中国诗的兴趣、了解和翻译的，却是其意象派诗歌原则（特威切尔，1992）⁸⁶；而斯奈德对东方文化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禅宗哲学不但心向往之，更是身体力行，对中国文学持真正认同的态度。简言之，庞德

^① 庞德完全不懂汉语，而斯奈德具有东方语言文学的专业背景。受其汉语水平差异的影响，两人翻译的直接性（directness of translation）不同：庞德只能以费诺罗萨的笔记作为中介和底本，对原文没有实质的把握，而斯奈德却可以直接接触汉语原文，选取1928年日本东京审美书院出版的宋刻影本《寒山诗集》作为底本（许明，2019）。

只是“汉诗的发明者”(Eliot, 1928)¹¹,而斯奈德则是汉诗的学习者、体悟者、推崇者。在这样的个体认知框架下,庞德既不愿忠实于中国古典诗歌原文,也无力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特有要素进行深入审美,只是将汉诗英译视为诗歌创作的特殊形式和自我表达的第二渠道;不同的是,斯奈德能够联通中国古典诗学与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视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诗学为应对西方精神危机的宝贵资源,以汉诗英译探索中西思想沟通的可能性,因此竭尽全力获取并传达出对偶的审美经验。

更重要的是,两位翻译主体的译文生成还受到宏观背景下时代诗学的影响。由庞德领导的“意象派运动”(Imagist Movement)拉开了“新诗运动”的序幕,但只持续了较短时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打响,美国本土诗学在焦虑不安的社会中快速演进,直到战后,以斯奈德为代表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逐渐占据了主流。在这段时期,美国本土诗学呈现出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双重进程:一方面,诗歌不断探寻现代性成分,因而渐渐注意到汉诗对偶所传达的注意力凝滞、立体性空间等现代性审美经验;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潮下,质疑工业文明、寄情自然山水、渴望返璞归真的意识形态外化于文学创作和翻译之中,而对偶诗句所描画的和谐世界也自然反映在了汉诗英译里。从庞德到斯奈德,“新诗运动”下的美国文坛已历经现代主义诗学的高峰,逐渐向后现代诗学过渡。因此,相比庞德,斯奈德对汉诗对偶的凝滞美、立体美和和谐美更为敏感,并能深入观察到汉诗对偶诗学与美国新诗诗学之间的洽接性。可以说,两人的审美经验差异与其诗学主张紧密相关,不仅是个人性的,更是时代性的。

结 语

从《华夏集》到《寒山诗》的近半个世纪,是美国现代诗歌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汉诗不断被美国发现、汉诗英译与英诗创作共荣共生的历史性时期。在审美经验层面,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辞格蕴含着凝滞的阅读进程、立体的空间想象、和谐的世界图式等诸多现代性诗学要素,这些适宜美国新诗的中国风格被诗人发现、选择、固定在译诗乃至文学系统之中,显示出世界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不同于庞德“改头换面”式的译法,斯奈德将这些世界文学因素加以调和,有效融入美国现代诗歌形式库之中,以传递审美经验的方式突破了诗歌语言的不可译性,探索出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推动美国现代诗学进程的全新方式,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提供了宝贵借鉴。

参考文献:

- 安旗,2017.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
陈望道,1976.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程抱一,2006.中国诗画语言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高友工,1996.律诗美学[M]//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寒山,2019.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
- 胡安江,2005.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67-72.
- 江弱水,2009.现代性视野中的骈文与律诗的语言形式[J].文学评论(1):25-30.
- 李林波,2010.论创作取向的翻译:以庞德、斯奈德等人英译中国古诗为例[J].外语教学,31(3):101-105.
- 李生龙,1999.论对偶在古代文体中的审美效果[J].中国文学研究(1):21-26.
- 刘安,2010.淮南子[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区銛,1994.加里·斯奈德面面观[J].外国文学评论(1):32-36.
- 浦安迪,1996.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特威切尔,1992.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J].外国文学评论(1):86-90.
- 童山东,1990.对偶:汉语言文化的有意味形式[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82-87.
- 魏宏灿,2009.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王贵明,2004.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86-90.
- 王军,1988.艾兹拉·庞德与中国诗[J].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51-56.
- 许明,2019.加里·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底本之考证[J].中国比较文学(3):50-65.
- 杨星丽,2014.诗格对偶理论及其审美建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1):46-52.
- 叶朗,1998.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叶维廉,2019.庞德与潇湘八景[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余苏凌,2015.目标文化视角:英美译者英译汉诗之形式及意象研究 1870—1962[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宇文所安,2013.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强,2001.意象派、庞德和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J].外国文学研究(1):38-44.
- 张曦,2013.目的与策略:庞德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03.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钟玲,2001.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史耐德的唐诗译作[J].中外文学(7):77-92.
- 周来祥,1998.和谐美学的总体风貌[J].文艺研究(5):4-10.
- ELIOT T S, 1928.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 POUND E, 1915. Cathay[M]. London: Chiswick Press.
- POUND E, 1973. Selected Prose 1909-1965[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SNYDER G, 2013. Cold Mountain: Twenty-four Poems by Han-Shan[M]. Berkeley: Counterpoint.

作者简介:

蔡正伍,男,2000年2月生,四川成都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诗歌翻译研究。

杜磊,男,198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翻译学博士(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Nicky Harman 英译中国当代文学接受效果研究^①

曾玲玲 金 江



摘 要:基于亚马逊的读者评论,分析英国汉学家韩斌所翻译的 19 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接受效果,发现影响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接受效果的因素可分为文内和文外因素。文外因素主要有出版社的类型、作者的知名度、电影的助推作用、译介活动的发起人等。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接受效果优于独立出版社出版的;华裔作家因地理优势,作品更易推介与传播,接受效果更好;译者和作者的推介也有助于提升接受效果。文内因素主要有作品的题材、体裁、中英叙事方式的差异、副文本等。具备普世文学价值的作品接受效果好,短篇小说集接受效果欠佳,中文小说叙事介入太多和太煽情会影响接受效果,合适的副文本能提升接受效果。

关键词:读者评论;接受效果;出版社;叙事方式;副文本

The Reception of Nicky Harman's Trans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ZENG Lingling JIN Jiang

Abstract: Based on reader reviews from Amaz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ception of Nicky Harman's translations of 19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fi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ce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extra-textual factors and intra-textual factors. The extra-textual factors are mainly the type of publisher, the popularity of the author, the boosting effect of the film and the initiator of th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ublishers are better accepted than those by independent publishers;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works are more easily promoted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their acceptance is better; the promotion of translators and authors also helps to enhance the reception. Intra-textual factors include the subject matter, gen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narrative styles, and paratext.

^①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项目“英国汉学家 Nicky Harman 译者惯习研究”(项目编号:Y201942900)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英译(2000—2021 年)接受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YJA740001)阶段性成果。

Works with universal literary values are better received,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are less well received, too much narrative involvement and sensationalism in Chinese novels affect the reception and appropriate paratext can enhance the reception.

Keywords: reader reviews; reception; publisher; narrative styles; paratext

1. 引言

目前在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对译作销售之后相关的关注、反馈和调研工作非常薄弱,如译本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能否进入主流市场进而产生文化上的影响等。然而,了解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译者知悉自己译作的接受情况有助于其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方面的决策,作者了解自己作品的接受效果也能培养国际视野,有效反哺其创作。对于参与译介活动的各方而言,了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及制约其接受效果的因素,能为译介的选材、翻译、出版发行和宣传等环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为探讨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将以为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为例,探讨其译作的接受效果及影响接受效果的因素。

韩斌,英国著名汉学翻译家,毕业于英国丽兹大学,任教于帝国理工大学,2011年辞去教职成为全职翻译,专注于翻译中国当代小说、文学非虚构作品,偶尔也翻译诗歌。她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英译近20年,共出版文学译作19部。除翻译外,她还通过写专栏、演讲、授课等各种活动向英语读者推广当代中国小说。她是当代文学海外推介网站Paper Republic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伦敦中国小说读书俱乐部的创始人,并担任Harvill Secker青年翻译家奖和利兹大学白玫瑰翻译奖的评委,同时她还指导青年译者,教授暑期学校。专业翻译教师、中国文学推广者、青年译者导师的多元身份是她区别于葛浩文等其他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汉学家译者的显著特点,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学界对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宏观上对其翻译实践、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的总结(李佳悦,2021;刘桂杰,2019)。二是对具体译作的个案研究,相对于第一类而言这类研究数量更多,具体译作主要集中在《金陵十三钗》《高兴》《极花》三部。《金陵十三钗》主要涉及英译本在英语国家读者中的反响(文军等,2014)及译者采用的增译、删减、归化、意译等翻译策略(朱振武等,2017)。对于《极花》的研究采用的视角有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冯正斌,2020)、译本对于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忠实(刘阳朔,2019)。《高兴》英译本的研究数量最多,研究视角多样化,如以目的语读者为归依、以归化为主的翻译模式(季进等,2018)、文化翻译策略(贾立平等,2018);社会学视域(冯正斌等,2021;王阿静,2020)、译者主体性(张白桦,2020)、乡土语言翻译(邵霞等,2020;车明明,2019;刘红见,2020)等。

上述研究大多集中探讨具体译作的翻译策略,对接受效果的探讨相对较少。而且

所选译本是传播接受情况较好的三部作品,那么其他译作的传播接受情况如何?同一译者的译作是否会出现传播接受迥异的局面?影响译作传播接受的因素有哪些?对中国文学外译有何启示?

2. 韩斌译作及接受效果

迄今为止韩斌共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译作 19 部,其中诗歌 1 部,小说 18 部,如表 1 所示。其译作题材广泛,并不固定于某一作家的作品,如葛浩文之于莫言,罗鹏之于阎连科等。她选择的作家多样化,除了贾平凹的两部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鲜少译介,反而特别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鲜血液如韩东、谢晓虹、陈希我等超现实主义的作家及颜歌等新锐作家。其选材标准只有一个,即作品必须写得出色(舒晋瑜,2018)。

表 1 Nicky Harman 译作一览表

| 年份 | 作者 | 书名 | 出版社 | 体裁 | 星级 | 评论数 |
|------|------|---------|----------------------------|------|-----|-----|
| 2002 | 虹影 | K | Marion Boyars | 长篇小说 | 4.4 | 18 |
| 2009 | 韩东 | 扎根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长篇小说 | 5.0 | 3 |
| 2009 | 欣然 | 见证中国 | Chatto & Windus | 纪实文学 | 4.3 | 38 |
| 2010 | 欣然 | 中国母亲 | Chatto & Windus | 纪实文学 | 4.5 | 155 |
| 2010 | 张翎 | 金山 | Penguin Canada | 长篇小说 | 4.5 | 31 |
| 2010 | 白桦 | 鹰群 | Hope Road Publishing | 诗歌 | 0 | 0 |
| 2012 | 韩东 | 来自大连的电话 | Zephyr Press | 诗歌 | 0 | 0 |
| 2012 | 严歌苓 | 金陵十三钗 | Chatto and Windus | 长篇小说 | 4.4 | 85 |
| 2012 | 安妮宝贝 | 去往别处的路上 | Makedo Publishing | 短篇小说 | 0 | 0 |
| 2012 | 谢晓虹 | 雪与影 | East Slope Publishing | 短篇小说 | 0 | 0 |
| 2014 | 颜歌 | 白马 | Hope Road Publishing | 长篇小说 | 4.4 | 6 |
| 2014 | 陈冠中 | 裸命 | Doubleday | 长篇小说 | 3.3 | 3 |
| 2014 | 陈希我 | 冒犯书 | FortySix | 短篇小说 | 0 | 0 |
| 2015 | 许知远 | 纸老虎 | Head of Zeus | 长篇小说 | 4 | 5 |
| 2016 | 徐晓斌 | 水晶婚 | Balestier Press | 长篇小说 | 0 | 0 |
| 2017 | 贾平凹 | 高兴 | Amazon Crossing | 长篇小说 | 3.7 | 556 |
| 2017 | 饶平如 | 平如美棠 | Knopf Doubleday | 长篇小说 | 4.8 | 41 |
| 2018 | 颜歌 | 我们家 | Balestier Press | 长篇小说 | 4.1 | 13 |
| 2019 | 贾平凹 | 极花 | ACA Publishing | 长篇小说 | 3.7 | 10 |

一般而言考察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海外接受效果,可以通过图书馆的馆藏量、译本的销量、专业和大众读者的评价等参数来衡量。目前的研究大多考察社会精英读者群体

对文学翻译的阅读和反应,而大众读者才是文学翻译底层接受的主体,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大众读者的评价。大众读者不受年龄、学历、职业限制,他们凭借自身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阅读与欣赏英译本,通过亚马逊平台购买中国文学英译本并表达他们最直接、最真实的阅读感受和体会,可以为其他购书者提供一定参考。不同于专业书评人,他们的评论能更真实地反映出西方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接受情况。以亚马逊读者评价为例考量大众读者对韩斌译作的接受情况,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梳理19部译本的评论数量和译本评级,相关参数如出版社、作者和作品体裁也一并记录。评论数量越多,代表读者对该作品的关注越高,再参考评分星级判断其接受效果。其次,细读并分析亚马逊上详尽的读者评论。这些评论能大体揭示该时期大众读者的欣赏品味和阅读兴趣,甚至整个社会的文学鉴赏能力及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到潜在读者的阅读或购书,不少读者在写评论时也会提及自己与其他读者的观点相同或不同。

从表1来看,接受度好的作品有:贾平凹的《高兴》,评分3.7,评论数高达556条;欣然的《中国母亲》,评分4.5,评论数155条;其次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评分4.4,评论数85条。饶平如的《平如美棠》41条评论,欣然的《见证中国》38条,张翎的《金山》31条,虹影的《K》18条,颜歌的《我们家》13条,贾平凹的《极花》10条。评论数10条以下的分别是颜歌的《白马》6条,许知远的《纸老虎》5条,陈冠中的《裸命》和韩东的《扎根》各3条。无评论的有白桦的长诗《鹰群》、韩东的诗集《来自大连的电话》、安妮宝贝的《去往别处的路上》、谢晓虹的《雪与影》、陈希我的《冒犯书》和徐晓斌的《水晶婚》。

韩斌曾荣获2020年中国特别图书奖、2015年茅台杯人民文学汉英翻译奖、2013年中国国际翻译大赛汉英组一等奖,其翻译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亚马逊读者评论里也多次有读者对其翻译表示赞赏,如《中国好女人》有评论说是超级棒的翻译,《金陵十三钗》有评论说译者有经验、非常信任她等,《金山》评论里一位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读者说英译本简直是极好的,并认为她与获奖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处于同一级别。那么,除去译者这一因素之外,影响译作接受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呢?通过对表1和亚马逊评论的分析,我们把影响接受效果的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

3. 影响接受效果的文外因素

影响译本接受效果的文外因素主要有出版社、作者、电影的助推、译介活动的发起人、译者的推介等。

3.1 出版社

表1中19部译作的出版社可分三种类型: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和独立出版社。

每类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接受情况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接受效果较好的作品大多为商业出版社出版。排名前7的均为商业出版社:《高兴》由亚马逊出版,《中国母亲》《金陵十三钗》和《见证中国》都由Chatto and Windus出版,《平如美棠》由兰登书屋出

版,《金山》由企鹅出版,《K》由 Marion Boyars 出版。双日出版社出版的陈冠中的《裸命》只有 3 条评论,相对是比较少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东的《扎根》仅 3 条评论。由于表 2 中的大学出版社只有 1 家,样本太少,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表 2 出版社类型与接受效果

| | 书名 | 出版社 | 星级 | 评论数 |
|-------|---------|----------------------------|-----|-----|
| 大学出版社 | 扎根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5.0 | 3 |
| 商业出版社 | 见证中国 | Chatto & Windus | 4.3 | 38 |
| | 中国母亲 | Chatto & Windus | 4.5 | 155 |
| | 金山 | Penguin Canada | 4.5 | 31 |
| | K | Marion Boyars | 4.4 | 18 |
| | 金陵十三钗 | Chatto and Windus | 4.4 | 85 |
| | 高兴 | Amazon Crossing | 3.7 | 556 |
| | 平如美棠 | Knopf Doubleday | 4.8 | 41 |
| | 裸命 | Doubleday | 3.3 | 3 |
| 独立出版社 | 鹰群 | Hope Road Publishing | 0 | 0 |
| | 白马 | Hope Road Publishing | 4.4 | 6 |
| | 来自大连的电话 | Zephyr Press | 0 | 0 |
| | 去往别处的路上 | Make do Publishing | 0 | 0 |
| | 雪与影 | East Slope Publishing | 0 | 0 |
| | 冒犯书 | Forty Six | 0 | 0 |
| | 纸老虎 | Head of Zeus | 4 | 5 |
| | 水晶婚 | Balestier Press | 0 | 0 |
| | 我们家 | Balestier Press | 4.1 | 13 |
| | 极花 | ACA Publishing | 3.7 | 10 |

整体数据显示,独立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接受效果欠佳。相对比较好的是 Balestier Press(若意出版),其出版的颜歌的《我们家》有 13 条评论,ACA Publishing(英国查思出版亚洲有限公司)出版的贾平凹的《极花》10 条,Hope Road Publishing 出版的颜歌的《白马》6 条,Head of Zeus 出版的许知远的《纸老虎》5 条。其他 6 部无评论的作品也都来自独立出版社:Hope Road Publishing(白桦的《鹰群》),Zephyr Press(韩东《来自大连的电话》),Makedo Publishing(安妮宝贝的《去往别处的路上》),East Slope Publishing(谢晓虹的《雪与影》),Balestier Press(徐晓斌的《水晶婚》)和 Forty Six(陈希我的《冒犯书》)。

商业出版社或跨国出版集团拥有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一流的编辑出版团队,成熟的销售网络以及长年积累的市场美誉度,译作的传播效果会更有保障。以贾平凹作品《高兴》和《极花》英译本为例,二者均由韩斌翻译,但前者的影响力远高于后者,前者有

556条评价,后者只有10条。关键因素之一是出版社的综合实力的差异。《高兴》由Amazon Crossing(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出版,它是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机构,专门出版翻译作品。《高兴》译本的传播离不开其强大商业资本的助推,2017年8月23日,即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日,亚马逊宣布在其全球14个站点同步首发《高兴》英文版*Happy Dreams*的纸质书和电子书,第一时间将该书介绍给遍及183个国家的亚马逊读者,这也是亚马逊第一次为华人作家的作品英文版举办全球性首发活动。此外,*Happy Dreams*还入选了亚马逊Kindle的独有First项目,使得北美地区的Prime会员和订阅亚马逊出版信息的上千万读者可以优先购买《高兴》英文版。该书也是2017年唯一入选Kindle First项目的中国文学作品。此外,亚马逊的精准推送和营销也增加了《高兴》的读者群体,例如在亚马逊网站评论中有许多并没有阅读过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正是通过其Kindle推广而接触到这本书。而《极花》由ACA Publishing出版,该出版社是英国的小型独立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场域的象征资本有限,综合实力远不及Amazon Crossing。

3.2 作者

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接受效果与作者也有一定的关系。商业出版社通常会选择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如贾平凹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而且著作颇丰,自身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此外,排名前7的作品中有5部是华裔作家的作品如虹影,张翎,欣然,严歌苓。韩斌认为他们的写作风格比较外向,所以比较容易吸引西方读者(Li,2012)。此外,华裔作家在地理距离上有优势,可接触性强,作品更易推介与传播,因而接受效果更好。其他新锐作家如颜歌、谢晓虹、韩东、陈希我等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作品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效果。

作者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自己作品的翻译、营销宣传等环节,也有助于提升接受效果。以颜歌为例,她的两部作品都在小型独立出版社出版,但也获得了一定量的关注,2014年出版的《白马》有6条评论,2018年出版的《我们家》则有13条评论。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精通英语和积极参与海外文学场域。在翻译《我们家》时,她和译者一起讨论英文文本,指出译文中理解错误或希望改进的地方,解答文中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她参加了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的活动,和汉语、翻译专业的学生、教师和普通读者面对面交流。此外,她借参加活动的机会结识出版社或翻译家,加深了解,为下一步合作奠定基础,她近期出版的作品《异兽志》就是她在“研究中心”结识的翻译家程异翻译的。可见,如果中国作家的英语水平有所提升,可与海外翻译家和受众沟通交流,将会对译作的海外传播起到不小的帮助。

3.3 其他因素

接受效果和译介发起人也有关系。一般来说,由商业出版社发起译介的作品会比译者自行发起译介的作品接受度好。商业出版社拥有雄厚的资本,在作品价格、营销宣

传上都有优势；而译者自行发起译介，往往要花相对长的时间找出版社，而且还不一定保证能出版。《高兴》由亚马逊招募韩斌翻译，《平如美棠》由兰登出版社招募韩斌来翻译，《金山》由企鹅出版社委托韩斌翻译，这几本接受效果都不错。韩东的《扎根》则是韩斌出于感兴趣，自己征求作者同意后翻译，之后联系了英国多家出版社，被拒后几经波折，最终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接受效果也不尽人意。

发挥译者的多重作用也能促进作品的接受。译者的角色并非单纯地翻译，更需推介和引荐。只有“懂”译会“介”，方可扩大中国文学英译本的传播范围，将英美图书市场内更多的潜在受众转化为实际受众，提升传播效果。韩斌通过“纸托邦”平台宣传《高兴》英译本，在 Bookanista 网站发表名为“Never Happier”的博文讲述翻译《高兴》的心路历程，并转载至“纸托邦”。张翎的《金山》也在“纸托邦”上有详尽的介绍，如对“金山”概念的解释、故事背景和历史意义、作者、译者、出版社等信息，译者主持的翻译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网站中国小说读书会也对该书进行了推介。

此外，电影也是对作品的一种推介，如《金陵十三钗》有评论说是看了倪妮主演的电影而去读小说，也有评论说因为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出演男主角才去看了电影，进而读了小说，另有 2 条评论也说是非常喜欢电影然后才去读了小说。

4. 影响接受效果的文内因素

通过分析具体评论内容，发现影响译作接受效果的文内因素主要有作品的题材、体裁、中英叙事方式的差异、副文本等。

4.1 作品题材和体裁

作品题材对接受效果也有很大影响。文学对人性之谜的探究以及对美矢志不渝的追求是共通的。具备普世文学价值的作品才能被世界各地读者广泛阅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都可通过阅读文本找到与自身的关联，文本主题和内容可以与读者自身文化经历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

表 1 中接受效果好的作品都是具备普世文学价值的作品。贾平凹的《高兴》是一本讲述流动工人的小说。人员流动迁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中国国内，有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在世界范围内，有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他们的遭遇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亚马逊有读者评论说《高兴》中刘高兴和五富的设定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乔治和雷尼不谋而合。该小说讲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两个身无分文的农业工人乔治和雷尼在美国加州牧场生活、工作并相互扶持的故事。相似的情节和人物令西方读者倍感亲切。饶平如的《平如美棠》讲述了最平凡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历经战争、饥饿、监禁、分离、劳改和疾病，像无数夫妻一样，吵吵和和，共同养育孩子又一起变老，这种题材对全球读者都具有普适性。

作品体裁也和接受效果直接相关。5 部无评论的作品其中 2 部是诗歌：白桦的《鹰

群》和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3部是短篇小说集：安妮宝贝的《去往别处的路上》、谢晓虹的《雪与影》和陈希我的《冒犯书》。美国出版社一般不愿意出短篇小说集，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就曾提及在美国出版界出版社会针对短篇小说出版要求签两份合同，一份短篇小说集和一份长篇小说。再如余华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早于2004年译完，但美国编辑认为短篇小说的市场不如长篇小说，一直压了下来，想等余华在美国有名气以后再出版，后来一直到2014年该小说集才出版。虽然小说是所有文类里翻译最多的，但近10年内儿童文学和诗集的翻译数量有所增长，整体翻译数量也越来越多。

4.2 中英叙事方式的差异

通过细读读者评论发现中英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差异会影响读者接受。这些差异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中文小说叙事细节太多。《中国母亲》有读者评论说叙事应该更紧凑，有些引用长达半页，有些细节不必要，也有评论说对译本的编辑还应该改进。《高兴》有读者评论说有点粗糙，读起来更像是一本日记，有时会涉及一些不必要的细节。葛浩文曾批评中国作家作品过于冗长，加入太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纸托帮”的创始人 Eric Abrahamsen 也认为中国很多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容易写得啰唆，“就好像是故意奔长了写的”，而西方文学当中有个传统是“Keep it short; less is more”。二是作者介入太多。《中国母亲》有评论说叙事太过煽情，也有评论说作者经常花几页篇幅表达吃惊、生气等个人情感，介入太多；《极花》有评论说感觉作者在过度描写；《见证中国》有评论说自己被作者的一些评论弄得有点烦躁，很多时候，作者会讨论为什么她有资格采访这些对象，为什么这些对象信任她，为什么她有资格讨论中国文化，等等。其实韩斌(2006)也谈到中国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过于煽情和伤感的表达。西方读者不喜欢过于直白的叙述，而更习惯叙述者采用显示的方式给他们留出思考空间。美国小说家、文体学家亨利·詹姆斯主张作者应尽量采用小说人物的视角，客观展示其所观察下的现实(James, 1984)。

4.3 副文本

此外，评论中还发现副文本也能促进译本的读者接受。《高兴》的评论中很多读者对作品后记和封面表示赞赏，如非常吸引人的标题和有趣的字体。好几条评论建议把译文末尾的注释和后记放置在译文前边，这样会有助于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作品本身、故事来源及翻译。《极花》的评论中多数读者认为作品后记应调整为前言，以帮助读者了解小说的创作背景及文化内涵。《金山》的评论中有读者建议添加附录以便高中生也可以阅读此书。《平如美棠》的评论中很多读者对插图和装帧大加赞赏，如插图引人入胜，装帧很精美；书里的绘画和书法并不是专业艺术家的作品，但有一种质朴的美；插图令人赏心悦目；插图为故事增色不少；非常喜欢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等。由此可见，副文本也能起重要的推介作用，助力读者接受。译者的副文本策略能促进译本的读者接受，

如译者的前言、后记能帮助读者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翻译过程等,引导读者领略译本的价值。甚至可以在序言中把作品中的细节与目标语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结合起来,建立阅读基础,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出版社的副文本策略也能促进译本的传播接受。正如英国的企鹅丛书,每一部经典小说前面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导言(introduction),中国作家的重要作品被翻译出去,也可以请国际一流的汉学家或中国文学研究者写导言。出版社对于封面配色、图像、插图、装帧、开本、版本等的设计都有助于定位书籍、吸引读者,从而促进译本的传播接受。

5. 结语

文学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更是如此。本文以英国汉学家韩斌的译作为例,分析了影响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接受效果的文内和文外因素。文外因素主要有出版社的类型、作者的知名度、电影的助推作用、译介活动的发起人、译者的推介等。文内因素主要有作品的题材、体裁、中英叙事方式的差异、副文本等。本文只是以韩斌译作为例探讨影响译本接受效果的因素,如果考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可能还会发现其他影响因素。上述影响因素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下去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在文学场域积累了一定象征资本的作家作品,可以积极推进其在国外商业出版社出版,也可发挥电影、副文本等的助推作用;对于青年作家或体裁独特的优秀作品,可以选择先在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再慢慢走进商业出版社的视野;作者和译者可以积极参与国外文学场域、翻译场域的活动,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他们了解中国故事,真切地感受中国文学;做到精准传播,如《中国母亲》的很多读者都是收养中国小孩的家庭,评论中不少读者用了“必读书”“作者的粉丝”等字样;传统纸媒、电子书、有声读物等多模态开发需同时跟进。

参考文献:

- 车明明,崔落梅,2020.文化诗学视角下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5):542-554.
- 冯正斌,林嘉新,2020.“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极花》英译本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4):87-92.
- 冯正斌,唐雪,2021.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机制研究:以贾平凹《高兴》英译为中心[J].山东外语教学(4):115-126.
- 季进,王晓伟,2018.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与未来: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J].当代作家评论(6):165-173.
- 贾立平,张钰迪,2018.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域下《高兴》英译本的文化翻译初探[J].宜春学院学报(10):76-80.
- 李佳悦,刘嫦,2021.弥合文化鸿沟,打开文学之窗:汉学家韩斌翻译思想与译介行为研

- 究[J]. 东方翻译(3):62-74.
- 刘桂杰,2019.《高兴》英译本发行背景下韩斌翻译思想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76-81.
- 刘红见,2020.贾平凹《高兴》英译本中乡土语言模因英译研究[J]. 牡丹江大学学报(12):70-73.
- 刘阳朔,柴鲜,2019.从《极花》英译看韩斌译本的“双重忠实”[J]. 小说评论(6):69-78.
- 邵霞,马会娟,2020.基于贾平凹《高兴》的方言功能与英译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104-109.
- 舒晋瑜,2018.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学[N]. 人民日报(海外版),10-10(3).
- 王阿静,2020.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高兴》的英译研究[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8):74-81.
- 文军,王昕娟,2014.《金陵十三钗》英译本评论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3):44-50.
- 张白桦,杨茹,2020.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视域下韩译《高兴》的译者主体性[J]. 长春大学学报(1):50-53.
- 朱振武,刘文杰,2017.汉学家 Nicky Harman 的“创造性叛逆”:以《金陵十三钗》的英译为例[J]. 外文研究(2):50-57.
- LI H,2012.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Nicky Harman[J]. The AALITRA Review: A Journa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4):18-25.
- HARMAN N,2006. Foreign Culture, Foreign Style: A Translator's View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 13-31.
- JAMES H,1984. The Art of the Novel: Critical Preface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曾玲玲,女,1980年4月生,湖北荆门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译介研究。

金江,男,1977年7月生,湖北大冶人,文学博士,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及相关研究。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对比研究

——基于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

常晶昊



摘要: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源自系统功能语言学,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对语篇描述和分析,用实义切分法划分句子为主位和述位,分析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的公文,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民生和国防等方面。其英译本是全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现状和计划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21年《报告》及其英译本中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从语篇连贯的角度研究《报告》及其英译本。为以《报告》为代表的政治类语篇的汉英翻译提供指导原则。

关键词: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主位类型;主位推进模式;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21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Based on Thematic Type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CHANG Jinghao

Abstract: Thematic Type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are originated from System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hich describe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ssage as a clause. They divided the clause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WG”) is delivered by China’s government. It includes many aspects of government’s work such as: China’s economy, politics, people’s livelihood, national defense and so on. Its English version is a window for the world to know China’s development and plans. This research appli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compare Thematic Type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in RWG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Studying the two tex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politic texts, particularly for RWG could be concluded.

Keyword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Thematic Type; Thematic Progression; comparative study

1. 引言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前一年的工作回顾、当年工作任务和政府自身建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工作生活,对中国政府工作了解的需求也不断高涨,《报告》的英译本应运而生。

《报告》兼有演讲体和书面语的呈现形式,既便于总理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发布,又便于以书面文件的形式供读者阅读参考。《报告》具有鲜明的语言风格特征:行文全面客观,用数据和事实说明前一年取得的成绩;《报告》突出重点问题和重点工作,针对性强;《报告》行文言简意赅,语言精练。对于《报告》的英译本而言,要做到源文本信息和原文风格的准确再现。

近年来,针对《报告》和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有不足之处。与《报告》相关的翻译研究文章多集中在翻译策略和技法层面,且其中大部分聚焦翻译过程中词汇层面的处理方法,针对句子层面上信息结构的翻译研究数量较少。

司炳月和高松(2019)曾以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本为语料,辅以UAM Corpus Tool 3语料库统计软件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统计分析级差资源在外宣译本的分布情况和形式,揭示了外宣文本及其英语译本中级差资源类型、分布特点及对文本其他意义的调节效果,讨论了级差系统对外宣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价值。龚卫东等(2020)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主题词及其搭配角度出发,比较分析历年《报告》英译文本和英国国家语料库的语言特征,深入探讨主题词及其搭配特征历时变化所体现的国家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政府工作报告而言,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基础上的定性分析更能分析出文本特征以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

以语料库为研究工具的相关研究多集中研究以下指标:词长、词丛、主题词、句长、句子个数和复合句使用频率等,这些指标都可直接借助语料库标记并统计。叶铖(2019)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选取2009—2018年发布的《报告》、《报告》英译本及美国政府《国情咨文》作为研究对象,对比《报告》和《报告》英译本展开平行语料库研究;对比《报告》英译本和《国情咨文》展开可比语料库研究。对比三种文本的句法特征,维度包括平均句长、句子个数无主句翻译、复合句使用频率和常用结构。发现近十年每份《报告》英译本体现的句法特征与汉英语言自身差异、《报告》行文特点及政治文本严格的英译要求有关。主位类型、主位推进模式这类语义指标和句长、词频等形式指标不同,几乎无法靠语料库软件直接标注,因此开展相关翻译研究有一定难度。本研究

手动标注各种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并用 AntConc 软件统计各指标数量,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比研究。

2. 主位结构理论框架

篇章是指“一段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前后衔接、语意连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功能的语言作品”(郑贵友,2002)主位结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篇章功能的子系统,与信息结构、衔接共同体现语篇功能。

2.1 主位类型

主位是话语信息的出发点,主位可以在下文中确定信息推进的方向。(Halliday 2004)⁶⁴根据主位本身的复杂程度,可以将其分成单项主位、句项主位和复项主位。

单项主位指只包含概念成分的主位。(胡壮麟,2008)¹⁶²典型的单项主位由一个名词词组充当,只体现概念功能。单项主位也可由一个副词词组或介词词组充当,同样可由两个或多个单位组成的并列结构充当。(李美霞,2006)“单”是指单一的元功能(概念功能),而非唯一一项主位。

句项主位则是由小句充当主位,传统语法所说的主从复合句的主句和从句都可以成为主位。(胡壮麟,2008)¹⁶³句项主位是单项主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单项主位由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构成,句项主位由一个完整的小句构成。二者都只体现概念功能,但在信息结构的复杂程度上,二者有明显区别。句项主位的信息结构更加复杂。多数情况下,句项主位的信息调群更长,且可以进一步划分主位和述位,所以将二者分开讨论。

复项主位和单项主位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内部结构,可以进一步划分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话题主位;后者没有内部结构,不可以进一步分析(朱永生,1995)⁶。

2.2 主位推进模式

在篇章中,所有的句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处于一个上下衔接、前后连贯、主题统一的表述整体中,因此前后句子的主位、述位间既有联系,又有发展。处于一个整体中的句子通过不断变换主位,从而推动语言表达向前推进,通过保持主位与主位、述位与述位、主位与述位等之间的联系,从而保证这个表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这种推进和联系的过程就是主位推进,对不同类型的篇章的主位推进方式过程进行抽象概括总结出的模式,就是“主位推进模式”(patterns of thematic progression)(朱永生,1995)⁷。

本文采用以下四种主位推进模式:主位同一型、述位同一型、延续型和派生型。

在主位同一型中,几个句子的主位保持一致或近义关系,述位不同。其中,T为主位(Theme),R为述位(Rheme)(下同)。具体推进模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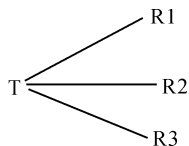


图 1 主位同一型

在述位同一型中,几个句子的主位不同,但是述位保持一致或近义的关系。具体推进模式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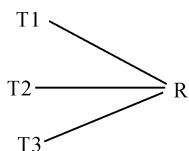


图 2 述位同一型

在延续型中,后一个句子的主位是前一个句子的述位,也可称之为阶梯型主位推进模式。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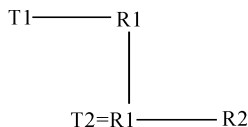


图 3 延续型

在派生型中,主位相当于前后几句主位或述位之和,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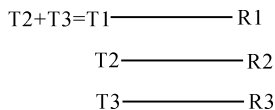


图 4 派生型

大多数语篇往往不会只采用一种主位推进模式,在对比分析中,我们要考虑特定类型的语篇是否倾向于使用某一种主位类型或者主位推进模式。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译文是否会改写原文的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

3.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

2021 年《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 2020 年工作回顾、“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以及 2021 年重点工作。本文分别标记《报告》及其英译本的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统计各种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数量,分析《报告》的行文特征和翻译策略。

3.1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中的主位类型

在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中,本文以句号为基准,将全文切分成 486 个完整的句子。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本文以句号和分号为基准,将全文切分成 666 个完整的句

子。根据主位类型的划分原则,分别在《报告》和《报告》英译本中标注单项主位、句项主位和复项主位,并在 AntConc 软件中统计各类主位数量和占比。各类主位在两个文本中的数量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中三类主位的数量和占比^①

| 主位类型 | 数量(个) | 占比(%) |
|------|-------|--------|
| 单项主位 | 187 | 38.48 |
| 句项主位 | 258 | 53.09 |
| 复项主位 | 41 | 8.44 |
| 总数 | 486 | 100.00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中,句项主位数量最多,有 258 个,占主位总数量的 53.09%。其次是单项主位,有 187 个,占主位总数量的 38.48%。最少的是复项主位,只有 41 个,占主位总数量的 8.44%。

如表 2 所示,在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占比最大的是单项主位,有 512 个之多,占主位总数量的 76.88%。其次是句项主位,有 124 个,占主位总数量的 18.62%。数量最少的是复项主位,只有 29 个,占主位总数量的 4.35%。

表 2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三类主位的数量和占比

| 主位类型 | 数量(个) | 占比(%) |
|------|-------|--------|
| 单项主位 | 512 | 76.88 |
| 句项主位 | 124 | 18.62 |
| 复项主位 | 29 | 4.35 |
| 总数 | 666 | 100.00 |

我们不难发现,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句项主位居多,英译本则单项主位居多。英译本多次将原文句项主位调整为单项主位。如表 3 所示:

表 3 原文句项主位与译文单项主位对比

| | |
|-----|--|
| 源文本 | 1 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CT],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超过 2100 万套。 |
| 英译本 | The goal of granting urban residency to 100 million people from rural areas and other permanent residents without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1] was met. More than 21 million housing units in run-down urban areas [ST2] were rebuilt. |

^① 本文百分比取值至小数点后两位,因取值时四舍五入,故占比总和会在 100%上下浮动,总和仍视为 100%,特此说明。

在源文本中,该句是一个典型的句项主位的句子,其主位是“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述位是“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超过2100万套”。而在英译本中,这句话被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句子,分别表述原文主位和述位的信息。两句话的主位分别是“The goal of ...”和“More than 21 million housing units”,将源文本中的一个句项主位拆分成两个单项主位。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对句项主位的界定是:主从复合句的主句和从句都可以成为主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英语立场上的,英语的完全句,按其结构,可以分为简单句、并列句、复杂句和并列复杂句(章振邦,2012)。句项主位的判定前提是该句包含2个或2个以上独立分句。汉语不常谈及主句和从句,英语中的复合句相当于汉语的复句,即比单句高一个层次的语法单位(朱德熙,2000)。汉语句项主位的判定前提是该句为复句,句项主位往往是复句中的单句。不难发现,《报告》源文本句子个数比英译本少了180个,这是因为源文本复句中包含多个单句,单句用逗号分开,复句用句号结尾。单句之间既可由连词连接,也可由语义成分连接。若英译本完全重现这一构句形式,则会出现流水句(连谓句)。所以英译本要么将单句调整为简单句,要么将原文复句调整为英文并列句、复杂句或并列复杂句(第一种处理方法较多见)。这就是造成源文本多句项主位,英译本多单项主位的原因。

除此之外,英译本多次补全主位“we”,在英译本中主位“we”和“We”出现了244次,而源文本中与主位“we”直接对应的主位“我们”只出现了16次。英译本多次还原了主位成分“我们”。如表4所示:

表4 原文单项主位(有省略)与译文单项主位(无省略)对比

| | |
|-----|--|
| 源文本 | (我们[ST]将)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 |
| 英译本 | We[ST]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and improve tax reduction policies. |

原文直接将主语主位“我们”省略,述位单独成句,而译文补全了被省略的主语主位“We”。出于主谓一致的要求,凡是在汉语中隐含的成分英语中都要在形式和内容上重现。汉语此类主语省略句较多,从语言心理上看,这是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认为自己谈及的一切不言自明(潘文国,2004)³⁶⁷。而英语中要么明示主语主位,要么使用形式主语,不会有不言自明的意味。汉语的主体意识和英语的客体意识其实是东西方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对立。悟性思维的特点是参与意识,参与社会活动、自然界和生命的轮回;理性思维的特点是距离意识,前提是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剖析(潘文国,2004)³⁶¹。因此,在汉语语篇中,如果话语主体为“我”或“我们”,那么就可以依靠逻辑和语序形成意义的内在衔接,形成一种隐性的“意脉”;英语中则更注重形式或形态因素这种显性手段,把主、客体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来。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和英译本的复项主位都比较少。而且这些复项主位绝大多数包含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极少数有人际功能。这是因为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

与到某一情境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判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胡壮麟等,2008)。政府工作报告与常规演讲体文本不同,政府工作报告的鼓动性较弱,更多的是陈述政府工作内容、任务和目标。所以极少表达演讲者的态度、判断和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的内容。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和英译本是供受众阅读的书面文本,而不是单纯的演讲体文本。在复项主位中,占比较大的是“语篇主位+概念主位”,只在第三部分末尾才出现“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同时体现三种元功能的主位则更少。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和英译本中复项主位的构成情况

| 源文本和英译本中的复项主位 | | 语篇主位+概念主位 | 人际主位+概念主位 | 人际主位+语篇主位+概念主位 | 总数 |
|---------------|-------|-----------|-----------|----------------|--------|
| 源文本 | 数量(个) | 13 | 25 | 3 | 41 |
| | 占比(%) | 31.71 | 60.89 | 7.32 | 100.00 |
| 英译本 | 数量(个) | 20 | 9 | 0 | 29 |
| | 占比(%) | 68.97 | 31.03 | 0.00 | 100.00 |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报告》及其英译本的复项主位中,包含三个元功能的复项主位数量最少。源文本和英译本中语篇主位绝大多数是框架标记语,如:第一、第二等。在源文本中,“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占比较大;在英译本中,“语篇主位+概念主位”占比较大。在源文本的人际主位的功能在于将演说的直接受众拉入到特定情境语境中,这些人际主位都体现出讲话者(国务院总理)对直接受众的鼓励,号召各位在接下来一年的工作中砥砺前行。但是在英译本中,这一人际功能有所削弱。因为英译本的直接受众是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以这一人际功能不再有针对性,而是弱化成了一种陈述性话语。因此英译本中“人际主位+概念主位”的复项主位数量较少。

英译本中“语篇主位+概念主位”复项主位数量较多,其原因在于:汉语的逻辑律和英语的形态律。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一个个语音语义团块是一颗颗分散的珠子,需要有一根线将它们串起来。这根线就是逻辑,由人的思维逻辑决定语音语义团块安排的先后顺序(潘文国,2004)²⁵⁷。英语的形态律在于英语的逻辑是通过形态实现的,其中包括词尾变化、介词、连词等一切形式上的东西。英语主从句位置可以颠倒,是因为从连词可以知道何为主句,何为从句,而且这些连词通常是不可少的(潘文国,2004)²⁵⁷。汉语连接单句和单句既可以使用连词又可以使用意合法,而英语的主句和从句则要靠严密的形态连接,所以源文本复项主位中篇章主位较少,英译本则较多。

3.2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中的主位推进模式

在标注《报告》及其英译本中各种主位推进模式后,将文本导入 AntConc 软件中,统计各类主位推进模式数量和占比。具体情况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的主位推进模式

| 类型 | 主位同一型 | 述位同一型 | 延续型 | 派生型 | 总数 |
|-------|-------|-------|------|------|--------|
| 数量(个) | 188 | 11 | 15 | 5 | 219 |
| 占比(%) | 85.84 | 5.02 | 6.85 | 2.28 | 100.00 |

在《报告》的源文本中,共有219次主位推进,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主位同一型,共出现188次,占推进模式总数的85.84%;其次是述位同一型和延续型,分别出现11次和15次,分别占推进模式总数的5.02%和6.85%;数量最少的是派生型,在文中出现5次,占推进模式总数的2.28%。

表7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的主位推进模式

| 类型 | 主位同一型 | 述位同一型 | 延续型 | 派生型 | 总数 |
|-------|-------|-------|-------|------|--------|
| 数量(个) | 128 | 27 | 19 | 8 | 182 |
| 占比(%) | 70.33 | 14.84 | 10.44 | 4.40 | 100.00 |

在2021年《报告》的英译本中,共有182次主位推进,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主位同一型,共出现128次,占推进模式总数的70.33%;其次是述位同一型和延续型,分别出27次和19次,分别占推进模式总数的14.84%和10.44%;数量最少的是派生型,在文中出现8次,占推进模式总数的4.40%。

对比原文和译文的主位推进模式,发现如下特征:总体上,源文本的主位推进次数比英译本更多。虽然英译本比源文本句子个数多,但是英译本的主位推进模式只存在于完整句之间,而源文本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存在于单句和单句之间,或单句和复句之间。也就是说,英文主从句内部不会出现主位推进,而中文复句中却可能会包含多次主位推进。而且,英译本多次将原文复句中多个单句调整为一个完整句,不体现原文单句间的主位推进。所以原文的主位推进次数比译文更多。

在原文和译文中,主位同一型占比最大,远超过其他三种推进模式。《报告》内容多样,但多集中陈述一个话题:政府部门已完成的或计划完成的工作,所以绝大部分句子的主位都是“我们”“政府”或“中国”。(源文本倾向于省略重复主位)在主位同一型推进模式中,所有句子都以同一个成分为谈论的起点,每个句子的述位都对这个起点作新的论述。文本围绕什么谈,有什么可谈,受众一目了然(朱永生,1997)。主位同一型有利于向受众清晰明了地传达原文信息,也使得内容排列更整洁。

原文中多个主位同一型的主动句都在译文中调整为被动句。话语视角改变,例如从“有序推进疫苗研制”变成“The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will be steadily advanced”,前者体现参与意识,后者体现距离意识。面对同一事件结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关注的焦点有同有异,这会影响到被动式句法标记的词汇来源的异同,也会影响被动式标记成分的异同(石毓智,2010)。其实,汉语中显性被动标记“被”“受”等和英语中的“be done”形式不完全对等。王力(1985)指出,中文被动式所述,对主语而言

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如受祸、受欺骗、受损害等,或引起不利的结果等等。被动句是英语中的一个重要句式,能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和解码,在句子和语篇的构建中具有信息重组的语用功能,其中包括主题确立、主题连接和焦点凸显三方面(姚雪梅,2010)。因此,中英文被动句式的语义色彩不同,英文体现中性语义,而中文则体现负向语义。鉴于此,《报告》行文会尽量避免被动句式,英译本则并无此限制。

原文述位同一型推进模式多骈偶,译文则会把这一推进模式调整为散行句,弱化原文形式语义。在原文述位同一型推进模式中,述位多是对仗的四字词,如“持续推进”“不断深入”“持续改善”“稳定增长”“显著提升”等。汉语以意合为主,形合为辅,手段之一就是骈偶,这一特色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骈偶能帮助意义凝聚,其最大特点就是互文见义,通过相对位置映衬字义,并列结构的词可以通过相互对待其整个词的意义(潘文国,2004)³⁵²。而英语以形合为主,意合为其补充;形合主要在句内,意合则在句间,因此通篇行文可以以散行为主,不必强调骈偶(潘文国,2004)³⁵³。形合和意合是语言特点的两个方面。因此,单讲中文是意合语言,英文是形合语言是不严谨的,二者的语言特征要辩证地看。

4. 结语

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对比分析2021年《报告》的源文本和英译本,发现源文本句子数量少,但主位推进次数多;英译本句子数量多,但主位推进次数少。源文本多用句项主位,英译本多用单项主位。在源文本和英译本的复项主位中,源文本“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占多数,英译本“篇章主位+概念主位”占多数;源文本经常省略主位“我们”,英译本补全主位“we”。此外,在《报告》及其英译本中,主位同一型占比最大。源文本被动句数量比和英译本少。源文本述位重骈偶,英译本重散行。这些现象有的源自《报告》的文体特征,有的则源自汉语和英语的本质差异。

本文研究所发现的结论适用于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文本的汉英翻译实践,在翻译过程中要明确各种类型的主位在传达信息时的功能,也要明确各种主位推进模式的特点。在保证译文信息准确的同时,也要确保译文的衔接顺畅和行文连贯。但仅通过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和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所总结出的特征和现象不足以充分证明本文结论的有效性。今后的研究可对比分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源文本和英译本的主位类型和主位推进模式,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总结出更普遍、适用性更强的翻译实践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 龚卫东,姜倩倩,于翠红,2020. 政府话语中国国家形象的历时建构:基于《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的主题词及其搭配研究[J]. 长沙大学学报(5):123-130.
- 胡壮麟,2018.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15.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2008.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衍,1985.试论英语主位和述位[J].外国语(5):34-38.
- 李美霞,2006.功能语言学导论[M].北京:外文出版社:140.
- 潘文国,2004.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2010.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91.
- 司炳月,高松,2019.外宣文本中英级差资源分布与翻译: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双语文本为例:[J].上海翻译(5):14-20.
- 王力,1985.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88.
- 徐盛桓,1982.主位和述位[J].外语教学与研究(1):1-9.
- 姚雪梅,2010.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篇功能[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89-191.
- 叶铨,2019.2009—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句法特征的语料库探究[J].语料库语言学(1):41-55.
- 张慧,张和张志新,2019.主述位理论视角下的散文翻译策略能力评价:以《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英译本为例[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9-73.
- 章振邦,2012.高级英语语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7.
- 郑贵友,2002.汉语篇章语言学[M].北京:外文出版社:16.
- 朱德熙,2000.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42.
- 朱永生,1995.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3):6-12.
- 朱永生,1997.试论语篇连贯的内部条件(下)[J].现代外语(1):11-14.
-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3rd ed. London: Hodder Arnold.

作者简介:

常晶昊,男,1998年6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研究

——以冒国安和冯涛译本为例

窦龙昕 马秀鹏



摘要:《长日留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位典型的英国管家史蒂文斯服务于没落贵族的故事,在长达 35 年的工作期间,他极力压抑内心情感,盲目服从和效忠被纳粹利用的达林顿勋爵。本文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在不可靠叙述视角下,对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长日留痕》进行研究,分析两个译本是否成功地重现了原作中不可靠叙述的风格并借此如何塑造和深化人物形象,指出不可靠叙述再现的必要性,探讨不可靠叙述的翻译策略和叙事学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以期为今后的译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长日留痕》;不可靠叙述;石黑一雄;译本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 Case Study of Mao's and Feng's Translations
DOU Longxin MA Xiupeng**

Abstract: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British-Japanese writer Kazuo Ishiguro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a typical British butler, Stevens, in the first person who suppressed his innermost feelings and was blindly loyal to Lord Darlington for thirty-five years lo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Kazuo Ishiguro's nove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nalyses whether the two versions successfully reproduce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how the characters are shaped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reproduc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unreliable narr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narratology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unreliable narration; Kazuo Ishiguro; translations

1. 引言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于1989年创作了 *The Remains of the Day* 这一长篇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作为故事的展开,故事中,以6天的驾车旅行作为小说背景板,用第一人称口吻讲述其为达林顿勋爵服务30余载的种种经历。自小说公开发行以来,曾多次在大陆地区出版中文译本,出于对译文质量的考虑,本文选取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长日将尽》(冯涛译)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长日留痕》的叙述方式十分独特,不可靠叙述又是该小说叙述方式的一大亮点,因此涌现出了不少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的文章,例如李昆鹏(2010)以《长日留痕》小说为例,分析史蒂文斯在其不可靠叙述中运用的词汇、双重否定句以及插入语三个方面的特征,并探讨这些文体因素对其叙述的影响。刘璐(2010)从隐喻入手对该小说进行分析展现其“朝圣”叙事结构。刘超(2011)在以经典叙事学理论为视角、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上对《长日留痕》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梳理,以此找寻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含义。邓颖玲(2016)从回忆的不可靠叙述、回忆的碎片化叙述、回忆的选择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所运用的回忆叙述策略。石慧(2018)从不可靠叙事者、不可靠叙述以及叙事进程三条轴线分析《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以探明不可靠叙事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国外而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于1999年发表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通过分析《长日留痕》中的最后一部分《威茅斯》史蒂文斯的叙述,将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不可靠叙述从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

即便 *The Remains of the Day* 是石黑一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且不同版本的译文在国内也相继出版,但目前国内对该作品中译本的翻译研究并不充分。王博、李永兰(2018)从长句汉译角度出发,探讨了长句如何通过拆分,以及语序调整策略及其技巧。韩笑(2018)探讨了小说中“banter”这一动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译法,提出了冒国安译本在此方面的瑕疵,并分享了自己的参考建议。郑伟在(2019)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小说中翻译的美育功能。韦喧钧(2019)讨论了石黑一雄八部作品的书名的中文译法,其中包括了分析比较“长日将尽”“长日留痕”两种译名的异同之处。李开妹(2018)选取了冒国安和张淑贞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诺德的功能加忠诚作为理论框架,对冒国安和张淑贞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殷思莉(2018)以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为视角,通过比较张淑贞和冒国安两个中译本,从功能对等中词汇、句子、篇章三个方面来分析两位译者在保持原文含义及风格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曾慧(2020)选取了冯涛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案例分析法来探讨翻译转换理论在译文中的运用。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针对 *The Remains of the Day* 中译本的相关研究多从微观层面的具体翻译问题入手,如词汇、句法等方面。而宏观层面却有所欠缺。此

外,文学、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联系不足,依据现有文献,笔者仍未发现将此小说的文学内涵、叙述特色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论文;而将叙事学与中外名著译本的比较分析的结合已有先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如《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与叙事理论的结合等,这种将文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加深了译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为翻译实践和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不可靠叙述”的界定

在近现代小说叙述方式中,不可靠叙述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不可靠叙述”的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出自1961年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之后,“不可靠叙述”这一词的受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并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两种互为对立的情况:即修辞性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修辞性方法的代表人物是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而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则是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和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修辞性方法在不可靠叙述定义上,把重点放在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在阐述叙述距离时,布斯指出:“由于缺乏更恰当的术语,当叙述者所说所做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Booth, 1961)¹⁵⁸⁻¹⁵⁹。认知(建构)方法则是把不可靠叙述的定义重点放在了读者角度,“雅克比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制’”(申丹,2011)¹³⁵。同时,雅克比认为读者总是能通过一些机制对叙述者的可靠性与否做出假设,这些机制即“存在”“功能”“文类”“视角”“创作”等五种机制。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修辞性方法。

在“不可靠叙述”概念中,布斯提出并区分出了两种类型:一是“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二是“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前者是主体对事实进行错误的理解和传递,而后者则是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可能会出现偏差并最终导致其在叙述事实时的不可靠。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进一步充实并发展了布斯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他将不可靠叙述由两大轴发展到了三大轴,其中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以这三大轴为中心类型,发展并区分出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次级类型:以事实/事件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两种次级类型;以价值/判断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两种次级类型;以知识/感知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类型。费伦对其理论的完善,使得在分析文本或人物形象时更具操作性和全面性。

3. 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

小说中的主人公史蒂文斯人到暮年,在他的这部类似日记般的回忆录中,他追述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叙述以“尊严”为圆心,以工作、爱情、

生活等多方面为半径,展示出一个与达林顿勋爵、肯顿小姐和父亲的关系图景。在他逐步展开的叙述中,读者很快发现,当很多重要的人物和事情在被叙述者叙述时,叙述者经常会出现与作者价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左的道德判断:他的主人与纳粹集团暧昧的关系,他与父亲僵硬而又尴尬的关系,他对同事肯顿小姐感情的压抑,他职业信条中对“尊严”的过分崇拜,等等。然而在叙述中他多次通过语言对其所处困境遮遮掩掩,总在试图说服读者、安慰自己。申丹(2006)认为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能构成正确的判断。所以在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时,应与具体的语境相结合进行多元翻译,以更加灵活的方法来表现叙述的不可靠性,为读者拓展出更多元的解读空间,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理解和体会原文叙事的妙趣。

3.1 工作场景中的不可靠叙事再现

史蒂文斯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唯一的叙述者。在小说开始,史蒂文斯自述自己必须西行去拜访肯顿小姐的原因是这样表达的:

例(1)

原文:So then, there seems little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undertake my motoring rip to the West Country ... But all in all, I can see no genuine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undertake this trip. (Kazuo, 2015)¹⁷

冒译:于是乎,我似乎再没有丝毫的理由不驾车到英格兰西部去旅游了……终归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借口来放弃这次旅行。(石黑一雄,2003)¹³

冯译:事已至此,我似乎也就再没什么理由不正式启动我前往西南诸郡的驾车出游计划了……总之一句话,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理由不进行这次计划中的远行了。(石黑一雄,2019)¹⁶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人公史蒂文斯流露出此次西行的主要动机是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对昔日女管家的留恋,属于不可靠叙述中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和传递;而非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出于工作关系,合情合理。从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用了冗余的语言和多重否定来表达极少的信息,也展现了他思维的混乱和承认事实真相及面对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不情愿。冒译和冯译在翻译中对“little reason”和“not undertake”的翻译有所不同,冒译为“似乎再没有丝毫的理由”“放弃”,而冯译为“似乎也就再没什么”“不进行”,后者削弱了叙述者的否定语气,为读者解读不可靠叙述留下了空间,而冒译更加强了叙述者的否定语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表现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例(2)

原文:“Stevens, are you all right?”

“Yes, sir. Perfectly.”

“You look as though you’re crying.”

I laughed and taking out a handkerchief, quickly wiped my face. “I’m very sorry, sir. The strains of a hard day.” (Kazuo, 2015)⁷⁹

冒译:“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老爷。真的没事。”

“你看起来好像在哭泣。”

我笑了笑,掏出了一块手绢,迅速地擦了擦脸。“十分对不起,老爷。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石黑一雄, 2003)¹⁰³

冯译:“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先生。我很好。”

“你看起来好像哭了。”

我笑了笑,掏出手帕迅速地擦了擦脸。“非常抱歉,先生。是劳累了一天,太紧张了。”(石黑一雄, 2019)¹⁰²

文中史蒂文斯以“极度紧张”为由搪塞了达林顿勋爵的疑问,史蒂文斯否认自己流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史蒂文斯对自己流泪的事实是有所察觉的,但出于维护自身尊严与管家形象的目的,刻意在叙述中向读者隐瞒自己流泪的事实;二是史蒂文斯未能察觉出自己流泪的事实。若是第一种,其属于叙述的不可靠类型中的: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价值上的错误判断。正是因为他对“尊严”的错误理解及对人生价值的错误定位,导致他自欺欺人,故意向读者隐瞒自己流泪的事实,表现史蒂文斯虚伪的人物形象;如若第二种,史蒂文斯已经在事实轴上做到了尽可能的可靠,其叙述的不可靠类型则属于对个人情感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判断。因此该例明显是不可靠叙述,通过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上的冲突和对立实现反讽的修辞效果,突出对史蒂文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冒国安和冯涛对原文最后一小句的处理略有不同,原句中史蒂文斯用十分简洁凝练的语言“The strains of a hard day”向达林顿勋爵传达了自己流泪的原因,冒译为“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短小简洁,与原文的语言风格相一致,并还原了史蒂文斯当时想要极力回避事实真相,不愿多言的心理状态,恰当地传递了叙述者的意图,也为读者结合下文体会不可靠叙述留下一定的解读空间;但冯译将一句话拆分了为了两小句,不免显得有些多余,不利于读者解读史蒂文斯这一人物形象。

例(3)

原文:“... each of us harboured the desire to make our own small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of a better world, and saw that, as professionals, the surest

means of doing so would be to serve the great gentlemen of our times in whose hands civilization had been entrusted.”(Kazuo, 2015)⁸⁶

冒译:“我们每一个人均有强烈的欲望去为创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清楚地认识到,于我们这一行的人实现这一目标最可靠的途径是效力于我们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绅士们,因为他们手中掌管着文明。”(石黑一雄, 2003)¹¹⁵⁻¹¹⁶

冯译:“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渴望,愿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略尽绵薄,做出贡献;我们也都认识到,身在我们这一行,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命于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重任的伟大的士绅。”(石黑一雄, 2019)¹¹³

这句话中,史蒂文斯用“each of us”来拉近他与读者的叙述距离,使他的陈述更加合理化,但事实上,这种陈述无疑是有问题的,石黑一雄在谈到对于此类代词的应用时解释道:“史蒂文斯在叙述中认为他的对象指的是另一名管家。他无法将叙述对象设想为来自他个人世界以外的人物……我想利用这一点使人们看到史蒂文斯视野的狭隘性。”(Shaffer, 2008)¹⁵¹史蒂文斯的视野很狭窄,脱离不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误将管家的事业比拟于世界上的任何职业,其属于叙述的不可靠类型中的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这里作者通过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凸显了史蒂文斯保守愚昧的人物形象。

在翻译上,冒译和冯译对“desire”的处理都十分恰当,“强烈的欲望”和“渴望”都反映出主人公服从于达林顿府的忠心与决心;而冒译对“in whose hands civilization had been entrusted”采取了直译的方法,特别是“掌管”一词强有力地揭露了史蒂文斯根植于内心的固执愚昧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任人摆布的棋子的残酷现实的荒谬对比。在冯涛的译本中,绅士们“肩负着当代文明的重任”,这个表达对原文中“in whose hands”进行了改动,语气相较微弱,不利于表现主人公性格和凸显史蒂文斯以“尊严”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冒国安还原并加强了原文叙述的不可靠性,增大了读者的解读空间,对塑造人物性格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例(4)

原文:“I’m sorry, sir, but I cannot see that his lordship is doing anything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highest and noblest. He is doing what he can, after all, to ensure that peace will continue to prevail in Europe.”(Kazuo, 2015)¹⁶⁴

冒译:“对不起,先生,可我看不出勋爵阁下除了从事最崇高、最宏伟的事业之外还会做其他任何事情。总而言之,他正尽其所能以确保和平将持续地遍及欧洲。”(石黑一雄, 2003)²²²

冯译:“很抱歉,先生,可是我看不出爵爷的所作所为当中哪怕有一丝一毫

不够高尚的地方。毕竟,他在尽其所能,确保欧洲能继续维持既有的和平。”
(石黑一雄,2019)²¹⁶

上述对话发生于史蒂文斯服役于达林顿府最后一次接待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动中,达林顿勋爵的教子卡迪纳尔先生设法努力让史蒂文斯看清这次秘密会谈的本质和雇主对于其追求和平原则的背道而驰,但无论卡迪纳尔如何劝说,史蒂文斯此时为了维持作为管家的“尊严”依然在表面上不为所动,处处为主人辩解。作为读者,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知道达林顿勋爵在人生后期被德国纳粹分子所利用,不知不觉地成为帮助纳粹上台的工具,变成了众人所“唾弃”的对象,并且史蒂文斯在前文中已透露了内心对达林顿勋爵帮助德国之事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回忆这些话时,在我看来,达林顿勋爵的许多主张在今天当然似乎是相当古怪的——有时甚而是不讨人喜欢的。”(石黑一雄,2003)¹⁹⁶这句话间接地反映出了史蒂文斯内心已默认其他人对达林顿勋爵的评价。但他依然在叙述中向读者传达出达林顿勋爵所从事的是“最崇高、最宏伟的事业”,在事实/事件轴上进行了错误报道,显然史蒂文斯对勋爵的评价是不可靠的,不仅与事实本身相悖且与隐含作者对达林顿勋爵的评价也不相符合。

在具体翻译中,冒国安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将原文中“highest and noblest”直接翻译成“最崇高,最宏伟”,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并且增译了“事业”一词,表现出史蒂文斯对主人的所作所为给予高度的赞赏,大大加强了原文叙述的不可靠性,凸显了史蒂文斯性格中虚伪和固执。而冯涛将两个形容词最高级翻译为“看不出有一丝一毫不够高尚的地方”,弱化了史蒂文斯对于主人盲目崇拜的程度,“所作所为”也未能体现出史蒂文斯对于达林顿勋爵极其正面的评价;此外,两者对“prevail”的处理也明显不同,冒国安翻译出了该词本身的意义“遍及”,与原文所言之意十分贴切,还原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特点,而冯涛却译成“维持”,降低了该词本应具有**的强度、深度和广度,淡化了原文主人公的情感色彩和史蒂文斯表里不一的性格特征,不利于表现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3.2 个人情感中的不可靠叙述再现

例(5)

原文:“He has asked me to marry him. I thought you had a right to know that.”

“Indeed, Miss Kenton.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I am still giving the matter thought.”

“Indeed.” (Kazuo, 2015)¹⁵⁶

冒译:“他要我嫁给他。我想过你有权知道这件事。”

“那是当然的,肯顿小姐。那真叫人开心。”

“我现在仍在仔细琢磨这件事。”

“那是当然的。”(石黑一雄,2003)²¹¹

冯译:“他已经向我求了婚。我想您有权知道这件事。”

“的确,肯顿小姐。这是件很让人高兴的事。”

“我还在考虑是否答应。”

“是吗。”(石黑一雄,2019)²⁰⁶

上述对话发生于达林顿府最后一次举办具有官方性质会议的当晚,肯顿小姐即将赴约与本恩先生会面,紧接着下文可知,肯顿小姐在离开达林顿府去订婚之前曾多次暗示史蒂文斯,如果史蒂文斯稍微给肯顿小姐点鼓励,她便会拒绝与贝恩先生订婚:“史蒂文斯先生,你是希望我今天晚上仍坚守工作岗,我能这样理解吗?”(石黑一雄,2003)²¹²史蒂文斯知道肯顿小姐外出是为了订婚之事,内心很希望肯顿小姐留下来,但他并未按内心的想法去挽留爱人,强忍内心的悲痛、矛盾与纠结祝肯顿小姐外出愉快、婚姻幸福。一直以来,史蒂文斯将发生在男管家与女管家之间的爱情视为私通,并错误地认为“这类私通事件对府内井然的秩序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威胁。”(石黑一雄,2003)⁴⁸这属于感知轴和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是对发生在男女管家之间的爱情不充分解读,是狭隘的爱情观。即便在同一宅邸内,相爱的男女管家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也会获得相应的幸福。小说中利萨和副男管家的相爱与结合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与史蒂文斯僵硬刻板、不可靠的爱情观形成鲜明对比。

在翻译中,两位译者都将原文的“interesting”翻译成“开心”“高兴”,而非直译为“有趣”;“interesting”内涵丰富,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斯认为求婚一事很有趣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因此该词的运用贬义褒义皆有可能;但两位译者都认为史蒂文斯的态度是高兴的而非讽刺之意,这一处理方式更加有力地揭露了史蒂文斯表面愉悦与内心悲痛的荒谬对比,有利于体现原文不可靠叙述的特点。然而对肯顿小姐仍在考虑的回复上翻译截然不同,原文仅仅用“indeed”一词作为回答,冒国安采取了与原文意思十分贴近的“那是当然的”,却流露出史蒂文斯不愿肯顿小姐答应求婚的真实意愿和倾向,此举不利于原文不可靠叙述特点的呈现,大大缩小了读者的解读空间;而冯译“是吗”更加灵活,充满不确定性,为读者留下更多猜测和解读主人公心理状态的空间,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3.3 日常生活中的不可靠叙述再现

例(6)

原文 Then, lowering her voice, Mrs Wakefield had said: “But tell me, Stevens, what was this Lord Darlington like? Presumably you must have worked for him.”

“I didn't, madam, no.”

.....

I considered the situation for a moment, then said: "I'm very sorry, sir. But it is to do with the ways of this country." (Kazuo, 2015)⁹¹⁻⁹²

冒译:接着,韦克菲尔德夫人降低嗓门说:“那告诉我,史蒂文斯,这位达林顿勋爵是什么样的人?推测起来,你肯定曾为他工作过。”

“我没有,夫人,绝对没有。”

.....

我对当时的情形斟酌了一会儿,而后说道:“很抱歉,老爷。这事与本国的传统习惯有关。”(石黑一雄,2003)¹²³⁻¹³⁵

冯译:接着,威克菲尔德太太刻意压低嗓音道:“不过请跟我说说,史蒂文斯,这位达林顿勋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想必肯定是为他工作过的。”

“没有,夫人,我并没有。”

.....

我权衡了一下当时的情势,而后说道:“我深表歉意,先生。不过我这么做是出于本国传统礼俗的考虑。”(石黑一雄,2019)¹²⁰⁻¹²¹

随着时代变迁,当达林顿勋爵成为举国唾骂的对象后,史蒂文斯便没有勇气和能力面对承认事实之后社会舆论带来的鄙视与指责,所以当史蒂文斯带领其主人的上流社会圈内好友韦克菲尔德夫妇对达林顿府进行全面的参观时,当被问起是否曾在府内工作一事,他便竭力否认自己曾是达林顿府的管家或认识达林顿勋爵,这与事情的真相大相径庭,在事实轴上进行了错误报道,与隐含作者的规范并不一致,并且为自己的懦弱与逃避辩解道:“避免任何令人不快之事的最简单的方式,我愈是认真地对此进行思索,便愈发认为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站得住脚的解释。”(石黑一雄,2003)¹²⁶紧接着,面对新雇主为什么要隐瞒事情真相的质问时,史蒂文斯依然不愿也不敢面对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愧疚与不安,利用“出于本国传统习惯”这一借口搪塞过去,又一次欺骗了新雇主和读者。所以史蒂文斯此处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在麻痹自己,欺骗自己以减少内心的不安与惭愧。

具体翻译实践中,当韦克菲尔德夫人推测史蒂文斯肯定在达林顿府工作过时,冒译的“绝对没有”简短有力的四个字反映出史蒂文斯内心的果断与坚决,强化了原文叙事者语气的否定态度,能够帮助读者发现此处不可靠叙述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便于读者发现史蒂文斯不可靠叙述的蛛丝马迹,大大增强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的效果,使得主人公“自欺者”形象更具张力和反讽效果。相较而言,冯译“我并没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的风格,但语气微弱,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上的冲突和对立实现的反讽效果并不如冒译来的强烈。在第二次欺骗中,冯译将原文“But it is to do with the ways of this country.”翻译为“不过我这么做是出于本国传统礼俗的考虑”,将事件主语“it”替换成第一人称“我”,为原文的客观事实增添了一抹主

观色彩;“to do with”译为“出于……的考虑”不免显得有些啰唆,与原文含蓄节制的叙事风格有一定的出入,影响了读者阅读体验的自主性并与原文想要表达的内涵也有所偏离,译出语也未能和原文简洁明了的风格一致。冒国安则采取了“直译”的方法,一一对应,很好地再现了原文不可靠叙述,为读者留下了一定的解读空间。

4. 结语

本文以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为中心理论,采用译本对比分析和例证两种方法,通过对《长日留痕》冒国安译本和冯涛译本中的代表性实例进行比较式分析,发现两个译本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作中不可靠叙述的特点,但在阅读效果上,冒国安的译本在总体上比冯涛译本的表现力度更强,在还原叙述风格上略胜一筹。

此外,不可靠叙述的再现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译者通过还原原作中的不可靠叙述,表现叙述的不可靠性使得史蒂文斯的形象具有很强的阐释张力;冒国安通过呈现原作中大量不可靠叙述,成功地塑造了史蒂文斯迷失自我者的形象:沉湎于追求尊严从而变得固执而虚伪,同样也自欺、愚昧保守;同时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形象和主题的重要线索。

“鉴于不可靠叙述在原文中难以觉察,译者翻译时有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尽量给读者留下一定的交际线索或解读空间,尤其体现在译者对一些细节的灵活处理上。”(冯全功,2012)不可靠叙述因其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不一致,含蓄晦涩,而令读者不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并领悟其中的内涵,只有对叙述者叙述和隐含作者规范进行“双重解读”才能把握其中意味。作为译者有责任对原文的叙事风格和特色先做好功课,做好整体把握,结合上下文细心体味,尽量为读者创造解读空间。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则需敏锐观察出原文的不可靠叙述,发挥译者主动性,必要时增添提示性的词语来凸显不可靠叙述所带来的反讽修辞效果或加强不可靠叙述性来还原风格,切勿对原文进行过度解读,妨碍读者阅读的自主性,把握好尺度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冯全功,2012. 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中话语英译对比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5): 95-102.
- 冯全功,张慧玉,2011.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J]. 红楼梦学刊(6): 27-44.
- 李昆鹏,2010. 论不可靠叙述的文体特征:以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为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9-13.
- 李红梅,张丽云,2014. 《红楼梦》中的不可靠叙述及其英译研究[J]. 理论观察(12): 112-114.
- 李彧娟,2013. 《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分析[D]. 北京:北京大学.
- 石黑一雄,2003. 长日留痕[M]. 冒国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石黑一雄,2019. 长日将尽[M]. 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申丹,2006. 何为“不可靠叙述”? [J]. 外国文学评论(4):133-143.
- 申丹,2002. 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 中国翻译(1):11-15.
- 申丹,2009.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OOTH W,1961.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KAZUO I,2015. The Remains of the Day[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 SHAFFER B W,1998.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个人信息:

窦龙昕,女,1998年7月生,江苏盐城人,南京农业大学硕士,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马秀鹏,男,1972年9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再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李巧珍



摘要: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翻译界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莫衷一是。现有研究并未对翻译理论的概念和分类予以明确界定,这些本源问题模糊不清使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争论不断,不利于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稳固。本文主要依据詹姆斯·霍姆斯对翻译理论的定义和分类,将翻译理论分为普遍理论和局部理论、规定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本体理论和跨学科理论,认为翻译理论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不同类别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是一定范围内的指导,是不同层次上的指导。

关键词: 詹姆斯·霍姆斯; 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Reargu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I Qiaozhe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been a debatable issue for a long time and hitherto failed to come to any agreement.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n't given a clear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o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us the indefiniteness of these origin questions has caused the endless dispute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Mainly based on James Holmes'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is paper is classified into general theory and partial theory, prescriptive theory and descriptive theory, ontological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It's concluded that translation theor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riginates from practice, and varied translation theories can guide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in a given scope and in a certain level.

Keywords: James Holmes;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

1. 引言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均可并行不悖,几乎没有人去质疑理论研究的价值。翻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张经浩,2001;穆雷,2012),然而在翻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却是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文学翻译家对翻译理论颇有微词。傅雷(2009)⁶⁹²曾言:“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许渊冲(2003)²认为:“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在国外,这个问题也曾引起热议,翻译学学科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Holmes,2007)⁹⁷曾言:“译者常常问翻译学者:你研究的那些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帮助?首先,我想质疑帮助译者是否的确是翻译学的一个原则。……翻译学的主要目标不必是帮助译者。不过它们对译者有用吗?……就翻译理论目前所处的状态而言,它对译者大体上还是有所帮助的,……能让译者有意识地进行翻译,主动意识到他所做出的选择。”欧盟委员会的翻译工作者爱玛·韦杰(Emma Wager)曾质问翻译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价值何在,依据他们之间的辩论还出版了一本书《理论对译者有用吗?》(Chesterman et al.,2002)。

《上海科技翻译》曾于2003年发表过一系列由周领顺发起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探讨的论文。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有关二者关系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说明这个问题仍然有必要继续探讨。周领顺(2019)¹⁴认为,现在依然有必要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进行回顾和反思。现有论文大多未对翻译理论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对于翻译理论的分类也不够全面,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需厘清翻译理论的概念和分类,否则这些争论永远不会停止,不利于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稳固。

2. 问题的根源

杨自俭(2002)⁸曾说:“文艺界从来听不到‘文艺学没有用’的论调,可译界‘理论无用’的论调长期不衰。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至今还不能说清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产生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它与翻译学学科地位的建立时间有关。翻译实践在中国和西方均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翻译学学科地位的建立始于1972年霍姆斯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距今仅有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在此之前,翻译学仅仅作为应用语言学或者比较文学下的一个分支。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不到承认,不利于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人类漫长的翻译实践似乎没有理论也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普遍认为翻译理论无用。这主要是因为翻译学尚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翻译理论尚未发展成熟,其适用范围颇受限制,许多人动辄以某一翻译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翻译实例来指

责该理论,始终对翻译学理论持怀疑态度,不认可翻译学学者对翻译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本质上而言,这些人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新学科缺乏宽容之心。

第二,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逐渐分离。纵观中西翻译史,早期西方《圣经》和中国《佛经》的译者同时也是翻译理论家,他们是在自己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翻译理论(严格意义上而言是翻译经验),因此不存在翻译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现象。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的,也就是从翻译理论逐渐超越了翻译经验这个层面以后,尤其是翻译学学科地位建立之后,随着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逐渐分离,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中西方高校等学术机构的职称评审体系重视科研论文轻视翻译实践导致许多翻译学学者不从事翻译实践,进一步扩大了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这些学者的理论也常因他们自身缺少译作而备受质疑。

第三,忽视了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者所应具备的不同能力。既精通各种翻译理论,同时又有大量优秀译作问世的人毕竟属于少数。一方面受时间精力所限,另一方面理论者和实践者所应具备的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有所不同,大多数人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致力于理论研究,或致力于翻译实践,无可非议。要求理论研究的学者同时具备大量的优秀译作属于强人所难,忽视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所应具备的天赋才华因素。中国古代文人提出了文艺创作的天赋论,认为“文艺创作如果没有这种先天的禀赋,即使后天再努力也是徒劳的”,颜之推也曾指出“文艺创作与学问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无天才”(袁济喜,2002)⁴¹⁻⁴²。因此,在文学领域,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并不会因其没有创作出文学作品而受到质疑,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可以和谐共处。然而在涉及两种语言转换的文学翻译领域,人们似乎忽视了文学翻译者也是需要艺术天赋的,并非掌握了两种语言和文化,就能翻译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大可不必对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缺乏艺术天赋而求全责备,没有翻译实践活动也未必不能进行翻译理论研究。

3. 翻译理论的概念及其分类

3.1 翻译理论的概念

在厘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明确翻译理论的概念。许多学者没有对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就开始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误解在所难免。翻译实践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许多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是伴随着翻译实践而产生的,霍姆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自西塞罗起的翻译理论是宽泛意义上的理论,即有关翻译现象的一项观点陈述或者一系列陈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是一系列陈述,每一项陈述都由前一项或者一个公理中推演而来,各项之间彼此有逻辑关系,对某种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度和预测能力(Holmes,2007)⁹³⁻⁹⁴。霍姆斯认为西方20世纪50年代以前难以证明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这种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理论,以从事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为主,大多为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称之为翻译经验更合适。在中国,董秋斯(2009)⁶⁰¹于1951年首次提出中国要建设翻译理论,他认为我国从事翻译工作的历史悠久,有的是片段的经验和零星的意见,而无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可见,不论中西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翻译理论,从现代理论的角度而言,实质上是翻译经验。

孙艺风(2002)⁴认为:“实践和理论之间还隔了经验,于是人们常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因缺了经验一环而产生。”翻译实践与经验的关系最为紧密,这些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有关怎么译的翻译原则,时常被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经验和翻译理论相比,翻译经验具有主观性、片面性,因此翻译经验之间往往互相冲突,如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而赵景深提出“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瞿秋白,2009)³⁵⁰。孙艺风(2002)⁷认为:“任何理论都有局限,但一般来说,就其性质而言,比经验的局限性要小。”因此,主观片面的翻译经验需要上升为客观全面的翻译理论,才对翻译实践具有相对普遍的指导意义。

霍姆斯对于翻译理论的定义可理解为翻译理论的多层次性,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属于较低层次的翻译理论,或称翻译经验,以译者对于翻译实践的反省和体会为主,具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规定性特征,此种理论和实践的距离较近,以提供翻译原则和策略为主。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属于较高层次的翻译理论,是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描述性的特征,此种理论和实践的距离较远,其目的主要不在于指导翻译实践,而在于揭示翻译现象的内在规律,促进翻译学的学科发展。

翻译理论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翻译理论的金字塔形构造,趋近于塔底的理论以翻译经验为主,主观具体,数量庞大,距离翻译实践较近,主要用于指导翻译实践。越趋近于塔顶,离翻译实践的距离越远,抽象化程度越高,以揭示翻译现象的内在规律为主,对于翻译实践是一种方向性的指导。

3.2 翻译理论的分类

3.2.1 翻译的普遍理论和局部理论

就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而言,霍姆斯(Holmes,2007)⁷³⁻⁷⁶认为翻译理论可分为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和局部理论(partial theory),普遍理论是全面的,包罗万象的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任何翻译现象,局部理论指针对特定媒介、区域、层级、文本类型、时间和问题的翻译理论。

这个分类主要基于翻译理论的应用范围,所谓的普遍理论至今尚未形成,因为这需要以古往今来世界各种文化中的翻译现象为基础,联合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以及各种文本类型的译者,才有可能创立普遍理论。翻译学仅仅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种普遍理论建立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各种流派的翻译理论,本质上而言均属于局部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人

为的,滥用局部理论去解释或者指导一切翻译实践,混淆了普遍理论和局部理论的区别。

3.2.2 翻译的规定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

霍姆斯认为翻译理论可分为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和非规范性理论(non-normative theory),前者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翻译,后者描述人们如何进行翻译(Holmes, 2007)⁹⁴。为了避免翻译规范理论混淆,本文将霍姆斯的规范性理论称为规定性理论(prescriptive theory),将非规范性理论称为描述性理论(descriptive theory)。图里的描述翻译学范式极大地推动了描述性翻译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翻译理论以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和早期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为主,基本都属于规定性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改写理论以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等属于描述性理论。规定性翻译理论以“怎么译”为核心,侧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功能。描述性翻译理论侧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译”,揭示翻译行为的本质,其目的在于推动纯翻译理论的建设。

3.2.3 翻译本体理论和翻译跨学科理论

纵观翻译理论的历史,翻译学每次范式的转变都与其借用的其他学科理论有关,如语言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现有的翻译理论大多是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翻译本体理论,这种翻译本体理论不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的基础上产生,以指导、解释和预测翻译活动为目的?“图里认为,翻译学若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描述翻译学至关重要。若没有描述翻译学,译者将继续依赖语言学等其他学科为其提供理论框架以及验证假说的方法”(Baker, 1993)²⁴⁰遗憾的是,这种翻译本体理论至今尚未形成,图里的描述翻译学可以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他基于其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两条具有普遍性的翻译法则,即标准化法则和干涉法则(Toury, 1995)。

翻译理论就产生方式而言可分为翻译本体理论和翻译跨学科理论,二者虽然都以翻译为研究对象,其区别在于翻译本体理论是以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不借助其他学科理论。因此和翻译跨学科理论相比,翻译本体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该分类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如图1所示。

翻译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至少掌握两种学科体系的理论,增加了翻译研究的难度(韩子满, 2018)。翻译跨学科理论并非植根于翻译土壤而生,加之翻译学者往往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并不透彻,运用它们来研究翻译现象时,常有生搬硬套之嫌,难免削足适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翻译跨学科研究的普遍盛行也加大了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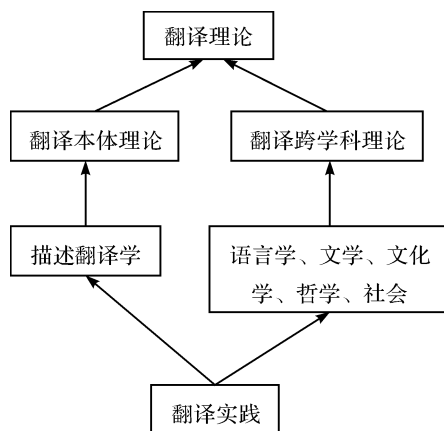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本体理论、翻译跨学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4. 翻译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论证

4.1 翻译理论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

现有的翻译理论就其应用范围而言属于局部翻译理论,就其产生方式而言属于跨学科翻译理论,就其性质而言,既有规定性翻译理论,也有描述性翻译理论。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的观点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王东风,2003;黄忠廉,2003;孙致礼,2003;许渊冲,2006)。还有一些学者(傅敬民,2002;穆雷,2012)认为,翻译理论未必完全来源于实践,可以来源于理性的思考过程或者来源于应用翻译理论。根据现有理论推导出新理论,这个旧理论是来源于翻译实践的,在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理论时,仍然要结合翻译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来修正旧理论,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翻译理论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产生,在被新的翻译实践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发展。

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基本取得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翻译实践一定是翻译研究者的亲自实践吗?国内外许多翻译学者都参与了一定数量的翻译实践,在其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翻译实践就不能研究翻译理论。翻译理论来自翻译实践,这种翻译实践不一定是研究者本人的实践,也可来源于他人的翻译实践。黄忠廉(2003)认为,“更重要的是研究他人的实践”,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予以分析。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又受时间精力所限,难免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以一种为主的选择。随着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大多数高校学者以研究为主,翻译实践偶尔为之,需要借助于他人的翻译实践来研究翻译,这种可称之为翻译理论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

翻译本体理论植根于翻译现象,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翻译跨学科理论借鉴了其相关学科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基于相关学科领域内的实践,并非来源于翻译实践。

然而这些学科的理论若要成为翻译理论,就必须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相结合。因此,翻译理论来自翻译实践。区别在于部分理论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部分理论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规定性翻译理论大多以理论创建者自身的翻译实践为基础,而描述性翻译理论需研究大量的翻译现象,主要以研究他人的翻译实践为主。

4.2 翻译理论指导、解释或者预测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是否必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这是翻译实践者经常诘问翻译学者的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点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非常紧密,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能够预测和指导实践。然而,即便如此,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2012)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解答在一给定期它所面临的所有谜题;即使已得到的解答也不常是完美的。恰好相反,正是这种理论与资料间的吻合程度的不完备和不完美,才界定出了许多表征了常规科学的谜题。如果理论与数据间稍有不合即成为抛弃理论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抛弃。”可见,即便是在较为客观的自然科学领域,理论不能解释实践的活动也时有发生,更何况是相对主观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呢?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的指导,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理论总有它的局限性,那种认为翻译理论无用论者实质上片面夸大了翻译理论的局限性,或者忽视了翻译理论的应用范围,要求该理论能够解释和指导任何翻译现象。即使翻译理论不能解释或者指导翻译现象也无可厚非,随着人们对翻译实践认识的深入,发现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翻译现象越来越多时,那么翻译界就要发生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即根据新发生的现象彻底抛弃该理论,用新的理论替代它。

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隔阂,部分学者(孙艺风,2002;穆雷,2012)认为,理论之所以不能直接指导实践,是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隔着经验,存在一定距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之间的距离较小,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问题基本不存在。许多学者(谢天振,2001;吕俊,2003;王东风,2003;曹明伦,2006)认为,一些译者片面强调翻译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忽视了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和预测功能。这涉及翻译理论的分类问题,规定性翻译理论偏重指导功能,描述性翻译理论则偏重加深对于翻译本质规律的认识。

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在其专著《翻译研究入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中,对他所介绍的每一种翻译理论,都附有具体的翻译实践来应用这种翻译理论,说明每一种翻译理论都能用于指导或者解释翻译实践。人们之所以对翻译理论有所误解,就是因为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局部理论,有其应用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自然无法应用于实践。如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应用于非文学翻译。就目的论而言,“虽然自称是一种普遍理论,事实上仅对非文学文本有效,因为文学文本没有特殊的目的,文体风格过于复杂”(Munday,2016)¹³⁰。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大多

数翻译理论都是基于欧洲语言的翻译实践,一旦跨出西方边界,把理论应用于其他语言和文化时,问题就会凸显(Bassnett,2002)⁸。例如,根据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发展来的翻译理论如主位推进模式,在指导欧洲使用的语言之间的翻译时非常有效,然而用于汉语和日语之间的翻译时就很难。这种跨学科翻译理论是基于特定语言文化的局部翻译理论。在用局部翻译理论解释或者指导翻译实践时,有必要了解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应用范围,若生搬硬套,必然产生翻译理论不能指导翻译实践的困惑。

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怎么译”,提出一些翻译应该遵循的原则,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翻译实践。目前争议较大的是侧重探讨“翻译是什么”的描述性翻译理论是否能够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描述性翻译理论来自翻译实践,也能给翻译实践以具体的指导。如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今中国文学在欧美文学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因此,中国文学若想走进欧美文学市场,译者在翻译时宜采取符合欧美读者审美需求的可接受性策略,此理论的意义在于从宏观上指导译者的翻译策略。描述性翻译理论侧重描述、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该理论对未来翻译行为的预测功能,即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功能。

描述性翻译理论,即便是高度抽象的哲学翻译理论,也能指导翻译实践。这种翻译理论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翻译实践的本质,虽然不能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它对于译者的意义在于宏观层次上的指导。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于译者的意义在于,译者不再迷信原作者和原文的权威,在翻译时,不再执着于作者原意,而是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融入译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整体而言,描述性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是一种宏观的、方向性的指导,规定性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具体操作上的指导。

5. 结语

本文从翻译理论的概念及其分类着手,结合具体的翻译理论流派,来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理论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翻译实践,各种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区别在于指导方式的不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并非百分之百的吻合,目前所产生的翻译理论都是霍姆斯所言的局部理论,仅仅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在运用翻译理论解释或者指导翻译实践时,需注意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若用局部理论代替普遍理论,则往往产生翻译理论无用的困惑。适用于一切翻译实践的普遍理论以及和翻译实践关系密切的翻译本体理论目前尚未产生,因为翻译学学科较为年轻,学科地位不牢固,发展尚未成熟。随着翻译学学科不断发展,现有的局部理论终将过渡到普遍理论,能够指导、解释和预测一切翻译实践。翻译学也会逐渐摆脱其他学科的束缚,创建翻译学所特有的翻译本体理论,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终将不再具有争议性。

参考文献:

- 曹明伦,2006.从教学视角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3(2):1-8.
- 董秋斯,2009.论翻译理论的建设[M]//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601-609.
- 傅敬民,2002.试论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关照[J].外语与外语教学(9):44-46.
- 傅雷,2009.翻译经验点滴[M]//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692-696.
- 韩子满,2018.跨学科翻译研究:优劣与得失[J].外语教学,39(6):74-79.
- 黄忠廉,2003.研究植根于泥土,译论发生于事实[J].上海科技翻译(2):4-5.
- 库恩,2012.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23.
- 吕俊,2003.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J].上海科技翻译(1):3-4.
- 穆雷,2012.也论翻译研究之用[J].中国翻译,33(2):5-11.
- 瞿秋白,2009.再论翻译:答鲁迅[M]//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350-359.
- 孙艺风,2002.理论、经验、实践:再论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3(6):4-10.
- 孙致礼,2003.理论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J].上海科技翻译(4):4.
- 王东风,200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互动的[J].上海科技翻译(1):7-8.
- 谢天振,2001.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J].中国翻译,22(4):2-5.
- 许渊冲,2006.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 许渊冲,2003.实践第一,理论第二[J].上海科技翻译(1):2.
- 杨自俭,2002.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M]//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18.
- 袁济喜,2002.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赋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2(4):39-45.
- 张经浩,2001.再谈“翻译学”之梦[J].上海科技翻译(2):61-65.
- 周领顺,2009.“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回顾与反思[J].上海翻译(6):13-17.
- BAKER M,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BAKER M, FRANCIS G, TOGNINI-BONELLI E.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3-250.
- BASSNETT S,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M].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 CHESTERMAN A, WAGER E,2002.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HOLMES J,2007.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MUNDAY J, 2016.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作者简介:

李巧珍,女,1981年12月生,河南洛阳人,翻译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热捧与冷遇：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卢冬丽 熊 玥



摘 要：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经历了武侠的领跑、儿童与科幻的接力以及网络文学的多元发展三大阶段。相比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引发的热潮，儿童文学有一定反响，网络文学则备受冷遇，在日本遭遇了“热”与“冷”的双重境遇。横向维度上，通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力远逊于欧美；纵向维度上，科幻文学一枝独秀，凌驾于其他通俗类文学。“热”与“冷”一方面源于日本译者和出版社的翻译选择偏好与推广策略，另一方面凸显出日本读者的接受审美。当代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本体特质及其大众化、传播力强的媒体特征，可以通过提质转型、作品国际化、贴合日本生态环境的“长尾效应”产业链，多路径构建在日本译介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通俗文学；日本；译介

A “Hot and Cold” Dilemma: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LU Dongli XIONG Yue

Abstract: China's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martial-arts fictions come first, followed by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and online literature in Japan. Online literature had a “cold winter” in Japa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it brought by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certain positive reception brought by children's literature. It went through a “hot and cold” dilemma. Viewed from the horizontal angle, the spread of China's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is way behind in Europe and America. From the vertical angle, China's science fiction outshines other popular literatures. On one hand, the dilemma is the result of selection preferences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of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rs in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lies the acceptance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readers.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 not only has the ow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and world literatures but also the popular and wide-spreading features of media. It can create a new situation for Japanese translation

through improving the quality, internationalizing the works, catering to the “long-tail effect” industry chain of Japa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s.

Keywords: China, Popular Literature, Japan, Translation.

1. 引言

近些年来,形态丰富、特质鲜明的中国文学及作家作品陆续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学交流的中国作家身影日渐增多,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等“出海”成果显著。(许钧,2021)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从经典的纯文学到流行的通俗文学,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题材的作品纷纷得到译介,构成了文学“走出去”的丰富图景。(吴贇等,2019)2019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主编姚建彬介绍说:“不少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除了继续聚焦于传统的纯文学作品外,还将感知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当代的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盗墓小说和各种当红的网络小说。”武侠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新门类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是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刘慈欣和郝景芳分别斩获2015和2016年的雨果奖,曹文轩2016年折桂国际安徒生奖,《三体》《北京折叠》《草房子》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海外代名词。通俗文学颠覆了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认知,透过通俗文学折射出来的中国当代人文社会也逐渐被海外读者认知并接受。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海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蓬勃态势。但是,译介整体仍处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状态,不同语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温差”。此外,通俗文学单向性的推介也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态势。本文聚焦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脉络历程与现实图景、面临的困境及引发的思考,反思通俗文学如何进一步融入以西方和本土为中心的日本文学的对话之中,达成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

2. 通俗文学及其特质

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虽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一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受主流文学批评家重视。针对这一现象,范伯群(2004)认为“专门以一元化的文学作品去满足全民的多元需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促使通俗文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总结出一套通俗小说创作的规律,……总结出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某些不足的教训中,建立我们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

汤哲声(2018)认为通俗文学不同于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和民间文学,“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和世俗化阅读。”通俗文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诠释了当今通俗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民族性根源。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具备五大要素:大众文化

的文字表述、强烈的媒体意识、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过程、程式化特征并有传承性、当代社会的世俗阅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系,形成了以武侠仙侠、玄幻志怪、都市言情、历史军事四驾马车齐头并进,游戏竞技、探案解密、恐怖悬疑、宫廷斗争、青春校园等题材奋勇争先的景象,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偏好虽有不同,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国际传播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张翼飞等,2020)

3. 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现实图景

3.1 武侠:当代通俗文学的领跑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受20世纪90年代武侠影视剧、卫星剧场热潮的影响,1996年德间书店出版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全4卷(《書劍恩仇錄》),由中国文学研究者冈崎由美翻译,此后亚东书店亦有出版,在日本颇受好评。这股“武侠热”持续发酵,截至2011年德间书店、小学馆、学习研究社等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金庸的《天龙八部》全8卷(《天龍八部》,土屋文子译)、《射雕英雄传》全5卷(《射鵬英雄伝》,金海南译)、《神雕侠侣》全5卷(《神鵬劍俠》,冈崎由美、松田京子译)、《笑傲江湖》全7卷(《秘曲笑傲江湖》,小島瑞纪译)、《倚天屠龙记》全5卷(《倚天屠龍記》,林久之、阿部敦子译)、《鹿鼎记》全8卷(《鹿鼎記》,冈崎由美、小島瑞纪译),古龙的《楚留香传奇》(《楚留香》,土屋文子译)、《边城浪子》(《边城浪子》,冈崎由美译)、《多情剑客无情剑》(《多情劍客無情劍》,冈崎由美译)、《陆小凤传奇系列 绣花大盗》(《繡花大盜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阿部敦子、冈崎由美译)、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七劍下天山》,土屋文子译)等20余册武侠小说。其中,金庸所著的15本武侠小说全部发行了日译本。

冈崎由美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是武侠小说在日本译介的重要译者,其在中国汉学家中的知名度主要得益于金庸武侠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了金庸、古龙的7部小说,并担任金庸小说日译的监修。同时,作为中国通俗文学、明清传奇侠义小说的研究学者,著有论文《翻译金庸小说,翻译武侠文化》《金庸小说的格斗描写》《明代长篇传小说的文体》等,并出版评论性专著《畅读武侠小说的世界》。同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土屋文子专注中国三国历史故事,潜心研究《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翻译武侠小说得心应手。林久之主要从事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翻译,共参与了5本武侠小说的翻译,是翻译中国武侠小说数量最多的译者之一。总体上,以冈崎由美为代表的武侠文学译者多毕业于日本名校,既是翻译家,也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造诣,在日本翻译界具有较高的象征性地位。

武侠文学在日本形成通俗文学译介的高峰,“翻译生动再现武林世界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对海外读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许钧,2021)。不过,武侠文学的译介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热潮维持了大概15年,随着日本读者对于传统武侠文学的热情逐渐“降

温”而终结。究其原因,一是文学界没有出现像金庸、古龙、梁羽生等被誉为“御三家”的武侠文学大家;二是武侠文学本身逐步被仙侠、玄幻、修仙等网络文学所取代,有了更多元的文学表现形式,对武侠文学抱有好感的读者渐渐将目光转向新的文学载体。

3.2 儿童与科幻:当代通俗文学的接力

继武侠之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接力者。迄今为止曹文轩有7部作品译介至日本,其中6部以插画、绘本的多模态翻译贴合日本的阅读生态。早在2002年,儿童文学翻译家中由美子十分喜爱曹文轩的短篇作品《守夜》(《よあけまで》,童心社出版),邀请和歌山静子绘画,以绘本形式出版。《守夜》标志着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日译活动的起步。随后,曹文轩的《草房子》(《サンサン》,中由美子译,てらいんく出版社,2002年)、《羽毛》(《はね》,滨野京子译,マイティブック出版社,2015年)均以绘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但反响平平。

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其作品在日本儿童文学界引发广泛关注。以曹文轩作品的日译为契机,“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树立社极为重要的文学分类,出版社官网还为此单独开设了版块。树立社与国际插画家积极合作,运用国际编辑室的做法,在日本制作中国故事的多语种绘本与图鉴,与世界各国出版社合作同步发行,大力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此推动效应之下,树立社陆续出版了岩谷季久子翻译的《远方》(《とおくまで》,2018年)和《风吹到乌镇时累了》(《風のぼうけん》,2018年),水野卫子翻译的长篇作品《细米》(《樹上の葉 樹上の花》,2019年),中由美子翻译的《青铜葵花》(《青銅とひまわり》,2020年)。此外,树立社正在编辑制作“中国少年文学系列”,计划引进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烟》《夏天》以及“萌萌鸟系列”等。树立社大力推介曹文轩的作品,很大原因在于其作品颇具人文深度和乡土情怀,大大扩大了读者群范畴。《草房子》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王雪琴,2015)¹³³,不少成年读者在日本亚马逊和読書メーター等网站上留下书评,客观反映了儿童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受制于文本形式的禁锢,具有普世的文学价值,有较为广泛的读者受众群。

儿童文学国际奖项效应也惠及其他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除曹文轩的作品外,近三年中由美子翻译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如杨红樱的《木耳》(《木の耳》,2019年)、《猫小花和鼠小灰》(《ともだちになったミーとチュー》,2019年)、《寻找快活林》(《たのしい森をさがして》,2020年)、《做梦的房子》(《ゆめみるへや》,2020年)、秦文君的《我是花木兰》(《あたしは花ムーラン》,2020年)、杨思帆的《错了?》(《ちがうかな》,2020年)等。中由美子近30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文学交流,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和交流期刊,迄今已发行了39期,是译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中坚人物。此外,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狼王梦》(《紫嵐の祈り》,2017年)由光吉樱和湾仔翻译,大樟树出版社出版。虽然在日本反响平平,但是大樟树出版社是浙江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成为中国出版社主动在海外译介儿童文学的范例。

除儿童文学之外,科幻文学成为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主力军。虽然科幻文学进入日本较晚,但影响最大。尤其近十年,科幻译介进入快速发展期,翻译活动空前繁盛,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科幻作品的体系化、规模化日译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2019年《三体》(《三体》,大森望、光吉さくら、ワンチャイ译,早川书房出版)成为中国科幻在日本的代名词,在日本发售一个月内销量超过13万册,在中国书籍中排名第二。截至2021年3月,日本亚马逊网站上有书评998条,笔者统计其好评率中高达88%。“有趣”“获得雨果奖”“翻译质量高”“中国风”成为读者评价的关键词。随后,2020年早川书房强势推出《三体Ⅱ 黑暗森林》(大森望、立原透耶、上原かおり、泊功译),2021年5月推出《三体Ⅲ 死神永生》(大森望、ワンチャイ、光吉さくら、泊功译)。早川书房坦言,正是读者的普遍性认可和市场的广泛接受,才促使出版社积极组织翻译并加速出版。

《三体》系列在日本的成功,除了出版社的积极组织,充满“科幻文学”的文风功不可没。由于日本缺少“既懂中文又懂科幻”的专门译者,早川书房出版社认为“应该由懂科幻的专业人士”来翻译科幻文学,积极招募译者。所以,《三体》系列的译者群落中既有光吉樱、湾仔、立原透耶、上原熏、泊功五位精通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也有知名英日科幻文学翻译家大森望。翻译工作分汉日初步直译、英日转译修改、汉学家校阅三大步骤。首先,汉日译者提交直译初稿,译者在人物塑造、保留中国元素方面颇费功夫。上原熏表示《三体2》依旧保留了很多英文外来语,不直译汉字,如“科幻边界”翻译成“科学frontier”,但“为了表达出作者本来想要描写的那种庄严、美妙,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部分,基本是直译的。”译者泊功从小就是军迷,所以“军队相关的词语和对话应该都译得都比较符合原著”,“东方延绪这个角色我下了不少功夫,希望让她作为女性舰长既有女性的一面,又有作为军人的一面。”大森望基于汉日直译本、汉英中介译本、中文原文本,着力将中国科幻打造成日本科幻迷们所期待的“科幻文学”,而非“翻译文学”。大森望表示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对汉日直译稿进行了超过80%的修改,这才带来了《三体》发售一周以内重印10次的火爆销量。(皆川裕子,2019)而且,英日翻译家大森望是作为第一译者承担所有的翻译责任。《三体》系列在日本的火爆直接引发日本文学界对中国当代科幻的广泛关注,日本主流文学期刊《文艺春秋》《文艺》等连续刊载陈楸帆、王晋康、宝树等的代表作及相关评论文章,空前关注中国新生代科幻文学。

继武侠小说的高峰,儿童与科幻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两大接力棒。黄建斌(1998)⁴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坛上“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和作品欠缺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组织翻译工作不力”。虽然儿童文学在日本有一定的显示度,但相较之下,离科幻文学的热捧相距甚远。科幻文学在日本的成功一方面在于中国当代科幻作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通过环境、疾病、爱情、战争等叙事探讨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学基因,又颠覆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纯文学’的刻板印象”(许钧,2021),引发世界性共情。另一方面,译介与传播模式日益专业化,以中国官方机构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在译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成为

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文化战略。《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的巨大成功,也为科幻文学在日本的持续性发酵注入了一股兴奋剂。此外,20世纪以来星新一、小松左京、筒井康隆等知名的日本科幻作家酿造了日本民众喜好科幻文学的生态环境,为海外科幻文学的接受提供了生态土壤。

3.3 网络文学:当代通俗文学的多元化传播

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作为新兴文学发展迅猛,“穿越”“重生”“修仙”“网游”等题材的作品在不同阶段受到热捧。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开始受到学界、媒体、政府管理部门和业界的高度关注。2017年阅文集团上线国际版网络文学网站“起点国际”,标志着网络文学出海从1.0时代的海外出版授权、2.0时代的海外平台搭建与网文内容输出,走到海外原创内容上线及IP内容输出的阶段。

尽管如此,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不能一概而论,其在日本的传播呈现出与欧美“热捧”所截然不同的惨淡状态。起点国际仅仅用了18个月,就已经拥有了超过3000名注册作者和超过6000部英文原创网络小说。(吉云飞,2019)¹⁰⁷而在日本,中国网络文学起步较晚,目前基本陷入停滞状态。2015—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全职高手》(《マスターオブスキル 全職高手》,田中未穗译,リブレ出版)仅出版4卷后再无消息,官网已经下架电子版的购买渠道。其中,译者的经济酬劳是重要因素之一。日本的网络作家多是业余的,而且网络支付相对滞后。另外,译介主体非职业化、网络文学语体问题造成的翻译策略不当、瞄准女性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传播渠道选择有失偏颇等诸多因素,导致网络文学在日本未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错失了发展的良机。

网络文学种类多样、可传播性强、受众黏性高,在日本仍具有很大的潜力,越来越多的日本研究者开始重视并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目前《盗墓笔记》《花千骨》的译介工作正在进行中,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也有一定的讨论度,网络文学对日传播的后续发展值得期待。此外,走红的网络文学在日本呈现出电影、图像等非语言符号的媒介转向,如2014年的《杉杉来了》(《お昼12時のシンデレラ》)、2015年的《何以笙箫默》(《マイ・サンシャイン》)和《花千骨》(《花千骨》)、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倾城》(《シンデレラはオンライン中》)等以电视剧的多模态形式在日本传播。这些突破纯文本形式的文化输出,为中国网络小说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4.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困境

4.1 横向困境:逊于欧美

中日两国本共处“儒家文化空间”,地理与文化环境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内海。尽管如此,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与传播的势头远逊于欧美,尤其在当今网络文学的海外译介方面尤为明显。Wuxiaworld网站自2014年

创立之后,短短一年内吸引百万量级的英文读者,出现中国武侠小说的热潮。而日本最大的读者网站 booklog 上,即便是备受好评的金庸作品,不同出版社的各种版本以及漫画等衍生作品统计共 81 本,书评总数仅 259 条,不少知名作品鲜有评论,标记过“想看”“在看”“看完”的读者相当少。粉丝群无论从总数还是从热度来说,均是较为惨淡的状态。日本读者对于本土同类型剑豪小说的兴趣远高于中国武侠、玄幻仙侠小说。中国网文和日本轻小说虽然同样缘起网络,但是各自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阅读体系,这也是日本有别于欧美通俗文学生态土壤,日本读者拥有更多本土文学的选择。

此外,中国当代网络文学在欧美形成了“接地气”的“作者—译者—读者—网站”正循环系统的传播模式,即“由精英粉丝主导、粉丝集体协商,海外粉丝自发翻译、自主传播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粉丝的接受度适度商业化和全面职业化的模式,是更适应英语世界的文化环境和网络氛围的生产机制”(吉云飞,2019)。相比之下,在日本遭遇的种种水土不服,似乎依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译者的单一性、粉丝精英翻译团队的缺失、付费机制的僵硬使得大规模的网络翻译活动在日本很难持续。欧美的 Wuxiaworld 模式无缝衔接“作者层、读者层、译者层与市场运作”,某种程度上可以给网络文学在日本的网络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4.2 纵向困境:千禧年后的遇冷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高峰难以逾越,相较之下其他类型作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冷遇”。2019 年初,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访谈中谈道:“中国当代文学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的销售情况不是很好,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情况越来越不好,……日本出版业最好的时期是 1990 年左右,那时候书的种类和印数是最多的,现在则相对要少一半左右。”(刘成才等,2020)日本出版业对海外翻译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出版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在此困境之中,《三体》系列作为海外科幻文学在日本取得瞩目的销量成绩,是非常罕见的。科幻文学的火爆确实存在打破千禧年后的遇冷的困境,迎来了刘欣慈、王晋康、夏茄、郝景芳、宝树等科幻作家群体在日本传播的盛况,有望超越武侠小说的高峰。但从通俗文学整体来看,当今呈现出科幻文学一枝独秀的状态,其他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虽然在日本市场虽有所突破和尝试,但整体受众度依旧较低。

5.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未来

5.1 在日译介的再思考

首先,译介主体的单一化与多元化拓展。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的主体主要是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考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会”网站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报》等专门刊物,不难发现其主要成员为日本各个高校的教授、讲师、教员等。翻译家以研究学者为主,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多是基于学者的学术判断或个人喜好,对市场的因素考虑相对较少。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岸陽子、中央大学的栗山千香子、庆应义塾大学·成蹊大学的土屋肇枝、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大学的鹭巢益美等人,多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选择上偏向中国当代纯文学,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发表出版后不久,就会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出版,莫言的小说的日译就是如此。而通俗文学往往被排除在学术性、文学性译者的翻译选择之外。所以,欧美式的精英读者兼任半专业译者、专业译者,一方面解决了译者对通俗文学的翻译自主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拓展译者团队,进行大规模的通俗文学翻译活动,译者的非职业化、多元化拓展成为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首要面临的问题。

另外,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翻译策略。“中国文学的外文译本是原文本的遗失与被解构,体现了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以及中国民族文学在另一个文化场域中的移植与重生。”(张翼飞等,2020)科幻文学的英日转译兼顾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通俗文学海外译介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在日本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籍华裔翻译家刘宇昆的中介英译本。刘宇昆的英译本兼顾科幻文学中国元素的“异质性”特征,以世界性话语讲述中国科幻,在英语强势语国家中获得强有力的文本生命,成为文本海外生命力延续的重要参照,在海外语境中再度确认文本生命的自我价值(卢冬丽,2021),催生了其在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异化授粉”的二次传播。英日翻译家大森望转译中以“科幻文学”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科幻故事,既满足了早川书房出版社对“科幻文学”而非“翻译文学”的诉求,又满足了读者的异文化理解与科幻文学的阅读审美需求。通俗文学的海外传播中,融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本体特质以及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翻译策略是通俗文学海外译介的重要因素。

还有,译作形态多样化与超文本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日语后通常长度都会增加三五成,长篇作品翻译出版的难度相对大一些,而中短篇就会好很多。(刘成才等,2020)因此,中短篇的文库本往往是日本最先选用的译作载体。时至今日,突破静态封闭的文本,从文本走向超文本已成为通俗文学外译的必然趋势。以传统文库本、单行本等纸质媒体为主,辅以数字化阅读,儿童、武侠、科幻、网络文学以绘本、电影、电视剧、图像等多模态翻译形式展现出媒介的转向。日本出版社 KADOKAWA(角川株式会社)的成功提供了一些独到的经验。从事出版业务起家的综合媒体公司角川集团与 IT 企业 DWANGO 合并后,实现了内容娱乐产业、利益最大化的跨媒体联动。角川集团依据“创造 IP、IP 展开的多重化、媒体的多重化”三点经营目标,在实践中独创“角川商法”,即制作以自家发行的小说为原作的动画或电影,并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获得影视作品和书籍相乘的宣传效果。书籍、影视、动漫、游戏等多模态、多媒介联动达成多次方相乘的宣传效果,更适用日本这样的动漫大国,不失为“接地气”的传播策略。

5.2 在日译介新局面的构建

当代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其丰富的中国元素与贴合大众阅读的审美可以成为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矛。面对“热”与“冷”的双重境遇,当代通俗文学需要审视自身,创建产业链,实现跨界合作,努力构建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传播的新格局。

首先,通俗文学的提质转型。无论何种文学,其根本目的是要“沟通人类心灵,引发精神共鸣,互学互鉴,相互丰富”(许钧,2021)。当代通俗文学以中国式书写特征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在海外备受热捧的根本因素在于其超越中国文化疆域的人类共情,对中国、对世界现实社会的关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反思,提质转型是当代通俗文学在海外广为接受的重中之重。韩松(2019)认为:“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恰恰科幻小说更适合表现这种现实的荒诞性,反而是纯文学融入现实没那么有自由度。科幻小说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这样的表现力是纯文学达不到的。”欧美国家备受网民追捧的网络文学,正因为其“构建起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在丰沛的想象中逃离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无奈,……这种游离于现实时空之外的文学创作,反而激起对人性根本诉求的认同和期待,……可以说,中国网络文学对于精神审美的超现实建构正是人文价值与思想在当代的新生与发展,也是新时代追寻人类生存意义的崭新艺术形式,因此其接受者也就不止于中国文化疆域,而是能够在全球关注中找到广泛的共鸣与应和。”(吴贇等,2019)⁷⁸仙侠、奇幻、穿越、宫廷、侦探、盗墓等通俗文学融汇中国传统与现代元素,传统神话、宫廷文化、丧葬文化等贯穿其中,在世界通俗文学视域下,构建独具一格的中国通俗文学叙事范式,激发读者对异域的阅读想象,是拓展其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根本性因素。

其次,创造产业链“长尾效应”。日本通俗文学产业链极为发达,通常由文学、出版行业、电视剧动画、电影制作、商品制造(手办、玩具以及模型的开发、生产、制造与销售)、游戏制造行业(IT行业)以及更广义的文化产业(迪士尼、东京台东博览馆等)等诸多行业的联动,共同构成产业链甚至产业集群。作为“舶来品”的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想要“接地气”在日本广为传播并被接受,需要注重文学产业破次元多媒体融合,汲取其中的优势应用到当代通俗文学的外译传播模式中,创造产业链的“长尾效应”。例如,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在绘本的基础上着重玩具和模型的开发,相关动漫制作与宣传;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和游戏产业、影视产业联动,提升知名度、趣味性以及社会叠加效应等。主动规避文化藩篱,淡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利用好产业链的“长尾效应”进行多元立体传播,衍生影视剧的热播使得感官维度多样化,从而达到提高接受度、反哺原作商业价值的效果。

另外,出版业界的努力和作品的国际化。“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国际传播路径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正是这种汪洋恣肆的创作与发展模式,使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没有裹挟过多的政治指涉,最大限度抵消文化折扣的影响,精准有效地进行传播。”(张翼飞等,2020)获得《三体》海外版权的代理商 Tuttle-Mori Agency(タトル・モリエイジェンシ

一)的社长森健一认为,尽管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存在感相对微弱,但潜力很大。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对日传播的加速仍需出版业界的努力和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化。曹文轩获安徒生奖、刘慈欣和郝景芳获雨果奖,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带动链,由此《三体》带动中国科幻文学群体、《草房子》带动中国儿童文学群体进入日本读者大众视野,成为其个人和整个文学群体在日爆红的契机。在“作者—译者—读者—媒介”正循环系统下,聚焦问题所在,方能“接地气”地在日本广为传播并接受。

6. 结语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和世俗化阅读,具有极强的文本生命力,其接受者不止于中国文化疆域,而是能够在全球关注中找到广泛的共鸣与应和。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是文本生命力在不同时空中的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侠文学在日本领跑,21世纪之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成为两大接力者。刘慈欣、郝景芳、曹文轩的国际性获奖是通俗文学在日本备受关注的重要契机。德间书店、树立社、早川书房三大出版社积极组织并大力推介,译者的选择偏好及其在日本的象征性地位、几十年如一日对翻译的专注等,是武侠文学、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因素。新兴的网络文学在日本虽然陷入停滞状态,但仍具有很大的潜力,媒介转向的多模态翻译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纵观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热与冷”,整体上日本读者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依旧处于相对陌生的状态。尽管日本对欧美作品的热捧成为潮流,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世界性主要在于文学本身的被阅读和被接受。另外,译者的专业化与多元化、译作形态的多样化与超文本化、作品的国际性认可,以及出版社贴合本土生态的宣传,多方面联合互动共同推进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中日两国共处儒教文化圈,客观形成中日通俗文学共通的文学与文化基底,要促进当代通俗文学成为兼具话题性和艺术性的世界性文学,日本的译介已经展示出了诸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有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 范伯群,2004.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78-86.
- 韩松,2019.科幻的十三个关键词[J].科普创作(4):52-60.
- 黄建斌,1998.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谈儿童文学的引进与输出[J].编辑之友(1):290-293.
- 吉云飞,2019.“起点国际”模式与“Wuxiaworld”模式: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两条道路[J].中国文学批评(2):102-108.
- 刘成才,藤井省三,2020.莫言、都市文学与中日文学交流: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访谈

- [J]. 社会科学论坛(1):173-183.
- 卢冬丽,2021. 转生、再生与共生: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英日转译的文本生命延续[J]. 外语与外语教学(6):80-89.
- 汤哲声,2018. 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J]. 学术月刊,50(9):131-139.
- 王雪琴,商明珠,2015. 走近名著:贴近考点国内篇[M]. 延边大学出版社.
- 吴赟,顾忆青,2019. 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内涵、路径与影响[J]. 中国比较文学(3):66-79.
- 许钧,2021. 深耕文学翻译 增进文化交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N]. 人民日报,04-13(20).
- 张翼飞,崔宏图,2020.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思考: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国际传播研究[J]. 当代作家评论(3):57-62.
- 佚名,2019. 中国故事的国际之旅:曹文轩作品在日本[EB/OL]. (06-25)[2021-04-07]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timeline&isappinstalled=0.](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皆川裕子,2019. 翻訳者は語る 大森望さん[EB/OL]. (10-25)[2021-04-05][https://](https://shosetsu-maru.com/interviews/translator/21)
[shosetsu-maru.com/interviews/translator/21.](https://shosetsu-maru.com/interviews/translator/21)

作者简介:

卢冬丽,女,1980年12月生,江苏南通人,文学硕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教育学研究。

熊玥,女,1999年8月生,江苏南京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学研究。

归化和异化视角下俄语成语汉译策略初探

强田田



摘要:作为文化独有的符号,语言生动形象地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成语作为特殊的语言单位,其精辟简练、结构固定、内涵深刻,被奉为瑰宝。俄语成语凝结了历代俄罗斯人民的思想精华,透视其民族性格、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等,俄语成语所承载的深刻内涵值得我们深究。由于俄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俄语成语的构成、来源和分类等与汉语成语截然不同。因此,准确把握俄语成语伴随的文化含义,地道表达俄语成语是俄语学习者面临的一大难点。本文以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详细了解俄语成语的来源与结构,通过举例说明、类比分析、归纳总结等论证方法,深度分析其表层含义和语内意义,力争找到恰当的翻译方法,对俄语成语汉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俄语成语;归化;异化;翻译方法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Russian Idioms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ization and Alienation Perspectives

QIANG Tiantian

Abstract: As a kind of unique cultural signal, Language vividly show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 nation. Idioms as a special linguistic phenomenon are treasured for their incisive simplicity, fixed structur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On the one hand, Russian idioms condense thought essence of all Russian peoples, which can stand out nation character, cultural concept, mode of thinking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worth while to study deep meaning carried. As Russian and Chinese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Russian idiom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idioms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origin and classification, so, it is therefore a challeng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ultural meanings that accompany Russian idioms and to convey them in an authentic manner. This paper under the the guidanc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composition of Russian idioms, analyze their superficial and interlinguistic by illustration, analogy analysis, inductive summary and find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methods, could have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idioms.

Keywords: Russian Idioms; Adaptation; Alienation; Translation Methods

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成语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人们在实践中沉淀并沿用至今的固定性词组或短语。俄语成语作为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化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俄罗斯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和生产生活中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充分彰显出俄罗斯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特点,在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形式简洁、句式灵活、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富含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现代俄汉俄双解》对“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的解释为:《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устойчивых выражений и конструкций в языке.》(语言中固定表达和结构的集合)(张建华等,2021)。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和生活环境等不同,俄语成语和汉语成语在分类、性质、形式方面迥然不同,俄语种类繁多,不仅有固定表达、词组、短语,而且囊括民间广为流传的习语、俗语、谚语等。俄语成语自身结构特殊,需要全面理解其内容、形式,了解成语背后的背景知识,掌握俄语成语的翻译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地传达出原语的文化含义,最终在实践中灵活使用俄语成语,提高俄语语言水平和应用能力。

国内对俄语成语的研究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俄语成语的研究成果颇丰,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有人从文化角度探讨俄语成语翻译的策略,但系统地将成语翻译方法归纳入异化和归化策略框架之内的研究为数不多。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策略在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二者所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充分考虑原文的可译性和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合理运用翻译策略,使原文精准、完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以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俄语成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统一归纳俄语成语的汉译方法和策略,以期提高双语交际能力。

2. 归化与异化概念简述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正式提出“归化(Adaptation)”和“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所谓归化(domesticating method/adaptation)翻译,采取 Venuti 的定义,就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将原作者带进译入语言文化之中。”(王东风,2002)换言之,归化策略需考虑译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译者将异域文化因素归到本民族文化之中,使原语更符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价值观,便于译语读者接纳,更加充分地体会原语作者想传达的思想。归化使原作更靠近译语读者,使译语信息接受者和原语信息接受者产生共鸣,此外,该策略

也防止译文出现“洋腔洋调”，减少翻译失真，避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障碍。

美国著名学者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强调将原语信息“归化”，他指出无论是从语义还是语体都要在译文中最贴切、自然地再现原语的语言信息。国内也有不少翻译家指出翻译要防止和抵制异域文化入侵、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例如：傅雷将作画的原理引用到翻译实践活动，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原则——“神似说”，即翻译应像临画一样，不讲求形似而在于神似，翻译的东西要真正达意传神，而不是形式吻合即可。钱钟书的“化境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理解为“归化”，他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入的“化”，即把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的过程中，不因语言习惯差异而使译文文本生硬晦涩，显露牵强。这样就有效避免译文的词显得怪腔怪调，译文生涩难懂。

异化(Alienation)最早出现于德国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的著作《论不同的翻译方法》(1813)，他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林庆扬, 2011)。后来，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1995)中指出异化即偏离本民族主流价值观而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异化强调译者主体要靠近原著作者，译文应该再现原著作者的思想，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行文风格和文化特色，准确传达出原文文化内涵及原作者传达的价值观，便于译文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异域文化(张白桦, 2017)。异化策略能丰富译入语语言的表达形式，促进文化多元化，刺激不同文化间交流碰撞，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互鉴互赏，多样文明美美与共。鲁迅的翻译思想“宁信不顺”——无论是字面含义还是文本的整体信息都保持“硬译”也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今，跨文化交际的浪潮滚滚卷来，中俄两国赓续旧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21世纪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两国关系达到历史的巅峰。在此背景下，我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我国可借鉴俄罗斯的优秀文化，吸收其精粹。同时，发扬本民族文化，积极推动优秀中华文化的译介与传播。然而，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导致产生文化理解偏差，克服此类现象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地帮助不同民族克服对异语文化的陌生感和抵触心理。因此，在文化交流中译者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在翻译过程中译员需把握好“维度”，准确传达出原作的文化伴随意义，体现原作者的思想情感，同时不失译入语语言的风格，最终译文达到“不似原文，胜似原文。”

3. 归化指导下俄语成语汉译的具体翻译方法

3.1 意译法

意译和直译为最广泛的两种翻译技巧，意译区别于直译那样在形式和结构上一一对应，而注重译文内容忠实传递原文的信息，换言之，意译是一种保留原语文本内容，改变其表达形式的翻译方法。方梦之(2019)教授在《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一书中指出：“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由于语言体系不同，俄语的部分修辞、

语法直接转换为汉语后可能不符合汉语语用习惯,甚至导致理解偏差,译者需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在深刻把握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进行语际转换,经润色加工,最终传神达意。)实例如下:

(1) Встать с левой ноги.

直译:左脚下地(起床)。

意译:心绪不佳(一般指早上起床时不在状态,心情不好)。

该成语在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俄语详解词典》) 中的释义为: *Быть в плохом мрачном, плохом настроении, раздражё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闷闷不乐,心情不好,处于愤怒的状态。)该词源于古代俄罗斯人民的生产生活,人们对“左”和“右”的认知不一:“左”代表错误和扭曲,而“右”则象征公平、正义。因此,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俄罗斯人民对单词“лево”(左)持不友好的态度。然而,在汉语中由于历史时期更迭,出现了“左尊右卑”和“右尊左卑”不同的制度。因此,汉语读者不明确“左”在俄语中的文化含义,若逐词直接翻译为“左脚下地”会产生歧义,从而降低译文的可读性。

(2) 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 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

直译:量七次,裁一次。

意译:三思而后行。

数字“Семь”(七)在俄语中表概数,指数量众多。正如数字“三”在汉语里频频出现,例如在三教九流、韦编三绝等成语中,“三”均表数量多。可见这两个词语用意义相近。直译显得译文冗余,并未传达成语的隐喻含义,影响译语读者理解。“三思而后行”这一俗语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原文的含义,兼具文化内涵,便于汉语读者与原文作者产生共鸣。

(3) Держать язык за зубами.

直译:把舌头藏在牙齿后。

意译:缄默不语;守口如瓶。

虽然原句中有“舌头”“牙齿”这两个意象,但对于汉语读者来说,成语“守口如瓶”“缄默不语”更为贴切,且为四字格结构,读来朗朗上口,也十分形象生动。意译的方法在汉语中有相关含义的成语,清晰地表达出原词的内在含义。

(4) Лёгко на помине.

直译:很容易想起来。

意译:说曹操,曹操到。

逐字翻译会使得译文读起来生涩,易导致读者误解。因此考虑到俄汉文本词义层面的对等,选择恰当的方式传达成语的词汇含义,可以使译文通俗易懂。

(5) Конь-о четырёх ногах, и тот спотыкается.

直译:马有四条腿,却也摔跤。

意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原文中有“马”的形象,直译通俗明了,但句子结构杂乱,毫无章法。意译用中国人

耳熟能详的谚语,结构对仗、严谨工整、符合汉语语言表达的同时忠实原文。此外,该谚语语出《左传·宣公二年》,意译法巧妙结合中国古代典故,无论是句式结构还是寓意较直译略胜一筹。

(6)Первый блин комом.

直译:第一个薄饼烙成团。

意译:万事开头难。

直译只仅仅保留了形象即独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食物——薄饼,意译直接采用汉语俗语,不仅结构简洁,而且表明其隐喻意义。

(7)Стрелянный воробей.

直译:枪打过的麻雀。

意译:老油条;饱经世故者。

直译虽然转换成原文的形象,读者理解起来也不难。但语义层面并没有传达出原文潜在的隐喻意义,考虑到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此处采用译语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

3.2 以形换形

汉语和俄语成语中都具丰富的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不断充实和丰富了两国优秀文化,也正是这些动人的形象直观地反映各国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俄语中的动物、事物、神话人物等形象比比皆是,俄语词汇丰富多彩的奥妙就在于此。例如,俄语中常见的俄罗斯民族的图腾——熊,具有正面意义,是勇猛、威武和强大的象征。然而,同样的形象在汉语的象征意义与在俄语中的含义却大相径庭。此外,俄语中不乏“圣母”“上帝”“天使”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词。而汉语成语中大部分涉及“菩萨”“苍天”“佛”等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形象。因此,对两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词汇进行转换时,有必要正确理解隐喻意义,查找符汉语语用习惯的等值词汇,以减少文化认知障碍。Азимова Назира Фаттохевна 在论文“成语中形象的主要翻译方法”中提到在缺乏成语等值词的情况下,有必要根据不同的形象选择具有相同比喻含义的成语单位。具体实例如下:

(8)На охоту ехать-собак кормить.

直译:要去打猎才喂狗。

转换形象:临阵磨枪。

原文的形象为狗(собака),直译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打猎活动,但不符合汉语成语构词特点。因此,可以将原来的“狗”这一形象转化为汉语中的,换作中国人熟悉的古代军用器材——“枪”,临阵磨枪这一成语出自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比喻事到临头才匆忙准备。不仅体现出译者高超的语言转化能力,而且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9)Держать нос по ветру.

直译:顺着风向捏鼻子。

转换形象:见风使舵。

原文中鼻子(нос)、风(ветра)这两个意象生动活泼,但直译并不能传达其背后的讽刺色彩,译为“见风使舵”将原文形象转换为中国成语常见的形象,等价传达出它的隐喻含义。

(10)Жить как кошка с собакой.

直译:像猫和狗那样相处。

转换形象:水火不容。

原文中有两个形象——猫(кошка)和狗(собака),但由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中对猫与狗的相处模式的认知与俄罗斯人民有所不同,不加以解释易导致误解。为使译文形式和结构最大程度接近汉语成语,将意象换为“水”和“火”——中国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意象,淋漓尽致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

(11)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

直译:七个保姆,孩子没人管。

转换形象:三个和尚没水喝。

相比之下前出自中国民间谚语,通俗易懂且富含哲理。归化策略在此更为恰当。

(12)Слова не воробей, вылетит не поймаешь.

直译:话不是麻雀,说出口再也飞不回来。

转换形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转换形象后的谚语出自《论语·颜渊》,指一句话说出去后四匹马也拉不回来,原文中的形象是麻雀(воробей),在汉语中不习惯把话比作麻雀之类似表达,转换原文中的形象,采用汉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单位代替。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尝试超越原文,正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提出的翻译观点——译作与原作竞争。出色的译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完全可以超越原文。

(13)Бросить жемчуг перед свиньями.

直译:对着猪投珠子。

转换形象:对牛弹琴。

这个成语中有两个意象——猪(свинья)、珠(жемчуг)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缺省,汉语读者不知道原文隐含的寓意何在,若不加解释,容易产生理解偏差。对牛弹琴是人尽皆知的典故,它的讽刺寓意也十分明确,转换原文的形象减少了文化认知的屏障。

(14)Гром не грянет, мужик не перекрестится.

直译:天不打雷,农夫不祈祷。

转换形象: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作者为避免出现“翻译腔”,故将原文的意象“农夫”以及与俄罗斯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信仰活动“祷告”换作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因素,补充了原文语义层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暗讽含义。

4. 异化指导下俄语成语汉译的具体翻译方法

4.1 直译法

顾名思义,直译即按照原文结构直接翻译成目标语,直译不仅要求译文忠实准确传达原文的“义”,而且要求保留“形”。俄语部分词汇的含义与汉语词汇意义一致,直接翻译即可充分传达出原汁原味,同时也易于为汉语读者所接受。示例如下:

(15) Москва не сразу строилась. 莫斯科非一日建成。

(16) Труд человек кормит, а лень портит. 勤养人,懒毁人。

(17) Дело мастера боится. 事怕行家。

(18) Челове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а бог располагает.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9) Капля в море. 沧海一粟。

上述例子表明,部分俄语词汇在语言和语义层面有完全对等的汉语词汇,此时只需要一一对应便可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信息,同时达到语义等值的效果。

4.2 等值对应法

与直译相似,但等值对应不是简单的逐词对应,而要确保译文内容结构和词汇与原文等值,即在汉语中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言单位,虽然汉语和俄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各异,但人类文明具有共通性,对客观世界某些物质及现象有相近的认知与类似感受。对应法可以实现译文与原文对等。费奥多罗夫针对惯用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针对一种语言的惯用语,我们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与之意义相对应的惯用语来转换翻译,达到语意等值(吴克礼,2006)。

(20) Тише едешь,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

直译:越安静地走,走得越远。

等值对应:宁静致远。

在汉语成语中可以找到与原文对等的表达,直接运用汉语中词汇的表层含义和隐喻含义与之近似的俗语、谚语等成语。

(21) Делу время, потехе час.

直译:工作有时间,娱乐有时间。

等值对应:工作娱乐,各有定时。

这个成语意在劝诫人们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的同时要兼顾休息,学会适当放松。直译译文、复杂,无论是形式结构还是含义上都不符合成语的特点,按照汉语成语的构成方式译成结构整齐的四字格更地道,并且完整传达出原文思想。

(22) Герой не моего романа.

直译:英雄(男主人)不是我的爱情。

等值对应:不是我的意中人。

Роман 意为爱情、恋爱,原文要传达的实际含义为:英雄不是我喜欢的。如果直接对应翻译成汉语,译语显得啰唆且语义不通顺。为实现译文和原文语义层面最大程度对等,可在原文的基础上稍做加工,译为意义等值的汉语词组或短语。

4.3 仿作法

在翻译某些具有深刻文化含义的词汇时,如果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很可能传达不出其真正文化含义,此时译者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语中的“异质”成分,同时仿照译入语的语言结构和形式创作出新词。该方法既保证译文准确忠实地展现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又丰富了译入语语言词汇,有效地促进文化认同与包容。

(23) Язык до Киева доведёт.

直译:舌头能到基辅。

仿作:有嘴就能到基辅(有嘴走遍天下)。

基辅,乌克兰首都,罗斯时代各地的人经常徒步前往基辅朝圣、曾是留里克王朝的首都,因此享有“罗斯众城之母”的美誉。这个俗语自古沿用至今带有强烈的文化特色,如果采用归化策略会失去原文的文化意味,体悟不出原文的文化背景信息,保留原文的文化元素的同时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表述,使译语读者更好地感受异域文化。

(24) Незванный гость хуже татарина.

直译:没受邀请的客人比鞑鞑人糟糕。

仿作:不速之客比鞑鞑人还糟糕。

这个成语想表达客人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造访,打乱了主人原有的生活状态,主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儿开始打扫家务,东奔西忙招待客人。对于它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当年俄罗斯受制于金帐汗国,侵略者们随时都会闯入平民家里掠夺财富,抢走百姓辛辛苦苦劳作的食物等,鞑鞑人是金帐汗国的主体民族之一,因此,鞑鞑人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此处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概念,故采用异化策略。

(25) Дамоклов меч.

仿作: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个成语来源于古希腊文化,达摩克利斯以成为希腊传说中的重要的人物形象。狄奥尼修斯国王邀请得力大臣达摩克利斯参加宴会,命手下在他的座位上空用马鬃悬挂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来后吓得仓皇而逃。此典故象征安逸祥和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时时刻刻都有潜在的危险,应该慎独,提高警惕。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真实地在再现了该成语蕴含的文化典故,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

(26)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直译:人在套子里。

仿作:套中人。

这个约定俗成的短语源于契诃夫同名经典文学作品主人公别里科夫这个总是把自

已装进“套子”的形象,比喻生活中那些思想守旧、循规蹈矩、不肯改变的人。译者没有改变原文的形式,只是简单仿照汉语的结构造出了这个词,形神兼顾,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同时也促进了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

(27) Береги платье снову, а честь смолоду.

直译:珍惜新的裙子,珍惜年轻时候的名誉。

仿作:衣服要从新时惜,名誉要从小时惜。

译者考虑到汉语语言结构的特征,在保证译文准确达意的同时,模仿汉语诗句结构保证译文对仗,使其结构规整。

(28) Готовь сани летом, а телегу зимой.

直译:夏天的时候制雪橇,而冬天的时候制造马车。

仿作:夏造雪橇冬造车,闲时做好忙使用。

雪橇(сань)和车(телега)是俄罗斯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此处作者保留原文中的意象,翻译成结构工整的两句,符合汉语的语用规范,且生动传达出原文的寓意。

5. 归化与异化综合指导的翻译方法

俄译汉过程中不乏遇到此类现象:原语词汇中有一部分语言单位在译语中缺乏相应的表达,若直接翻译则导致译文传达的信息不完整,若采用意译则会失掉原语的语言特色和风格。为争取译文在信息功能上与原文最大限度等值,需要译者调动自身主体性,结合相应的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直译加注释、增译等方法,进行翻译补偿,对信息转换过程中失去的语义成分进行补偿,合理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

5.1 直译+注释法

受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影响,俄语中一部分词汇来自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等,这些词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独具民族特色。但语际转换时,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等值或近似的表达。此时,需要通过查证词汇的来源、构成、文化背景信息等。无论从成语的语义还是语体出发,都要考虑译文能被汉语读者接受,准确把握俄语成语的文化特征,在汉语里找到词汇含义最贴切俄语原文的词。此外,对缺少的信息需加以补偿,在注释中体现,既留原文的“形”,又不失其“味”。举例如下:

(29) В Тулу со своим самоваром не ездят.

译文:带着茶炊去图拉(多此一举)。

图拉,俄罗斯城市以盛产茶炊闻名。如果中国读者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了解茶炊在图拉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更不会联想到该成语的喻义。对该谚语的内在含义进行解释,使读者恍然大悟。

(30) Демьянова уха.

译文:杰米扬诺夫的鱼汤(比喻死乞白赖地乞求别人接受的东西)。

这个成语出自俄罗斯著名寓言家克雷洛夫的同名寓言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杰米扬的人热情款待邻居菲卡的故事。杰米扬知道菲卡喜喝鱼汤,他煮了一大锅汤,特意邀请菲卡来家中喝鱼汤,一个劲儿让他喝鱼汤,最终菲卡只好收拾东西落荒逃离,并决定不踏进杰米扬的家半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东西固然好、心意固然足,但对他人好也得张弛有度,学会适可而止,不能把自己的意志过分强加给别人,反而会招致讨厌。逐词逐句翻译过来后该成语在发音、结构等方面都忠实于原文,但其背后蕴含的隐喻意义却难以知晓,加注释后其意义会更加明确。

(31)Казанская сирота.

译文:喀山弃儿(装可怜的人)。

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成语,如果不加注释,则无法感受它背后隐含的讽刺意义,也丧失原文感情色彩。

5.2 意译+增译法

译者以原文上下文的意思、逻辑为依据,结合译文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在转化过程中增加原文字面没表现出来但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增译不局限于增加词、短语、句子来实现,有时候也可以增加言外之意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实例如下:

(32)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

直译:放下袖子。

意译+增译:干活马马虎虎。

这个成语看似结构简洁,但它来源于俄罗斯民族历史,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含义是马马虎虎,但只有真正了解它的文化来源才能恰当理解这个词的语内涵义,俄罗斯的传统服饰袖口长而宽大,劳作过程中如果不卷起袖子则很难干活儿,如果有人放下袖子那么就意味着他干活儿不卖力,想偷懒。若直译为放下袖子,则失了原文表贬义的隐喻意义。

(33)Засучив рукава.

直译:卷起袖子。

意译+增译:撸起袖子加油干。

Засучив рукава(撸起袖子)与“马马虎虎”对应,如果谁将袖子卷起来干活,那就意味着干活卖力,比喻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汉语里也有类似的表达“撸起袖子加油干”。可见,文化是相通的,持不同语言的民族对一部分普遍的现象和活动有共同的认知。

(34)Пальца о палец не ударить.

直译:手指也不会碰手指的。

意译+增译:不采取任何行动;毫不出力。

该成语形象生动描绘出一个人的状态:手指头都懒得动。但直译“传形”不“传意”,为表达出某人袖手旁观的态度,此处采用意译,同时增补了感情色彩。

6. 结语

成语彰显了本民族的语言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于一体。俄语成语吸收了民间谚语、俗语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词组。其来源广泛,有的出自古斯拉夫语,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有的与宗教事务息息相关,还有许多成语产生于人民日常生活和劳作。许多谚语俗语民族特色鲜明,需深刻发掘其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正确理解。译前必须做足功课,借助相关词典、工具书、电子资源等查证成语的出处、类别、用法,仔细考证其隐喻含义,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指导之下,综合运用直译、意译、增词、减词、转写、编译等全译的翻译方法。如今中俄文化交流如火如荼,恰当使用翻译策略,正确理解俄语成语的含义,有助于广大俄语学习者深刻认识俄语成语在俄罗斯民族生活中的作用,体会其所折射的俄罗斯民族的特性。本文有针对性地将俄语成语翻译方法在归化、异化框架内进行梳理、总结。今后翻译实践中更应报以热忱的态度深刻钻研,提高双语语言能力,掌握双向文化知识,正确使用俄语成语,在实际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中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参考文献:

- 方梦之,2019.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修订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23.
- 林庆扬,2011.走进翻译:认知体验思索[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20.
- 王东风,2002.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5):24-25.
- 吴克礼,2006.俄苏翻译流派述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22.
- 张白桦,2017.翻译基础指津[M].北京:中译出版社:50.
- 张建华,赵文炎,2021.现代俄汉双解词典[M].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153.

作者简介

强田田,女,1996年11月生,甘肃陇南人,文学硕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在读,主要从事俄语翻译研究。

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0—2021年)^①

盛俊军



摘 要:藏族谚语是博大精深的中华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并富有哲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语言艺术之一。它是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智慧的传承载体。国内外对藏族谚语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及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这些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人类智慧的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还没有对这些译本的系统梳理。故此,文章拟就藏族谚语的英译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期反映其英译的整体互动情况,旨在丰富相关翻译史料,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藏族谚语;英语世界;译介

A Review on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Proverbs in the English World (1900—2021)

SHENG Junjun

Abstract: Tibetan proverb,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ast and profound Chinese proverb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guistic arts that are created orally by Tibetan working people and are rich i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Meanwhil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a vehicl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wisdom. Ther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concern about Tibetan proverbs at home and abroad, resulting in many research results and translations, of which the number of English versions is the largest. These translations have been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wisdom. However, there are some translations without systematic card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nduct a macroscopic surve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proverbs, with a view to reflect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of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which aims to enrich the relevant translation history,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藏族文化典籍译者研究(1959—2019)”(项目编号:20YJAZH139)的阶段性成果。

and help Chinese culture go global.

Key words: Tibetan proverb; English world; translation

藏族谚语(以下简称“藏谚”),藏语称之为“丹慧”“丹白”,是藏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并富有哲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语言艺术之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谢正荣,2019)。藏谚源远流长,从最早的古藏文《敦煌文献》中收录的三、四十则《松巴谚语》可知,藏谚早在吐蕃时期(633—842年)就已盛行,普遍应用(张家秀,1989)⁸⁰。国内外对藏谚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及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这些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人类智慧的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其翻译史进行梳理能够考察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概况,可以为进行相关深度研究提供资料参考(赵春龙等,2018)。然而,目前藏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故此,本文拟就藏谚的英译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期反映其英译的整体互动情况,旨在丰富相关翻译史料,全面反映其英译的宏观图景。百余年来,藏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1940年),滥觞阶段,译者多为国外来华的传教士,所译的藏谚大多出现在涉藏著作的相关章节或副标题;第二阶段(1941—1990年),初步发展阶段,译者以域外藏学家为主,译本规模不断扩大,单行本开始出现;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多元发展阶段,译本和译者多样化,国内学者加入了译者的行列,改变了只有外国人英译藏谚的局面。

1. 藏族谚语英译的滥觞(1900—1940年)

藏谚的英译主要伴随着西方藏学研究的推进和英国侵略西藏的进程而展开,西方藏学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西藏战败后被迫开放,大量的学者、传教士、英印政府的官员以及英国驻中国西藏的商务代办开始进入西藏,于是对西藏的研究才开始兴起(杜永彬,2002)。因此,19世纪以前西方对藏谚的英译寥若晨星,直到1900年弗兰克英译本 *A Collection of Ladakhi Proverbs* 的发表,才开启了西方英译藏谚的先河。从这个译本问世到1940年,藏谚的英译呈现几乎同样的特征:译者多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商务代表,翻译藏谚只是他们传播教义的副产品。译本均为规模较小的零星翻译,多在期刊上发表,或出现在涉藏著作的相关章节及副标题。底本主要为译者从民间搜集而来,底本语言主要是藏语及藏语的次方言。翻译方式主要为直接译自藏文。译本形式包括藏英对照、英译对照加拉丁转写等。这一阶段构成了藏谚英译的滥觞期。

1.1 弗兰克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00年,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刊登了德国著名藏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的 *A Collection of Ladakhi Proverbs*, 这是藏谚在英语

世界的首秀,该译本包含了51条拉达克谚语。为保留藏谚的风格、原文的比喻形象以及民族色彩,同时弥补藏英谚语语言中出现的文化空缺现象,主要采用直译加注解的翻译方法。每条谚语的编排方式如下:(1)拉达克语谚语;(2)发音(威利转写);(3)英语译文(4)适用场景,(5)拉达克语语法和其他方面的注释。纵观这51条拉达克谚语,不难发现,大多涉及当地的宗教、民间传说等内容,或与其想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有关;形式上,拉达克语谚语原文主要以两句谚为主,辅以少量三句谚、一句谚,译文上来说,大多将两句谚或三句谚整合为一句英谚。该译本激发了西方学者对藏谚的兴趣,为其域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1.2 谢尔顿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25年,美国乔治H.多兰公司出版了史德文(A. L. Shelton, 1875—1922)所著的《藏族民间故事》(*Tibetan Folk Tales*),全书涵盖了史德文在西藏旅行途中搜集到的49个藏族民间故事和49条藏谚。史德文1875年6月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1900年前后来中国西藏做了20多年的医疗传教士,备受当地的藏族人尊敬。

实际上,史德文译本是由其寡居的妻子弗洛拉编撰并出版的,她的翻译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快乐”(Shelton, 1925)。弗洛拉巧妙地将49个藏谚与对应的民间故事相结合,借民间故事来呈现谚语的真实含义,但事实上译本中的谚语与故事内容联系不大,或根本无关,仅有数条与正文意义相连(丹珠昂奔等,2003)⁸³¹。译本中虽无藏语原稿,但翻译的谚语完全符合英语谚语讲究音韵、文字优美和博彩传神的特点,押头韵、押尾韵的比比皆是,运用了比喻、对偶以及白描等大量的修辞,足见译者的文学功底。

1.3 麦克唐纳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31年3月31日,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在Folklore Enterprises上发表了*Tibetan Proverbs and “Good Sayings”*的文章,该文翻译了48条藏谚和格言,其中藏谚21条。麦克唐纳是1903年4月拉萨代表团的翻译,随后担任了大约20年的英国驻西藏商务代表。他也曾任瓦德尔(L. A. Waddell)的助理,以协助其研究西藏历史文化。

麦克唐纳译本中的藏谚是直接从藏语翻译过来的,主要来自农民随身携带的通俗手抄本、袖珍书和部分口述资料,彰显了实用性。形式上,这些谚语与西欧的民间谚语大致相同;至于为何只有英文译文,没有藏语原稿,这是因为译者是在西藏翻译这些谚语的,而他所收集的资料存放在印度,他无法给出确切的参考资料来源,因此其翻译的准确性或需置疑(Macdonald, 1931)。此外,这些谚语与瓦德尔所著的《拉萨及其奥秘》(*Lhasa and Its Mysteries*)一书中作为章节标题所收集的谚语是一个系列,并对其进行了补充。

1.4 A. F. C. 里得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34年,A. F. C. 里得(A. F. C. Read)的 *Balti Proverbs* 刊登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第7卷,该译本收录了15个最常见的藏语次方言——巴尔蒂谚语。A. F. C. 里得生卒年不详,资料很少。里得译本收录的15条谚语均为巴尔蒂语的拉丁转写和英语译文对照的形式,并未呈现原始的巴尔蒂语谚语,或许是为了简化起见,便于学者阅读。

2. 藏族谚语英译的初步发展(1941—1990年)

1942年,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出版了阿斯伯(Rev. Walter Asboe)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一书,这是域外首个藏谚英译单行本。随后的若干年,藏谚的英译仍以零散翻译为主,但较上一个阶段来说,译本的规模不断扩大,译本中英译藏谚的条数由几十条增加到近千条;译者身份多为域外藏学家;译本或在藏学著作中出现,或在藏学期刊上发表,翻译目的是为了助力藏学研究。

2.1 阿斯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阿斯伯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由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于1942年出版,底本为约瑟夫·格根(Rev. J. Gergan)所收集的1000条藏谚。阿斯伯是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于1939年来到拉达克传教,随后在摩拉维亚传教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阿斯伯译本为20世纪首个藏谚英译单行本,收录的所有藏谚均为藏英对照形式,按照藏文字母表分类,方便读者阅读查询。总体来看,收录条数多,共976条藏谚;注释多,对晦涩的短语进行了简短的解释,并直接附在对应藏谚英译的后面;内容涉及广,包括宗教和世俗等方面的内容,但其陌生的节奏和粗糙的文字结构表明这些“精辟的谚语”源自拉达克语,这归功于已故的格根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为后人收集和保存了拉达克这片迷人的土地上的智慧宝库(Dhondup, 1977)。阿斯伯译本传播范围较广,自1942年出版至今,再版了三次,分别于1976年在德里再版、1991年由 Tiwari's Pilgrims Book House 出版以及2004年在印度出版。

2.2 托马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57年,印度学家和藏学家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8—1956)的著作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在柏林出版,书中第五部分翻译的就是我国敦煌千佛洞中的古藏文文献中完整保留的谚语,后来学者们将其称之为《松巴谚语》(*Sum-pa Mother's Sayings*)。《松巴谚语》这一名称来自这份材料的最末一句话:“伟大的松巴谚语终”。

托马斯译本收录的松巴谚语共76条,以罗马文字编辑、翻译和注释,依次分为四部分单独呈现:首先是对该部分的概括性介绍,其次是藏文底稿的拉丁转写,再次是对应的谚语英译,最后是注释部分。松巴谚语题材广泛,涉及内容广,用的都是九世纪藏文文字改革前的古藏文,晦涩难懂,因此作者加入了各类注释共计105条,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正文;但注释与正文不对应,导致阅读体验不佳,普通读者恐难驾驭。此外,这些谚语具有浓厚的藏族特色,强调简洁而尖锐的表达,混用了明喻、对偶等各类修辞手法。

2.3 邓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61年,邓肯的著作*Love Songs and Proverbs of Tibet*在伦敦出版,书中第二部分翻译了大量的藏谚。邓肯·马里恩·赫伯特(Duncan Marion Herbert,1896—1977)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毕业于希拉姆学院。1921—1936年,担任基督门徒会在藏东地区的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居住在亚历山大市,担任藏语教师和翻译。

邓肯译本中翻译的藏谚,是译者1921—1936年作为传教士在居住的藏东地区收集的,涵盖了气象、农业、成就、幸福、道德、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共计672条,只有英语译文,无藏语底稿,注释短而少;事实上,这本书主要面向普通读者,但若附上藏语底稿,增加注释,那将会更有价值。邓肯译本的影响较大,意大利东方学家、印度学家和东亚研究学者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曾这样评价邓肯译本中的谚语部分:“与约瑟夫·格根牧师(Rev. J. Gergan.)所收集的谚语集相比,邓肯译本的关注度或许更高。”(Tucci,1963)

2.4 理查德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89年秋,理查德斯在*The Tibet Journal*上发表了*Selected Tibetan Proverbs*一文,囊括了148条藏谚。彼得·理查德斯(Peter Richardus,1952—?),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库马,是一名艺术史学家,主要研究南亚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的历史文化,1989年至今,理查德斯一直是独立研究员。

理查德斯译本的底稿源自加尔各答大学的藏语讲师保罗(Karma Sumdon Paul)和嘉登(Jampal Gyalsten)共同编辑整理的一份古藏语谚语清单,经转写后,翻译成英文。理查德斯认为藏谚中所呈现的这些表达,揭示古代藏族人民为生存而进行的普遍斗争。这些只有年长的藏族人才能记住的话,现在大概已经被废弃了。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况,许多有趣的藏族语言文化遗产亟须拯救,然后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被记录下来(Richardus,1989)。为了扭转这一趋势,译者从上面的藏语谚语清单中选出一部分译成英文。

3. 藏族谚语英译本类型的多样化(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者对藏学研究的日益关注,藏谚伴随西方藏学研究的兴起渐次产生多个外文单行本,其中德、法、俄、乌尔都及匈牙利等语种均有不同数

量的译本产生,但英译本数量依然遥遥领先:20世纪90年代产生3个译本,21世纪初期4个译本,总体来说,藏谚的英译呈现物理加速度的发展态势。在此期间,藏谚英译者身份渐趋多样化,教师、诗人作家等开始涉足其间,不再局限于藏学家,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人加入了译者的行列,改变了只有外国人英译藏谚的局面。

3.1 彭巴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6年,拉莫·彭巴(Lhamo Pemba)编著的 *Tibetan Proverbs* 由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出版,彭巴在书中简介部分提到了翻译目的:每个藏族人都应该有机会了解和热爱属于他们的东西。我希望这些谚语能给那些对藏族和藏族世界感兴趣的人以启迪(Pemba,1996)。彭巴出生于不丹,藏族,精通英语,曾在印度、英国和美国学习,自2004年以来,彭巴一直在美国工作。

彭巴译本包含了大量有关自然环境、哲学、轮回以及其他方面几千条的藏谚,主要以两句谚为主,三句谚为辅;形式上,所有的谚语均按照藏语字母表的顺序依次排列,且为藏英双语对照;此外,书中注释详尽,多达123条,所有的注释单独成一个章节,便于阅读。彭巴译本,不仅使藏族人民从书中丰富的谚语中受益,也使非藏族读者有机会从其英译和语境中感受藏族独特的文化。彭巴译本的传播范围较广,于2006年以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再度出版;2007年再度重印出版。

3.2 索伦森和库珀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8年,The Institute for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ndia Tibet 出版了索伦森(Per K. Sørensen)和库珀斯(Christoph Cüppers)编著的 *A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overbs and Sayings*,收集的谚语和格言共计10756条,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藏族谚语和格言集。索伦森是德国著名的藏学家,专门研究西藏和喜马拉雅的历史文化,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1994年至今,他一直担任德国莱比锡大学中亚研究的教授。克里斯托弗·库珀斯生卒年不详,但他对西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与索伦森共同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索伦森和库珀斯译本收录的藏谚和格言,主要基于近年来在印度和中国出版的12本小型谚语汇编,除此之外,他们还受益于一组由藏族作家创作的21部作品和另一组54部西方语言作品,这组西方语言作品几乎涵盖了1988年以前所有出版过的藏谚英译本,如阿斯伯1942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等。本书可分为3个主要部分:介绍性章节(共33页),包括一个简短的序言和导言(17页)两部分,导言对谚语的特点进行了简要的研究。然后是所使用的藏文资料清单,接着是二级文献的列举;主体部分(278页)包括10756条有编号的谚语和俗语,按照藏文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在每个条目的末尾,还注明了其来源;该书最后有一个详尽的词语索引,涵盖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162页)。索伦森和库珀斯译本特别有价值,一方面,将这些谚语收集起来可以更好地保护藏族文化;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备受现代化和西方

化的影响下,它可以帮助藏族人民加强民族认同感。遗憾的是,该书收集的所有谚语和格言只有藏文拉丁转写形式,没有原始的藏文,亦无对应的英语译文。

3.3 次旺和索伦森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9年,不丹廷布出版社收录了德国著名藏学家索伦森(Per K. Sørensen)和次旺(Tsewang Nidup)编著的《不丹的说法和谚语》(*Sayings and Proverbs from Bhutan*),该译本包括大量的不丹藏谚。次旺是一位藏族学者,生卒年不详,其翻译藏谚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此译本的特色如下:

首先,翻译过程来说,是由藏学家和藏族学者合作翻译,多元化的译者尤其是藏语母语者的加入在增加译文准确性的同时,赋予译本更多藏族文化的特色;其次,内容上来看,该译本收录了大量不丹藏区的谚语和说法,内容丰富多样,涉及面广;最后,形式上,此译本为双语对照译本,底稿为藏语方言跨境存在形式和重大变体之一——宗喀语,译文为英语。

3.4 哈斯尼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2004年,哈斯尼(Gulam Hassan Hassni,1955—2010)编著的 *Tamlo (Balti Proverbs)* 在巴尔蒂斯坦首府斯卡杜出版,出版社为 Shabbir Printing Press。哈斯尼是巴控克什米尔的著名学者、诗人、作家、广播评论员和剧作家,一生撰写了许多关于宗教和其他主题的诗歌和散文书籍,作为巴尔蒂斯坦人,哈斯尼对巴尔蒂文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哈斯尼译本中包含了900条巴尔蒂语和拉达克语的谚语,全书共387页。每条谚语都以藏文拉丁转写和乌尔都语书写,并附有简短的英文翻译和较长的乌尔都文解释。但是,历史背景和其他细节都以乌尔都语表述出版。这些谚语反映了拉达克人和巴尔蒂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有些谚语反映了伊斯兰教思想,而有些谚语则与藏族文学中的同类谚语相同。哈斯尼曾用以下方式表达了谚语的重要性:“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巴尔蒂谚语记录了藏语发展的较早阶段,并包含古老的发音形式,然而对其的保护和搜集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了解到巴尔蒂谚语面临的处境,哈斯尼走遍了整个巴尔蒂斯坦,收集并翻译了这些藏谚。

3.5 万玛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2012年,Boston Wisdom Publ出版了万玛(Pema Tsewang Shastri)的 *Like a Yeti Catching Marmots: A Little Treasury of Tibetan Proverbs*,包含108条传统的藏谚。万玛是前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曾担任波士顿藏族协会董事会主席;他出版了许多藏文书籍,包括诗歌、小说和非小说。

万玛译本共176页,收录的谚语均按照藏语原文、英语译文以及使用场景的说明排列。这些谚语的来源广泛,一部分来自译者母亲达娃(Dawa)的口头训诫,另一部分则

归功于译者收集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等国的藏谚。此外,万玛在译本的前言中提到了翻译目的:一是向非藏人介绍藏族的民间智慧,二是鼓励和启发年轻的藏人去认识这一独特的藏族表达艺术。

3.6 国内译者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国内译者翻译藏谚的成果颇多,已有 75 本单行本,但多为汉译本,英译本仅有两本,分别出版于 2016 年和 2019 年。2016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西波·谷玛和陈淑娟合译的《盐源藏族谚语》(*Yanyuan Tibetan proverbs*),该书是一部记录四川省盐源县及木里县的大坝乡、后所乡、桃巴乡、鸭嘴牧场和恰尔牧场等地培米藏族的谚语以及现今在培米藏族民间流行的部分故事和传说。书中收录了诸多谚语,每条谚语采用国际音标注音,汉语、英文对译的形式,对文化背景和特别用词方面的解释。

2019 年,斋林·旺多的《藏族谚语藏英对照》(*Tibetan Proverbs in English*)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旺多出身江孜贵族,新中国成立前曾去印度留学,1953 年从圣约瑟夫学院毕业后回国,开始从事教学、翻译等工作。旺多译本中收集了他近年来在教学、翻译等工作中搜集的藏谚,共计 600 条,均为藏英对照形式;此外,对于晦涩难懂的部分,增加了注释,可读性强。事实上,该书原本收录 638 条藏谚,后来为了保证出版的质量,旺多先生重新审校后,剔除了 38 条过于浅显且听起来不像是藏谚的条目。总体来说,国内的两个藏谚英译本,译者以藏族学者为主,就翻译过程来说,既有独立翻译,又有合作翻译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旺多译本出版最晚,但已被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收藏,传播到英语世界。

4. 结 论

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由国外译者完成的居多,国内译者参与度不高。二是译本规模扩大,收录谚语的条数不断增加。三是藏谚各译本之间多有互动,共同构成了其英译史的宏观互动图景。四是就翻译过程而言,包含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两种翻译形式。五是沿着两条脉络展开,其一,在西方藏学著作中出现,或在期刊上发表,这些翻译往往是零散翻译,最早可追溯到 1900 年,并且此条脉络一直延续至今;其二,以单行本问世的藏谚英译,这些译本渐成规模,部分译本收录的藏谚条数多达万条。经过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大力推介,藏谚在英语世界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仅就目前的情况看,藏谚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还仅局限于藏学领域,依然有很大的推广空间。此外,国内译者的参与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且,国内对现有英译本的研究不甚充分,这就需要国内学者致力于对藏族谚语的外译研究和翻译,推进文明互鉴、鉴往知来,增进理解认同、促进民心相通,以期互鉴共赢(佚名,2021)。

参考文献:

- 丹珠昂奔,周润年,莫福山,李双剑,2003.藏族大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
- 杜永彬,2002.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管窥[J].中国西藏(中文版)(4):46-47.
- 谢正荣,2019.从藏族谚语解读犬非藏族图腾[J].西藏研究(4):154-160.
- 佚名,2021.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儒学》创刊发布会
在京举行[J].国际儒学(2):162-163.
- 张家秀,1989.藏族谚语略谈[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80-86.
- 赵春龙,李正栓,2018.《萨迦格言》外译史考察:以捷译史为例[J].民族翻译(4):52-59.
- DHONDUP K,1977. Review of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J].
The Tibet Journal, 2(1):85-86.
- MACDONALD D,1931. Tibetan Proverbs and "Good Sayings"[J]. Folklore, 42(1):
82-85.
- PEMBA L, 1996. Tibetan proverbs: Bod kyi gtam-dpe[M]. 1st e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RICHARDUS P,1989. Selected Tibetan Proverbs [J]. The Tibet Journal, 14(3): 55-71.
- SHELTON A L,1925. Tibetan Folk Tales[M]. New York:George H. Doran Company:Ⅷ.
- TUCCI G,1963. Review of Love Songs and Proverbs of Tibet[J]. East and West, 14
(3/4): 282.

作者简介:

盛俊军,男,1994年2月生,陕西白河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乱译、胡译、滥译再探

袁斌业



提 要:关于胡译、乱译、滥译,迄今国外有关研究未几,而国内部分相关学者在界定这些术语时欠严缺密、与翻译实践和译文接受实况有牴牾。本文认为,乱译和胡译重叠颇多,辨清甚难,可以把二者合一称之为胡乱译。以下三种情况属于胡乱译:第一,译文违背语言表达规则、错误百出的翻译;第二,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科学知识等的翻译;第三,造成严重后果的翻译。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错误百出、质量低劣、违法侵权的翻译就是滥译。同时本文提出用“随译”指称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经历史检验在译入语文化构建中起到积极作用的翻译。

关键词:乱译;胡译;滥译;随译;再探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Revisited

YUAN Binye

Abstract: So far few studies have been made by foreign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regard to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ver the issues, but they are ill-defined, as they do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truth of translation and its recep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and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can be combined as huluanyi as it is a tough task to make a clear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them. Huluanyi are those translations which are lexically, gramma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 incorrect, which go against objective fact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which have incurred serious consequences,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refers to those badly, quickly and voluminously produced versions which appear in a short time and those that violate the copyright law. The author suggests a new term *suiyi* to include part of what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by some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uncontrolled tra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suiyi; revisited

1. 引言

乱译、胡译、滥译是跨文化交际中常见的语言转换现象。如何界定这三种语言转换现象?国外学者如 Mona Baker(2004)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和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2004)的《翻译学辞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都没有专论这些现象,后者的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稍有触及(Shuttleworth et al., 2004)¹⁹⁷⁻¹⁹⁸,而我国学者对以上语言转换现象很早就有论及,近年则有较多的研究(吕冀平,2000;方梦之,2004;方梦之,2011;杨晓荣,2008),但其中有些看法还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探究,本文就为此目的而写。

2. 关于乱译、胡译、滥译的现有界说

乱译、胡译和滥译应该是与人类翻译活动相伴而生。佛经翻译时期,慧远在《大智论钞序》中所说的“简烦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大致就是针对类似乱译、胡译和滥译而说的。在现代,鲁迅可能是最早明确地提出“乱译”这个概念的学者。在1931年12月发表的《风马牛》一文中,鲁迅把赵景深先生译 the Milky Way 为“牛奶路”称为乱译,在1935年4月发表的《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鲁迅说,“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这是鲁迅针对节译、误译和宁顺而不信的翻译而说的,因此,在鲁迅看来,这些翻译就属于乱译。当代不少学者对“乱译”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讨论。杨晓荣(2008)²⁷³认为,信息传达方面不准确和语言方面不正确的翻译就是乱译、胡译。吕冀平(2000)²⁴⁰⁻²⁴⁶把直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等方法的翻译称为乱译。方梦之(2004;2011)的《译学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也收录了这三个术语。两本辞典对它们的解释大致相同。在方梦之看来,乱译(uncontrolled translation)是指在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驱动下,违背译德,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胡译(unrestricted translation)指的是指不按照原文、随心所欲地进行翻译,或因中外水平低,或因译德、译风有问题,或二者兼有。滥译(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一般指对原作不加选择的翻译。本来,翻译作品应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然而由于有的译者态度不够严肃,选择所翻译的作品不慎重,以及某些出版单位的单纯经济观点,迎合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等原因,以致翻译出版了一些平庸的、甚至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外国作品;(2)也指乱译。

鲁迅提到的乱译是针对我国当时翻译界存在的随意增删、理解上粗心大意、表达时撇开原文追求通顺流畅的翻译现象而言的,在当时对于遏制这些翻译现象在译坛的泛滥蔓延具有积极意义,杨晓荣提出的乱译胡译是提醒在译途起程的初学者如何避免这样的翻译,这样的告知是完全必要的,是一本翻译教程里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他们所指的乱译胡译这里不加以讨论。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其他学者提到的那种乱译、胡译、滥译。

3. 对上述部分论说的剖析

笔者认为,吕冀平教授和方梦之教授提到的乱译、胡译、滥译定义严密性似乎有所欠缺,与翻译实践和译文接受的实际状况扞格。

3.1 直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这样的翻译不属于乱译

关于这个问题,10年前,作者曾有专文讨论。当时作者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不可用原则来规范词语的引进;第二,同事同物异译并存可以丰富汉语的表现形式、有利于汉语择优选用;第三,不管是使用生造词、仿音译词等,只要社会大众接受就是合适的翻译,我们不能随意对一时读之拗口、听之逆耳的外来译语斥之为“污染词语”或“乱译、胡译”,否则,民族语言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袁斌业,2002),因此它们不属于乱译。今天,作者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近10年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仍然受到国人的欢迎,毫无显露减弱之势。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讨论生造词。下面我们讨论几个近年媒体频频出现的政经领域生造专有名词:金砖国家、南锥体共同市场、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

美国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的报告。2003年10月,该公司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经济报告。这两份报告所提到的BRICs先是指Brazil、Russia、India、China(2010年12月South Africa加入后包括南非)的英文头字母缩写。由于这个词与英文中的brick(砖)类似,因此,2010年12月之前国内的媒体都把它译为“金砖四国”,后来,为了避免世人特别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曲解,我国外交部先是将BRICs译为“基础四国”(赵念渝,2010),但后来外交部发言人使用更多的是“金砖国家”,当下我国媒体也是普遍使用后者,而非前者。

还有“南锥体共同市场”这一译语。“南锥体”的英文是Cone South,这是指南美洲大陆的形狀,特别是下半部,呈现一个倒悬的尖尖锥体,指南极,这就是南锥体。在政治经济方面,“南锥体”特别指南美洲大陆南端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加上巴西的南部几州和巴拉圭东南部地区。

1991年3月26日,这四个国家的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the Treaty of Asuncion),宣布在1994年12月31日建立由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也称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英文是 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or MERCOSUR(Mercado Commun de Sur)。

从各种媒体上我们还可以读到“迷雾四国”(MIST)和“金钻11国”(Next-11)。前者是墨西哥(Mexico)、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韩国(South Korea)和土耳其(Turkey)的英文首字母,后者则是除上述“迷雾四国”外,还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伊朗。

以上“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南锥体共同市场”“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都是我国译者造出来的词。这是因为,BRICs先是四个后来五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我国译者看到其与英文单词 bricks 类似,就联想到其汉语对应词“砖”,同时他们又联想到黄金市场上的“金砖”,这样,他们先把 BRICs 译为“金砖”,然后用一个总括词译出这几个国家;“迷雾四国”(MIST)也是如此。外交部早期把 BRICs 译为“基础四国”和有媒体把 Next-11 译为“金钻11国”在创造方面走得更远,因为 BRICs 跟“基础”和 Next 跟“金钻”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初期译名“金砖四国”,还是后来外交部的“基础四国”、各媒体的“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其实它们都属于造词。“南锥体共同市场”与其英文也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是按照“共同市场”国家形成的地理形状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

如果按照生造的词都是乱译胡译,那么,以上这几个专有名词也都归属其中之列,但是,它们时下经常出现在我国各种媒体中,甚至出现在我国外交部的正式文件中(赵念渝,2010),这就不可能让我们认同它们是乱译或者胡译了。

有些翻译进来的专有术语或普通词语曾被有关学者斥为乱译胡译,如政经专有术语方面的“欧佩克”(译自 OPEC)、“首席执行官”(译自 CEO),等。陈忠诚等(2000)曾经批评说,“欧佩克”的翻译是一种多数人无法理解、令人莫名其妙、违反译事客观规律的“倒退”;周学艺(2000)指出,CEO(Chief-Executive Officer)被国内媒体普遍译为“首席执行官”,公司哪来的“官”呢?其实是大公司的“总裁”或“总经理”。普通词语方面的有“声称对……负责”(译自 claim responsibility for)、“软币”(译自 soft money)、“描写”(如“对翻译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其中的“描写”译自 describe),等等。张经浩(1996)认为,以上几个词语的汉译是一种“不求甚解”“用词不当”“生吞活剥”的死译。从张先生全文的讨论看,他所说的“死译”其实就是指乱译或胡译。以上学者们的分析和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它们现在已在国人中广泛使用,谁还会把它们当作乱译或胡译?

3.2 “在个人或小组利益的驱动下”的翻译不一定是乱译

“在个人或小组利益的驱动下”的翻译不一定是乱译。只要这种翻译不违法犯纪,不偏离译德,能激起我国读者对外国文化的兴趣,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他们了解异国文化甚至本国语言文化,它就不是乱译。严复、林纾等20世纪初期翻译家的翻译与他

们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里我们仅以林纾的翻译为例。林纾后期的翻译被钱钟书认为是“造币厂”(钱钟书,1964),换言之,林纾后期的翻译完全是在个人或合作者的利益驱动下而为之,尽管林纾与其合作者的翻译受部分学者所诟病,但受到多数读者的喜爱,其中就包括钱钟书先生。他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有味地阅览。”(钱钟书,1964)郭沫若(1997)在谈到少年时期的读物时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 Haggard 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我国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周作人(2002)在谈到自己学习国文时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商务印书馆 1924 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张俊才,2007)。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施蛰存(1990)在谈到文学翻译的影响时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林纾翻译是乱译吗?

3.3 “违背译德,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不好界定

首先,“违背译德”不好界定。方梦之(2011)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对“译德”的解释是“翻译道德或译者的职业道德,体现在志趣、责任感和品德三个方面:(1)对所从事事业的志向和兴趣往往表现出译者的使命感,译者的选题方向应有利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译者应是世界文明种子的播种者,而不是精神鸦片的贩卖者,译者应当树立高尚的选才志向,摆正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2)‘以译者所负的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其有真正译家的资格。’;(3)译者的品德须是高尚的,不能为私利而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在外国友人和商人面前要自尊、自重、自爱;不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译者应通过出色的工作来促进中外双方的真诚合作。”方教授这里所说的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要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称为“有译德”,恐怕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找出具有这样“译德”的译者。严复作为一个译者的使命感估计不会有人怀疑,他的选题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不会有人质疑,但他没有对原著者负责,他和出版商因为译作的版权问题而发生纠纷(皮后锋,2003)³²³。他在翻译《法意》过程中还故意地把“人类的法律”译成“王制之法典”、以“拂箴”译“法兰克族”,有时以“景教”译“基督教”等(皮后锋,2003)³⁴⁸。林纾把英国小说家葛哈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

小说 *Montezum's Daughter* 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 *Old Curiosity Shop* 译为《孝女耐儿传》，英国人在家庭成员关系中并不讲究什么“孝”，这是林纾凭着自己的喜好添加。我们能据此就说严复林纾没有译德吗？显然不能。

其次是“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不好界定。我们通常是通过译者的译文来判断他(她)是否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和充分地理解原文。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译者是否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和表达前的充分理解。众所周知的是，林纾在翻译之前，缺少必要的语言准备和其他方面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译程中有大量的误译、篡改、删减等，如 *David Copperfield* 第一章描写来家里接生的医生，原文用了近 130 个字描写医生的性格，生动富有情感，而林纾只用“医生平惋不忤人亦不叱狗”这十一个字将其概括出来。林纾的另一个译本《魔侠传》(即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在内容上仅仅是原文的三分之一，还有他那些眼花缭乱的译名，这些能算是乱译吗？如果说这只是百多年前的翻译，其实今天也有类似的翻译，以现在的影视片名翻译为例。时下很多影视剧名的翻译让人眼花缭乱。把 *Singing in the Rain*、*Anna Karenina*、*The Quiet Man* 分别译为《雨中曲》《安娜·卡列尼娜》《沉静的人》就是很好的译名。但有人将它们分别译为《万花嬉春》《浮生一世情》《蓬门今始为君开》。我们如何判断后一种翻译？我们能说译者“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吗？肯定不能。这些译名是译者经过对影片内容的斟酌、观众的喜好和译者需要达到目的的综合考虑后才给出的译名。

3.4 对“滥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方教授关于滥译的定义有两方面的内容，因为其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指乱译，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其第一方面的内容。在方教授看来，翻译低级趣味、内容平庸，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作品就是滥译，至于哪些作品属于“低级趣味、内容平庸，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方教授没有提到，我想应该是指那些描写色情、凶杀的作品。对于充满凶杀场面的作品，我们比较好判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译者不去碰它或者有关部门禁止翻译出版就是了。但对有色情描写的译作，则应当具体分析。首先，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在褒评的时期，翻译该作品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选择，而在贬评时期，翻译该作品就是滥译，或者选择不慎重。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的 *Lady Chatterley's Lover* 充满大量的色情描写，有些描写还相当露骨，1928 年出版后在英国、美国、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部“腐化读者心灵”的淫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它的经典作品地位才慢慢得到确认。如果中国译者在改革开放以前翻译该作品，肯定会被认为“态度不够严肃，选择所翻译的作品不慎重，以及出版单位的单纯经济观点”，但现在翻译该作品不会受到如此的指责，不会被认为是滥译；其次，任何包含有这方面描写的作品，无论描写是详是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对此责任不在译者，而在于相关部门的监管是否到位；最后，“迎合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不好判断。如对 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性描写，有人会认为这对于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劳伦斯小说中的性主题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有人可能只会从感官愉悦的角度去欣赏这些

描写,正如鲁迅在划分《红楼梦》的读者群体时所指出的那样,“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2014)。所以,关键是从什么视角看待这样的描写。对何为滥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 三概念的重新厘定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现阶段对乱译、胡译、滥译的界定周密度有缺,漏洞颇多,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这些概念。

4.1 乱译和胡译的重命名、重新定义及其表现

从以上方教授的定义看,乱译和胡译难以严格区分,我们可用胡乱译来统称那些类型的翻译。

“胡、乱”在汉语里是贬义词,与动词搭配使用,表示可以带来消极甚至有害结果的行为。在翻译中,任何偏离原文的翻译都不能确保两种文化进行真实充分的对话交流,所以,把违背原文的翻译看作消极有害的翻译并没有错,但这种消极有害有程度之分,范围之别。损害程度一般、局部的仅仅是造成文化误读的翻译可以排除在胡乱译之外,而那些损害程度严重、造害广泛的翻译可以归入胡乱译。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情形可以归入胡乱译之列。

第一,才疏胆大,导致译文违背语言表达规则、拼写、标点等方面错误百出的翻译就是胡乱译。这里的“才”是指必要的语言素养、跨文化交际素养等方面的知识。有这些方面的欠缺,但却大胆操刀上阵。商正(1995)曾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英文宣传册上的拼写、标点、语法错误提出批评,这种胡乱译目前在企业、政府机关的对外宣传手册中非常普遍。广西桂林某旅游企业向中外游客散发印有下列中英文介绍的旅游宣传册:

龙胜旅游总公司(旅行社)是龙胜经营旅游的企业,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有英、日、粤、国语等语言导游,经营温泉、龙脊梯田、花平原始森林探险、南山牧场狩猎及瑶、侗、壮、苗民族风情游览,同时承办会议及各种专业旅游,实行宾馆、用车一条龙服务。服务上乘的温泉宾馆内设餐厅、商场、停车场、卡拉OK歌舞厅、录像厅、桑拉按摩,有高档(鸳鸯池、彩电、席梦思)及中档床位(带卫生间)、沐浴温泉、一流享受,舒适、方便。另有龙胜特产销售,如香菇、木耳、猕猴桃,多种野味及有特效功能的罗蓝茶、蕨菜等。

THE TOURISM IN LONG SHENG

Longsheng Travel Service is a unique enterprice who mangage the tour.
Our company with well-trained managerial personnel and tour guides

speaking English Japanese and cantonese dialect. It's manage the tour include the Hot Spring, LongJi terrace, Huaping primeval forest exploring, NanShan grazing hand hunting, Yao、Dong、Zhuang、Miao national cunstoms and difference profesion tour. In Hot Spring hotel. It has karapke dinning-room, shopping store, bus stop, dancing hall, vidio hall and massage.

Local specialties are many in Longsheng: mashroom, bamboo shot, LuoLan tea, pteridophyte, Yangtao etc. (以上原文用词、译文中的单词拼写、标点符号、措辞、句子结构均按照原样录自该手册)

以上译文中的错误对专业人士来说一目了然。

第二,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科学知识等的翻译就是胡乱译。前者的例子如几年前流传甚广的译 Menciu 为“门修斯”、译 Chiang Kai-shek 为“常凯申”。以下两例也是与客观历史事实相逆的胡乱译。

商正(1995)提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那本宣传册的译者把“春秋末年”译为“in the late Cun Qiu Dynasty(476 B. C.)”;把“吴王夫差在此冶铜铸剑”译为“Wu Wang Fu used to smelt copper and make sabre here”;把“六朝古都南京”译为“the ancient capital of Liu Dynasty”;把“电视剧《唐明皇》”译为“TV film King of Tang Ming Dynasty”。

美国专门研究名作家传记的历史学者肯尼思·S. 林恩(Kenneth Schuyler Lynn, 1923—2001)在他的 *Hemingway* 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In the wake of his mother's death some thirty-six years later, Hemingway turned back to 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heron and tried to write a novel about it.”有译者把它译为“在他母亲去世 36 年之后,海明威又想起了那次苍鹭历险奇遇,并试图写一部小说。”外国文学专家杨恒达(1998)指出,这句话译文违背历史事实,句子开头的介词短语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随着大约 36 年以后他母亲的去世”。

违反科学知识等的胡乱译相当多。如有学者指出,把“Most call-box in London are on the STD system, which is now being extended to all parts of Britain”译为“伦敦的大多数电话亭装的是 STD 系统,这一系统目前正向全英国各地推广开来”是缺乏电话装置系统知识而导致的误译(李绍选,1998)。笔者认为,误译有可接受的误译和不可接受的误译,该译背离科学知识属于后者,所以,准确地说,该译应该是胡乱译,其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伦敦的大部分电话间都与用户的直拨长途系统联机,而该系统正向英国各地延伸开来。”

第三,造成严重后果的翻译就是胡乱译。经济活动中由于胡乱译而导致的赔偿官司时常见诸各媒体。以下两桩官司都发生在我国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一桩,2009 年,商人马木提与朋友在巴基斯坦投资做矿产开发生意。2009 年 12 月,他从当地矿产部门得到一份矿产开发报告。由于不是专业人员,无法确定矿产的投资价值,他将这份资料交给了某翻译事务所,要求翻译成中文。半个多月后,翻译工作完成。译文写明,该矿中

金含量达到 0.2%。也就是说,在一吨石头中,黄金含量就达到两千克。为了进一步探明矿产的投资价值,马木提自费邀请几家有投资意向的公司负责人,前往巴基斯坦考察。到现场后才得知,矿中 0.2%的含量不是黄金而白银。原来,在化学元素符号中 Ag 代表银,Au 代表金。译者错将 Ag 翻译成了黄金。法院审理认为,翻译对铜矿报告中至关重要的化学元素符号翻译错误,导致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对于造成的损失,翻译方应承担 60%的赔偿责任,赔偿马木提 6.8 万余元(<http://www.law-lib.com>,2010-10-22)。第二桩是乌鲁木齐市西北富来工贸有限公司为拓展业务,将公司的企业简介、产品范围等中文文字内容,交乌鲁木齐市某翻译公司进行英文、俄文翻译。翻译公司的译者在将西北富来公司的宣传材料译成英文和俄文时,将公司名称中的“富来”,俄文翻译为“来富”(音译),公司地址内容本是“金濠大酒店”,英文翻译为 Mianma Hotel(音译为“棉麻酒店”)。接到这样的译文,西北富来公司不得不取消原有的宣传计划,将某翻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除退还已付的翻译费外,并索赔 3 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费。

以下翻译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原文:株洲玻璃厂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行安装的第一个综合性大型玻璃企业。具有年产平板玻璃 260 万箱,压延玻璃 350 万 M²、钢化玻璃 10 万 M²,玻璃纤维及制品 2000 吨,中碱玻璃球 5200 吨的生产能力。

译文:As a national large size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of glass, the equipments of which is self-designed self-manufactured and self-equipped, capable of yearly producing 2,600,000 boxes of flat glass, 350,000M² of roll glass, 600,000 M² of toughtered glass, 2,000 tons of fibre glass and its products, 5,200 tons of medium-alikealine glass balls. (李际平,1996)(以上原文和译文用词和标点照录)

以上翻译除了语法方面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原文数量与译文数量的严重不符,是典型的胡乱译,其后果的严重性不难想象。

4.2 滥译的重新定义

对于滥译,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错误百出、低质量文本的翻译,或通过改动已有译文的个别措辞表达、侵犯已有译作版权的翻译就是滥译。据《深圳商报》2003 年 9 月 20 日报道,有译者在已有译文中每页改动 10 个字,3 个月内生产出 100 多部世界名著。近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叫龙婧的译者四年内翻译了 23 本作品,内容涉及文史哲政治经济等领域,另一位叫李斯的译者翻译出版了涉及 12 种外语总共 26 部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这些都是典型的滥译。

4.3 关于胡乱译和滥译中的积极成分

对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的翻译、那些被斥为“乱译”“胡译”“滥译”但经历史检验有积极作用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另找一个概括性比较强的术语来概括它们。用什么术语呢?笔者认为,“随译”可当此任。

“随”在汉语里的意思之一是“依顺、依从、依据”,即依据译者当时的所思所想进行翻译,它不一定是贬义词,与动词搭配使用有时可以表示积极的结果。类似于严复、林纾那样的翻译,无论它们与原文有多么大的差距,只要它们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不能斥之为胡乱译或滥译。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很多胡乱译和滥译都会在译语环境中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如果这些翻译是违法犯章的结果,那么,它们也属于胡乱译和滥译之列。

5. 结束语

关于乱译、胡译、滥译,国外有关学者迄今研究不多,而国内部分相关学者在界定这些术语时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提出可以把乱译、胡译合称为胡乱译,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它们具体表现,另外,也重新定义了滥译,并提出用“随译”这个术语指称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经历史检验起到积极作用的翻译。明确区分这些关键术语,是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完善我国译学术语体系,尽早形成含义清晰明确的译学术语系统有积极意义。关于胡乱译、随译,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如胡乱译、随译还有哪些具体表现,胡乱译、随译有哪些具体的积极作用,判断胡乱译和滥译中的积极成分有哪些标准,中西方译坛中胡乱译、滥译有哪些异同点,等等。冀望我国译坛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出现。

参考文献:

- 陈忠诚,吴幼娟,2000. 词语翻译丛谈续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76.
- 方梦之,2004.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2011.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91.
- 郭沫若,1997. 我的童年[M]//郭沫若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郭沫若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7-98.
- 李际平,1996. 对外翻译应严肃认真、力求准确:谈《湖南科技》的部分英译问题[J]. 中国翻译(3):20-23,37.
- 李绍选,1998. 浅谈翻译中的误译[J]. 中国翻译(4):23-25.
- 鲁迅,2014. 鲁迅文集:杂文集下[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吕冀平,2000.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皮后锋,2003. 严复大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钱钟书,1964. 林纾的翻译[M]//文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29.
- 商正,1995. 是翻译还是乱译[J]. 中国翻译(4):25-27.
- 施蛰存,1990.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杨恒达,1998.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读任晓晋等译《海明威》有感[J]. 中国翻译(3):55-58.
- 杨晓荣,2008.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袁斌业,2002. OPEC 音译名称和零翻译缩略语的广泛接受对引进外来语的启示[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100.
- 张经浩,1996. 不能提倡这种译法:也从 responsibility 的汉译谈起[J]. 中国翻译(2):47-48.
- 张俊才,2007. 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98.
- 赵念,2010. 从“金砖四国”看政治翻译[N]. 社会科学报,01-21.
- 周学艺,2000. 新闻媒体误译举隅[J]. 中国翻译(4):55-56.
- 周作人,2002. 我学国文的经验[M]//周作人. 知堂文集.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0-11.
- BAKER M, SALDANHA G, 200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SHUTTLEWORTH M, COWIE M,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作者简介:

袁斌业,男,1962年6月生,广西平南人,博士,广东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庄子》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张伟红



摘要:自 19 世纪末首次英译以来,《庄子》迄今已有 30 多个全译、选译、节译和摘译本,其中梅维恒和汪榕培的全译本分别为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西方和中国译本的代表。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分析两译本呈现的译者风格,并进而探讨二者风格差异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两译本形式类参数显示:梅译本难度略大于汪译本;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显示:梅译本语言灵活,注重原文文学色彩的传递,偏重归化策略,汪译本文笔凝重,注重庄子哲学思想的传播,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产生两译本译者风格差异的主要动因在于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及目标读者。

关键词:《庄子》;译者风格;语料库;动因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Translators' Style in *Zhuangzi*

ZHANG Weihong

Abstract: Since its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re are more than 30 complete, selected and abridged English versions of *Zhuangzi*, with Victor Mair's and Wang Rongpei's as tw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1990s. A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is built to analyze their translators'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al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ir's translation is slightly more difficult than Wang's; Mair's version is more flexible, emphas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original and adopting mostly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while Wang's is more dignifie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Zhuangzi*, and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translators' styles lie in their choic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purpose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argeted readers.

Keywords: *Zhuangzi*; translator's style; corpus; factors

《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重要典籍，现存 33 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记录了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也因其奇幻瑰丽的想象和汪洋肆意的文学特色而广受赞誉，对后世哲学、宗教、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英译始于 1881 年英国人巴尔福翻译的 *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迄今已有 30 多个英文全译、选译、节译和摘译本，其中梅维恒(Victor Mair)和汪榕培的全译本分别为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西方和中国译本的代表。梅维恒是知名美国汉学家，对于庄子哲学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1994 年翻译出版《庄子》全译本 *Wo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受到广泛好评，并于 1998 年再版。有学者认为，梅译本在文学性和通俗性方面都超过了华兹生(Burton Watson)译本(包兆会，2004)。汪榕培是我国著名翻译家，1997 年翻译出版《庄子》，是中国学者的第一个全译本，包括本书在内的 8 部汪先生典籍译著入选《大中华文库》，可见其译文质量之优。

西方世界的《庄子》研究主要聚焦于庄子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Mair, 1983)，*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Allinson, 1989)等相关论著相继问世，表明“英语世界对《庄子》日益重视以及对《庄子》研究的自觉化和多元化”(包兆会，2004)。国内学界《庄子》研究则视角多样，除哲学思想、文学特色研究外，《庄子》翻译研究也颇受关注。张伟红(2020)将国内《庄子》英译研究划分为综合性研究、英译版本历时研究、译者和译本研究、核心术语及特殊词汇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四大类，如徐来(2008)、姜莉(2014)、赵彦春和吴浩浩(2017)、朱舒然(2019)、殷燕(2021)等。然而，相较于《庄子》在中国哲学和文学史上的作用，其英译研究整体略显薄弱。在译者和译本研究中，知网统计数据显示，汪榕培、理雅各和华兹生的《庄子》翻译研究位列前三，如林琳和周桂君(2021)通过理雅各和汪榕培译本对比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意向性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表征问题；仇轶凡和李秀英(2021)分析了汪译《庄子》对实用成语的跨时空语境重构的策略及特点。专文对比研究《庄子》汪译和梅译只有一篇，庄少霜(2016)借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研究了两译本概念隐喻翻译策略的差异，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译者思维模式不同。

在已有的《庄子》译本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凭借文本中的个别例证，得出感悟式的结论，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几乎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分别代表中外高质量译本的《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为语料，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拟从形式类参数和特殊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入手，通过研究：《庄子》两译本的形式类参数呈现何种译者风格、语言类参数呈现何种译者风格、二者风格相同或差异的主要动因是什么三个主要问题，为《庄子》英译研究从方法论及中外译者风格对比等方面提供借鉴。

1. 语料库翻译学与译者风格

20 世纪 60 年代，语料库方法与语言学的结合为人文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学者 Mona Baker(1993)首次提出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用于翻译研究，

开辟了语料库翻译学的新领域。“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研究上的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本质的一种翻译学研究方法。”(王克非,2012)⁴ 相较于传统译学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通过量化数据直观呈现研究结果,研究更加客观确切,结论更具说服力。

译者风格研究一直是传统翻译研究的重要关注点。Baker(2000)将译者风格界定为一种“指纹”。胡开宝和谢丽欣(2017)认为译者风格(译者的翻译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应用等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2000年,Baker(2000)利用TEC(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翻译语料库研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不同译本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子长度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转述动词“say”不同形式出现的规律,描述了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从而开创了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此后,国内外学界也采用类似方法进行译者风格研究,极大地扩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如Bosseaux(2001,2006)、Olohan(2004)、冯庆华(2008)、刘泽权和闫继苗(2010)、范敏(2017)、侯羽和郭玉莹(2021)等。Saldanha(2011)认为,译者风格研究可分为“源文本型译者风格”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即黄立波和朱志瑜(2012)所提出的S型和T型译者风格研究,“前者主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表现原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而后者主要关注译者特有的表达方式。”(侯羽等,2021)本文研究视角为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

2. 研究方法

无论源语型还是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都主要体现在非语言特征和语言特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译本选择、翻译方法和策略、序、注等副文本信息;后者可细分为形式类参数、叙事类参数、语言类参数和其他综合类参数(黄立波,2018)。鉴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庄子》两译本中的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及其翻译策略。

形式类参数是指通过语料库索引软件直接可以呈现的或者通过简单计算就能得出的数据,此类参数“都是译者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其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应当是稳定的”(黄立波,2018)。

我们首先创建《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的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并为两个译本进行TreeTagger词性赋码,然后使用WordSmith 8.0软件自动获得两个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并计算出6字母以上词汇占比和词汇密度,同时利用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软件自动获取其易读性(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数据,如表1所示。

表 1 《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形式类参数

| 形式类参数 | 梅译本 | 汪译本 |
|--------------------------------|-------|-------|
| 标准类符/形符比 | 40.00 | 38.45 |
| 平均词长 | 4.43 | 4.30 |
| 6字母以上词汇占比(%) | 27.06 | 24.55 |
| 平均句长 | 17.40 | 16.79 |
| 词汇密度(%) | 56.06 | 56.65 |
| 易读性(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 | 66.04 | 67.15 |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形式类参数

类符/形符比是指某一文本中所使用的不同词语的数量与词语总数量与之间的比值。通常会以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STTR)作为衡量标准,比值越大,说明词汇多样性程度相对越大,难度也相对越大。本研究中《庄子》梅译本的 STTR 值为 40,略大于汪译本的 38.45,说明前者的词汇丰富度略高,难度略大。

平均词长是指某一文本中所使用词语的平均长度,本研究中梅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4.43,略高于汪译本的 4.30。在英语中,6字母以上的单词常认为是长难词,平均词长越长,长难词汇越多,文本阅读难度相对就越大。因此,我们进一步统计了两个译本中 6字母以上词汇占比,发现梅译本为 27.06%,汪译本为 24.55%,差异较为明显,说明前者用的长难词较多,进一步印证了其难度略大于汪文本。

平均句长是指一个文本中句子所包含词语数量的平均值,据此参数也可了解文本的难易度。统计发现,梅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17.40,汪译本为 16.79,均高于英语原创语料库 BNC(英国国家语料库)的 15.62(Laviosa,1998),反映了“显化”这翻译共性特征。

词汇密度无法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自动获得,需通过人工简单统计和计算得出,其公式是:词汇密度=实义词/词语总数 \times 100%。英语中的实义词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汇密度值越大,说明该文本所使用的实义词越多,其信息负载就越大,文本难度相对越大。本研究发现《庄子》梅译本和汪译本词汇密度没有明显差别,前者略低于后者,但均略高于 BNC 的 54.95,说明上述译本的信息负载量和文本难度均大于英语原创库。

易读性参数 Flesch Reading Ease 根据美国 Rudolf Flesch 博士的统计方法计算获得,数值在 0 和 100 之间,数值越大,文章越容易读,60—70 为标准阅读难度。本研究发现,梅译本和汪译本的易读分数分别为 66.04 和 67.15,亦表明前者较后者难度略大。

从上述语料库所呈现的形式类参数结果来看,《庄子》梅维恒译本整体难度明显大于汪译本,且两个译本难度大于英语原创文本,反映了翻译文本的共性特征——显化。

3.2 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

黄立波(2018)认为,体现译者风格的语言类参数主要包括外来词、文化特有项词、转述(报道)动词、连接词、代词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庄子》两译本文化特有项词的翻译策略。文化特有项词,也称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²³²。《庄子》是庄子本人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的凝结,其中包含了许多文化特有项词,下文分别探讨梅译本和汪译本中虚构人名及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

3.2.1 虚构人名的翻译策略

《庄子》一个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于通过寓言、重言、卮言等形式传递其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文中出现大量虚构人物,他们的名字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因此,翻译此类人名时,是采用音译转写还是阐释其深层含义?这是留给译者的一道选择难题。对此,梅维恒和汪榕培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例如: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德充符》)^①

Mair: Duke Ai of Lu inquired of Confucius, saying, “In the state of Wey there was an ugly man called Nag the Hump.” (“Symbols of Integrity Fulfilled”)

Wang: Duke Ai of Lu asked Confucius, “In the state of Wei there was an ugly man by the name of Aitai Tuo.” (“Signs of Complete Integrity”)

《庄子》中虚构了一系列“怪人”形象,这些人虽身有残疾,却有着迥乎常人的道德高度和人生智慧,如《德充符》中塑造的王骀、申屠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闾跂支离无脣、骯盎大癩,他们或跛脚伛背,或相貌奇丑,或脖上长瘤,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身体特征。例子中的哀骀它,陈鼓应(2016)¹⁸⁵注解为:“‘哀骀’,貌丑。‘它’,名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虚乌有之类。”此人虽然相貌丑陋,但却颇具个人魅力,男人跟他相处不舍离开,女人情愿做他的妾,甚至鲁哀公都请他做宰相。“正因为身体不完美的感知力会扭曲真理,所以,真理要求将追求知识转移到心灵上来。”(舒斯特曼,2011)⁷⁹在翻译这个虚构人物时,梅维恒将其归化为 Nag the Hump,译出了其名的字面含义,又老又丑且驼背,使读者听其名如见其面,从而达到原文想要传递的“形”与“德”的巨大反差,且尽量保留原文人名的文学创造特质;汪译本则采用音译,异化了一种声音符号,对译入语读

① 例句中画线部分为笔者添加,下同。

者却缺乏必要的意义传递。

基于自建平行语料库,我们通过更多检索(如表2所示)发现,对于《庄子》中假托的虚构人物,梅译本整体倾向于意译,注重解释人名的深层含义,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汪译本则混合使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更偏爱后者,往往利用音译传播异质文化,为目标语读者造成陌生感。

表2 《庄子》虚构人物梅译和汪译(部分)

| 虚构人物名 | 梅译 | 汪译 |
|--------|----------------------------|---|
| 叔山无趾 | Toeless Uncle Hill | Shushan the Toeless |
| 闾肢支离无脤 | Lipless Clubfoot Scattered | A man with club feet, hunchback and no lips |
| 甕盎大癭 | Jar Goiter | A man with a big tumour on his neck |
| 伯昏无人 | Uncle Obscure Nobody | Bohun Wuren |
| 无为 | Non-action | Wuwei |
| 无始 | Non-beginning | Wushi |
| 昆阍 | Dusky Gates | Kun Hun |
| 鸿蒙 | Vast Obscurity | Natural Energy |
| 泰清 | Exalted Purity | Taiqing |
| 少知 | Little Knowledge | Shaozhi |

3.2.2 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

《庄子》中包含大量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术语,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正如许国璋(1983)所言,“哲学著作的翻译家肩上负有完整介绍一种哲学体系的责任。他的责任超过翻译:他还必须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一种概念系统。”译者对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不仅鲜明体现其文化倾向和翻译风格,且能在一定范围内立言立解。在庄子思想中,“天”和“道”是其核心范畴,“作为哲学本体内容的天论和道论形成了庄子“并行的独特的形上学体系”(张敏,2009)。因此,本节着重探讨梅译本和汪译本中以“天”和“道”为代表的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管窥其译者风格。

(1)天。

“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冯友兰(2001)⁸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有五重含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庄子》全文中“天”共出现668次,其意义大致可分为五类:①天地万物,即自然界,经常与“地”“下”搭配出现,其他如“天倪”、“天钧”、“天籁”、“天府”、“天机”等亦含有自然之意。②自然,天然,没有经过人为干预的,即庄子所说的“无为为之之为天”(《天地》)。③事物的必然性,如“遁天倍情”(《养生主》)。此三者均为庄子对“天”的哲学理解。此外,该词在《庄子》中也有具体所指。④与“地”相对的“天”,如“天之苍苍,其正色邪?”(《逍遥游》)、“仰天而嘘”(《齐物论》)。⑤“天下”也可表示国家或王权。

通过语料库检索发现,《庄子》内篇中与“地”相对的“天”,即客观天空的概念,梅维恒和汪榕培均译为 sky;当“天”表示自然、天然时,两位译者也往往使用 nature 一词。然而,当“天”用以指代天地万物(尤其是“天下”),更多蕴含哲学意义时,两译本差异明显,梅译更倾向于使用 heaven,而汪译则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译为 heaven 或 world 等,如表 3 所示,《庄子》内篇梅译本使用的 heaven 远高于汪译本,而汪译本使用 world 一词的频率几乎是前者的近 7 倍。例如: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论》)

Mair: There is nothing under heaven larger than the tip of a downy hair at the end of autumn, but Mount T'ai is small. (“On the Equality of Things”)

Wang: There is in the world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tips of the downs of a bird in autumn while Mount Tai is tiny. (“On the Uniformity of All Things”)

这句话旨在论证庄子关于事物大小、多少等概念的相对论,“不要局限在感官认识上去比较事物表面上的数量差别,而要通过抽象思维去认识一切空间的大小都是相对的。”(严北溟,1981)。其中的“天”与“下”搭配,意为自然万物,梅维恒常将其译为“(all) under heaven”,而汪榕培则往往选择“in the world”表示。heaven 一词具有西方基督教色彩,被美国译者采用对等中国哲学的“天下”易为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但中国译者汪榕培则更倾向于使用中性的 world。选词的差异表现了两位译者的文化视角和身份差异,同时也体现了其翻译策略倾向,前者偏爱归化,而后者则更偏爱异化策略。

表 3 《庄子》内篇梅译本和汪译本“天”的翻译

| | heaven | world | Nature/natural/naturally | empire | throne | sky | others |
|-----|--------|-------|--------------------------|--------|--------|-----|--------|
| 梅译本 | 86 | 3 | 12 | 4 | 0 | 7 | 10 |
| 汪译本 | 53 | 20 | 14 | 4 | 2 | 10 | 19 |

(2)道。

“道”是中国道家思想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庄子》中的“道”与老子之“道”一脉相承,是其哲学本体,其含义复杂多变,可概括为四个层次:①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有时也被称为“大道”“至道”;②规律,方法;③道路;④言说。

1842年,儒莲在其《道德经》法译本中将“道”译成 way 之后,“道”在西方语言中的译文变得多姿多彩(刘乾阳,2012)既有人将其译为带有宗教色彩的 God、Spirit、way、the Way、the Providence,也有将其译为 Rule、Principle、Reason、Infinity、Nature、Existence,还有人认为上述任何一词都无法完全传递“道”本身的复杂内涵,因而将其直接音译为“Tao”“Dao”或“Tau”。梅维恒的《庄子》译本沿袭了此前华兹生等西方译者普遍采用的方法,将“道”译为“the Way”,而汪榕培则一脉相承冯友兰和林语堂等中国译

者的译法,将其译为“Tao”。两个译本的实义高频词表中,the Way 和 Tao 均排在第四位(梅译 341 次,汪译 411 次),梅译本充分考虑读者视域,注重译本的接受性,汪译本则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异域读者,考量更多的是词义的准确性和文化的完整性。例如: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

Mair: The Way has attributes and evidence, but it has no action and no form. It may be transmitted but cannot be received. It may be apprehended but cannot be seen. (“The Great Ancestral Teacher”)

Wang: Tao is a reality which has its substance, inert and formless. it can be transmitted by the heart, but not taught by word of mouth; it can be acquired by the heart, but not seen by the eyes. (“The Most Venerable Teacher”)

《大宗师》中这段话往往被视为庄子之“道”的经典定义,详细描述了其特性。梅维恒将“道”译为“the Way”,虽然该译法为许多译者采用,字面意思也跟“道”类似,但二者的文化内涵却迥然不同。The Way 在译入语文化中与西方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圣经》中的 way 常特指“基督的启示与救赎之路”(刘乾阳,2016),而“道”却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概念,庄子的“道”侧重个人精神的内省洞察,它可以指引人生,却绝不是至上的人格神所揭示的解脱之路。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曾表示,“希望终有一天,当西方读者读到‘道’时,不再理解成‘the Way’”。(郭薇等,2020)与梅译不同,汪榕培将“道”译为 Tao,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种文化陌生感,反而能吸引其兴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因为 Taoism, Taoist 已经被西方世界广为接受,Tao 等相关词汇也已成为主流英文词典的一项词条。

4. 译者风格差异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对梅维恒和汪榕培《庄子》全译本中形式类参数的语料库分析及语言类参数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发现:梅译本所呈现的译者风格表现为语言使用难度更大,文笔灵活,注重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倾向于归化策略;汪译本则难度较小,文笔凝重,更注重源语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播,倾向于异化策略。

两位同时代译者几乎同一时期产出风格相异的《庄子》译本,其动因主要在于二者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及目标读者。

4.1 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

译者的文本选择是译者风格构成的一部分。

作为美国知名汉学家,梅维恒翻译《庄子》主要是个人的主观选择,源于他对这部作

品的喜爱,“《庄子》无疑是最喜欢的中国作品……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是最想译成英语的作品。”^①(Mair, 1994)^Ⅱ在其译本的前言部分,他也对《庄子》极尽溢美之词,“奇怪精彩”“诙谐有趣”“把《庄子》主要当作文学而非哲学作品”,视庄子为文学家和“player”。于梅维恒而言,每次阅读《庄子》都能让他快乐放松,故而想把此书与他人分享,希望他的译文能让读者免受原文深奥术语的影响,尽情享受阅读世上最诙谐、最有趣的作品(Mair, 1994)^Ⅱ。

在中国,《庄子》首先被视为一部哲学典籍,其次才是文学作品,汪榕培亦持此观点,“《庄子》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顺应自然的社会观和汪洋恣肆的文学语言而为世人瞩目。”(汪榕培,1995)在谈及翻译目的时,汪榕培认为之前都是英美人的全译本,原文理解和气文连贯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他将近期国内庄学的最新成果融入译文中,主动肩负起“让《庄子》以真实面貌从东方走向西方”(汪榕培,1999)⁴¹的重任。当然,汪榕培译《庄子》也有个人因素,“我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己的思想理念。”符合他对自己“本色译者”的定位。但同时,他翻译《庄子》也是一种官方行为,“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我接洽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事宜,我接受了《庄子》的翻译任务。”(汪榕培,1995)显然,汪译本具有国家和集体的选择因素在内,更多承担的是中国哲学思想对外传播的任务。

4.2 翻译原则

由于梅维恒和汪榕培翻译《庄子》目的不同,分别注重传递原文的文学色彩和哲学思想,两译本的整体翻译原则也不尽相同。梅译本更加注重原文活泼灵活的文学风格,而汪译本则在保持译文流畅性及可读性的同时注重原文思想内涵的准确传递。

梅氏的整体翻译原则是尽量“贴近原文,避免意义模糊或译文蹩脚”,同时也“大胆采用新的表达方法模仿其古怪的写作手法”(Mair, 1994)^Ⅱ,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他对原作文学风格的尊重和模仿。梅译本借用《庄子》名篇《逍遥游》的主旨作为整部译作的主标题——Wandering on the Way,创造了一种唯美的文学意境,副标题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则强调了《庄子》作为文学作品讲故事和寓言的一面。梅维恒译本对原文文学风格的忠实传递突出表现在以英文韵文翻译书中的诗歌部分,注重传递中国传统文学的诗性特质。例如: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

Mair: Great knowledge is expansive;

Small knowledge is cramped.

Great speech blazes brilliantly;

Small speech is mere garrulousness. (“On the Equality of Things”)

^① 梅维恒引文均为笔者翻译。

梅维恒采用韵文形式,简洁明了,富有文学气息,跟他一贯强调的《庄子》原文风格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完美契合。

汪榕培《庄子》“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的就尽量直译,也就是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汪榕培,1999)⁴¹。此外,如果译文“可能出现词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用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所以,当同一个概念或术语在不同的行文中出现,“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汪榕培,1999)⁴²,例如“无为”在不同情况下就被译成 non-action, do not take any action, do nothing 等,反映出译者对原文哲学思想的准确把握。

4.3 目标读者

“翻译文本呈现模式与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的符合度,也是衡量翻译文本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王瑞等,2015)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读者:不懂汉语但对中国文学好奇或喜爱的英语读者,懂汉语或正在学习汉语的英语读者,说英语的中国籍读者”(Eoyang,1993)⁶⁸。梅维恒和汪榕培在翻译《庄子》时也充分考虑其目标受众,均为欧阳桢所提到的第一类读者,即普通的英语读者,比如汪榕培就明确提出,其译本“读者对象为西方的一般读者”(班柏,2018)。但两个译本由于出版单位、发行范围及体例安排不尽相同,所以在副文本及翻译策略上也使用不同的手段以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期待。

《庄子》整体风格活泼幽默,但文中一些哲学术语的意义却充满了流动性,给翻译造成一定难度。在处理此类术语时,两位译者都摒弃了文内注解的方式,因为“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或者作为脚注势必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朱舒然,2019)然而,梅译本由于主要受众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不甚了解的英语读者,其译文副文本信息内容和形式均远远多于汪译本,如前言详述庄子其人其书,附带古代中国地图,每章正文前增加译导语简介该章内容,文末详略不一、长达 38 页的术语表(包括人名、地名、术语典故)等。即便如此,许多注释由于篇幅问题无法在译本中呈现,梅氏在自己主编的 Sino-Platonic Papers 期刊开设一期专刊,撰文收录《庄子》全部注释内容,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阅。

相对而言,汪译本由于是原文、今译和英译对照,原文许多信息读者可以通过双语对比而增强其理解,故而其译本的副文本信息相对简单,主要是文末的“译名对照表”,共 21 页。此外,译者帮助读者理解的方法还包括在个别地方“加译了庄子的‘不言之言’和‘言下之意’”,以及在“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则采用了解释性的译法”,尽量减少明显的注释,因为这样“读者不必随时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汪榕培,1999)⁴²，“用译入语中的互文指涉,从而激活译文读者的知识、文化图式,以使读者产生深层共鸣,领略到《庄子》的艺术风采”。(马向辉等,2008)

5. 结语

通过自建梅维恒和汪榕培《庄子》全译本的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我们主要从语料库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入手,考察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呈现。从形式类参数来看,梅译本的语言难度总体大于汪译本;两译本语言类参数的语料库统计发现,梅译本文笔自由,注重呈现原作的文学性,较多使用归化策略,而汪译本则文笔凝重,重在中国哲学思想的传递,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两个译本所呈现的译者风格的差异的主要动因为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目标读者。此外,译本难度的差异也与译者的翻译方向,即译入和译出有关,王瑞和黄立波(2015)研究发现,“译入文本词汇丰富程度显著高于译出文本……译入文本比译出文本信息负载量更高”。

当然,欲更加深入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则需基于他们更多的翻译文本研究才能全面呈现,同时,《庄子》原文风格对译者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在这些方面未来有更多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班柏,2018.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39(6):3-10.
- 包兆会,2004.英语世界庄学研究回顾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1):76-86.
- 陈鼓应,2016.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敏,2017.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38(6):80-83.
- 冯庆华,2008.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 冯友兰,2001.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郭薇,辛红娟,2020.哲人译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路径探析: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外语与外语教学(5):139-147.
- 侯羽,郭玉莹,2021.《红楼梦》霍克思英译本翻译风格研讨:以语用标记语 I think 的使用为例[J].红楼梦学刊(2):190-211.
- 胡开宝,谢丽欣,2017.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J].中国翻译,38(2):12-18.
- 黄立波,朱志瑜,2012.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J].外语研究(5):64-71.
- 黄立波,2018.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反思[J].外语教学,39(1):77-81.
- 姜莉,2014.《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舒斯特曼,2011.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79.
- 廖七一,2000.当代西方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 林琳,周桂君,2021. 心智哲学视域下译者意向性的表征研究:以理雅各和汪榕培《庄子》英译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9(1):84-88.
- 刘乾阳,2012. 跨文化视角下《庄子》“道”的英译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 刘泽权,闫继苗,2010.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中报道动词及英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87-92.
- 马向辉,宫玉萍,2008. 互文策略与文化用心管窥:兼评《庄子》的两个英译本[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13.
- 仇轶凡,李秀英,2021. 功能语境视域下《庄子》实用成语英译探析——以汪榕培《庄子》为例[J]. 外国语文研究,7(1):102-112.
- 王克非,2012.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汪榕培,1995.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10.
- 汪榕培,1995. 《庄子》十译本选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4):59-63.
- 汪榕培,1999. Zhuangzi[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许国璋,1983. 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 国外语言学(1):1-18.
- 王瑞,黄立波,2015. 贾平凹小说译入译出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 中国外语,12(4):97-105.
- 徐来,2008. 《庄子》英译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严北溟,1981. 从道家思想演变看庄子哲学[J]. 社会科学战线(1):11-18.
- 殷燕,2021. 哲学家视野和致用型翻译:冯友兰英译《庄子》的副文本考察[J]. 中国翻译,42(1):120-130,191-192.
- 张敏,2009. 《庄子》内篇“天”论思想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9):91-94.
- 张伟红,2020. 《庄子》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途径与意义[J]. 外国语言与文化,4(4):125-132.
- 赵彦春,吴浩浩,2017. 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及译学思考[J]. 外语学刊(6):100-106.
- 朱舒然,2019. 论《庄子》的哲学翻译:以《齐物论》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51(1):96-108,160-161.
- 庄少霜,2016. 描写翻译学下《庄子》概念隐喻翻译对比研究[J].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5(3):111-114.
- ALLINSON, ROBERT E, 1989. 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 [C]//BAKER M, FRANCIS G, TOGNINI-BONELLI E.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33-250.
-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 translator[J]. *Target* (2): 241-266.
- MAIR, VICTOR H, 1983. *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IR, VICTOR H, 1994. *Wandering on the Way*[M]. New York: Bantam Books.
- BOSSEAUX C, 200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voice and style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J]. *CTIS Occasional Papers* (1): 55-75.
- BOSSEAUX C, 2006.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The Waves*[J]. *Meta* (3): 599-610.
- EOYANG E C, 1993.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AVIOSA S, 1998.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J]. *Meta*, 43(4): 557-570.
- OLOHAN M, 2004.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 SALDANHA G, 2011. Style of translati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in translations by Margaret Jull Costa and Peter Bush[C]// A. Kruger, K. Wallmarch, J. Munday.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C]. London: Continuum: 20-35.
- SALDANHA G, 2011.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Translator* (1):25-50.

作者简介:

张伟红,女,1974年10月生,河南郑州人,郑州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典籍翻译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唐诗中的引语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假象等值”研究

朱含汐



摘要:引语及其翻译一直是叙事学、文体学以及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鲜少有学者关注中国古典诗歌中引语的翻译现象。本文从文学文体学视角出发,探讨唐诗中引语的特点,并提出“三类五型”的分类方式。分析发现,在唐诗引语的英译过程中,“假象等值”现象不可避免,且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缺省部分的增译,引述动词的不当选择,引述方式的任意转换,引述范围的错误判断,以及诗人的陌生化创作与译者的改动。针对以上现象,笔者提出三种以文体对等为导向的翻译方法,以最大程度还原诗歌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引语;翻译;唐诗;假象等值

Deceptive Equivale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Speech Presentation of Tang Poetry

ZHU Hanxi

Abstract: Speech presentation and its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the major topic of narratology, stylistics and translatology, but only a few studies concentrate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yl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tures of speech presentation in Tang Poems and proposes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ree types with five modes”. It finds that “deceptive equivalence” is inevitabl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t mainly lies in five aspects: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 omission, the improper choice of reporting or quoting verbs, the conversion of speech modes, the conversion of the scope of speech presentation, and the change of defamiliarization. The author further proposes three stylistic-oriented translation methods of speech presentation, so that the aesthetic values and thematic function of Tang Poems can be best transferred.

Keywords: speech presentation; translation; Tang Poetry; deceptive equivalence

1.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引语逐渐成为叙事学、文体学以及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学界对引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文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关注仅有几例(黄国文,2002;李宏霞,2015)。然而,受汉英语言差异和文化习俗的影响,唐诗中引语的翻译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的文体风格。作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文学文体学重在探讨“作者如何通过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学习性和操作性,“适合引入翻译学科”(申丹,2002)¹¹。因此,本研究尝试用文学文体学理论探讨唐诗中引语的特点和分类方法,分析唐诗中的引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假象等值”现象,并进一步探索如何翻译才可以达到文体上的等值,以最大程度还原诗歌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2. 唐诗中引语的特点及分类

完整的引语包括引导句和引述内容,引导句由引述主语和引述动词组成。但对于受到严格的字数和韵律的限制的唐诗来说,同时呈现引述主语、引述动词和引述内容三个要素较为困难。笔者分析发现,唐诗中的引语在文体形式上主要有两个特点:引述主语的缺失和引述内容的省略。首先,中国古典诗歌讲求物我合一,叶维廉(2007)认为中国诗人受传统美学中的“虚以应物”的观物态度的影响,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存在现象之上。受此影响,唐诗中少见引述主语(通常由人称代词或名词构成),叙述主体多呈隐性状态,如“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等。另外,引述内容通常为对事件或感情的描述,由于字数较多可能成为累赘,所以诗人在创作时经常有意省略,尤其是在一问一答的情境下,诗人通常选择略去其一。

关于引语的分类,国内外学者争议颇多。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区分了“mimesis”和“diegesis”,即直接展现人物话语和用自己的言辞来转述人物话语。Norman Page(1973)将小说中引语的表现方式系统地分为8类。Leech和Short(1982)将人物的言语和思想进行区分(但表达言语和思想的几种引语形式完全相同),根据叙述者的控制程度将引语分为: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赵毅衡(1987)将中国文学中的引语分为直接式与间接式;引语式与自由式。而申丹(1991)根据汉语中缺少从句、人称和时态的变化的特点,提出了中国文学独有的“两可型”。以上分类方法多适用于小说,目前少有学者对唐诗中的引语进行系统分类。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黄国文(2002)在探讨唐诗中的转述现象时对“原话引述”和“间接引述”的区分,提出翻译作品中不存在原话引述,并根据是否使用了引号在“间接引述”下次分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探讨引语的翻译问题,厘清原诗的引语类别是首要前提。笔者根据对唐诗引语特点的分析,将唐诗中的引语分为直接引述(直接引语+自

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述(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和“两可型”三大类。需要注意的是,在唐诗中,言语和思想在表达形式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所以本文在讨论引语形式时不对人物的言语和思想进行区分。

2.1 直接引述

直接引语,即原封不动地记录人物话语,在展示人物话语之前往往有“引述主语+引述动词”作为引导句进行提示。由于唐诗在创作时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故我们在判断时可遵守三个检验标准:(1)是否有引导句;(2)引述内容是否完整;(3)加上冒号和引号后,引语是否成立。为方便检验,笔者将标点符号加入到了以下例证中。如杜甫的《石壕吏》中“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听妇前致词”为引导句,“听妇”点明了其后的引述内容为“妇”的话语,引述内容完整。且加上冒号和引号之后,引语成立,故可判定为直接引语。

自由直接引语可看作直接引语的副型,虽然也是原本地记录人物话语,但自由直接引语省略引导句,使引述更加“自由”。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写诗人谪居浔阳城的一段文字“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感我此言”提示前文内容为诗人的自述,由于没有引导句,画线部分可看作自由直接引语。在诗歌文体风格的传递上,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都可以真实地展现人物的语气和语言风格,进而凸显其性格特点,具有较突出的直接性和生动性。但由于唐诗本身的含蓄性和模糊感,这两种引语模式的“直接生动”效果与小说相比还是要弱许多。同时,直接引述占据篇幅较长,多用于长篇叙事诗,少见于律诗或绝句。

2.2 间接引述

间接引语,即诗人用自己的话转述人物原本的话语,由于唐诗中叙述主语和标点缺失的特点,笔者在判断间接引语(尤其是与直接引语进行区分)时采用三个步骤:(1)具有引述动词。代表性的引述动词包括“问”“说”“称”“语”“借问”,这一点可以把引语范围限制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三个类别;(2)引述动词和引述内容在一句诗中。如果二者在两句诗中,则多为直接引语。如“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引述动词是“问”,引述内容是“西游何时还”,二者同在一句诗中;(3)引述内容较为具体全面,如“西游何时还”就是一个完整的问题,这一点主要用来区别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综上,“问君西游何时还”可视为间接引语。

言语行为的叙述体可看作间接引语的副型。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由 Leech 和 Short 提出,即人物话语完全被叙述者控制,形式上相当于 Page 八分法中的“被遮覆的引语”(Page,1988)³⁴,在唐诗中表现为高度简洁的引述行为,而非具象化的引述内容,即诗人对无需赘言的人物话语一笔带过。由于唐诗简洁规整的文体风格,言语行为的叙述体极为常见。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一句是对诗人与表弟的寒暄行为的概述,将具

体的人物话语凝练为“问姓”和“称名”。再如李商隐在“君问归期未有期”中将妻子的询问与自己的回答加工成了七个字,简洁紧凑,读起来朗朗上口。

2.3 “两可型”

“两可型”最早由申丹提出,申丹认为在中文第三人称叙述中,由于缺乏时态标志,可能出现两种引语模式(如自由直接式和自由间接式)的模棱两可(申丹,2019)³¹³。笔者认为这一类型同样适用于唐诗。由于唐诗缺乏时态、人称、标点的标志,我们可能无法确定某句诗是否为引语,或将其归位引语中的某一类别。如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其中“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由于没有引导句和人称的提示,既可看作诗人的自由直接引语,又可看作诗人思想的叙述。再如《金缕衣》中的名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劝”在古代汉语中具有多义性——既可用作引述动词,后接引述内容;又可作为口语表达,“劝君”即“我希望您怎样”。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劝君”到底是引导句,还是引述内容的一部分,这也就决定了这两句诗为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模棱两可。

综上,我们将唐诗中的引语分为直接引述、间接引述、“两可型”三大类。其中直接引述包括“直接引语”及其副型“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述包括“间接引语”及其副型“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若按照引述内容的完整度和自由度为基准,唐诗中引语模式(除“两可型”)的排序应为: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

3. 唐诗引语翻译中的“假象等值”现象

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似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的翻译现象(申丹,2002)¹¹。在唐诗的翻译中,若译者没有将原诗的语言成分与其背后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充分关联,诗歌的文体价值在呈现上便会有所减损。如 David Wei 将“自言本是京城女”中的“自言”翻译成“said to herself”(赵娟,2018)¹⁸²,无疑是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对自己说道”,顿时将“对话”变为了“自白”。笔者试图总结唐诗中的引语翻译中的“假象等值”现象,及译者的应对策略。

3.1 缺省部分的增译

唐诗中引语的缺省现象主要体现在引述内容和引述主语上。在上下文隐含信息不充足的时候,省略的引述内容可以有多种猜测,如“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诗人并没有给出“借问”的问题,读者也无法从上下文得出确切答案,所以省略的内容可以是:你多大了?你在干什么?附近有没有人家?等等。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如表1所示:

表 1 “零翻译”策略

| | |
|----------------------------------|--|
|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
| 唐一鹤(2005) ²⁸² | When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Luoyang inquire about me, |
| Stephen Owen(1981) ⁹¹ | If friends and kin in Lo-yang should ask you how I am, |
| 王福林(2015) ⁴⁰² | If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Luoyang ask about the demotion I got, |

王昌龄的这两句诗是典型的一问一答形式:“洛阳亲友如相问”以引述动词“问”结束,省略了引述内容;“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是对上句中省略的问题进行回答。针对省略的引述内容,唐一鹤将其模糊译为“inquire about me”,类似于零翻译;Stephen Owen 稍做处理后译为“how I am”,侧重关心诗人的状态;王福林则具体译为“the demotion I got”,突出强调诗人“被贬谪”这一事实。从文学文体学视角出发,唐译较好地还原了诗歌的美学价值,Stephen Owen 次之,而王译看似等值的翻译在表达效果上并非等值。笔者认为,在对引述内容的推测有出入时,应采用模糊译法或者零翻译,避免“假象等值”的出现。

与引述内容相比,引述主语的缺失和补出较为棘手。吕叔湘(2002)⁵认为“中文常不举主语,韵语尤甚,西文则标举分明,诗作亦然。译中诗者遇此等处,不得不一一为之补出”。在现代小说和英语书写中,引述主语是引语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若要清楚的展示“引语”确实应该等值译出。然而,部分学者对古诗中主语缺失的现象持“不可译”的观点,认为译者对缺失的主语进行补出时,可能会损害原诗的意境和美感(陈伟英,2006),将隐含的叙事主体符码化是破坏诗歌审美价值的主要原因(庞秀成,2009)。笔者认为,本文探讨的“引语”是在唐诗的具体语境之下的,时刻受到其文体风格的裹挟,翻译时需首先满足文体风格上的对等,再追求叙事层面的对等。而在追求文体价值的实现时,我们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减少对缺失主语的补出,(1)采用被动句式。如孙大雨(2007)³²⁷将“君问归期未有期”译为“Being asked for my home-coming date”,保持了主语的省略。(2)采用自由直接引语或自由间接引语,省略引导句的同时也就避免了引述主语的出现,如表 2 所示:

表 2 补出主语

| | |
|-----------------------------------|---|
| 李白《蜀道难》 |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
| Witter Bynner(1929) ⁶⁷ | <u>We</u> wonder if this westward trail will never have an end. |
| 孙大雨(2007) ⁴³ | <u>Let me</u> ask you when you would turn back from journeying westwards; |
| 杨宪益(2005) ²⁰ | Friends when will you return from this westward journey? |
| 许渊冲(2012) ⁴⁴ |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from this journey to the west? |

“问君西游何时还”一句并无引述主语,由上下文和创作背景可知缺失的主语为“我”,即诗人自己。在翻译时,杨宪益和许渊冲采用自由直接引语的方式将主语继续省略。Witter Bynner 和孙大雨选择了间接引语的形式,将主语补出,译为“we”和“let me”,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诗的意境和美感,可看作“假象等值”现象。

3.2 引述动词的不当选择

引述动词(又称管领词、引进词)在转述人物话语中具有重要的衔接和提示作用。笔者根据唐诗中引述动词的语用功能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具体语用功能的引述动词,如“问”“答”“歌”“叹”等,这类引述动词不仅可以起到提挈作用,而且会提示说话者的情感态度以及引述内容,但在唐诗中占比较小。另一类引述动词具有很强的“概述性”,只能提示引语的存在,而不能展现说话者的态度以及引述内容,如“言”“说”“云”“道”“语”“称”“致词”等,在古诗中较为常见。这类动词按照基本含义对应到英语中是“say”,但由于受到不同语境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这类无特殊语用功能的引述动词时,可以根据语境选择更为具体的下义词或修饰词,或塑造人物形象,或提示引述内容,或表现语气态度,以贴近原文的文体风格,如表3所示:

表3 补出主语

| | |
|--|--|
| 杜甫《石壕吏》 | 听妇前致词;三男郾城戍。 |
| W. J. B. Fletcher(吕叔湘,2002) ¹⁶⁷ | I heard her <u>say</u> that her three sons had gone. |
| 许渊冲(2012) ⁷⁹ | I hear what she tries to <u>speak out</u> . |
| Herbert A. Giles(吕叔湘,2002) ¹⁶⁶ | <u>Told</u> all her story's <u>mournful</u> page. |
| Stephen Owen(1981) ⁸⁶ | I listened as the woman <u>pleaded with</u> him; |
| 唐一鹤(2005) ¹⁵⁹ | The old woman was <u>bitterly crying</u> and was heard saying: |

该例中的引述动词“致词”单从字面上看并无特殊的语用功能,但根据引述内容可知,老妇是在哭诉自己的不幸生活:两个儿子刚刚战死,家里仅有老母亲和小孙子,接着乞求官吏把自己带走,到部队做饭。所以,老妇的话语带有强烈的情感张力。在搜集到的五个译文中,Fletcher将“致词”直译为“say”,没有体现老妇强烈的态度和情感,人物塑造比较扁平,看似等值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的等值。Giles, Owen和唐一鹤的译文或选择了下义词“plead”“bitterly cry”或增加了形容词“mournful”,更能将读者带入到老妇的情绪之中,老妇的形象也更加鲜明。许渊冲译为“speak out”(大声说出),然而原文并没有体现出老妇是在大声说话,尤其是在官吏面前,普通百姓应该是诚惶诚恐的,少有底气敢喊出一些话语。所以许译也可看作“假象等值”。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选择“下义词”的译法多限于“概述性”引述动词,且需要语境支持。对于有具体语用功能的引述动词,不建议采用这种译法,可能会导致误译或过度翻译。如Herbert A. Giles将“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中的引述动词“问”译为“whisper”(吕叔湘,2002)¹⁹⁴,whisper在柯斯林词典中的释义为“you say something very quietly, using your breath rather than your throat, so that only one person can hear you.”但通读全诗,并无暗示诗人以较低的音量询问,所以,Giles对引述动词的处理过于主观,与原诗的意境和美感有一定差距,也属于“假象等值”。

3.3 引述形式的任意转换

由于汉英语言对引语模式的划分不同,以及唐诗独特的行文风格,翻译时很难做到文体上的等值,译者在选择引述形式时往往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唐诗中不同的引述形式具有不同的美学效果,典型且不可替代,这就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引语模式与之对应,不能一味照搬,更不能随意转换。本文分别对五种引语模式在英译文中的转换进行讨论,探寻转换过程中的“假象等值”现象,以及如何转换才能达到文体上的等值,如表4所示:

表4 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

| 崔颢《长干曲》 | 许渊冲(2012) ⁶² | 王福林(2015) ³⁹³ |
|---|--|---|
| (一) 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 I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On the shore I've my home. Will you rest on your oar? Are we from the same shore? | I The young girl says, "Where do you live, young fellow? I live at Hengtang. To ask you this question I stop my boat for a mo, Maybe we'r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
| (二) 家临九江水, 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 自小不相识。 | II I dwell by riverside, And sail on river wide. We live on the same shore, Not knowing it before. | II The young man replies, "My home is by the Yangtze River, So I come and go on the river. Though both of us come from Changgan, the same neighborhood, Yet we haven't known each other since our childhood." |

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具有较强的生动性和直接性,其中,自由直接引语比直接引语更加直接,而且具备直接引语不具备的自由性。所以,在自由直接引语可以充分展现人物话语和诗歌逻辑的情况下,无需改变原本的引述形式,若随意转换可能会导致“假象等值”的出现。比如《长干曲》以对话的形式,描写了采莲女子与一位男子的相识过程。由《长干曲(一)》中的代词(“君”指代对方,“妾”指代自己)可知女子在自报家门,而《长干曲(二)》恰好是男子对女子“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回应。全诗没有引导句和引述动词,两首诗可视为女子和男子的自由直接引语。在翻译时,许渊冲选择自由直接引语,还原了诗歌生动自由的叙述形式。而王福林选择了直接引语的形式,补充了引导句“The young girl says”和“The young man replies”,虽然内容和逻辑都有译出,但结构繁复且赘余,不符合原诗的文体风格,故可看作“假象等值”,如表5所示。

表5 间接引语

| | |
|--|---|
|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 |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
| Witter Bynner (1929) ³⁶ | They smile and say, "Stranger, where do you come from?" |
| 许渊冲(2012) ¹⁷ |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ir?" they ask with beaming eye. |
| Herbert A. Giles (赵娟, 2018) ²²⁵ | But smiling ask, "O stranger, whence art thou?" |

续表

| | |
|--|--|
| Victor H. Mair (赵娟, 2018) ²²⁵ | Laughing, they ask, "Guest, where have you come from?" |
| 王福林(2015) ³⁹⁹ | So they ask me "Where are you from?" with a smile. |
| 唐一鹤(2005) ⁵ | But asked me where I was from, in smiles. |

唐诗中的间接引语特征较弱,在表达上,它没有直接引语的自由生动,也没有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的高度凝练,所以在翻译时,译者不必拘泥于间接引语这一种形式,可根据诗歌的文体风格和美学价值进行多种形式的比对和选择。如“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句是诗人对儿童话语的转述,但在六个译本中,只有唐译选择了间接引语,其余五个译文都处理成了直接引语。这里的引语究竟要如何处理呢?引语是诗歌的一部分,引语形式的选择必须与诗歌的行文风格和主题意义相符。《回乡偶书二首》写于贺知章辞官还乡之时,质朴的语言流露出诗人久别回乡的亲切感,与儿童的交谈更是充满生活情趣。相比间接引语的冷峻和客观,直接引语更能还原轻松自然的文风,真切地抒发诗人此情此景的感受。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尊重”原诗的唐译反而陷入了“假象等值”,如表6所示:

表6 言语行为的叙述体

| | |
|------------------------------------|---|
| 元稹《遣悲怀(二)》 |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
| 许渊冲(2012) ¹⁴⁰ | "What if one of us should die?" we said for fun one day; But now it has come true and passed before my eyes. |
| 王福林(2015) ³⁴⁷ | In the past we said for fun "What should be done if one of us dies?" Today everything we said has happened before my eyes. |
| Witter Bynner(1929) ²¹⁶ | We joked, long ago, about one of us dying, But suddenly, before my eyes, you are gone. |

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虽是间接引语的副型,但在翻译时却有所不同。“昔日戏言身后意”一句高度凝练,诗人仅用“身后意”三个字概括了戏言的具体内容。因为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的一大特点就是“遮覆”无关紧要或有意留白的内容,故读者无法推测出具体准确的引述内容。笔者认为翻译时仍应选择同样简洁且有“遮覆”作用的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与之对应。对比三个译文,Bynner将“身后意”简洁译为“one of us dying”,概括言语行为的同时,巧妙隐藏了引述内容,与原诗的文体风格相仿。而许渊冲和王福林采用了直接引语的形式,将其扩写为“What if one of us should die?”和“What should be done if one of us dies?”。不难看出,两位译者对“身后意”的理解和具体化表达是有偏差的,而且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的“遮覆”特质决定了这种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许译和王译出现了“假象等值”现象,如表7所示:

表7 “两可型”

| | |
|--------------------------|--|
| 贾岛《寻隐者不遇》 |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
| 许渊冲(1998) ³⁰⁸ | I ask your lad' neath a pine-tree. "My master's gone for herbs," says he, "Amid the hill I know not where. For clouds have veiled them here and there." |

续 表

| | |
|--|--|
| 许渊冲(2012) ¹⁴⁴ | I ask your lad' neath a pine-tree. "My master' s gone for herbs," says he, You hide amid the mountains proud, I know not where deep in the cloud. |
| Burton Watson (袁小林, 2018) ¹¹⁶ | Under the pines I questioned the boy, "My master's off gathering herbs. All I know is he's here on the mountain, Clouds are so deep, I don't know where." |
| 王大濂(1997) ¹²⁹ | Beneath pines trees I asked your lad nearby, "My master's gone for herbs" was the reply. "He's only in this mountain somewhere round, In heavy mists he is nowhere to be found." |

前文提到“两可型”是中国文学中特有的引语形式,故翻译时比较棘手,涉及的问题有:原诗中的引语是哪几个类型的模棱两可?翻译时是选择一个确定的引述形式还是模糊翻译?“两可型”的判断和翻译中的选择应该以什么为标准?以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为例,“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童子的话,与“言师采药去”同为对诗人问题的回答;另一种是诗人自己的话,对寻隐者不遇的感慨。前者对应的引述形式可能为间接引语(引导句为全诗第二句中的“言师”)、自由间接引语(将这两句与“言师采药去”分离看待,是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或自由直接引语,但引述主语都是童子。后者对应的引述形式为自由直接引语,引述主语是诗人自己。对于这种情况,王大濂意识到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与前句分属两个问题的答案,故用了两个引号进行区分,可看作无转述句的间接引语,或带引号的自由间接引语。若将三四句的引号去掉,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可能效果更佳。许渊冲前后给出了两个译本:在较前的译本中,许渊冲将后两句诗视为童子的话,处理为了直接引语;在其后的译本(最早见于2000)中,许渊冲将其视为诗人的自述,处理为了诗人发出的自由直接引语。比较之下,笔者认为许渊冲后来的改译比较可取,巧用人称代词“you”转换视角,较大程度上还原了诗思,体现了译者的文体意识。而Watson将这两句与全诗的第二句一起处理为了间接引语,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两句诗的复杂性。Watson的译文虽无错,但过于简单直白,没有体现出原诗引语“两可型”的特点,犯了“假象等值”的错误。

通过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选择引述形式时,要尽可能贴近原诗的文体风格,避免突兀的引述出现;(2)翻译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体时,尽量与原诗的引述形式一致,保持诗歌的简洁性和音响效果;(3)间接引语可以根据诗歌的语言节奏和意境氛围灵活翻译,尤其是具有强烈的对话画面的诗歌,可考虑使用直接引语;(4)“两可型”要求译者具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并在译文中做出积极的反应。

3.4 引述范围的错误判断

前文提到,唐诗无标点符号和时态的变化,加上各种引述成分的缺省,译者在判断引语时或许出现偏差或疏漏,在译文中扩大或缩小引述范围,阻碍诗思的传达,出现形式上的“假象等值”,如表8所示:

表8 形式上的“假象等值”

| 白居易《燕子楼(三)》 | 许渊冲(2014:53) |
|--|--|
| 今春有客洛阳回， 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 争教红粉不成灰？ | Some friends coming back from ancient capital say They've visited the grave of her dear lord again. The graveyard poplar white grows high as pillar gray. How can her rosy face still beautiful remain? |

原诗中,引述动词“说”出现在第三句,按照逻辑来看,“说”后面的内容才是“客人”的话语,但许渊冲在翻译时,也许为求押韵和音节的对称,将“say”提前到第一句,使得引述内容与原诗相比,多了“曾到尚书墓上来”这一叙事内容,故可看作对引述范围的扩大。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如表9所示:

表9 引述范围扩大

| 李白《长相思(一)》 | Witter Bynner(1929) ⁶⁹ |
|--|---|
|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 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 "I am endlessly yearning To be in Chang-an, Insects hum of autumn by the gold brim of the well; A thin frost glistens like little mirrors on my cold mat; The high lantern flickers; and deeper grows my longing. I lift the shade and, with many a sigh, gaze upon the moon, Single as a flower, centred from the clouds. Above, I see the blueness and deepness of sky. Below, I see the greenness and the restlessness of water Heaven is high, earth wide; bitter between them flies my sorrow. Can I dream through the gateway, over the mountain? Endless longing Breaks my heart." |

《长相思(一)》借景抒写离人的相思之苦。“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将全诗分为篇幅均衡、形式匀称的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环境描写,描绘出一个饱受相思之苦的寂寞空虚的幽独者的形象;第二部分写诗人在浪漫的幻想中对心爱女子的追求。从叙事手法的角度出发,上半部分应为白描,下半部分是诗人思想的展现。在 Bynner 的译文中,引号的使用将全诗都译为了直接引语。然而,诗中既无听者的出现,也无暗示诗人在自白,所以 Bynner 的处理显然是不恰当的,是一种假象的等值。本诗中唯一的叙述动词是第一段的最后一个词“叹”——诗人望着明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长叹,按理说“叹”后面的内容应为引语,加之“空长叹”后面接的“美人如花隔云端”是全诗中唯一的独立句,也是最悱恻缠绵,意切情真的一句。所以笔者认为,只有这一句是诗人的话语,宣泄出对心爱之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相思之苦。此句之前是叙事,此句之后是诗人的意识流。在翻译时,不如将“美人如花隔云端”一句处理为直接引语,加引号进行突出强调。由此可见,译者在遇到“引语迹象”时,一定要反复斟酌,慎重下笔,避免主观臆断。

3.5 诗人的陌生化创作与译者的改动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的“陌生化”概念常用于诗歌研究,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力图“改变日常语言自动化、习惯化的状态,使人们对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肖曼琼,2008)⁹³。为给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感受,诗人通常会使用拟人、比喻、双关、移情等修辞手法,以及超常的意向搭配和遣词造句。面对诗人的陌生化创作,文体能力较高的译者可以捕捉到原诗中用字的奇妙之处,并在翻译中创造性地加以表现。而未能识别诗人良苦用心的译者在翻译时可能会出现“假象等值”现象,如下面两个例子,如表10和表11所示:

表 10 假象等值(一)

| | |
|------------------------|---|
| 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 |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
| 许渊冲(2012:172) | She whispers to <u>him</u> after touching up her face, “Have I painted my brows with fashionable grace?” |
| Witter Bynner(1929:24) | She has finished preparing, she asks of <u>you</u> meekly, Whether her eyebrows are painted in fashion? |

此诗作于诗人进士考试前夕,将诗作呈给老师张籍,希求其称扬和推荐。诗人将自己和张籍分别比作新妇和新郎,公婆则为主考官,看似描述新娘见公婆之前问丈夫她所画的眉毛是否合宜,实际在询问张籍自己能否踏上仕途。这种“夫妻——师友/君臣”的比拟关系是唐诗一种典型的表现手法,可看作诗人“带有意图”的“陌生化”创作,翻译时译者首先需要意识到这种陌生化的表达,其次思考如何呈现表层和深层关系。许渊冲遵从原诗的引述形式,将这两句话处理为直接引语,说者和听者分别翻译成了“she”和“he”,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给英文读者营造了浓浓的“闺意”。但是许译只展现了诗歌表层含义,没有体现诗人的真实意图,在主题意义的呈现上出现了“假象等值”现象。相比之下,Bynner将原诗处理为间接引语,他将“夫婿”译为“you”,看似突兀的第二人称其实是对张籍(收信人)的提问。另外,Bynner没有把“妆罢”具象化为“after touching up her face”,而是模糊翻译成“finished preparing”,也是一种对读者的暗示,较好的还原了诗歌的隐含意图。

表 11 假象等值(二)

| | |
|--------------|--|
| 孔绍安《落叶》 | 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
| 许渊冲(2012:10) | I seem to <u>hear</u> them cry, “We will not leave our <u>trees</u> . ” |
| 翁显良(1985:10) | I seem to <u>hear</u> them crying, “To <u>the home of our fathers</u> we are eternally bound!” |

“犹言惜故林”一句包含拟人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首先,在引导句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落叶”之口诉说家国破亡的无奈凄凉。其次,引述内容“惜故林”看似

说的是落叶不愿离开森林,其实是将“故林”比作“故国”,表达思乡念国之情。对于前者,许渊冲和翁显良显然意识到了拟人的修辞,将“犹言”翻译成“I seem to hear them cry”。但原诗中“犹言”的主语是“落叶”,对应的英语应该是“They seem to cry”,两人在翻译时不约而同地增译了“我听到”这一层内容来引出落叶的话,将视点转移到了第一人称视角。虽然逻辑关系更加明确,但是“我”的明晰化处理,破坏了原诗的“无我之境”,可视作“假象等值”。相似的例子还有刘禹锡的“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在翻译时也应“以花”的口吻诉说,体现诗人的陌生化创作。而对于引述内容的翻译,许渊冲将“故林”直译为“our trees”,而翁显良则将比喻义“the home of our fathers”译出,笔者认为翁译在修辞的处理上优于许译。所以,译者对于陌生化创作的误判或误译不仅会浪费诗人的苦心孤诣,而且会大大减损原诗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4. 结语

研究发现:唐诗中引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引述主语的缺失和引述内容的省略。通过搜集和比较语料,笔者将唐诗中的引语分成“三类五型”,即直接引述、间接引述和“两可型”三大类,包括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两可型”五种类型。在对文体对等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唐诗引语的英译过程中,“假象等值”现象不可避免,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缺省部分的增译;引述动词的不当选择;引述方式的任意转换;引述范围的错误判断;诗人的陌生化创作与译者的改动。针对“假象等值”现象,本文提出三种以文体对等为导向的翻译方法:(1)对于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体,翻译时建议保留原有的引述形式,对于更为灵活多变的间接引语和“两可型”,则需要根据具体文本进行判断,以最大程度还原唐诗的文体风格;(2)对于引述主语和引述内容的缺省现象,译者在翻译时可采用零翻译或模糊翻译的方法,以还原诗歌的美学价值;(3)面对唐诗中引语的变异的表达方式,译者可以采用陌生化翻译,做出积极的诗学回应。

参考文献:

- 陈伟英,2006. 唐诗主语省略英译补出现象:解读文化差异及意境不可译性[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77-186.
- 黄国文,2002. 唐诗英译文中的引述现象分析[J]. 外语学刊(3):1-6,112.
- 李宏霞,2015. 乐府诗中引述语言的英译[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8):14-16.
- 吕叔湘,2002. 中诗英译比录[M]. 北京:中华书局.
- 庞秀成,2009.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叙事“主体”符码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32(3):86-95.
- 申丹,1991. 也谈中国小说叙述中转述语的独特性:兼与赵毅衡先生商榷[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8-81.

- 申丹,2019.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申丹,2002. 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 中国翻译(1):10-14.
- 申丹,1991. 小说中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1):13-18.
- 孙大雨,2007. 英译唐诗选[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327.
- 孙洙(蘅塘居士),2020. 唐诗三百首[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 唐一鹤,2005. 英译唐诗三百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王东风,2004. 变异还是差异:文学翻译中文体转换失误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01),62-68.
- 王大濂,1997. 英译唐诗绝句百首[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王福林,2015. 唐诗三百首详注·英译·浅析:普及读本[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翁显良,1983. 意态由来画不成[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翁显良,1985. 古诗英译[M]. 北京:北京出版社.
- 吴钧陶,1997. 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M]. 长沙:湖南出版社.
- 肖曼琼,2008. “陌生化”: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翻译[J]. 外语教学(2):93-96.
- 许渊冲,1998. 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许渊冲,2012. 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 许渊冲,2014. 许渊冲英译白居易诗选(汉英对照)[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叶维廉,2007.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袁小林,2018. 经典唐诗英译欣赏[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智中,2014. 汉诗英译中的主语与人称[J]. 外语教学,35(4):99-104.
- 赵娟,2018. 唐诗英译研究.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BYNNER W, KANG-HU K,1929. Jade Mountain[M]. New York: Knopf.
- OWEN S, 1981.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GE N, 1988. Speech in the English Novel[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YANG X, YANG G, 2005.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作者信息:

朱含沙,女,1999年6月生,辽宁抚顺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翻译批评研究。

青年学者园地

中美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拒绝策略对比研究

——以《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为例^①

白春苗 王勃然



摘要:为探究中美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拒绝策略使用的异同,选取两部社会地位较为明显的政治连续剧中的拒绝语为语料,并根据 Beebe 等人(1990)提出的拒绝策略方案进行分类。研究发现,中美人士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而美方人士较中方人士更为间接;中方人士在社会地位敏感度方面要高于美方人士。中方人士倾向于使用“回避”策略而美方人士倾向于使用“说明原则”策略。其差异原因可归结为:中方权利距离指数(PDI)较美国高;此外,汉语文化强调理想的社会身份而美国文化强调理想的个人自主性;作为集体主义国家,中国有众多不同的“内团体”且团体成员多样,而美国人高度强调个人主义,只有直系亲属是其“内团体”成员。

关键词:拒绝策略;对比研究;社会地位;相对面子构想理论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fusal Strategies Used by

People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llustrated by the Corpora from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and *House of Cards*

BAI Chunmiao WANG Boran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refusal strategies when refus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is study selects the refusals from two political TV series with obvious social status as the corpus, and classifies the collected refusals according to the refusal strategy scheme proposed by Beebe, et al (1990).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s tend to use indirect refusal strategies, while the Americans are more indirect than the Chinese. However, the Chinese are more sensitive to social status than the Americans. The Chinese are inclined to use the “avoidance” strategy, while the Americans prefer the “statement of principle” strategy. The differences could be explained as

^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外语类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者粘性现状分析及影响因素模型建构”(项目编号:19BYY230)的阶段性成果。

follows: China's PDI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merica; in addition,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ideal social identity" while American culture stresses "ideal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as a collectivist country, China has many different "in-groups" with diverse members, while American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ism, and "in-groups" only include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Keywords: refusal strategy; comparative study; social status; 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 construct

随着互联网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不断推进与加强,本族语者可以突破地域局限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族人进行沟通交流。由于不同文化的本族语者都各有一套说话规约和行为模式,所以中美双方常因为说话方式、交际风格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分歧而导致跨文化交流出现故障。拒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对面子有潜在威胁的言语行为,但使用合理恰当的拒绝策略可以有效缓解拒绝语对交际双方面子的损伤以及使会话顺利进行。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已经从本族语,跨文化交际和基于学习者二语习得等角度对拒绝策略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以社会地位作为变量,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在面对不同社会地位谈话对象时的拒绝言语行为来揭示中美拒绝策略使用的异同以及存在的原因。

1. 拒绝策略相关研究

早期在对拒绝策略的研究中,数据主要通过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获得,然而此种数据收集方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 DCT 收集的拒绝语是书面语言,而拒绝语是口头产生的(Morkus, 2014),此外 DCT 中被试没有反应时间的限制,通常会产出较自然情境中更多的拒绝语,所以不能反映日常生活中人们即时实施言语行为的真实对话情景(Beebe, 2006)。另一方面, DCT 不允许被试在一定程度上退出反应,这与人们可能不做出反应的真实情况不相符(Olshtain et al., 1985)。除 DCT 之外,也有一些研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法收集数据,其中封闭式角色扮演类似于 DCT 的口头版本,被试可对一个提示做出一次口头回应。在开放式角色扮演中,被试被要求与研究或其他被试一起参与表演角色。尽管通过开放式角色扮演获得的数据是以一种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方式通过口头得出的,相比封闭式角色扮演和 DCT 更有优势,更接近自然语言,但研究者可能会影响角色扮演中引出的数据量(Gass et al., 1999)。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能够展现现实的屏幕,是一面可以反映我们自身状况的镜子(Robert et al., 2002)。电视剧、电影以及小说等是现当代受到广泛欢迎以及普遍关注的几种大众文化形式,其中电视剧是当代大众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形式之一,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语境中产生的言语行为,因此为了获得最趋近于现实的数据,通过转写电视剧等中的会话来收集数据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兴起(宋晓燕,

2010;王超超,2016)。

言语行为的实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地位、交际双方关系的远近亲疏、性别、文化教育程度等。其中社会地位是影响拒绝言语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对社会地位影响拒绝策略使用的研究多以大学等作为研究背景,被试多为学生,但学生因未正式踏入社会,可能会对社会地位的感知度不足,所以获得的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目前针对不同研究背景如公司职场等的拒绝策略的研究已呈上升趋势。在政治生活中,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处于政治领域较其他工作领域对社会地位敏感度更强,更能体现社会地位对拒绝策略使用的影响。由于极少有研究探索社会地位对政府工作人员拒绝策略使用的影响(洪岗等,2011),且目前还没有对中美政府工作人员拒绝策略使用的跨文化对比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分别选取两部中美热播政治类电视剧收集语料,对中美双方在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所采用的拒绝策略进行比较分析。

2. 研究设计

在以往对拒绝策略的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 Beebe 等人(1990)提出的拒绝策略分类,充分说明了这一分类方法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本研究也采用此种分类方法对收集到的拒绝语进行分类。通过对中美政府工作人员拒绝策略使用的对比分析,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两个问题:

一、社会地位对中美拒绝策略的使用是否有影响?对双方的影响是否不同?

二、中美人士在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对拒绝策略的使用有什么相同、相异之处?其原因是什么?

本文选取中国的《人民的名义》和美国的《纸牌屋》这两部政治题材的电视剧收集语料,以 Mao(1994)的相对面子构想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为理论框架,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计算了中美直接和间接拒绝的总体使用频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拒绝语以及拒绝策略的使用频率计数。此外,针对四种启动行为(请求、建议、邀请和提供)和被拒绝者的社会地位(低、相等、高),计算了每种拒绝策略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使用频率。为了更好地对比中美双方对拒绝策略的使用异同,计算了拒绝策略使用的百分比,方法是通过将其出现次数除以所使用策略的总数,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确定中美对直接或间接拒绝语以及拒绝频率的使用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显著性水平 alpha 值设为 0.05,采用 SPSS25.0 对所得数据进行 t 检验。在定性分析方面,基于 Hofstede(2010)的两个文化维度(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以及 Mao 的相对面子构想理论,分析了社会地位对中美拒绝策略使用的影响以及中美拒绝不同社会地位的谈话者时,导致双方对拒绝策略使用产生异同的原因。

3. 中美人士拒绝策略使用对比分析

基于 Beebe 等人(1990)的拒绝策略理论,对收集到的共 107 项拒绝语进行了分类。其中,在《人民的名义》中共收集到 67 项拒绝语,108 个拒绝策略;在《纸牌屋》中共收集到 40 项拒绝语,54 个拒绝策略。为明确探究社会地位对中美拒绝策略使用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比了当中美拒绝与自身相比,处于较低、相等以及较高社会地位的谈话者时,对拒绝策略的使用情况。

3.1 中美人士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使用拒绝策略的相同之处

当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无论被拒绝者处于较低、相等或较高的社会地位,中美双方的拒绝者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此外,当中美人士拒绝与其地位相同的人时,间接拒绝策略的使用频率最低。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当拒绝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时,中国人使用拒绝策略频率为:80.6%(间接) $>$ 19.4%(直接),美国人使用拒绝策略频率为:84.8%(间接) $>$ 15.2%(直接);当拒绝处于相等社会地位的人时,中国人使用拒绝策略频率为:55.6%(间接) $>$ 44.4%(直接),美国人使用拒绝策略频率为:72.7%(间接) $>$ 27.3%(直接);当拒绝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中国人:86.5%(间接) $>$ 13.5%(直接),美国人:80%(间接) $>$ 20%(直接)。

表 1 中方人士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拒绝策略使用情况

| 拒绝策略 | 低地位人群/% | 相等地位人群/% | 高地位人群/% |
|--------------|---------|----------|---------|
| 直接 | 19.4 | 44.4 | 13.5 |
| 施为性 | 0 | 22.2 | 0 |
| 非施为性陈述“No” | 6.5 | 22.2 | 8.1 |
| 不愿意或缺乏能力 | 12.9 | 0 | 5.4 |
| 间接 | 80.6 | 55.6 | 86.5 |
| 表达遗憾 | 0 | 0 | 0 |
| 表达愿望 | 0 | 0 | 0 |
| 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 | 21.0 | 22.2 | 32.4 |
| 提供可供选择的办法 | 11.3 | 11.1 | 8.1 |
| 提出将来或过去接受的条件 | 0 | 0 | 0 |
| 承诺未来会接受 | 0 | 0 | 0 |
| 说明原则 | 8.1 | 0 | 5.4 |
| 申明哲理 | 3.2 | 0 | 0 |
| 试图劝阻对方 | 24.2 | 22.2 | 24.3 |

续 表

| 拒绝策略 | 低地位人群/% | 相等地位人群/% | 高地位人群/% |
|----------|---------|----------|---------|
| 貌似接受实则拒绝 | 0 | 0 | 5.4 |
| 回避 | 12.9 | 0 | 10.8 |

注：%表示每一拒绝策略的使用频率(通过将其出现次数除以所使用策略的总数获得百分比)。低地位人群表示被拒绝者较拒绝者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或是拒绝者的下级,相等地位人群表示被拒绝者与拒绝者处于同等社会地位或级别,高地位人群表示被拒绝者较拒绝者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或是拒绝者的上级。下同。

表 2 美方人士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拒绝策略使用情况

| 拒绝策略 | 低地位人群/% | 相等地位人群/% | 高地位人群/% |
|--------------|---------|----------|---------|
| 直接 | 15.2 | 27.3 | 20 |
| 施为性 | 0 | 0 | 0 |
| 非施为性陈述“No” | 9.1 | 9.1 | 10 |
| 不愿意或缺乏能力 | 6.1 | 18.2 | 10 |
| 间接 | 84.8 | 72.7 | 80 |
| 表达遗憾 | 3 | 0 | 0 |
| 表达愿望 | 0 | 0 | 0 |
| 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 | 33.3 | 18.2 | 20 |
| 提供可供选择的办法 | 3 | 0 | 10 |
| 提出将来或过去接受的条件 | 0 | 0 | 0 |
| 承诺未来会接受 | 0 | 9.1 | 0 |
| 说明原则 | 18.2 | 9.1 | 0 |
| 申明哲理 | 0 | 0 | 0 |
| 试图劝阻对方 | 21.2 | 36.4 | 20 |
| 貌似接受实则拒绝 | 0 | 0 | 0 |
| 回避 | 6.1 | 0 | 0 |

中美双方都不使用“表达愿望”和“提出将来或过去接受的条件”这两种拒绝策略。中美双方拒绝处于较高、相等以及较低社会地位人群时,最频繁使用的间接拒绝策略为“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以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办法”。当拒绝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时,中美都不使用“施为性”直接拒绝策略以及“貌似接受实则拒绝、承诺未来会接受”间接拒绝策略,都极少使用“表达遗憾、申明哲理”间接拒绝策略。当拒绝处于相等社会地位的人时,中美都不使用“表达遗憾、貌似接受实则拒绝、回避”,极少使用“承诺未来会接受、申明哲理”。当拒绝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中美都不使用“施为性”直接拒绝策略以及“表达遗憾、申明哲理、承诺未来会接受”,极少使用“申明原理、貌似接受实则拒绝”。

与直接、间接拒绝策略相比,中美双方在拒绝语中使用的附加语较少。在《人民的名义》和美剧《纸牌屋》分别只有1项和4项拒绝语包含附加语,在其全部拒绝语中占比分别为1.5%和10%。包含这五项拒绝语的具体示例如下(下划线为附加语):

①季昌明(上级):亮平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太紧张了,今天晚上,我个人啊,请你们吃顿便饭。

侯亮平(下级):哟,这打了败仗,还慰问什么呀?

(间接拒绝,附加语,回避,邀请)

②Cathy(subordinate): Sir, if I may?

President Francis(supervisor): Yeah, we've discussed this, Cathy.

(间接拒绝,附加语,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请求)

③Douglas(subordinate): The President can make the announcement. In Canton when he appears.

Claire(here as the acting President, superior): Oh, no, I'll be announcing myself. Since I did the deal.

(直接拒绝,附加语,非施为性陈述“No”,说明原则,建议)

④Will(peer): Mr. President... I would have never condoned bringing Ahmadi into this.

President Francis(peer): Well, lucky for me, I'm not making decisions based on what you would or would not condone.

(间接拒绝,附加语,说明原则,试图劝阻对方,建议)

⑤President Francis(peer): Have some lunch. We've got ham, and I think some turkey.

Will(peer): I'm good, but thanks.

(间接拒绝,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附加语,提供)

根据 Beebe 等人(1990)的拒绝策略分类方案,前四项拒绝语中的附加语都为“停顿填充语”,如哟,yeah,oh 和 well。在第五项拒绝语中,虽然威尔拒绝了总统弗兰西斯提供的食物,但他通过附加语“表示感谢”消减了拒绝言语行为对双方面子造成的损伤。

中美平均最频繁拒绝的启动行为为要求和建议。如图1所示,中国人拒绝启动行为的占比排序为:建议>要求>邀请>提供,美国人拒绝启动行为的占比排序为:建议>要求>提供>邀请。当拒绝要求时,中美人士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双方采用间接拒策略的比例几乎相同;拒绝建议和提供时,中美人士都频繁使用直接拒绝策略;拒绝邀请时,中国人多使用直接拒绝策略而美国人多使用间接拒绝策略,详细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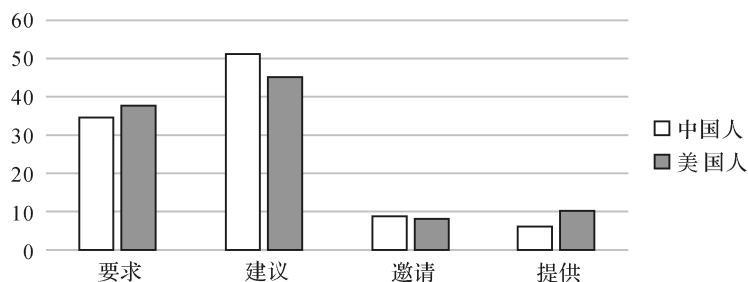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人士拒绝启动行为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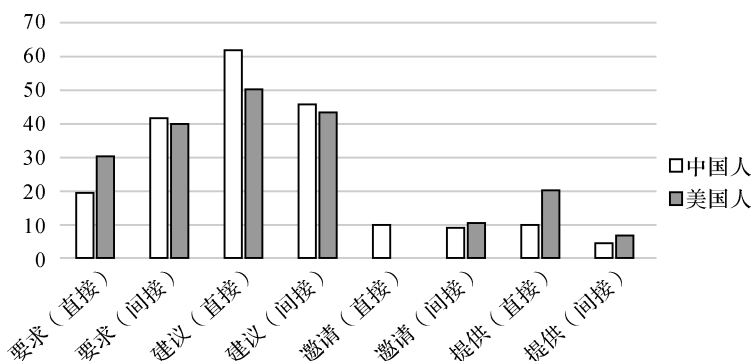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人士拒绝启动行为的直接、间接拒绝策略使用占比

3.2 中美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使用拒绝策略的相异之处

中国人较美国人对社会地位的敏感度更高,即当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注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差距。如图3和图4所示,当拒绝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时,中国人对直接、间接拒绝策略使用的上升、下降趋势明显。中国人拒绝地位较高的人时,使用直接策略的比例最低且呈急剧下降趋势,使用间接策略的比例最低并呈急剧上升趋势。而美国人拒绝处于较低、相等或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时,使用直接和间接拒绝策略的比例相近且使用拒绝策略所占比例的走向趋势均较为平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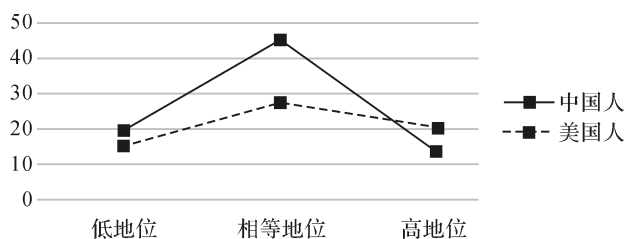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直接拒绝策略使用情况

尽管中美双方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较少使用直接拒绝策略,但是在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中方表达拒绝的态度较美方更直接。例如,如表3所示,中方($M=33.24, SD=32.02$)比美方($M=14.79, SD=20.79$)实施更多的直接拒绝语,而美方($M=51.88, SD=42.19$)比中方($M=41.76, SD=35.46$)实施更多的间接拒绝语。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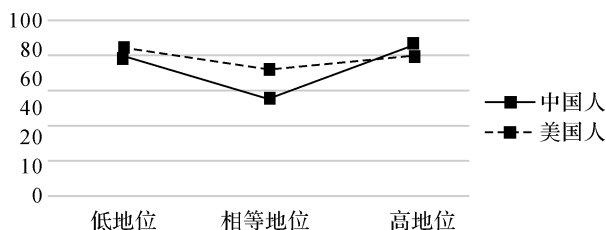


图 4 中美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间接拒绝策略使用情况

中方(M=6.44,SD=9.47)较美方(M=5.20,SD=7.66)更频繁使用直接拒绝策略,相反,美方(M=19.81,SD=18.24)较中方(M=18.54,SD=18.39)使用更多的间接拒绝策略。然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 alpha 水平设为 0.05 时,这些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中美人士直接、间接拒绝语及拒绝策略使用情况

| 策略类别 | 中方 | | 美方 | |
|--------|-----|------|----|------|
| | N | % | N | % |
| 拒绝语 | | | | |
| 直接拒绝语 | 21 | 31.3 | 10 | 25 |
| 间接拒绝语 | 46 | 68.7 | 30 | 75 |
| 总计 | 67 | 100 | 40 | 100 |
| 拒绝策略 | | | | |
| 直接拒绝策略 | 21 | 19.4 | 10 | 18.5 |
| 间接拒绝策略 | 87 | 80.6 | 44 | 81.5 |
| 总计 | 108 | 100 | 54 | 100 |

有三种拒绝策略只出现在中方拒绝语中,分别为“施为性”直接拒绝策略、“申明哲理”以及“貌似接受实则拒绝”的间接拒绝策略。而“表达遗憾”和“承诺未来会接受”这两种间接拒绝策略也只出现在美方的拒绝语中。尽管中美都频繁使用“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以及“试图劝阻对方”这两种拒绝策略,但中方也多使用“回避”的拒绝策略,而美方则多使用“说明原则”的拒绝策略。中美最频繁使用的间接拒绝策略分布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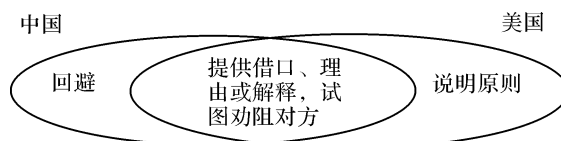


图 5 中美最频繁使用的间接拒绝策略分布情况

当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中美对某些特定拒绝策略的使用存在差异。如当拒绝处于相等社会地位的人时,美方便使用的拒绝策略比中方更多样化,即美方便使用了 6 种

拒绝策略,而中方只使用了5种策略。但当拒绝地位较高的人时,中方使用的拒绝策略则比美方更多样化,即中方使用了9种拒绝策略,而美方只使用了6种策略。此外,当拒绝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时,中国人多使用“试图劝阻对方”(24.2%)、“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21%)以及“回避”(12.9%)这三种间接拒绝策略。美国人频繁使用“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33.3%)、“试图劝阻对方”(21.2%)以及“说明原则”(18.2%)的间接拒绝策略;当拒绝处于相等社会地位的人时,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间接拒绝策略为“试图劝阻对方”(22.2%)和“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22.2%)。美国人对“试图劝阻对方”(36.4%)以及“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18.2%)的使用比例最高;当拒绝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中国人最频繁使用“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32.4%)、“试图劝阻对方”(24.3%)以及“回避”(10.8%)的拒绝策略,美国人多使用的间接拒绝策略为“提供借口、理由或解释”(20%)、“试图劝阻对方”(20%)以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办法”(10%)。

4. 中美人士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对拒绝策略使用的异同原因分析

4.1 相同之处分析

拒绝本质上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当以间接方式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拒绝者既可以相对礼貌地拒绝他人并且也为对方保留了面子。因为间接言语行为具有“预防的灵活性(prophylactic flexibility)”,它可以使会话双方随时调整、撤销以及适应交际的发展,从而减少或避免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冒犯、怨恨或冲突局面,确保双方面子不受威胁或损害(Held,1992)。尽管礼貌原则可能因文化、个体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但礼貌具有普遍性,是“人类交往的普遍原则”,是“其他仪式或礼制的模型或原型”(Brown et al.,1987),“是一种缓和话语冲突的方式”(Lakoff,1989)。因此,为了保护双方面子以及维持双方人际关系,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拒绝他人时,都倾向于使用间接拒绝策略。

Félix-Brasdefer(2006)认为“给出拒绝的理由是向对话者表示合作和支持的一种方式”。中美人士在拒绝他人时都习惯寻找借口、理由或解释,在收集的数据中美双方所给出的借口、理由或解释大多数都是不受拒绝者控制和决定的外部因素。拒绝者通过说明理由,表明他或她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因此不承担造成对面子威胁的个人责任。此外,这些原因的真相只有拒绝者自己知道,因此无可指责。即使对话方知道拒绝者所说的理由或解释并非真实,为了保护双方的面子以及避免尴尬,也通常不会揭露对方的谎言。

4.2 相异之处分析

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亦即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王勃然,2001)。虽然社会地位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性,但在美国似乎并不重要。这种差异反映了中美社会地位的不同作用。根据 Hofstede 等人(2010)的研究,

中国的权力距离指数(PDI)得分较高,而美国的权力距离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因为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较美国复杂,中国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个体明白自己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地位,并且由于受到社会地位和权威的影响,他们倾向于依赖上级并对上下级关系持乐观态度。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由于处在一个PDI水平相当低的社会中,美国人坚持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他们不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设置上下级只是为了满足合理安排工作的需要。因此,由于中国人生活在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中,所以比美国人更容易受到权威的影响,对社会地位的敏感度更高。

中国人在拒绝他人时往往比美国人表现得更为直接,这似乎与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应该比崇尚个人主义国家的美国更追求和谐所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中美两国“内团体(in-group)”的内涵及其成员存在差异。团体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反映了“个人对其组织或家庭感到自豪、表达忠诚以及展示凝聚力的程度”(House et al., 2004)。作为一个高度集体主义国家,中国有众多不同的内团体并且团体成员多样,如家庭中的家庭成员、社区中的居民、班集体中的学生和老师以及工作团队中的同事等。人们对自己的团体从内心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保持忠诚,并且团体成员互相对彼此负责。然而,美国人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社会关系松散,人们更多地只关注自己和其直系亲属。美国人的内团体种类有限并且其成员通常只包括他们自己的直系亲属。所以虽然美国人有很多不同的团体或组织,但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相互合作,在心理上并没有集体归属感。例如,在《人民的名义》中,林华华、陆亦可、周正以及他们的上级侯亮平都属于一个内团体,而在美剧《纸牌屋》中,虽然副总统唐纳德和国务卿凯瑟琳都对总统弗朗西斯负责,但他们只是同事而非内团体成员。社会距离是影响言语行为礼貌程度的三个维度之一(Brown et al., 1987),由于美国人除了直系家庭成员外,彼此不以内团体成员的身份对待对方,所以他们往往会使自己表现得更有礼貌,倾向于间接拒绝他人。而当中国人与内团体成员互动时,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社会距离很小,所以他们通常会不考虑是否或怎样会使自己表现得礼貌,而是直接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美国人常用的第三种策略是“说明原则”策略,而中国人常用的是“回避”策略。特定拒绝策略使用的差异反映了中美社会中面子的不同内涵。根据Mao(1994)的相对面子构想理论,中国人的面子观倾向于“理想的社会身份”(ideal social identity),中国人认为社会和谐高于个人行动自由,所以个体行动易受他人影响。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关注自己的欲望、主动性以及渴望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因而美国人的面子观更倾向于“理想的个人自主性”(ideal individual autonomy)。Mao(1994)认为,具有自我导向特征的面子观适用于西方文化,但在重视个人归属感和集体完整性的中国文化中却不适用。美国人对“说明原则”的偏好反映了他们更强调自己的感受、想法以及行动自由。而中国人对回避策略的偏好反映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注重社会和谐。在中国文化中,面子的重点不在于顺从自己的意愿,因为中国人都希望得到自己所在群体的接纳、认可和赞赏,而并非追求过度实现个人自由。

5. 结语

本文基于相关拒绝策略理论,对《人民的名义》和美剧《纸牌屋》中收集到的语料予以分类并进行质化、量化对比分析,发现中美在拒绝他人时,中方人士比美方更关注双方社会地位差距;此外,中美人士在拒绝不同社会地位人群时,对拒绝策略的使用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是因为中美双方都遵守礼貌原则,在拒绝他人时,尽量保护双方面子以及避免尴尬;不同之处主要源于中美“内团体”内涵及成员组成不同、中美权利距离指数不同以及中美面子倾向性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 洪岗,陈乾峰,2011.中美新闻发言人拒绝策略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43(2):209-219,319-320.
- 宋晓燕,2010.从英语电影看拒绝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 王勃然,胡燕玲,2001.从文化差异看汉英的语言差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93-295.
- 王超超,2016.拒绝策略研究:以英剧《是,大臣》为例[J].海外英语(22):185-199.
- BEEBE L M, CUMMINGS M C, 2006. Natural speech act data versus written questionnaire data: How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ffects speech act performance[C]//GASS S, NEU J. Speech acts across cultures: Challenges to communica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65-86.
- BEEBE LM, TAKAHASHI T, ULISS-WELTZ R, 1990. Pragmatic transfer in ESL refusals[C]//SCARCELLA R, ANDERSEN E, KRASHEN S 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ewbury House: 55-73.
- BROWN P,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ÉLIX-BRADDEFER J, 2006. Linguistic politeness in Mexico: Refusal strategies among male speakers of Mexican Spanis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2158-2187.
- GASS SM, HOUCK N, 1999. Interlanguage refusal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Japanese-English[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HELD G, 1992. Politeness in linguistic research[C]//WATTS R J, IDE S, EHLICH K. Politeness in language: Studies in it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31-153.
- HOFSTEDE G, 2010. The globe debate: Back to relev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 527-532.

- HOUSE R, HANGES P, JAVIDAN M, et al, 2004.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LAKOFF R T, 1989. The limits of politeness: Therapeutic and courtroom discourse [J]. Multilingu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8(2-3): 101-130.
- MAO L R, 1994.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5): 451-486.
- MORKUS N, 2014. Refusals in Egyptian Arabic and American Englis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70): 86-107.
- OLSHTAIN E, BLUM-KULKA S, 1985.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and the testing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 Language Testing, 2(1): 16-30.
- ROBERT W, STANLEY C, 2002. The immediate experience: Movies, comics, theatre, and other aspects of popular culture[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白春苗,女,1995年2月生,山西忻州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

王勃然,男,1972年7月生,江西黎川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外语教育、认知语言学等研究。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 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①

高艳荣



摘要:“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自古以来就是俄汉民族感兴趣的主体、人类永恒的话题。与“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相联系的语言文化单位在俄语和汉语中异彩纷呈,表现出俄汉民族对“судьба/命运”的感悟。本文选取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的语料作为语料来源,按照词性归类法,即按照语言文化单位词性的不同来划分的方法,从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等几个方面分析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聚合关系语言文化场的异同,丰富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组合关系;对比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ield of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GAO Yanrong

Abstract: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has been a subject of interest to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s and an eternal topic of mankind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unit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судьба/Fate” are colorful in Russian and Chinese, showing the perception of “судьба/Fate” amo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 This article selects Modern Chinese Cor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CCL Corpus) and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as the source of the corpus,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the part of speech, that is to say, the divis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t,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ield of the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from the adjective field, the verb field, the noun field and other parts of

^① 本文系“2021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N2021009)和2019年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基础俄语”的阶段成果。

speech fields, etc. Several aspects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ield of the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Keywords: Fate concep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ield;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 contrast

1. 引言

根据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中语言文化单位的特点,我们发现,分层逐级划分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因此,我们采用的是词性归类法,即按照语言文化单位词性的不同来划分“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词性归类法不是唯一的,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视情况而定。我们认为,这样划分既能清晰地表达组合关系场所反映的俄汉两族的命运观念,又能丰富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的理论体系。同时,本文选取的语料是从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筛选的,因为语料库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实施的可行性更强。

2. 语言文化学视角下组合关系的界定

“在纯语言学层面,组合规则指句法构造内各单位相互结合的规则。词、词的形式、词组和单句都有组合规性能,后者包括搭配能力、组成句法构造的能力及形成句法联系时有无限制。”(信德麟等,2009)⁴⁶⁴而叶蜚声和徐通锵在《语言学纲要》(1981)中从符号学的角度定义了组合关系。他们认为,组合关系是“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叶蜚声等,1981)³³。

彭文钊、赵亮在《语言文化学》(2006)⁷³一书中对语言文化场中的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关系做了明确的定义。他们认为:“组合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表现为符号、概念或客体的功能运作,其结果是基于场性分工的基本单位可搭配性(价)——语言搭配和文化搭配的实现;其实质是人在该语言文化场与其他场相互作用所限定之文化语境中的活动的符号化表达。……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介入的文化因素,文化本身的隐性表达和文化—心理联想。”

通过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领域对组合关系的界定,我们能够看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分析语言文化场中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关系,指的都是一种搭配的关系,只是在语言文化学视域下研究时,我们更应关注这种搭配下体现的文化价值。

3.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对比

任何一个语言文化场都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世界观模块。我们在语言文化学视角下对“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进行描写与阐释,分别从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等几个方面分析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的异同。

3.1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形容词场

通过对“俄语国家语料库”以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同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同俄语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共有 118 个,与汉语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共计 79 个。我们根据这些形容词的语义信息进行归纳整合分析。

3.1.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场

(1) 社会属性场

“社会通常指那些生活在一个固定地区、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陈俱生,2002)⁸⁹²“属性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陈俱生,2002)⁹⁴⁶我们认为,人类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高级生物,其一切生产、生活活动均是受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的,人类本身就处于千千万万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决定了人类的高级性社会性动物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放等,2021)¹⁸ 本文认为社会属性是指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本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经过分析有如下一些词,这些词的义素成分都能显示出“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社会关系”,这类形容词主要有:*народная*(人民的),*человеческая*(人类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国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民族的),*общая*(共同的),*личная*(个人的),*собственная*(个人的),*женская*(女性的),*политическая*(政治的),*историческая*(历史的),等等。例如^①:

① Но в этом-горь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удьба*, жизни тысяч малых, старых и женщин,-кто обрати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их горе?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На болотной стежке. (但这就是苦难的人民的命运,那些关注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的生活的命运。))

① 本文的语料来源: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语料库):<http://ccl.pku.edu.cn>;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国家语料库):<http://ruscorpora.ru/ssearch-mail.html>。

②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убивает предателя с первых же дней войны, куда ни забрасывала его *солдатская судьба*,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всегда искал зэзяка. (阿列克谢·库里科夫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杀死了叛徒,不管他当士兵的命运会如何,阿列克谢·库利科夫一直在寻找同胞。)

可见,俄罗斯人相信命运,在他们看来,不论是个人的、民族的,还是全人类的,或者他们与周围事物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命运”密不可分。

(2) 不可避免场

“不可”是指“不可能;不可以”。(陈俱生,2002)⁷⁷“避免”是指“设法不使某种情况发生。”(陈俱生,2002)⁵⁰“不可避免”,即无法阻止某种情况发生。因此本场中主要的义素成分是“无法避免而注定要发生”。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 *неизбежная* (不可避免的), *непредотвратимая* (不能防止的), *неминуемая* (注定的), *неминуемая* (必然的), *фатальная* (命中注定的), *неотвратимая* (无法阻止的), *самовластная* (主宰一切的), *неумолимая* (不可改变的), 等等。例如:

① *Неизбежная судьба*, рок, фатум? Тоже плохо для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不可避免的命运、运气、厄运? 同样不利于生命的意义。)

② Я верю не в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а в непреложную силу темного рока. Фатум, рок, *неотвратимая судьба!* (我不相信预感,但我相信命运无可争辩的力量。厄运,运气,必然的命运!)

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命运要由上帝来决定,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命运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3) 不可预知场

不可预知,即不能预先知道事件是否发生,如何发生。因此,本场中的义素成分主要指“无法控制、变化莫测,具有神秘色彩”。在“不可预知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 *загадочная* (神秘的), *замысловатая* (奥妙的), *капризная* (变幻无常的), *коловратная* (变化莫测的), *изменчивая* (变化无常的), *неведомая* (神秘不解的), *неверная* (不忠实的), *обманчивая* (不测的), *тайная* (神秘莫测的), *неизвестная* (无人知晓的), *непостижимая* (无法解释的), *непостоянная* (不寻常的), *висящая в неизвестность* (悬而未决的), 等等。例如:

① Его пугала далекая, занесенная снегом Сибирь,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судьба* брошенной туда младшей сестренки... (他被远处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吓坏了,她对仍在那里的小妹妹的命运一无所知……)

在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中,命运是无法预知的,未来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掌控。同时,命运也是多变的,正是命运的这种多变性,使得俄罗斯人更容易形成顺从的思想。

(4)幸福美好场

“幸福”是指“享受到或满意于舒适、安全或愿望得到实现的心里境况”。(陈俱生等,2002)¹¹³¹“美好”,是指“在能力和前途方面令人鼓舞、胜人一筹的”。(陈俱生等,2002)⁶⁵⁴因此,本场中所包含的义素成分主要是“好”,能给人带来满足,让人鼓舞的形容词。在“幸福美好场”中与 *судьба* 相搭配的形容词有:прекрасная(美好的),благодатная(富足的),благосклонная(有好感的),великая(伟大的),высокая(崇高的),гордая(高尚的),дивная(美好的),добрая(善良的),прихотливая(奇妙的),красивая(美妙的),прекрасная(美好的),светлая(光辉的),светозарная(充满幸福的),славная(令人满意的),счастливая(幸福的),хорошая(好的),等等。例如:

①Этой книге была уготована прекрасная судьба.(这本书注定有美好的命运。)

②Все озаглавили: “Чудесная судьба”.(所有人都加上了标题:“奇妙的命运”。)

尽管在俄罗斯人看来,命运无法掌控,但是他们仍然希望一切好的事情发生,希望命运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但是,根据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和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是幸福美好的,但是结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5)不幸灾难场

“不幸”是指“令人失望、痛苦的;表示不希望发生的却发生了;灾难;祸患”。(温端政等,2016)⁹⁷“灾难”是指“导致毁灭性或巨大损失的灾祸”。(陈俱生,2002)¹²⁷⁹该场的主要义素成分是“倒霉、不走运、不祥”等。在“不幸灾难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бедственная(苦难的),безжалостная(残酷无情的),безотрадная(凄凉的),бесславная(可耻的),等等。例如:

①С отчаянием увидел я, куда бедственная судьба завлекла Антиоха.
(我绝望地看到了安提阿遭受了苦难的命运)

②Жестокая судьба отняла у вас право носить имя вашего отца.(残酷的命运使您失去了拥有您父亲名字的权利。)

在“不幸灾难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词在这五个场中数量最多,由此可见,在俄罗斯人的意识观念中,命运总是会给人带来不好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一方面人们顺从命运,认为命运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想与命运抗争。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的影响下,俄罗斯人民具有顺从、苦行、善良、同

情等特点。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人们的命运中存在着上帝的形象,人们要对上帝顺从,要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

3.1.2 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

“汉语语法中形容词的构成方式最为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分类。按照能在句子中充任什么成分,可以把形容词分成一般形容词(如“很红”)和非谓形容词(如“共同”);按照其表达功能分为性质形容词(如“伟大”)和状态形容词(如“红通通”);把“大、长、粗、厚、高、胖、热、好、积极、快、熟”等称为正向形容词,把“小、短、细、薄、矮、瘦、凉、坏、消极、慢、生”等称为负向形容词。”(刘月华等,2017)¹⁹⁰⁻¹⁹³同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分类相适应,我们同样将与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形容词按照其义素成分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子场:

(1) 社会属性场

该场内包含的形容词主要有:伟大的,不平凡的,最终的,今后的,以后的,同样的,共同的,不同的,不相同的,相同的,相似的,类似的,公正的,等等。例如:

①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

②褚英听了,不觉眼睛一亮,去算一下未来的命运,也可以及早防范呀!

在社会属性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大都是表示时间和相同与否的词。没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只有个别的,如“伟大的”“不平凡的”等,这类形容词属于性质形容词,具有褒义的色彩。

(2) 不可避免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无法抗拒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抗争的,等等。例如:

①衰亡和毁灭是度过了光辉灿烂的时期后恒星所无法抗拒的命运。

在不可避免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的义素成分大都指“注定、不可避免”。这些词使用很广泛,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也是认为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既定的。直到延续到当今,有一些人还是这样认为,于是这类形容词也会经常使用。

(3) 不可预知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无法预知的,不可改变的,变化无常的,斑驳陆离的,变化的,起伏变化的,多变化的,大落大起的,生死未卜的,等等。例如:

①我是为这些不可改变的命运感到难过。

②他没有收入,变化无常的命运把他压倒了。

(4) 幸福美好场

幸福美好场中有以下形容词:幸福的,好的,很好的,更好的,美好的,最好的,较好的,等等。例如:

- ①好的教养往往给一个青年带来好的命运。
②李光头反而有了一个很好的命运。这兄弟两人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

(5) 不幸灾难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艰苦的,失败的,悲惨的,不幸的,失利的,等等。例如:

- ①“……为什么那个少女必须背负这么艰苦的命运?”
②朋友家出了大事情,都急急慌慌赶来看,一个个大睁着眼睛,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3.1.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异同

上文我们借助俄汉语料库中的具体例子,分别归纳整理了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的各个子集。在每个子集中其构成单位都具有相同的义素成分,这些义素成分也就是各个子集形成的基础。为了做到对比分析的直观性,我们对各子集的形容词的数量进行了定量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义素分析法对每个子集内的语言文化单位所包含的相同义素成分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寻找各个子集差别义素的语义特征,其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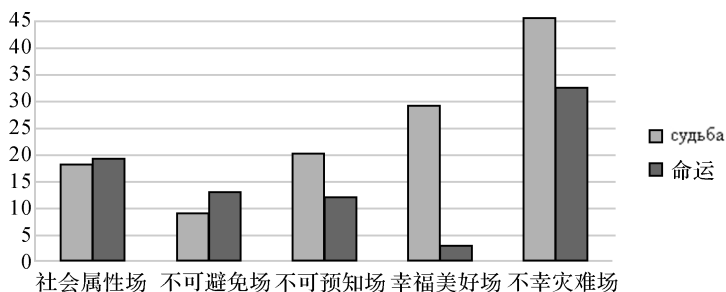


图1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的形容词场组合关系统计图

参照图1,得出结论如下:

俄汉语中观念词 *судьба* 与观念词“命运”的共同之处在于,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表消极意义的形容词要多于表积极意义的形容词,这是由“命运”的不可抗力决定的,因为人一出生就被赋予“命运”,因此,人们对“命运”不可变性表现出恐慌的心理,由此,对于“命运”的表征也就具有共同性,这也就是“命运”“好/坏”的对立。但是,这种共同性中又存在个性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汉语中,从数量上看,汉语中表示“命运”不幸的数量是32个,远大于表示美好的数量3个。

在“幸福美好场”,俄汉两种语言差别不大。在该场中,俄汉语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都既有“好的”这个义素成分,又有“幸福”这个义素成分。这是因为,“命运联系于希望,就像幸福和‘爱’联系一样,命运和幸福都需要去相信。”(科列索夫,2006)¹⁴⁰,换言之,судьба(命运)即 вера(信仰)。

通过对上述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的分析,我们认为,俄汉两个民族的意识中“命运”常常与“不幸”相联系,都认为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预知的”,其不同点在于汉民族不认为命运可以带来好运;俄罗斯民族认为命运的“不可避免性”要多于“不可预知性”。

从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可以看出,俄汉两个民族对待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的态度是存在差异性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观念显然更加极端,好与坏均要达到极致。

3.2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动词场

“动词表示作为过程的行为,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动词是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最丰富的词类,除了体、态、式、时、人称等动词的语法范畴外,有些动词形式还具有性和数的范畴”。(张家骅,2006)⁷³在本小节,我们在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进行分析时,主要从动词态的角度切入。

我们认为,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在句中抑或充当语义主体,抑或充当语义客体,因此其所在句子就表现为被动结构以及主动结构两种形式,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同观念词搭配的“动词场”。需要强调的是,同上文一样,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力图在最大的语料基础之上进行的相对封闭的研究,其语料来源俄语为“俄语国家语料库”,汉语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所进行的是以样本估计总体的研究方法。

3.2.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场

(1) 主动结构场

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其主动结构是指,*судьба* 是行为的主体,在句中做第一格形式的主语,其谓语相应地位主动态动词或动词的主动态形式。这类动词主要有: *свела*(带来), *обещает*(承诺), *забросила*(引领), *ведёт*(引领), *сводила*(牵着), *отказала*(拒绝), *улыбнулась*(笑), *смеется*(笑), *сложилась*(形成), *случилась*(发生),等等。参见以下例句:

① Судьба сразу *подбросила* мне подарок — заказ на скульптурный портрет. (命运立刻抛给我一个礼物——定做雕像。)

② Но судьба *отказала* Шанель в замужестве, и для мира моды она осталась Великой Мадмуазель. (但是命运使沙内尔失去了婚姻,对于时尚界来说,她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2) 被动结构场

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其被动结构是指,*судьба* 是行为的客体,其在句中主要作为第一格的形式主语存在,该类动词主要有: *определялась*(被确定), *переменится*(被改变), *распорядилась*(被宣布), *решена*(被解决),等等。参见以下例句:

① *Моя судьба решилась*…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

② *Мы с ней уже знали наверняка, что судьба распорядилась правильно.*
(她和我都知道命运的安排是正确的。)

从上述例句中,我们看到,观念词 *судьба* 作为第一格形式主语存在,其表达的是行为客体意义,此时,行为主体并没有出现。

从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动词被动态形式与主动态形式出现的数量角度出发,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所组成的句子结构以主动结构为主。同时,这也就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观念词 *судьба* 作行为主体的时候居多,从而说明俄罗斯人的语言意识习惯是将 *судьба* 作为行为主体,人作为行为客体的。由此,我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观念的突出特点“命运”具有强制性,人是受到“命运”控制的。

3.2.2 与“命运”搭配的动词场

同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分类相适应,在分析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动词时,我们同样从被动结构、主动结构两个角度出发。

(1) 主动结构场

汉语中的主动结构是指“命运”是动作的主动发出者,人或事物是动作的承受者。与观念词“命运”搭配,并表示主动结构的动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即“主动结构场”。这些动词有:选择,改变,决定,掌握,给,拨弄,带向,捉弄(了),打击,给予,安排,摆布,领着,拖着,赐予,安排,注定,开玩笑,嘲弄,露出,垂青,推上,造就,亏待,包含,不依人愿,敲门,推开,发生,逆转,揶揄,折磨,引起,牵动,等等。例如:

① 你不去选择命运,命运才选择了你。(《读者》)

② 我真的打算要离开,而且已经决定动身了。但是,该死的命运捉弄了我!(《龙枪传奇》)

(2) 被动结构场

在汉语中,被动结构的一般形式主要有“受……所”、“被……所”等结构。同观念词“命运”相搭配,表示被动意义的动词主要有:遭受……,听任……摆布,受……左右,归因于,屈服于,向……屈服,屈服于……,被……安排,被……赐予,被……播弄,受……捉弄,等等。参见例句:

①罗密欧,唉!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②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受命运的指引,找到我们的归宿。(《塞莱斯廷预言》)

大量的例句表明,在汉语观念词“命运”的被动式中,“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受到“命运”安排的。我们认为,此类动词往往是暗含着“与‘命运’斗争”的意思,例如“改变命运”“掌握命运”“选择命运”等。

因此,在语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动词的被动结构场中,中国人一方面将“命运”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在主动结构场中,又表现出了与“命运”抗争的心理。从数量上看,表示“不可避免的”意义的动词的数量远少于表示主动意义的“与‘命运’斗争”的动词的数量,这也说明,在汉民族的语言意识中,虽然“命运”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是它同时具有改变的可能性。

3.2.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场异同

通过对俄汉语料库中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的主动态形式与被动态形式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俄汉语中与“судьба/命运”相搭配的动词差异性比较明显。总的来说,俄语动词场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人的观念是受“命运”控制的,而汉语动词场则表现出,汉民族认为“命运”的观念具有改变的可能性。

3.3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名词场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包括空间、方位和时间)名称的词。”(刘月华等,2017)³⁵由于俄汉两种语言本身的语法规则的不同,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形式也随之不同。我们同样采用义素分析法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进行分析,探讨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名词场的异同。

3.3.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场

在俄语中,名词可以在句子中充当任何句子成分。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则主要充当 *судьба* 的定语,表示领属意义,即为 *судьба* 的所有者。这类名词多以第二格的形式修饰观念词 *судьба*。根据义素的差异性特征,我们将能够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划分为“国家场、人类场和民族场”。

(1) 国家场

国家场,即能够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并表达“国家”异议的语言文化单位的集合。这样的名词主要有: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俄罗斯的(命运), (*судьба*) республик 共和国的(命运), (*судьба*) Отечества 祖国的(命运),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国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 режимов 政权的(命运), 等等。例如:

①И вообще, не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а судьба режимов. (通常,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政权的命运。)

②От того, как сложится судьба этой банды, зависит будуща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俄罗斯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集团的命运。)

在国家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国家”这个义素成分,只有一个表示“政权”,这也说明,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关心国家的政权由谁掌管,因为掌管的人不同,俄罗斯人自身的命运也会不同。

(2)人类场

人类场所指的是以人为圆心,以其在社会、家庭中的称谓为半径所构成的场的集合。这类场的语言文化单位主要有:

(судьба) женщины 女性的(命运), (судьба) матери 母亲的(命运), (судьба) мужчины 男性的(命运), (судьба) поэта 诗人的(命运), (судьба) детей 孩子的(命运), (судьб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知识分子的(命运), (судьба) народов 人民的(命运), (судьба) граждан 公民的(命运), 等等。例如:

①От вас зависит и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матери. (未来母亲的命运取决于你们。)

②Судьба поэта зависит от жизненного мифа. (诗人的命运取决于生活中的无稽之谈。)

在人类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大都是一类人的命运,具有相同称谓的人的命运,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体。从这些语言文化单位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崇尚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大。

(3)民族场

“民族”是“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聚居地相对集中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温端政,2016)⁸⁶⁴ 因此,“民族场”所指的就是其所构成的场的集合。这类场的语言文化单位主要有:(судьба) империи 帝国的(命运), 等等。

另外,“形容词(代词)+名词组合”也可以修饰 *судьба* 作非一致定语。这类组合主要有(судьба)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小人物的(命运), (судьба)своей страны 自己国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партии Либер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俄罗斯自由党的(命运), (судьба)молодого политика 年轻政治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历史人物的), (судьба) цел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一代人的(命运), 例如:

①Понятна теперь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партии. (现在党的未来命运很明朗。)

②Но великий народ, народ со своей больш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со свои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обязан быть добрым,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с ним соединена судьба *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但是伟大的民族,具有本族大文化的民族,具有本族传统的民族都应是善良的,特别是小人物的命运和其紧密相连时。)

在民族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更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而且大部分都是“形容词(代词)+名词”组合结构,并不是具体的一个单词。从这些语言文化单位可以看出,很多名词都是时代的产物,例如:(*судьба*) *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小人物的(命运),(*судьба*) *партии* 党的(命运),(*судьба*) *молодого политика* 年轻政治家的(命运)等。

综上所述,在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场中,各子场使用的名词的数量差距不大,人类场中名词最多,这也说明在国家 and 民族立场面前,俄罗斯人更多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一类人的命运。

3.3.2 与“命运”搭配的名词场

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名词其主要形式是与助动词“的”连用,在句中充当定语,共同修饰观念词“命运”。

按照义素成分的不同,我们将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名词同样划分为“国家场,人类场,民族场”三个层次。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在俄语分析过程中,我们所列举的语言文化单位均是观念词的直接修饰成分,比如在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结构中,我们要分析的语言文化单位已不是 *страна* 的原型,而是将其变格后的二格形式。那么在诸如同“祖国”与“的”连用修饰“命运”的相似结构中,其搭配后的语言文化单位中带有助动词“的”的这种结构也就是名词性的,不是形容词性的,因此,我们也将该种形式列入名词场。

(1) 国家场

在“国家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家族(的),中国(的),国家(的),祖国(的),民族(的),政治(的),时代(的),阶级(的),共和国(的),历史(的),等等。例如:

①他把清廉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融为一体,使人生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②45年来,我院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走过了一条充满光明而又艰难曲折的道路。

在国家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的语言单位基本都有“国家”“时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所以,国家的命运高于一切,这种观念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我们有这种意识思想观念,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分不开的。

(2) 人类场

该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人类(的)，人民(的)，个人(的)，人物(的)，普通人(的)，等等。例如：

①以三个女性的命运揭示了不同的人对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改革的尖锐矛盾。

②这样的二律背反，矛盾冲撞中、裂变重塑中，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人类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相当丰富，有个人、有亲属称谓的、有一代人的。所有这些只要与“人”有关系的词都与命运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所有人的命运都应该受到关注，都应该被尊敬，不能看不起、瞧不起任何人。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和”的思想。

(3) 民族场

该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老百姓(的)，华侨(的)，华人(的)，农奴(的)，儒家文化(的)，海外侨胞(的)，农民(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等等。例如：

①洋华工许大成的故事，反映海外华侨的命运和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事实。

②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在民族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充分体现中国有别于别国的最本质的特征。

3.3.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场异同

在同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场中，俄汉两个观念词的共同性在于，与其搭配的名词均具有“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相同语义成分，而其内部的语义差别则通常与俄汉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如俄语名词二格形式 империи, партии 修饰 судьба, 汉语“老百姓的”“农民的”“儒家文化的”“华人的”“华侨的”“中国共产党的”等形式修饰“命运”。

3.4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其他词类场

在俄汉语中，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词类除了形容词、动词和名词外，还有其他词类，这是数量相对较少，比如数词，代词等，它们在反映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方面不占据主要地位，其差别也并不明显。

3.4.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其他词类场

(1) 数词场

主要有 одна, две, четыре 等数词, 参见例句:

① Два мира—две судьбы: Сходства и отлич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западного креативного рынка? (两个世界—两种命运: 俄罗斯和西方创意市场之间有何异同?)

② Кто был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идумать четыре столь различных характера, четыре судьбы, четыре стилия — задача, с которой даже в XIX или XX веке вряд ли справился бы самый талантливый писатель? (谁能想出四种不同性格、四种命运、四种风格的人? 在 19 世纪或 20 世纪, 最有才华的作家也未必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数词场中,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都是数字小的整数词, 如一、二、三、四等。因此,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 命运的选择性并不多, 往往有一种、两种、三种、最多四种命运之路选择,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是一和二。

(2) 代词场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代主要有: моя, наша, ваша, её, его, их, твоя, 等等。

① Личная его судьба непроста. (他的个人命运并不容易。)

在代词场中, 我们不难发现, 所有的物主代词都可以与 судьба 搭配, 经研究发现, его, моя 这两个词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频率最多。其中, его 出现的频率为 498, моя 出现的频率为 337, 其次是 их(181), наша(141), 由此可见,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 “他的”命运备受关注。

3.4.2 与“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

(1) 数量词场

在汉语中经常用“一种”“另外一种”“两种”等形式修饰观念词“命运”, 此时, 是数词“一”“两”与量词“种”组合共同修饰“命运”。例如:

① “这是历史的选择”——抗战胜利后, 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身历“下关惨案”的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再一次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在数词场中, 与“命运”搭配的词只限于“一、二、三”, 没有再多的数词与“命运”搭配。这也说明, 对于中国人来说, 命运的选择性同样不多, 使用频率高的也是数词“一”

和“二”。

(2) 代词场

汉语中的代词,如“我”“你”“他”等与助动词“的”连用,也可以与“命运”搭配,修饰“命运”,常见形式有: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自己(的),自身(的),等等。例如:

- ① 你们要记住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 ② 在社会变革的时期,有些人不了解发展的趋势,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

在代词场中,所有的人称代词都可以与“命运”相搭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他”(240),其次是“我”(165)、“他们”(166)、“她”(124),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第三人称的男性的“他”的命运备受关注。

3.4.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异同

通过对上述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与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以数词和代词为主,此时,它们的语义基本相同。这说明其他词类场在反映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时差异性并不明显。

在代词场中,我们发现,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代词基本相同,而且使用频率排在前三的都是一样的,即 *его/他(的)*, *моя/我(的)*, *их/他们(的)*。这说明代词在俄汉两族人民使用过程中频率是一样的。

但在数词场中,与 *судьба* 相搭配的数词有一、二、三和四;而与“命运”搭配的数词有“一、二、三”。这说明,无论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还是中国人来说,命运都有几种选择,而俄罗斯人的选择要更多。

4. 结论

我们从语言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在语言文化场中的组合关系。根据组合关系的内涵,我们从搭配的角度分析了能够跟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各种词类(主要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以及其他词类(如数量词、代词等等)。尽管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但通过在俄、汉权威语料库中收集的大量语料及其对这些语料进行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在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时所涉及的词类当中,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形容词在数量上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其次是动词和名词,最后是其他词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心结构中,我们从组合层面将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语言文化单位进行分类,形容词占据核心地位,动词和名词处于中心位置,而其他词类则处于边缘位置。

我们是根据语料的实际情况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词类进行归类,对与“судьба”和“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名词和动词进行划分,在“形容词场”中,俄汉语都是从

“社会属性场”“不可避免场”“不可预知场”“幸福美好场”和“不幸灾难场”五个方面归纳整理;“动词场”分为“主动结构场”和“被动结构场”两个部分;“名词场”中均可划分出“国家场”“人类场”和“民族场”;“其他词类场”主要划分为“数词场”和“代词场”。通过结合语料,我们能够观察到俄、汉两个民族在对待“судьба/命运”时的不同态度,能够从各个侧面挖掘其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上的差异能够体现文化上的差异;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在语言文化场中的组合关系中体现出的差异性也反映出了其民族性的不同。

参考文献:

- 陈俱生,2002.现代汉语辞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高放,高哲,张书杰,2016.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M].增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8.
- 科列索夫,2006.语言与心智[M].杨明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40.
- 刘月华,潘文娉,故鞲,2019.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0-193.
- 彭文钊,赵亮,2006.语言文化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73.
- 温端政,2016.新编现代汉语词典[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864.
- 信德麟,张会森,华劭,2009.俄语语法[M].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464.
- 叶蜚声,徐通锵,1981.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3.
- 张家骅,2006.新时代俄语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73.

作者简介:

高艳荣,女,1987年1月生,河北秦皇岛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语言学及世界语言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文化学、对比语言学、俄语教学法研究。

语料库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①

洪敏芳 王昕玥 李 平



摘 要:语料库已逐渐成为课堂中的重要教学工具。本研究综述语料库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中国知网上 2011—2020 年 320 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语料库间接应用于教学、语料库直接应用于教学和语料库建设三个方面对论文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该领域在过去 10 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人们对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的研究兴趣持续不断逐渐兴起等,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前人研究空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理论研究成果在外语课堂实际应用研究不足,研究内容广泛而不均衡以及国内语料库的资源建设和共享不足等。

关键词:语料库;英语教学;文献综述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rpora in English Teaching

HONG Minfang WANG Xinyue LI Ping

Abstract: Corpor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tool in the classroom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delivered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orpora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king 320 core journal papers on CNKI from 2011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s are meticulously studi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orpora indirectly applied to teaching, corpora directly applied to teaching and corpora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uitfu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field in the past decade, including a wider range of research areas and the gradual rise of research on corpora for teaching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which has largely filled the gaps in previous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lso existed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such as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into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extensive and uneven research,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he corpus resources in

^① 本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JCX21_0217)的研究成果。

China.

Keywords: corpus; English teaching; literature review

1. 引言

Sinclair(1999)⁴把语料库定义为根据明确的语言标准选择和排序的语言片段集合,可作为某种语言的样本。语料库语言学则是以语料库提供的真实语言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大量的语言事实进行分析后总结出语言使用规律,这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杨惠中,2002)。语料库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实证性质,它将大量真实的语言数据汇集在一起,让语言分析更加客观科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语料库已被广泛运用于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语用学、语义学、翻译与对比研究,二语习得和语言教学等,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数据驱动学习是一种基于语料库的外语学习方法,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并被赞为“外语教学的一次变革”(Hunston,2002)¹。

许多学者也曾对我国语料库和外语教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如闫超亚(2010)和方秀才(2012)分别就2000—2009年和1981—2010年间发表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有关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与研究的论文做了统计分析,总结了这两个阶段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因此,本研究文献选取范围始于2011年初,止于2020年底。在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语料库在英语教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笔者对2011—2020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320篇研究论文做了统计分析,并针对研究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今后国内语料库英语教学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参考。

2. 研究目的与问题

通过对所选论文进行细致的分析归纳,以期了解我国语料库应用于英语教学研究的最新动态,本文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在2011—2020年10年间语料库应用于英语教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2)语料库应用于英语教学研究有哪些主要内容及特征?(3)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搜集工具

本文主要以CiteSpace为主要工具,将近10年来语料库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导入软件进行图谱分析,并根据所得图像进行深入的精细化的分类统计。再使用教育文献法对文献进行深入的解读,了解该领域的发展态势。CiteSpace以知识域为对象,

以图像的形式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从而揭示科学结构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陈悦,2015)。CiteSpace 的分析结果具有直观立体快速科学的特点,软件自开发以来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在国内也得到了广泛使用。

3.2 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语料库”“教学”以及“语料库语言学”“数据驱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等关键词在 CNKI 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设置检索时间为 2011—2020 年,共 10 年,数据源设置为北大核心和 CSSCI。经过人工剔除会议信息、期刊简介、书评,会议论文,对外汉语教学和小语种相关研究,以及只涵盖语料库或者只涵盖教学的文献之后,共得到有效文献 320 条,本文将以此 320 条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是评价某个领域研究态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发表文献进行统计,可以得出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所选文献年度发文数量绘制的统计如图 1 所示,总体来看,国内核心期刊在此领域上的发文量并不高,年均发文量 32.8 篇,发文量最高的是 2011 年和 2015 年。除此之外,笔者在检索时发现这些文章部分来自于外语类的核心期刊,如外语电化教学和外语界等,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非外语类核心期刊,如中国成人教育、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等,这一现象体现了语料库教学的跨学科的本质,它以语料库为基本知识源,研究自然语言规律,从而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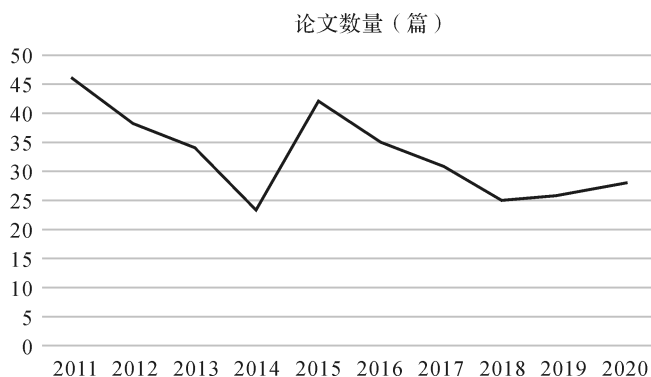


图 1 年度发文数量统计

3.3 具体分类情况

Leech(1997)将语料库在英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间接应用,主要是指教学资源 and 语言测试等;第二部分是直接应用,主要是指如何用语料库来进行课堂教学以及教学生如何使用语料库等;第三部分是面向教学的语料库建设,如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和专门用途语言语料库等。

语料库间接用于教学主要指把语料库和教学理论相结合研究,从而探讨出更好的教学资源 and 模式,用以指导教学实践。语料库在外语教学的直接应用首先是外语教学研究,偏向实际应用,所以这部分大都为实证研究,用以检测语料库在英语教学各个方

面的辅助是否有效,此分类下涵盖英语教学的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第三类则是前两类的基础,语料库在前两个重点中起着强大的辅助作用,只有把语料库建设好,才能更好地促进实际课堂语言教学。通过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参照 Leech 的分类情况,结合所得论文实际情况,将统计内容进一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语料库间接应用于教学,主要是理论研究;第二类是语料库直接应用于教学,主要为实证研究;第三类是面向教学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最后一类主要是一些会议评述等纯理论。每个大类下面都有次类,情况详如表 1 所示。

表 1 论文分类统计情况

| 分类 | 分类范围 | | 篇数 | | 比例(%) | |
|----|----------------|--------------|-----|----|-------|-------|
| 1 | 语料库间接应用于教学(理论) | 教学大纲、教学资源、教师 | 133 | 18 | 41.60 | 5.60 |
| | | 教学模式研究 | | 39 | | 12.19 |
| | | 词汇教学 | | 19 | | 5.94 |
| | | 语法教学 | | 4 | | 1.25 |
| | | 写作教学 | | 11 | | 3.43 |
| | | 阅读教学 | | 8 | | 2.50 |
| | | 听力教学 | | 2 | | 0.63 |
| | | 口语教学 | | 1 | | 0.31 |
| | | 翻译教学 | | 31 | | 9.69 |
| 2 | 语料库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 | 课堂话语研究 | 93 | 7 | 29.70 | 2.19 |
| | | 教学模式研究 | | 9 | | 2.50 |
| | | 写作教学 | | 19 | | 5.93 |
| | | 口语教学 | | 12 | | 3.75 |
| | | 语法教学 | | 7 | | 2.19 |
| | | 阅读教学 | | 1 | | 0.31 |
| | | 词汇教学 | | 32 | | 10.31 |
| | | 听力教学 | | 1 | | 0.31 |
| | | 翻译教学 | | 8 | | 2.50 |
| 3 | 面向教学的语料库建设 | 英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 | 57 | 42 | 17.80 | 13.13 |
| | | ESP 语料库 | | 14 | | 4.38 |
| 4 | 其他 | 理论和意义分析 | 35 | 15 | 10.90 | 4.69 |
| | | 综述 | | 20 | | 6.25 |

理论和实践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学资源、总体教学模式和英语教学各个层面的教学模式,如词汇、口语、语法、写作、阅读、听力和翻译等方面。数据显示,从研究内容上看,近十年来语料库外语教学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不同方面文章数量差别很大。有关理论

研究的有 133 篇,占论文总量的 41.6%,其中单独对课堂整体教学模式的研究就有 40 篇,占总论文的 12.5%。实践研究的有 95 篇,占 29.7%,其中词汇教学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写作和口语教学。在语料库建设方面,有 43 篇论文探讨通用英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以口译和笔译语料库为主。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专门用途英语(ESP)语料库的建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ESP 语料库的建设主要有旅游英语,航海英语,海事英语,学术英语,商务英语,信息技术英语,新闻英语和财经英语等方面。在具体的英语模块教学理论中,被研究最多的是翻译教学,其次是词汇和写作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应用中,被研究最多的是词汇教学,其次是写作教学和口语教学。由此可见,教学模式研究、翻译教学、写作教学、词汇教学和口语教学是 2011—2020 年的教学研究热点。以上数据更细致地反映了这 10 年间语料库英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重点。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选取的 320 篇论文中,研究对象呈现出广泛且多元化的特点,涉及成人教育学生、高职院校学生、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以及外语教师等,涵盖了我国高等教育大部分办学层次。与前人对过去 30 年语料库外语教学研究的成果相对比,近 10 年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在课堂教学方面,翻译教学依旧是热点,近 10 年来词汇口语和写作教学也开始受到重视。英语各方面的学习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拓宽研究范围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素质。在语料库建设方面,除了通用的英语大型语料库建设外,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语料库的研究逐渐兴起,以满足各特色专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4.1 教学模式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教学模式的研究占了很大一部分,共有 40 篇,占了 12.5%。这些教学模式中有针对英语教学的通用模式,如王晓雯、葛诗利(2015)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影视英语》精品课程改革为例设计了数据驱动教学模式,并探讨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实施方案。除此以外,学者们也在探索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模式,如高书娜(2016)从我国汽车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弊端出发,试图把语料库融入英语课堂教学中,提出了“数据驱动”的汽车专业英语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虽各有其特色,但都是以语料库为基础进行探索,强调激发学生个性化和自主化学习,让学生通过语料库这种真实的语料工具来发现语言的使用规律和特点,与传统的教师传授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却仅有 9 篇,如戈玲玲等(2014)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分析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表格中同样可以看出语料库在教学资源应用方面的研究依然不够。

4.2 听说教学

听力在语言四大技能中列于首位,是其他技能不断提升的基础。若将语言能力进行量化,我们听到的是说的2倍,是阅读的4倍,是写作的5倍(Morley,1991)。此外,听力理解是其他语言技能不断发展的基础。从表24.7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次,针对听力教学的研究数量还不够,只有2篇,口语教学的实证研究较多,达到了12篇。杨林伟、李婷(2015)采用行动研究方法开展多媒体新闻语料库自主学习研究,用问卷收集学习者对于这种教学平台的看法,分析结果表明,语料库对听力学习能起到很好的辅助的作用。

郑李卉和肖忠华(2015)以“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为基础,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常见的搭配错误,总结出了6种不同搭配错误的分布,并建议将语料库方法运用到大学英语课堂词汇教学中。李振营(2013)运用CIA(中介语对比分析法)对COLSEC和BNC这两个异国口语语料库进行词汇和词项特征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与英语母语者相比,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词汇的使用不足和过度使用现象。

4.3 读写教学

英语教学中把阅读视为输入,写作视为输出,两端处于平衡状态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写作教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中都是一个热点,但阅读教学研究受到的关注度却比较低,只有2篇,可见关于读写的研究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徐曼菲、何安平(2016)把语料库的关键词探究法和英语教学中的深度阅读相结合,在英语专业的精读课程中探讨了语料库辅助下的阅读教学模式,结果表明数据驱动的英语阅读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多种阅读微技能,提升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

董洪学、初胜华(2010)在分析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现状后,以输入假设理论为基础,将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语料库相结合,提出了基于计算机网络语料库驱动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架构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运用能力。王华(2020)提出将语料库驱动学习的理念及语料库技术应用到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探索一种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又切实可行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并应用于学术论文摘要写作教学。

4.4 语法词汇和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是一大热点,占到了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机器和神经翻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曾祥宏(2019)从MTI专业学位翻译教学的培养目标出发,针对传统翻译教学不足的分析,从教材编写、教学模式和翻译作业语料库建立这三个角度探讨如何将语料库有效应用于MTI翻译教学中。刘晓风、李德凤(2020)尝试将COCA单语语料库应用到英汉商务翻译教学中,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种能力”的教学方法。词汇学习是我国英语学习者的一大拦路虎,主要体现在单词记不住以及记住了却

无法正确运用,这一现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词汇教学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研究上都是一个热点,在所有的研究中占比 21%。闫长红(2018)在分析传统英语词汇教学课堂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语料库的运用优势,并进一步分析了语料库在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原则和策略。孟超和马庆林(2019)针对英语专业学生法律词汇学学习情况构建了基于在线语料库的法律英语词汇教学模型,实证研究表明该模型能有效促进学生法律英语词汇的认知与习得。相比之下,语法教学则不太受重视,理论和实践研究加起来一共 11 篇。吴军(2010)提出可以把语料库运用到英语语法教学中,来消除我国传统语法教学的弊端,并指明了未来研究改革和努力的方向。

4.5 语料库建设和利用

在语料库建设方面,除了通用英语语料库的建设,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 ESP 语料库的建设,主要包括旅游英语,航海英语,海事教学,学术英语,公安英语,商务英语,信息技术英语等。冯正斌、王峰(2016)从语料规模、语料采集、语料赋码方案等方面探讨了财经英语新闻语料库的初步建库理念,并探索语料库在专业英语词汇教学方面的应用。邓军涛、刘梦莲(2020)以欧盟委员会“虚拟现实口译”项目的视频语料资源库为例,从素材选取、语料切分、信息标注与场景模拟四个方面阐述如何深度开发面向口译教学的视频语料库。这说明国内语料库建设正在走向多元化,语料库作为工具提供的服务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针对的对象也越来越精准。

5. 问题与启示

本文选取的北大核心和 CSSCI 期刊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在 2011—2020 年间,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黄萍、闫超亚(2010)在梳理 2000—2009 年的相关文献时曾指出学界对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教师、口语教学、翻译教学、学习模式的探讨关注得很少,文体学教学、阅读分析课教学等小众领域没有涉及。这一现象在过去 10 年已经得到改进,王伟(2013),刘雯(2015)和余剑虹(2017)等陆续将语料库引进诗歌教学和英美文学教学课堂,填补前人研究空白。通过对 2011—2020 年间的文献梳理,本文也发现了一些研究不足之处。

5.1 外语课堂实际应用不足

在语料库间接应用于教学的理论研究方面的研究论文颇丰,占到了论文总量的 12.19%,相比之下,语料库辅助的课堂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较少,仅占 2.5%,理论成果的转化率还不够高。《课程要求》鼓励各高校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改进过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采用基于计算机的教学模式。学者们提出了众多教学模式,有广义上的多模态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模式等,也有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种能力”这样的具体教学策略,但其中真正运用到实证研究中的教学模式却寥寥无

几。教育部在200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要努力开发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教学模式,让英语的教与学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化的方向发展。从核心期刊文献数量来看,目前的实证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各层次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充分利用语料库在外语课堂应用的理论成果,进行广泛的课堂实践应当成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只有经得住课堂实践考验的教学模式,才是真正适合中国英语实际教学的新时代教学方法。

5.2 研究内容广泛而不均衡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针对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领域很广,几乎涉及了外语学习者会接触到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学习模式的探讨、口语教学、写作教学、语法教学、词汇教学、翻译教学、阅读教学等。也对前人的研究领域进行拓宽,如教师课堂话语的研究,教学资源研究和语料库建设等。其中的热点主要是教学模式和翻译词汇教学研究,对中国学生最薄弱的口语和听力部分的研究占比依旧很低,分别只占到7.4%和1.79%,这反映出对英语实际运用研究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口语是一个英语学习者综合能力的体现,“哑巴英语”依然是困扰中国英语学习者最大的桎梏。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大都为英语学习者的常见部分,但对于一些英语专业特有的课程如英语文体学和精读课程却没有涉及。

除此以外,对教师和教学资源(如课本和教学大纲),课堂话语等的理论较之前的研究有拓展,但关注度依旧不高。外语教学包括“教”与“学”,“教”的主体是老师,“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自身拥有过硬的语料库教学素养和语言意识对打造一堂好课至关重要。虽然针对语料库的课堂研究较多,但这些研究大都停留针对现有数据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没有深入分析受试者产生某方面外语学习障碍的根本原因。语料库语言学是外语教学的得力助手,在课堂上的教学能帮助学生暂时提高,只要找到学生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辅以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工具,才能真正达到授人以渔,让学生受益终身。

5.3 语料库利用率有待提升

语料库在外语课堂上的作用在于,训练学生通过语料分析主动去探索语言使用的型式和用法。虽然陆陆续续有不同高校的学者就自己所在学校的特色来进行ESP语料库建设,如财经英语新闻语料库,口译视频语料库和多媒体新闻语料库等,但是大都停留在建设构想层面,还未进行真正的建设;其次文献中涉及的语料库大都是国外的一些大型免费语料库,如BNC,COCA,BROWN等,国内的大型语料库,如CLEC(中国学习者语料库),CEME(中国英语专业语料库),PACCEL(汉英交替传译语料库)等十几个国内知名高校建立的大型语料库虽也有提到,但相比而言利用率并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采用了自建语料库的形式,如自建课堂话语语料库,美英报刊英语标注语料库(NEC)和英语阅读教材语料库(PCRC)等。这些语料库的建造耗费了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不加妥善利用,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虽然每个语料库是依照特定目的建立的,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但与国外相比,我国自建语料库的规模和内容无法满足学科发展所需。今后在资源建设和共享方面需要继续提高,只有充分吸收外来资源,加强国内语料库的建设与共享,才能更好地促进语料库教学研究的发展。

6. 结语

通过文献梳理分析,语料库在语言教学中应用研究在 2011—2020 年这个阶段趋于稳定,比过去 30 年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宽。所统计论文在总体上更侧重课堂教学理论创新,而忽视了外语教学实际。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但分布不均,教学模式研究、翻译教学、写作教学、词汇教学和口语教学是这一期间的研究热点。此外,国内语料库建设正在走向多元化,但现有语料库利用率有待提升。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朝英语能力各方面均衡发展,注重实证研究并加强 ESP 语料库的建设以及国内语料库资源的利用。本文对过去 10 年语料库外语教学的研究近况的概述和分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陈悦,陈超美,刘刚渊,等,2015.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研究,33(2): 242-253.
- 邓军涛,刘梦莲,2020. 面向口译教学的视频语料资源库深度开发机制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3(1):37-43.
- 董洪学,初胜华,2010. 基于计算机网络语料库驱动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5):27-32.
- 方秀才,2012.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与研究综述:成就与不足——根据 22 种语言学类 CSSCI 来源期刊近 30 年的统计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3):19-24.
- 冯正斌,王峰,2016. 财经英语新闻语料库的建设构想与教学应用[J]. 外语电化教学(2):54-58.
- 高书娜,2016. 语料库“数据驱动”的汽车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1(10):168-172.
- 戈玲玲,李广伟,刘彬,2014.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实证研究[J]. 外国语文,30(3):150-152.
- 黄萍,闫超亚,2010. 国内语料库应用于英语教学研究现状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31(5):44-50.
- 李振营,2013.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词汇特征研究[J]. 辞书研究(1):35-41.
- 刘雯,2015. 语言学教学中语料库文体学与狄更斯小说述介[J]. 中国教育学刊(1):47-48.
- 刘晓东,李德凤,2020. COCA 英语语料库在英汉商务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

- 翻译,33(1):29-32,61.
- 孟超,马庆林,2019.基于在线语料库的法律英语词汇教学模型实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82-89.
- 王华,2020.语料库驱动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探索:以摘要写作为例[J].外语学刊(1):49-55.
- 王伟,2013.读者反应教学法与网络资源结合在英语诗歌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79-82.
- 王晓雯,葛诗利,2015.大学英语的数据驱动教学模式研究: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影视英语》精品课程改革为例[J].外语研究(01):47-52.
- 吴军,2010.语料库与英语语法教学[J].外语学刊(01):104-107.
- 徐曼菲,何安平,2016.语料库技术促进英语深度阅读教学[J].中国电化教育(12):87-90.
- 闫长红,2018.英语课堂教学对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S1):94-96.
- 杨惠中,2002.语料库语言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杨林伟,李婷,2015.网络多媒体新闻语料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16):178-179.
- 余剑虹,2017.语料库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辅助应用——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J].中国教育学刊(1):112.
- 曾祥宏,2019.语料库辅助的MTI翻译教学探索[J].上海翻译(1):76-79.
- 郑李卉,肖忠华,2015.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搭配行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29-36.
- HUNSTON S, 2002.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 LEECH G, 1997. 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 A Convergence [C]//WICHMANN A, et al, 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 London: Longman:1-23.
- MORLEY J, 1991.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C]//CELCE-MURCIA.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ewbury House:81-105.

作者简介:

洪敏芳,女,1999年2月生,江西上饶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翻译学研究。

王昕玥,女,1998年7月生,江苏南通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李平,男,1971年9月生,湖北黄冈人,翻译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翻译学研究。

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基于省级行业面板数据^①

黄春山



摘要: 本文通过利用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 计算 2013—2020 年间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分析结果显示: 首先, 在整个样本时间内, 全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2.5%, 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 0.4%, 而技术进步下降 2.5%。其次, 中国文化产业以及三大子行业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文化产业以及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负增长。最后, 从地区角度而言, 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 其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 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增长引起。

关键词: 文化产业;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Industries

HUANG Chunshan

Abstra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chang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three sub-industries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by using Malmquist 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3—2020.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whole sample period, the TFP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decreased by 2.5%, of which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0.4%, while the technical progress decreased by 2.5%. Second,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three sub-industries generally show a downward trend year by year. The TFP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its three sub-industries increased negatively. Finally, from a regional

^① 本论文为大韩民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浙江地区海外韩国学种子型课题支持项目”(项目编号: AKS-2020-INC-2230008)的研究成果。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Seed Program for Korean Studie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KS-2020-INC-2230008).

perspective, the TFP increasing of the three sub-industries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mainly occur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improvement of TFP of cultu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mainly depends on technical progress, while the cultural 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 is mainly caused by technical efficiency.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progress

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关心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增强,这也带动了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新消费时代下,消费者不再仅满足于功能性需求,更关注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中国文化产业占GDP比例持续提升。2020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945亿元,比2010年增长4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3%。分行业看,2020年,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为28874亿元,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4.2%;文化制造业增加值为11710亿元,占比为26.1%;文化批发与零售业增加值为4361亿元,占比为9.7%。但是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地区文化产业不平衡加剧。

吴慧香(2015)利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估算出中国各省份1999—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时期内,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波动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由技术进步主导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重,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省际差异明显。郭淑芬等(2015)也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9—2011年中国各省市文化产业效率进行测算,并且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影响东中西三大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文化科研条件、文化市场需求、文化政策分别是影响东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的关键因素。朱伟等(2018)利用RD-Malmquist指数方法,以中国148家文化创意产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测算与分解,并对文化创意产业先驱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做出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5年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正增长,并且东部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优于中西部,京沪深三大文化创意产业先驱城市中仅有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胡双红(2020)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2013—201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表明: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有异质性,而且三大子行业表现出不同的区域差异。此外,马跃如等(2012),李兴江、孙亮(2013),揭志强(2013),Kim(2016)等论文也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焦点放在我国文化产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差异的研究较多,对文化产业分行业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利用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计算与分解 2013—2020 年间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根据计算结果,从年度、地区和城市的角度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以及政策启示。

2. 计算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Malmquist 指数受到研究学者的关注,并且运用于各种研究。Fare 等(1994)进一步发展了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通过两个产出距离函数的几何平均来修订了该指数。

$$M(h^t, h^{t+1}) = [M^t \cdot M^{t+1}]^{1/2} = \left[\frac{D^t(h^{t+1}) \cdot (D^{t+1}(h^{t+1}))}{D^{t+1}(h^t)} \right]^{1/2} \quad (1)$$

(1)式中, $h^t = (x^t, y^t)$ 里的是 t 年度 j 个投入品的向量, y^t 是 t 年度 k 个产出的向量。另外, $D^t(h^{t+1})$ 是以 t 年度生产技术为基准,并用 $t+1$ 年度的投入产出关系计算的距离函数。如果该指数值大于 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小于 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等于 1,代表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变化。(1)式可以重新表示如下。

$$MPI(h^t, h^{t+1}) = \frac{D^{t+1}(h^{t+1})}{D^t(h^t)} \left(\frac{D^t(h^{t+1}) \cdot D^t(h^t)}{D^{t+1}(h^{t+1}) \cdot D^{t+1}(h^t)} \right)^{1/2} = EC \cdot TC \quad (2)$$

(2)式中括号外项代表 t 期与 $t+1$ 期的距离函数比率,代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即反映被观测的产出离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距离,而括号里的几何平均项代表 t 期与 $t+1$ 期的技术水平的变化指数,即反映对于给定的投入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的情况。由此可见, Malmquist 指数可以划分成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C)两部分,其中技术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3. 数据说明与计算结果

3.1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2000 年 10 月“十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十一五”规划中制定多项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条例和规定。“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并且与文化产业结合紧密的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表 1 所示。

表1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

| 时 期 | 主要内容 |
|------------------------|--|
| “十五”计划 (2001—2005)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人大“十五”计划中强调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建设和管理、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
| “十一五”规划 (2006—2010) | “十一五”规划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且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法律、福利等现代服务业。“十一五”规划中强调发展教育、文化、出版、广告、影像等数字产业,以丰富的数字产业为目标,发展动漫产业,并且加强文化产业地区管理 |
| “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对此,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具体的文化产业发展计划,比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骨干企业、加强对外交流及宣传、继承和利用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等多种战略和政策 |
|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 “十三五”时期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等地区化特征开始明显。例如根据长江三角洲、西部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要素差异,分为五种类型,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和路径 |

资料来源:黄春山(2019)。

3.2 数据说明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为2013—2020年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这些数据均从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获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产出变量采用各子行业的营业收入,投入变量主要为劳动和资本两项。其中,劳动投入采用各子行业就业人数,而资本投入则采用资产数据。为了提高相对比较的客观性,本文采用Kim(2016)方法,产出和投入变量均除于企业数。本文为了体现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特点,将中国划分成东、中、西部等3个地区。东部地区由11个省市构成,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10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0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文化制造业 | | | | | | | |
|----------|----------|--------|------|-----------|----------|------|-------|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偏度 | 峰度 |
| 营业收入/亿元 | 1 353.48 | 419.28 | 0.98 | 10 016.52 | 2 132.97 | 2.44 | 5.61 |
| 从业人员/千人 | 153.02 | 44.14 | 0.38 | 1 501.61 | 265.10 | 3.18 | 11.39 |
| 资产/亿元 | 1 022.94 | 424.40 | 4.00 | 7 890.84 | 1 603.47 | 2.47 | 5.78 |
|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 | | | | | | | |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偏度 | 峰度 |
| 营业收入/亿元 | 546.49 | 177.14 | 1.25 | 4 203.02 | 860.63 | 2.23 | 4.61 |

续 表

|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 | | | | | | | |
|----------|----------|--------|------|-----------|----------|------|-------|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偏度 | 峰度 |
| 从业人员/千人 | 17.11 | 9.86 | 0.07 | 87.38 | 19.28 | 1.70 | 2.47 |
| 资产/亿元 | 342.73 | 136.12 | 0.88 | 2 373.23 | 486.38 | 2.85 | 3.01 |
| 文化服务业 | | | | | | | |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偏度 | 峰度 |
| 营业收入/亿元 | 946.84 | 255.49 | 0.40 | 12 215.64 | 1 788.70 | 3.16 | 11.61 |
| 从业人员/千人 | 95.64 | 50.12 | 0.28 | 493.82 | 116.68 | 1.86 | 2.69 |
| 资产/亿元 | 2 008.31 | 789.35 | 0.71 | 21 227.84 | 3 340.50 | 2.83 | 8.64 |

3.3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

在本文中,为了分析中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使用了 DEAP 2.1 软件计算了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图 1 中的各指标值是以 2013 年作为基年后求得累计指数。如图 1 所示,在整个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由技术进步下降引起。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2.5%,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 0.4%,而技术进步下降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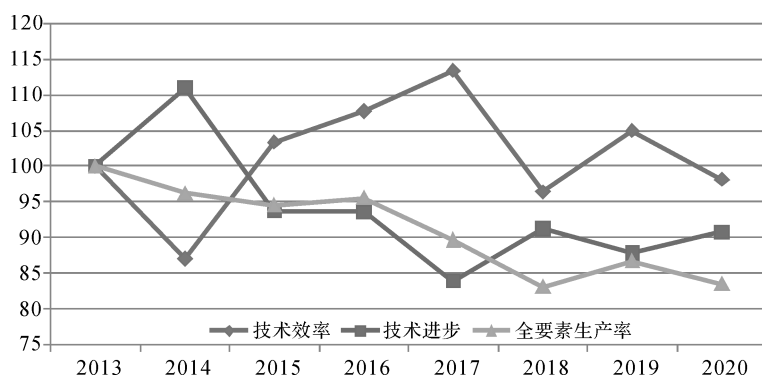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趋势

如图 2 所示,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可分成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在整个时期内,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文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并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产业以及三大子行业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 2016—2017 年和 2017—2018 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明显,主要是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技术效率下降引起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终导致 2016—2017 年和 2017—2018 年期间内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在整个样本时间内,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2.5%,其中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均下降 1.6%、3.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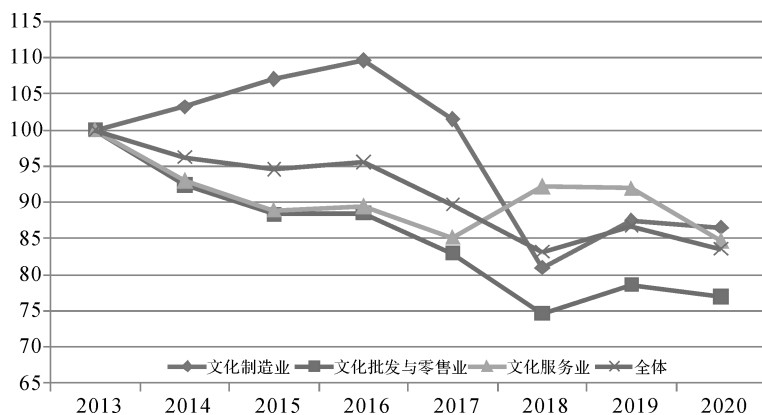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如表 3 所示,中国文化产业的三大子行业可按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文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改善。其中,东部地区增长 0.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下降 5.4%和 1.1%。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多的是海南,增长幅度达到 13.6%,其后是北京。另外,黑龙江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多的省,下降 12.8%。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同文化制造业一样,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生在东部地区,并且文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增长引起。文化服务业的东部地区增长 0.8%,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下降 2.1%和 5.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多的是浙江,增长幅度达到 15%,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多的是青海,下降 18.6%。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东部地区增长 1.5%,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下降 6%和 5.8%。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多的是海南,增长幅度达到 23.3%。另外,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多的省也是青海,下降 29.2%。这表明,在整个时期内,全国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着较大差异。

表 3 2013—2020 年中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分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分解

| 城市 | 文化制造业 | | |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 | | | 文化服务业 | | |
|-----|-------|-------|-------|----------|-------|-------|-------|-------|-------|
| | EC | TC | MPI | EC | TC | MPI | EC | TC | MPI |
| 北京 | 1.083 | 1.037 | 1.123 | 1.110 | 0.923 | 1.025 | 0.978 | 1.036 | 1.013 |
| 天津 | 0.935 | 1.023 | 0.957 | 1.126 | 0.928 | 1.045 | 1.033 | 1.046 | 1.081 |
| 河北 | 0.941 | 0.999 | 0.940 | 1.086 | 0.914 | 0.993 | 0.874 | 1.006 | 0.879 |
| 山西 | 0.991 | 0.999 | 0.990 | 1.025 | 0.914 | 0.937 | 0.955 | 0.995 | 0.950 |
| 内蒙古 | 0.925 | 1.006 | 0.931 | 1.011 | 0.916 | 0.927 | 0.879 | 1.081 | 0.950 |
| 辽宁 | 0.933 | 1.010 | 0.942 | 1.114 | 0.914 | 1.018 | 0.940 | 1.005 | 0.945 |
| 吉林 | 0.898 | 1.021 | 0.916 | 1.042 | 0.914 | 0.953 | 0.889 | 1.014 | 0.902 |
| 黑龙江 | 0.884 | 0.987 | 0.872 | 0.915 | 0.914 | 0.836 | 0.929 | 1.007 | 0.936 |

续 表

| 城市 | 文化制造业 | | |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 | | | 文化服务业 | | |
|----|-------|-------|-------|----------|-------|-------|-------|-------|-------|
| | EC | TC | MPI | EC | TC | MPI | EC | TC | MPI |
| 上海 | 1.022 | 1.018 | 1.040 | 0.964 | 0.968 | 0.934 | 0.950 | 1.063 | 1.010 |
| 江苏 | 0.969 | 0.993 | 0.962 | 1.043 | 0.931 | 0.971 | 0.923 | 1.006 | 0.929 |
| 浙江 | 1.003 | 0.996 | 0.998 | 1.082 | 0.921 | 0.996 | 1.017 | 1.131 | 1.150 |
| 安徽 | 0.979 | 0.991 | 0.971 | 1.000 | 0.930 | 0.930 | 1.002 | 1.007 | 1.009 |
| 福建 | 1.035 | 0.992 | 1.026 | 1.136 | 0.922 | 1.047 | 1.032 | 1.005 | 1.037 |
| 江西 | 0.970 | 0.992 | 0.963 | 0.960 | 0.928 | 0.891 | 0.975 | 1.005 | 0.980 |
| 山东 | 0.939 | 1.034 | 0.971 | 1.045 | 0.925 | 0.967 | 0.932 | 1.009 | 0.941 |
| 河南 | 0.958 | 0.993 | 0.951 | 1.106 | 0.914 | 1.012 | 0.995 | 1.005 | 1.000 |
| 湖北 | 0.985 | 0.987 | 0.973 | 1.025 | 0.914 | 0.938 | 0.987 | 1.004 | 0.991 |
| 湖南 | 0.986 | 0.970 | 0.957 | 1.091 | 0.914 | 0.998 | 0.994 | 1.025 | 1.019 |
| 广东 | 0.983 | 0.995 | 0.978 | 1.022 | 0.917 | 0.937 | 0.952 | 1.057 | 1.006 |
| 广西 | 0.947 | 0.986 | 0.933 | 1.066 | 0.914 | 0.975 | 1.049 | 1.005 | 1.054 |
| 海南 | 1.043 | 1.089 | 1.136 | 1.325 | 0.930 | 1.233 | 1.087 | 1.004 | 1.092 |
| 重庆 | 1.037 | 0.991 | 1.028 | 0.925 | 0.916 | 0.847 | 0.996 | 1.014 | 1.010 |
| 四川 | 1.042 | 1.017 | 1.060 | 1.030 | 0.925 | 0.953 | 1.032 | 1.013 | 1.045 |
| 贵州 | 0.947 | 1.004 | 0.951 | 1.076 | 0.939 | 1.010 | 0.954 | 1.011 | 0.965 |
| 云南 | 1.001 | 1.017 | 1.018 | 1.130 | 0.914 | 1.033 | 0.982 | 1.039 | 1.021 |
| 西藏 | 0.909 | 1.004 | 0.914 | 1.142 | 0.914 | 1.044 | 0.932 | 1.029 | 0.959 |
| 陕西 | 0.978 | 1.017 | 0.994 | 1.077 | 0.914 | 0.985 | 0.901 | 1.016 | 0.915 |
| 甘肃 | 1.005 | 0.984 | 0.989 | 1.049 | 0.884 | 0.927 | 0.892 | 1.010 | 0.901 |
| 青海 | 0.929 | 0.984 | 0.914 | 0.784 | 0.904 | 0.708 | 0.800 | 1.018 | 0.814 |
| 宁夏 | 1.067 | 1.019 | 1.087 | 1.032 | 0.916 | 0.945 | 0.903 | 1.007 | 0.909 |
| 新疆 | 0.949 | 0.989 | 0.939 | 1.052 | 0.916 | 0.964 | 0.924 | 1.014 | 0.937 |
| 东部 | 0.990 | 1.017 | 1.007 | 1.096 | 0.927 | 1.015 | 0.974 | 1.033 | 1.008 |
| 中部 | 0.952 | 0.993 | 0.946 | 1.024 | 0.917 | 0.940 | 0.965 | 1.015 | 0.979 |
| 西部 | 0.986 | 1.003 | 0.989 | 1.030 | 0.914 | 0.942 | 0.932 | 1.017 | 0.948 |
| 平均 | 0.986 | 1.011 | 0.984 | 1.060 | 0.927 | 0.964 | 0.965 | 1.033 | 0.978 |

注：MPI为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EC代表技术效率变化，TC代表技术进步变化。

3.4 技术创新地区的识别

根据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原理,每年都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上的地区,同时也存在移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地区。为了识别全国文化产业

的技术创新地区,本文提出如下创新地区的识别条件(Fare等,1994)。

$$TC_t^{t+1} > 1 \quad (3)$$

$$D^t(x^{t+1}, y^{t+1}) > 1 \quad (4)$$

$$D^{t+1}(x^{t+1}, y^{t+1}) = 1 \quad (5)$$

(3)式由于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表明实现了技术进步,(4)式则表示 $(t+1)$ 期的生产点位于 t 期的 $PPF[D^t(\cdot)]$ 之外,而(5)式表示 $(t+1)$ 期的生产点位于 $(t+1)$ 期的 $PPF[D^{t+1}]$ 之上。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地区可以识别为 t 时期和 $t+1$ 期之间的技术创新地区。

如表4所示,共有9个地区被识别为创新地区。具体而言,文化制造业的M5(内蒙古),M9(上海),M13(福建),M21(海南)等地区被识别为技术创新地区,其中,M21被识别为创新地区的次数为5次,M9为3次,M13为2次,M5为1次。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方面,W9(上海),W21(海南)等地区被识别为技术创新地区,其中,W9被识别为创新地区的次数为3次,W21为1次。文化服务业方面,S1(北京),S2(天津),S11(浙江),S21(海南),S29(青海),S31(新疆)等地区被识别为技术创新地区,其中,S11被识别为创新地区的次数为5次,S1为2次,S2为1次,S21为1次,S29为1次,S31为1次。

表4 技术创新地区的识别

| 时间 | 文化制造业 |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 | 文化服务业 |
|-----------|--------------|----------|--------------|
| 2013—2014 | M5 | — | S1, S31 |
| 2014—2015 | M21 | W9 | S1, S11 |
| 2015—2016 | M21 | — | S11, S29 |
| 2016—2017 | M21 | W9 | S11 |
| 2017—2018 | M9, M13, M21 | W9 | S11 |
| 2018—2019 | M9, M13, M21 | — | — |
| 2019—2020 | M9 | W21 | S2, S11, S21 |

注:M表示文化制造业各地区,W代表文化批发与零售业各地区,S表示文化服务业各地区。M、W和S后面的数字代表相应地区。序号与相应地区为:1.北京;2.天津;3.河北;4.山西;5.内蒙古;6.辽宁;7.吉林;8.黑龙江;9.上海;10.江苏;11.浙江;12.安徽;13.福建;14.江西;15.山东;16.河南;17.湖北;18.湖南;19.广东;20.广西;21.海南;22.重庆;23.四川;24.贵州;25.云南;26.西藏;27.陕西;28.甘肃;29.青海;30.宁夏;31.新疆。

4. 结论

本文通过利用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估算2013—2020年间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首先,在整个样本时间内,全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5%,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0.4%,而技术进步下降2.5%。其次,中

国文化产业以及三大子行业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文化产业以及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在整个样本期间内,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5%,其中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均下降1.6%、3.6%、2.2%。最后,我国文化产业三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一结论从技术创新地区结果也能得到印证,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增长引起。

研究结果表明今后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应把重点放在技术进步的改善。科学技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政府应该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并且借助现代信息化技术提升技术进步水平,尤其是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技术进步普遍较低,应该不断促进文化批发与零售业和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之间的相互学习、模仿与技术转移。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应该改善技术效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偏低,政府应通过联合或合并、结构调整、资金支援、税金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扩大企业规模,并且提高文化企业管理水平。海南、上海、浙江分别作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文化服务业的地区技术创新的中心城市,不仅要加强其技术传播与溢出效应,而且也需要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其他地区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郭淑芬,王艳芬,黄桂英,2015. 中国文化产业效率的区域比较及关键因素[J]. 宏观经济研究,203(10):113-121.
- 胡双红,2020. 中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异质性研究: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的分析[J]. 特区经济,373(2):111-114.
- 黄春山,2019. 中韩文化产业贸易竞争力研究[J]. 中韩语言文化研究(17):115-129.
- 揭志强,2013. 我国地区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研究[J]. 统计与决策(1):141-145.
- 李兴江,孙亮,2013. 中国省际文化产业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25-129.
- 马跃如,白勇,程伟波,2012. 基于 SFA 的我国文化产业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8):97-100.
- 吴慧香,2015. 中国文化产业生产率变迁及省际异质性研究[J]. 科研管理,36(7):64-69.
- 朱伟,安景文,孙雅轩,2018.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效率区域差异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11):166-172.
- FA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1994.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 66-83.

KIM S W, 2016.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Efficiency in China: 31 Provincial Regional Approach[J]. Korean-Chinese Social Science Studies, 14(1): 177-206.

作者简介:

黄春山,男,1981年10月生,吉林龙井人,经济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韩国经济以及国际经济。

《现代汉语词典》应该选择“披萨”代替 “比萨”做规范词形^①

黄 萍 彭泽润



摘 要:外来词的词形确认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用“比萨”做规范词形,现在应该改用“披萨”。2001年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定,异形词的规范主要依据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三大原则,其中通用性原则是首要原则。通用性原则是第一原则,但是也是动态的,应该根据新变化调整。本文通过语料库统计、问卷调查、企业信息查询软件全面考察了“比萨”和“披萨”的使用现状,结果表明“披萨”的通用性更强,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比萨;披萨;规范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Should Select Pisa(披萨) Instead of Bisa(比萨) as the Standard Word Form HUANG Ping PENG Zerun

Abstract: Confirming the form of foreign word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takes *bisa*(比萨) as the standard form. It should be changed to *pisa*(披萨) now. *The First Batch of Variant Words Arrangement Table* stipulates that universality is the first principle in sorting out variant words.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is dynamic, it. It should adjust according to the new change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the usage status of *bisa*(比萨) and *pisa*(披萨) through corpu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que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sa*(披萨) is more widely used now, and shows strong vitality.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bisa*(比萨), *pisa*(披萨), foreign word

^① 本文为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专项课题“思政教育融入语言规划(研究生)和语言现代化(本科生)课程的实践和研究”(项目编号:XYJ2021GA02)的研究成果。

1. 引言

“比萨”,又叫“比萨饼”“披萨”,是一种发源于意大利的食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比萨”的解释为:

名词,一种意大利式饼,饼上放番茄酱、奶酪、肉类等,用烤箱烘烤而成,也叫比萨饼。[英 pizza]。

Pizza 音译成汉语以后有两种较为常见词形,一个是“比萨”,另一个是“披萨”。《现代汉语词典》《柯林斯词典》《牛津词典》《剑桥词典》均以“比萨”作为规范词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今使用“披萨”的语言使用者数量众多,“披萨”在当今社会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选用“比萨”作为规范词形,还是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来源于西方的外来词传入我国,与之相伴的是外来词的同词异形现象。在音译外来词时,同一个词常常被音译成不同的词形。比如英语 pizza,既可以译为“比萨”,也可以译为“披萨”。冯志伟(1998)指出,对混乱的译名进行规范,是《现代汉语词典》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建中(1990)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音译异形词的处理,以普遍通行为主要原则,兼顾译音准确和字面雅正。2001年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定,异形词的规范主要依据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三大原则,其中通用性原则是首要原则。把通用性原则作为整理异形词的首要原则,这是由语言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因此通用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外来词的词形确认。在通用性原则的指导下,本文通过语料库统计、问卷调查和企业名称调查,全面考察了“比萨”和“披萨”在当今社会中的使用情况,结果表明“披萨”的通用性更强,在当前的语言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从译音的准确性来看,“披萨”的读音更接近英语 pizza。此外,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可以让“披萨”和“比萨”各司其职,表意更加明确。以通用性原则为主,兼顾译音的准确性和表意的明确性,本文建议《现代汉语词典》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

2. 从大众问卷调查结果考察使用现状

对音译异形词进行规范,必须要考虑到语言使用者的使用习惯,把通用性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为了比较“比萨”和“披萨”的通用性,我们利用问卷星设计了一份关于“外来词名称调查”的问卷,随机发放到微信群里,最后收集到有效问卷共计138份。问卷一共有4道题,第1题和第2题分别是填写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第3题是一张pizza的照片,如果受访者选择认识图中的食物,则会跳到第4题;第4题是让受访者选择该食物的名称。最后的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外来词名称调查”统计结果

| 选项 | 小计 | 占比(%) |
|-------------|----|-------|
| 比萨/比萨饼 | 17 | 13.39 |
| 披萨 | 65 | 51.18 |
| 比萨和披萨都可以 | 37 | 29.13 |
| 其他(皮扎饼,比查饼) | 8 | 6.3 |

调查结果显示,在 127 份问卷中仅有 17 个人选择了“比萨/比萨饼”,占比 13.39%;认为是“披萨”的有 65 份,占比过半;还有近 30%的人认为“比萨”和“披萨”都可以。我们随机采访了选择“比萨”的受访者和选择“比萨和披萨都可以”的受访者,他们表示自己认同“比萨”这个词形是因为在自己所学的英语教材中 pizza 这个单词的译名是“比萨”,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英语词典的翻译是“比萨”。在《柯林斯词典》《牛津词典》《剑桥词典》中 pizza 的翻译的确均为“比萨”。无论是汉语的权威词典,还是英语的权威词典,都以“比萨”作为规范译名。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了“披萨”,仅有百分之十几的人选择了“比萨”。现有语言规范根本无法制约“披萨”的野蛮生长,语言规范也无法阻挡“披萨”在大众中通行开来。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与时俱进改进现有规范。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选择“比萨”和“披萨”时具有差异性。本文把受访者的年龄划分为 4 个阶段:29 岁以下;30—39 岁;40—49 岁;50 岁以上。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2—表 5。

表 2 29 岁以下人群的调查结果

| 选项 | 小计 | 占比(%) |
|-------------|----|-------|
| 比萨/比萨饼 | 8 | 13.33 |
| 披萨 | 33 | 55 |
| 比萨和披萨都可以 | 16 | 26.67 |
| 其他(皮扎饼,比查饼) | 3 | 5 |

表 3 30—39 岁人群的调查结果

| 选项 | 小计 | 占比(%) |
|-------------|----|-------|
| 比萨/比萨饼 | 3 | 10.34 |
| 披萨 | 16 | 55.17 |
| 比萨和披萨都可以 | 8 | 27.59 |
| 其他(皮扎饼,比查饼) | 2 | 6.9 |

表4 40—49岁人群的调查结果

| 选项 | 小计 | 占比(%) |
|-------------|----|-------|
| 比萨/比萨饼 | 6 | 20.69 |
| 披萨 | 12 | 41.38 |
| 比萨和披萨都可以 | 9 | 31.03 |
| 其他(皮扎饼,比查饼) | 2 | 6.9 |

表5 50岁及以上人群的调查结果

| 选项 | 小计 | 占比(%) |
|-------------|----|-------|
| 比萨/比萨饼 | 0 | 0 |
| 披萨 | 4 | 44.44 |
| 比萨和披萨都可以 | 4 | 44.44 |
| 其他(皮扎饼,比查饼) | 1 | 11.11 |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减小,选择“比萨和披萨都可以”的越来越少,选择“披萨”的越来越多。以40岁为分界岭,40岁以下选择“披萨”的超过五成,而40岁以上选择“披萨”的只有四成。这表明“披萨”有一种年轻化趋势,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使用“披萨”。我们有理由预测,未来“披萨”的使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3. 从饮食行业企业信息查询结果考察使用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披萨”更符合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语言使用习惯(仅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倾向于用“比萨”)。那么相关餐饮企业在注册企业名称时更倾向于使用“比萨”还是“披萨”?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两款企业信息查询软件:企查查和天眼查。企查查和天眼查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两款企业信息查询软件,它们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工商信用网站,比如中国执业信息公开网、国家知识产权网、商标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据丰富而全面。它们不仅可以查看企业信息,还能精细化查询条件,比较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3.1 从搜索引擎“企查查”考察使用现状

在企查查的搜索引擎中搜索“比萨”,并把条件限定为“餐饮业”以后,一共找到8316条相关结果。各企业的具体注册日期和对应企业数量如表6所示。

表6 在企查查搜索“比萨”得到的相关结果

| 成立年份 | 2021 | 2020 | 2019 | 2018 | 2017 | 2016 | 2015 | 2014 | 2013 | 2012 | 2011 | 2010 |
|------|------|------|------|------|------|------|------|------|------|------|------|------|
| 数量 | 213 | 525 | 569 | 637 | 1028 | 1023 | 946 | 787 | 442 | 296 | 210 | 219 |

续 表

| | | | | | | | | | | | | |
|------|------|------|------|------|------|------|------|------|------|------|------|------|
| 成立年份 | 2009 | 2008 | 2007 | 2006 | 2005 | 2004 | 2003 | 2002 | 2001 | 2000 | 1999 | 1998 |
| 数量 | 171 | 205 | 220 | 199 | 156 | 136 | 114 | 96 | 39 | 28 | 9 | 8 |
| 成立年份 | 1997 | 1996 | 1995 | 1994 | 1993 | | | | | | | |
| 数量 | 20 | 9 | 7 | 1 | 3 | | | | | | | |

在企查查的搜索引擎中搜索“披萨”，并把条件限定为“餐饮业”以后，一共找到 33 258 条相关结果。各企业的具体注册日期和对应企业数量如表 7 所示。

表 7 在企查查搜索“披萨”得到的相关结果

| | | | | | | | | | | | | |
|------|------|------|------|------|------|------|------|------|------|------|------|------|
| 成立年份 | 2021 | 2020 | 2019 | 2018 | 2017 | 2016 | 2015 | 2014 | 2013 | 2012 | 2011 | 2010 |
| 数量 | 2052 | 6547 | 4794 | 5185 | 6100 | 4746 | 2293 | 941 | 353 | 106 | 56 | 29 |
| 成立年份 | 2009 | 2008 | 2007 | 2006 | 2005 | 2004 | 2003 | 2002 | 2000 | 1999 | 1998 | |
| 数量 | 18 | 12 | 5 | 3 | 5 | 3 | 4 | 2 | 3 | 9 | 8 | |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搜索到的结果归纳整理，如表 8 所示。

表 8 企查查中有关“比萨”和“披萨”的企业数目和占比比较

| 年份 | 比萨(数目/条) | 披萨(数目/条) | 比萨(占比/%) | 披萨(占比/%) |
|------|----------|----------|----------|----------|
| 1993 | 3 | 0 | 100.00 | 0.00 |
| 1994 | 1 | 0 | 100.00 | 0.00 |
| 1995 | 7 | 0 | 100.00 | 0.00 |
| 1996 | 9 | 0 | 100.00 | 0.00 |
| 1997 | 20 | 0 | 100.00 | 0.00 |
| 1998 | 8 | 0 | 100.00 | 0.00 |
| 1999 | 9 | 3 | 75.00 | 25.00 |
| 2000 | 28 | 1 | 96.55 | 3.45 |
| 2001 | 39 | 0 | 100.00 | 0.00 |
| 2002 | 96 | 2 | 97.96 | 2.04 |
| 2003 | 114 | 4 | 96.61 | 3.39 |
| 2004 | 136 | 3 | 97.84 | 2.16 |
| 2005 | 156 | 5 | 96.89 | 3.11 |
| 2006 | 199 | 3 | 98.51 | 1.49 |
| 2007 | 220 | 5 | 97.78 | 2.22 |
| 2008 | 205 | 12 | 94.47 | 5.53 |
| 2009 | 171 | 18 | 90.48 | 9.52 |

续表

| 年份 | 比萨(数目/条) | 披萨(数目/条) | 比萨(占比/%) | 披萨(占比/%) |
|------|----------|----------|----------|----------|
| 2010 | 219 | 29 | 88.31 | 11.69 |
| 2011 | 210 | 56 | 78.95 | 21.05 |
| 2012 | 296 | 106 | 73.63 | 26.37 |
| 2013 | 442 | 353 | 55.60 | 44.40 |
| 2014 | 787 | 941 | 45.54 | 54.46 |
| 2015 | 946 | 2293 | 29.21 | 70.79 |
| 2016 | 1023 | 4746 | 17.73 | 82.27 |
| 2017 | 1028 | 6100 | 14.42 | 85.58 |
| 2018 | 637 | 5185 | 10.94 | 89.06 |
| 2019 | 569 | 4794 | 10.61 | 89.39 |
| 2020 | 525 | 6547 | 7.42 | 92.58 |
| 2021 | 213 | 2052 | 9.40 | 90.60 |
| 合计 | 8316 | 33258 | 20.00 | 80.00 |

由表8可以看出,用“披萨”注册的企业占比高达80%,用“比萨”注册的企业只有20%。按照企业成立的年份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比萨”和“披萨”的发展脉络:1993年到1998年,还没有用“披萨”注册的餐饮企业;一直到1999年,首次出现了3家用“披萨”注册的企业;1999年到2007年,都只有零星几家企业用“披萨”注册(占比在1%—3%之间浮动);从2008年开始,使用“披萨”注册的企业逐年大幅上升,在2014年“披萨”的占比(54.46%)首次超过“比萨”,并在2020年达到顶峰(92.58%);虽然相较于2020年,2021年“披萨”的占比呈小幅下降,但是仍高达90%。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2014年以后,使用“披萨”注册的企业一直多于“比萨”,并且“披萨”占比呈稳定上升的趋势,直到2020年,“披萨”几乎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3.2 从搜索引擎“天眼查”考察使用现状

在“天眼查”的搜索引擎中搜索“比萨”,并把条件限定为“餐饮业”以后,一共找到8490条相关结果;同样条件下搜索“披萨”,一共找到31145条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天眼查”中有关“比萨”和“披萨”的企业数目和占比比较

| | 数目/条 | 占比 |
|----|-------|--------|
| 比萨 | 8490 | 21.42% |
| 披萨 | 31145 | 78.58% |

由表 9 可见,“天眼查”和“企查查”呈现的数据大体一致,“披萨”的总占比约为百分之八十,可见企业在注册企业名称时,也更加偏向于使用“披萨”。并且从表 8 可以看出,使用“披萨”并不是一时风潮,而是呈逐年稳定上升趋势。

4. 从语料库数据统计结果考察使用现状

4.1 语料占比分别是 69% 和 7% 的“披萨”

本文选取的语料库为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均为动态语料库,可以直观地展示“比萨”和“披萨”在当今社会的使用情况。在 BCC 语料库中检索“比萨”共有 4025 条结果(包括“比萨斜塔”、意大利的地名“比萨”),去除“比萨斜塔”以后共有 3248 条结果;检索“披萨”共有 7307 条结果。BCC 语料库中“披萨”的数量远远多于“比萨”。“披萨”占有绝对优势,占比达到 69%。检索情况如表 10 所示。

在 CCL 语料库中检索“比萨”共有 594 条结果(包含“比萨斜塔”、意大利的地名“比萨”),去除“比萨斜塔”和意大利地名“比萨”以后共有 429 条结果;检索“披萨”只有 33 条结果。在 CCL 语料库中,即使排除了“比萨斜塔”和地名“比萨”,“比萨”的检索条目数量仍然远远高于“披萨”。“披萨”处于劣势,只占 7%。检索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0 “比萨”和“披萨”在 BCC 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

| | 数量 | 占比 |
|----|-------|--------|
| 比萨 | 3248 | 30.77% |
| 披萨 | 7307 | 69.23% |
| 合计 | 10555 | 100% |

表 11 “比萨”和“披萨”在 CCL 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

| | 数量 | 占比 |
|----|-----|--------|
| 比萨 | 429 | 92.86% |
| 披萨 | 33 | 7.14% |
| 合计 | 462 | 100% |

4.2 语料是否经过编辑加工影响占比的真实性

“比萨”和“披萨”的检索情况在两个权威语料库中呈现出完全截然相反的表现,这是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语料库的特点入手。

BCC 收录的现代汉语语料约 130 亿字符,CCL 收录的现代汉语语料共 2 亿字符,可见 BCC 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规模更庞大。BCC 语料库的语料来源于报刊(14%)、文

学(22%)、微博(22%)、科技(22%)、古汉语(14%)等,取样分布较均衡,可以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

CCL 语料库的当代语料来源于报刊(73%)、当代文学及翻译作品(15%)、网络语料(5%)、当代口语(3%)等,其中报刊占比极大;CCL 语料库的现代语料主要来源于现代文学(92%)和现代戏剧(8%)。

因此,CCL 的语料更加注重书面语言,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词形推荐规范加工的结果,不能代表一般大众的使用倾向。BCC 语料库取样更均衡、规模更大,语料更生动鲜活,更加能够反映大众的语言使用现状。特别是选择的微博语料是报刊语料的 2 倍,大大减少了编辑对语言加工的可能性,更加逼真地体现了大众语言现实。

这样我们在表 10 中看到的矛盾的结果就不矛盾了。在 BCC 语料库中“披萨”的占比是 69.23%，“比萨”的占比仅只有 30.77%，看起来和 CCL 语料的数据矛盾，其实只有 BCC 语料库更加符合大众语言使用现状。因此从语料库的呈现的结果看，“披萨”的使用率是远高于“比萨”的。

当然,即使是 BCC 语料库,不同类别的语料来源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比萨”和“披萨”在 BCC 语料库中的具体检索情况,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比萨”和“披萨”在 BCC 语料库中的具体分布

| 名称 | 报刊类 | | 文学类 | | 对话类 | | 篇章检索 | | 多领域 | |
|------|-------|------|-------|------|------|-------|-------|-------|-------|-------|
| | 比萨 | 披萨 | 比萨 | 披萨 | 比萨 | 披萨 | 比萨 | 披萨 | 比萨 | 披萨 |
| 数量/条 | 816 | 69 | 248 | 20 | 172 | 4397 | 1048 | 316 | 1741 | 2505 |
| 占比/% | 92.20 | 7.80 | 92.54 | 7.46 | 3.76 | 96.24 | 76.83 | 23.17 | 41.00 | 59.00 |

由表 12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报刊和文学领域,“比萨”压倒性的胜利。报刊和文学都属于书面语,书面语稳定性较强,并且受到语言规范的制约,所以书面语沿用《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词形:比萨。这一点也和报刊、文学语料占比极大的 CCL 语料库呈现的结果一致。而对话领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披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达到 96% 的比例。这说明在日常口语中,脱离了编辑规范制约以后,语言使用者更加倾向于使用“披萨”。大众的使用习惯永远是语言规范的风向标,我们有理由相信“比萨”正在被逐步被语言使用者淘汰。

5. “披萨”为什么能战胜“比萨”

5.1 语料库数据立体结构图的历史变化分析

问卷调查显示出“披萨”更符合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语言使用习惯;企查查、天眼查呈现的数据表明企业在注册时更倾向于选择“披萨”作为企业名称;语料库统计数据表明在口语对话中,“披萨”(约 96%)的使用率远高于“比萨”(约 4%)。综合比较调查

结果以后,我们发现“披萨”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命力越来越强。

“披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暂不可考。林伦伦、朱永锴、顾向欣(2000)在《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中提到了“比萨饼”也叫“皮扎饼”“比查饼”。虽然在这本2000年的词典中还没有出现“披萨”这个词,但是由表8我们可以知道,从1999年开始已经有零星的企业用“披萨”作为企业名称注册了。“比萨”这个译名早于“披萨”出现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披萨”是什么时候战胜“比萨”的?

我们在BCC语料库的历时检索中搜索“比萨”,得到了检索式“比萨”的频次图,如图1所示。遗憾的是在我们没有查询到关于“披萨”的历时检索频次图,但是从“比萨”的历时频次图我们也可以获取一些关键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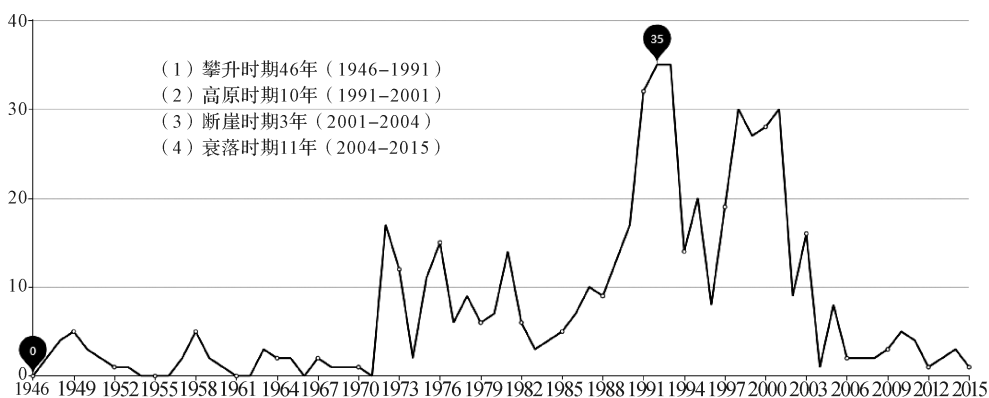


图1 “比萨”的断崖式兴衰历程

图1清晰地展现了1946—2015年70年时间里,“比萨”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后,“比萨”的使用频次就断崖式下跌,偶尔反弹也很微弱。这个时间正好是企业开始用“披萨”进行企业名称注册的时间。在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制约下,“披萨”和“比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从表8可以看到2014年,“披萨”首次反超“比萨”,此后“披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和“比萨”不断拉大差距,到2021年,“披萨”的使用占比已近九成,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5.2 从语言演变历史的惯例做理论分析

仅仅用了20年,“披萨”的通用性就反超“比萨”,在口语中几乎取得了完全胜利。“披萨”为什么更符合大众的使用习惯?为什么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更科学?我们认为译音准确和表意明确是“披萨”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内在动力。

《现代汉语词典》注释音译词词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尾注和夹注。尾注就是在注音释义之后用方括号注明该词由来的语言及外语原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比萨”的解释为:“名词,一种意大利式饼,饼上放番茄酱、奶酪、肉类等,用烤箱烘烤而成,也叫比萨饼。[英 pizza]”这一解释表明“比萨”是由英语 pizza 音译过来的英源外来

词。“比”的声母是不送气清塞音[p]，“披”的声母是送气清塞音[p^h]，相较于“比萨”，“披萨”的发音更接近英语单词 pizza[p^hi:tsə]的读音。对于语言使用者来说，译音准确的“披萨”比“比萨”的理据性更强，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披萨”在竞争中具备天然优势。

汉语的音译外来词，从词源上看来自英语的最多，其次是法语、梵语、德语、俄语。这些语言都是没有声调的语言，因此汉语在音译外来词时，常常做“去声调化”的处理，表现为词的第一个音节多为阴平调，比如“沙发、沙拉、咖啡、卡通、芭蕾、扑克、鸦片……”还有的音译外来词，比如“拜拜、的士”，它们的第一个音节在汉语中本来不读阴平调，但是我们现在习惯把“拜拜、的士”读成[pai⁵⁵ pai⁵⁵][ti⁵⁵ ʂɿ⁵¹]。“比萨”的“比”声调为上声，“披萨”的“披”声调为阴平，因此“披萨”更符合汉语音译外来词时“去声调化”的习惯作法。

音译词“比萨”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常见义项：一是本文讨论的意大利馅饼“比萨饼”，表示的是食品名称；二是表示意大利城市名，比如“比萨斜塔”就是意大利城市比萨的一个著名景点。“比萨”是一个多义词，而“披萨”指代的意义十分明确，就是本文讨论的意大利馅饼 pizza，不存在歧义的问题。因此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比萨”和“披萨”渐渐分化，各司其职，“比萨”更多地用来表示意大利地名，“披萨”则用来表示食物名。

6. 结论

我们通过语料库、问卷调查、企业信息查询软件考察了“比萨”和“披萨”的使用现状。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统计数据显示“披萨”在口语对话中的使用率远远高于“比萨”，但由于语言规范、权威词典的制约，书面语中“披萨”的使用率低于“比萨”；问卷调查显示“披萨”更符合语言使用者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披萨”；企查查、天眼查等企业信息查询软件显示当前用“披萨”注册的企业名称远多于“比萨”。“比萨”和“披萨”的使用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披萨”的通用性更强，是公众目前普遍使用的词形。彭泽润、李葆嘉(2018)³²¹主编的《语言理论》提出，语言规范要遵循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照顾语言使用的社会习惯。2002年出版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说明》指出，异形词的规范通用性原则是首要原则，提出应该根据科学的词频统计和社会调查，选取公众目前普遍使用的词形作为推荐词形。在外来词的词形确认上，通用性原则同样适用，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符合通用性原则。

许建中(1990)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音译异形词的处理，以普遍通行为主要原则，兼顾译音准确和字面雅正。通过上文分析，“披萨”的读音更接近英语 pizza 的发音，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符合“译音准确”这条原则。此外，“披萨”的指代明确，不存在歧义问题，而“比萨”是一个多义词，既用来表示本文讨论的食物名 pizza，又用来表示意大利地名。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表意更明确。

吕叔湘(1996)指出，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同义译名，优胜劣汰。以通用性原则为主，兼顾译音的准确性和表意的明确性，本文建议《现代汉语词典》

选用“披萨”作为规范词形。徐建中(1990)指出,有的音译词目前通行的词形不止一个,要从中决定取舍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考虑到“比萨”目前还有一定的使用空间,《现代汉语词典》在词条“披萨”的下面可以注解“也叫比萨”,作为过渡处理。下面是对词条“披萨”的具体修改方案:

【披萨】pīsà: 名一种意大利式饼,饼上放番茄酱、奶酪、肉类等,用烤箱烘烤而成。也叫比萨。[英 pizza]

参考文献:

- 程荣,1998. 规范型汉语词典的异形词处理问题[C]//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 中国辞书学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81-193.
- 冯志伟,1998. 同义译名研究刍议[J]. 词库建设通讯:16.
- 林伦伦,朱永锴,顾向欣,2000.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M]. 广州:花城出版社.
- 吕叔湘,1996.《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泽润,李葆嘉,2018. 语言理论[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321.
- 许建中,1990.《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音译外来词[J]. 辞书研究(3):64-71.
- 异形词研究课题组,2002.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说明[M]. 北京:语文出版社: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 现代汉语词典[M]. 7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黄萍,女,1997年6月生,重庆彭水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彭泽润,男,1963年4月生,湖南衡山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语言理论、汉语方言研究。

“隐喻”建构模式下的诺兰电影《信条》

钱建萍



摘要:由传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间谍动作大片《信条》自2020年9月上映以来,备受争议。外媒盛赞该片为“诺兰最佳作品之一”“令人上瘾的特工片”。但《信条》的实验性和解谜性超出了一般观众的接受能力。除了电影本身的物理学框架外,诺兰在影片中插入不少历史知识和现实背景,使影片的内涵更加丰富,但同时也增加了观众的记忆负担和解谜难度。本文研究分析诺兰导演在电影中埋设、构建的“隐喻”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环环相扣的电影剧情的设计理念和意图。

关键词:隐喻;诺兰电影;《信条》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ve Pattern of Metaphors:

Nolan's Film *Tenet*

QIAN Jianping

Abstract: The sci-fic spy action blockbuster *Tenet*, directed by legendary director Christopher Nolan, has been controversial since its release in September 2020. Foreign media praised the film as “one of Nolan’s best works” and an “addictive spy film”. But the film’s experimental and puzzle-solving nature is beyond the capacity of average viewers. In addition to the framework of physics of the film itself, Nolan inserts a lot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real world background into the film, which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the film but increases the burden of the audience’s memory and the difficulty of solving puzzle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attern of metaphors that Director Nolan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in the film, and the design ideas and intentions of the film plot following this pattern.

Keywords: metaphors; Nolan’s film; *Tenet*

1. 引言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科幻动作电影《信条》于2020年9月3日在美国上映,9月4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影片讲述了世界存亡危在旦夕,“信条”一词是唯一的线索与武器,主人公穿梭于全球各地,开展特工活动,力求揭示“信条”之谜,并完成一项超越了真实时间的神秘任务。

《信条》一经面世,就得到了诺兰影迷的极大关注。从《信条》片场走出后,许多观众直呼影片中细节太多,只看一遍看不懂。剑拔弩张的超高速剧情,正向和逆向时间并行的视觉奇观,以及高信息量的台词,掩盖住了藏在角落里的细节,在影迷中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

2. 专家述评

《信条》上映之后,各位电影评论人士对电影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

《世界电影》杂志主编曹祎娜(2020)认为《信条》中那些堆叠交错的时间和空间,让简单的“元故事”呈现出无法预测情节走向的迷局,从而突破观众的想象力和过往的观影经验,给观影者带来非比寻常的困惑感和新奇感,同时也带给他们解谜的欲望、体验以及快感。

电影制片人彭传钊(2020)认为《信条》这部电影是众多科幻迷的狂欢巨作,绝对是一部即使了解熵增理论、祖父悖论、单电子宇宙理论等内容,也明白时间是一个和长宽高一样的维度,却仍要在观看几遍之后,坐下来静静思考甚至画图总结才能搞明白的电影。

韩浩月(2020)认为《信条》让部分观众觉得不满意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智商遭到了挑战,而在于电影的文戏部分实在无聊。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如同一座巨大的沙砾,把支撑它的物理名词抽掉之后,会瞬间垮塌。诺兰对于概念的迷恋与对技术的崇拜使得他对故事处理的态度比较草率。

尚陵彬(2020)引用了部分网友的看法:看诺兰的电影就像考试:《盗梦空间》像统考,稳住思绪即可游刃有余;《星际穿越》像高考,状态拉满,也会留下遗憾,出了答案估分时即可了然;这部《信条》,像零基础参加奥数竞赛,考完觉得自己只能得零分,唯有复读是唯一方法。

赵立功(2020)对《信条》做了比较尖锐的评论。他说:作为一部高概念电影,《信条》和诺兰以往其他表现时间的电影一样,仍然把时间的线性打乱,让人物穿越其中,由此带来的个体及环境的错位,令观众眼花缭乱。但这一次,诺兰似乎有过头之嫌,烧脑的剧情令观众普遍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一遍看不懂已是一种共识。

抛开以上各种观点,本文作者将从另一个角度对《信条》进行深度解读,即分析电影

中诺兰导演为影片埋设、建构的“隐喻”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环环相扣的电影剧情的设计理念和意图。

3.《信条》的“隐喻”建构模式

根据汪正龙(2016)的解释,隐喻(metaphor)这个词源自希腊文“meta-pherein”,意思是“转移”或“传送”,“它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之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也就是说,在隐喻中,字面上表示某个事物的一个词或表达,可以不需要进行比较而应用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如《诗经·桃夭》中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盛开的桃花与新嫁娘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以桃花表示新嫁娘,就是隐喻。

同时,汪正龙(2016)还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等人的看法,“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从一般的意义看,隐喻是偏离本义的表达方式,即用某个语词暗示某种意义并实现交流的语言现象。隐喻虽然在诗歌里应用最为普遍,但在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故事、寓言、神话等中也很常见,甚至也存在于演说、政论和科学著作中。可以说,隐喻不仅是重要的修辞手段和文学手法,也是重要的美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现象。

左亚男(2017)提出,电影并非只是简单的媒体场域,更是一种权力的平台,它通过影像的存在以个性化的意志重建了现实,在直接甚至震撼的再现中,以压缩、纯化的方式向人们提示着已然、正在以及必将经历的一切。通过隐喻的构建,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视听符号对世界的重新分类及着色中,通过主题、内容、形式等方面的不同延展,对自我价值的追寻表达了“有关永恒和普遍形式”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信条》中的探索是沿着时间逆向的边界,将过去的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等元素嵌入电影的叙事过程中,使电影内容更饱满,更富有张力,同时传递了导演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思考。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向来被影迷称为“一切细节都是有意为之”。诺兰会在电影里布设无数的影射手法和隐喻,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手势,有的可能只是一句台词,或者是一个道具,最常用的则是角色的名字和人物设定等,内涵丰富。

现将诺兰在《信条》中埋设的“隐喻”做一详尽透彻的研究和分析。

3.1 《信条》英文片名 *Tenet* 的隐喻

跟《盗梦空间》(*Inception*)一样,片名 *Tenet* 这个词并非诺兰导演原创。根据词典中的定义,*Tenet* 的意思是“原则或是信念,尤其是宗教或是哲学中主要原则之一”,也就是信念的意思,跟电影的主题紧密相连。虽然诺兰导演解释过 *tenet* 一词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组织的名字,但这个片名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隐喻内涵。

Tenet 的一个出处是 Sator Square(萨托魔方阵)。Sator Square 最早见于两千年前

庞贝古城壁上,是西方古老的文字魔方,是西方非常有名的回文(palindrome),如图1所示。palindrome一词源于希腊文“palindromos”,有“再跑回去”的意思,因此从 Sator Square 中可以看到内里的文字不论是由上至下、下至上、左至右,或是右至左也好,都能得出一模一样的单词。

Sator Square 正中间的是“tenet”一词,另外分别是“sator”“arepo”“opera”和“rotas”。除了 tenet 外,另外几个 Sator Square 中出现的单词也出现在电影中。Sator 是电影中反派 Andrei Sator 的名字,在拉丁文中亦解作“播种人”的意思;Arepo 是电影中神秘假画卖家的名字,这个字源于埃及,是古埃及幸运之神 Harpocrates 的简写;Opera 则指代电影一开幕出现的基辅国家歌剧院,亦是代表 operation 一字,拉丁文中它是“工作”或“工人”的意思;Rotas 则是反派其中一家公司的名字,拉丁文中则解作“转动”或“旋转”的意思。

Sator Square 对于欧洲人来说,是驱邪的符号。多年来有不少人尝试解释 Sator Square 的意思,至今未有共识,但人们相信它是描述耕种的情况,因此才会有“一直循环”的意思。Sator Square 套用于《信条》中,能看到诺兰导演的缜密心思,即用这个回文来隐喻电影逆时的主题,来象征一些不可违背的法则。

“信条”组织的手势也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男主的长官,军火贩普利亚,多次拯救男主的尼尔都做出过该手势。手势为两手重合,十指交接在一起。这不仅寓意着电影里的时间是交叉咬合,互相背逆的,也暗示了“信条”组织把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的原则。



图1 Sator Square(萨托魔方阵)

3.2 《信条》的道具隐喻

诺兰在影片中埋下的细节精妙丰富,无论看多少次都会有新发现。而一个红色的背包小挂件是很容易被观众忽略的小细节,而事实上这是诺兰的精心理设、“欲说还休”的隐喻之一。

主角在剧院的袭击中暗自展开对人质及观众的解救,不料在拆除炸弹的途中突遇

变故,主人公的身份被恐怖分子识破并遭到持枪威胁。炸弹即将被引爆的危急之际,剧院地面的弹孔中突然发生时空逆转,一发倒射的子弹逆行穿过恐怖分子的躯体,而地面上的弹孔则复原至完好如初。这枚倒射的子弹来自一位蒙面的神秘人,他成功帮助主角脱身后转身而去,其背包上栓着的红绳铜币挂件显眼瞩目——男二号尼尔首度登场,这也是他首次在片中拯救主角。

小挂件第二次出现在危机解除后尼尔告别时身上背的包上面。他死前最后一个动作也是用“身体接住子弹”。电影通过展示尼尔前后做的同一个动作,身上携带的同一个信物,暗示了尼尔就是一开始拯救主角的特警,电影里反复出现尼尔接子弹这一镜头,强调了子弹与尼尔的重要性。尼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主角,完成最终的任务。而这宿命般的相遇也契合了本片发生的事情终将发生的母题。红色小挂件的隐喻就是尼尔对主角的无私奉献和坚定支持,代表的是主角与尼尔之间跨越时间线、贯穿始终并肩作战的深刻情谊和感天动地的真情。

3.3 《信条》的文学艺术隐喻

诺兰对诗歌情有独钟,前有《星际穿越》中引用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诗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信条》中男主角接头的暗号是“这是个混沌的世界”“黄昏时分无故人”,他说这是惠特曼的诗。其实19世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并没有创作过这两句诗,但“混沌”“黄昏”“故人”这些字眼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草叶集》中。比如《格言集》的《幻象》中就写道:“永远是混沌初开,永远是周期循环,是成长”;《自己之歌》里也有“当我嗅着黄昏的边缘的时候,请正视我的脸”;在他的《和解》一诗中提到“因为我的敌人已经死了,一个如自己一样神圣的人已经死了”。

除了诗歌,影片中推动故事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道具是两幅世界名画。女主角凯瑟琳·巴顿把一幅赝品画作卖给了自己的丈夫萨塔尔,但知情的丈夫就此抓住了她的把柄,让她难逃自己的手掌心。这幅画作的作者就是戈雅。但是画作的庐山真面目一直到萨塔尔和凯特起争执的时候方才揭开。使者端着餐具放到凯特面前,凯特揭开后发现是那幅一直困扰着、约束着自己的素描画。戈雅画作中的女人常常代表着开放、权力、风流,这些恰恰是控制欲爆棚的萨塔尔无法忍受的。因此,萨塔尔用这张画来警告凯特,不要妄想有任何出格的念头。

影片中另外一幅画作,也就是主角拿到凯瑟琳的拍卖行进行鉴定的是戈雅的《巢贼》。《巢贼》创作于1812—1820年,在现实中2010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近134万美元售出。画中内容是一位狩猎者正准备偷走鹰巢,而此时老鹰正叼着猎物回巢。影片中的主角,或多或少就像画中的狩猎者。

戈雅是18世纪的一位宫廷画家,早期画风以巴洛克风格为主,其作品以《裸体的玛哈》最为知名。晚期他又发展出一种极富表现力又令人不安的风格,并公开指责战争的暴行、教会的道德堕落和社会政治的灾难,比如那幅著名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戈雅与诺兰的作品在精神层面是一致的。戈雅的黑色绘画系列是早期暗黑风的萌芽,那是他在去世前几年的创作,画作的色调偏黑和灰,主题阴郁,画中人带有鬼魅的表情,如同被魔鬼附身,令人不寒而栗。而到了近些年,诺兰通过《蝙蝠侠:黑暗骑士》等超级英雄电影将暗黑风发扬光大。故事阴暗,反派做主角,邪性又病态的宗教性和仪式感,将黑暗气质散发得足够入骨。在《盗梦空间》里也曾出现过一幅抽象画,诺兰偏爱的这种另类的审美风格在《信条》中又得到了充分释放。

3.4 《信条》中的时间隐喻

影片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影片开头和结尾都各有一个限时 10 分钟(ten minutes)的任务,而“tenet”这一单词也可视为首尾并合的两个“ten”。影片中出现了一个虚构机器——时空穿梭机,人们通过穿梭机,能在时空中来回往复,当两个时空的人相遇时,他们顺应着自己的时空,在彼此的眼里对方都是“逆时空”的,就像两条隔岸相悖的河流,也像“tenet”里一正一反的两个“ten”。这一独具小心思的设计,也暗合整部电影中所探讨的母题:命运是不断循环的,过去已定,未来不可变。同时本片也是诺兰导演的第十部电影。可以看出《信条》不仅在剧情上是未来与过去的交合,也是诺兰导演电影系统理念的一个闭合,是其未来和过去的交集之作。

3.5 《信条》的时空隐喻

《信条》剧情上其实并没有那么“烧脑”,只是整部电影跳脱的叙事方式,打乱了整个故事的叙事顺序,它既是线性的,又是非线性的。线性体现在故事是顺着拯救世界,解除危机这个时间脉络的,而时不时地穿越到过去,正、逆剧情相交织,打乱了观众的思绪,才使这部电影如此难懂。本片采用了双男主的视角,两位男主互相经历着彼此的过去。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①的循环闭合,如图 2 所示,当正向剧情与逆向剧情向汇集时,整部电影被推向高潮。

在电影中,红色代表正常时空。蓝色则代表逆向时空。逆着时空的人,其处于的时空规则也是相反的,比如男主在大火熊熊的车祸现场时,差点被冻死。又如开场华纳电影的标志是红色的,结尾处却是蓝色的。

影片中出现的祖父悖论,是法国科幻小说作家赫内·巴赫札维勒在 1943 年的小说《不小心的旅游者》中提出的。悖论情形是:假如你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把自己的祖父杀死,但此举动会产生一矛盾的情况:你回到过去杀了你年轻的祖父,祖父死了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不会有你,那么是谁杀了祖父呢?

全片用循环的因果论在解释这个悖论,一切已经发生的,将一定会发生,并且一定

^① 莫比乌斯环是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比乌斯(August Ferdinand Möbius)和约翰·李斯丁(Johhan Benedict Listing)在 1858 年独立发现的。莫比乌斯环是一种拓扑学结构,只有一个面(表面),和一个边界,一般象征着循环往复、永恒无限。

发生了。(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will happen, and will always have happened.)这正是电影讨论的核心,也是要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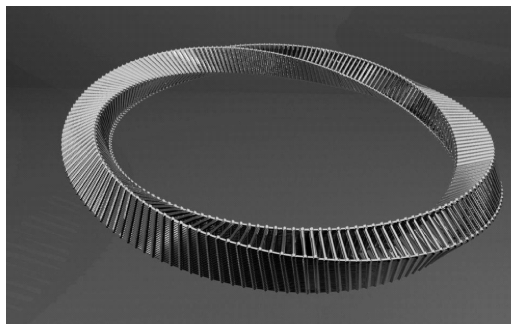


图2 莫比乌斯环

4. 结语

施叶丽(2016)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或是神经学家从各个领域证实了人类的思维是隐喻性的。隐喻的二大类,身体隐喻是人类以身体为参照,认识和描述世界,而非身体隐喻,如象征和意象,是人们借助自身的经验或经历来理解周围的世界,两者都通过类比或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来发现不同域之间的异同,以此达到表达情感和思想的目的。由此可见,人类所特有的这一生物特性,是隐喻产生的根源,这也说明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电影《信条》看似是激昂澎湃的科幻谍战片,其实却有着一个柔软的内核。男主一开始处于混沌状态,不得不听信于别人的“信条”,按组织的安排行事。但到头来,他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未来的自己安排的。从头到尾,他盲目相信的,一直是自己的“信条”,而尼尔也正是来自未来的“信条”继承人。在这个“信条”传递的过程中,他们互相拯救。

“信条”的真正内涵在于:抛去战争的外壳,它是女主对于被霸凌命运的刚烈反击;它是男主对女主跨时代的默默守护;也是尼尔逆转时空对男主的救赎。电影里每个人的“信条”都不一样,这也正连接和构成了电影中的整个闭合世界。

《信条》中的男主从头到尾都没有称呼,籍籍无名,而我们的现世安好正是由这些无名英雄创造的。《信条》是一部诺兰导演对于这些守护和平的使者——主角(protagonist)和他的队友们的致敬之作,这也是影片最深的“隐喻”。

参考文献:

- 曹祎娜,2020.《信条》够诺兰吗? [N]. 中国艺术报,09-09(04).
韩浩月,2020.《信条》让人思考什么内容才算电影的“故事”[N]. 中国青年报,09-08(09).
彭传钊,2020.《信条》您看懂了吗? [N]. 成都日报,09-16(07).

- 尚陵彬,2020. 关于时间的信条[N]. 宁夏日报,09-10(09).
- 施叶丽,2016. 论文学隐喻产生的根源[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3):58-61.
- 汪正龙,2016. 修辞、审美、文化:隐喻的多维透视[J]. 江汉论坛(9):90-95.
- 赵立功,2020. 看《信条》,我们在看什么[N]. 河南日报,09-11(19).
- 左亚男,2017. 自我价值的追寻: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中的古老力量与隐喻构成[J]. 当代电影(1):74-78.

作者简介:

钱建萍,女,1973年7月生,浙江绍兴人,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英语教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育、英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

多模态话语在西班牙语语法 教学中的应用:个案研究

王心悦



摘要:多模态话语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重要性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常常被忽略。本文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以2018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西班牙语组冠军、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师沈怡的比赛录像为研究对象,对录像中教师的多模态话语进行编码、描写、分类与分析,对其在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教师的大部分多模态话语会转移学生注意力;吸引注意和帮助理解是教师使用多模态话语的主要目的;教师计划外的多模态话语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个案研究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Spanish Grammar Teaching: A Case Study

WANG Xinyue

Abstract: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ut its significance is often ignored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aking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ncodes, describes,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Shen Yi, who is the champion of the multilingual teaching competition (group of Spanish teachers) in 2018 and Spanish teacher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s a pilot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Spanish grammar teaching,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most of the teacher's multimodal discourse will divert students' attention, that attracting attention and helping understanding are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use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and that the teacher's unplanned multimodal discourse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students.

Key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Spanish; grammar teaching; case study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不是人际交流的唯一媒介。除了使用口语和书面语传递信息外,多模态的交际手段如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副语言等,也对人类的交往和互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德禄(2009)将多模态话语定义为“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并将其划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大系统。相关学者如 Samovar et al. (1981)发现,在人们的直接交际活动中,35%的信息通过语言传送,而其他 65%的信息则依靠非语言手段。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课堂正是一个交际行为频繁发生的场所,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从教师的表情、手势、动作以及所使用的教具中,学生也能获取大量信息,感知教师的态度和意图。然而,侯巧红等(2015)对某高校日语、英语和德语精读课教师多模态话语使用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非语言模态的使用比例往往不到 1/4,尤其是课堂进入到词汇和语法讲解环节时,更是以教师用语言单向灌输为主要形式,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十分有限。和日常交流不同,在以语法翻译法为主要教学方法的精读课中,我们不能期望非语言模态在课堂中取代言语交际的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教师有意识地使用多模态的表达形式,或许可以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吸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认知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成效。

国内外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论述第二语言教学中多模态话语的表现和作用。但是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空缺:从研究方法看,理论性较强而实证性较弱,缺少对教师在具体课堂情景中多模态话语的分析;从涉及语言看,对以汉语为母语、西班牙语为第二语言的课堂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从具体课型看,主要是以会话、听力、写作等技能课为主,而对语法课这类以知识讲授为主要形式的课型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质性分析方法,以 2018 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西班牙语组冠军、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师沈怡的比赛录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录像中教师多模态话语的观察和分析,试图探索多模态话语在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的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具体形式、功能、使用情景和使用情况,希望以优秀教师为例,为国内高校西班牙语专业教学带来一点启发。

2. 文献综述

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语言学界产生了对比分析的外语教学研究方法。然而,对比分析在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为了弥补对比分析的不足,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以认知心理学和生成语法理论为基础的错误分析得到了关注。在具体的外语教学研究中,对比分析和错误分析常常被结合起来使用,以便更好地揭示学生在外语学习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但是,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和语言教学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心理学视角仅仅把课堂教学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途径与习得速度的一个影响因素,其研究对象是外语学习者,却忽略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鲜少关心课堂教学中教师传授知识的方法和过程。然而,只有把课堂教学置于师生之间人际交流的社会学框架内,我们才能回归到课堂教学的本质问题,即教师如何运用各种教学模式面对学生的提问和假设检验(Cherif et al., 1993)。

Halliday(1978)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系统,进而生成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Halliday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一个方面,但在语言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表意方式。Halliday的“语言是社会符号”这一论断及其三元功能理论为之后各领域的学者研究其他符号模态系统奠定了基础,因为既然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那么其他符号系统就和语言一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我们就有可能像研究语言一样研究其他模态的“语法”。可以说,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之上发展起来的。

真正将Halliday的理论应用于其他符号模态的研究始于O'Toole。O'Toole(1994)认为,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形式和语言一样可以实现意义,并将艺术展品传递的意义分为情态意义、表现意义和组篇意义,分别对应Halliday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随后,Kress和Van Leeuwen(1996)正式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这一概念,并发展了视觉语法。在Kress和Van Leeuwen看来,语法形式是对社会行为过程进行意义编码的资源,视觉符号同样符合Halliday所提出的三元功能理论。尽管受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批评,但是这两项研究都将看似不可分的图像拆解成可供进一步观察的视觉模态符号,从而方便了模态分析和理解的过程。

在外语课堂教学的多模态话语研究方面,Royce(2002)通过英语教学的多模态应用,研究了模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同性,并提出了“多模态教学方法论”。此外,Kress et al.(2005)探讨了英语课堂教学中与教师角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除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模态外,也涵盖了图像、手势、目光、移动和空间安排等多模态符号的使用。

国内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稍晚于国外,以李战子的研究为最先。李战子(2003)将“多模式”(即“多模态”)定义为“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综述了国外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视觉语法、功能语法的实现、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对课堂教学的现实意义。之后,胡壮麟(2007)形象地把“多模态”和“多媒体”归结为话语和技术的关系,将模态视为表达意义的资源,并分析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作为国内对多模态的早期研究,两位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做了周详的概念辨析和理论引进,但是仅点明了多模态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未有具体的建议和理论主张。

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研究的主要学者是张德禄。除了对多模态话语下了明确

的定义,张德禄(2009)还引入了国外学者对多模态话语分析所构建的由上至下五个层面的理论框架:文化层面、语境层面、意义层面、形式层面和媒体层面。其中,张德禄将媒体层面分为语言媒体和非语言媒体,语言媒体包括纯语言和伴语言两类,非语言媒体包括身体性和非身体性两类,每一次级范畴又有其具体的形式,如图1所示。张德禄对多模态话语媒体系统的区分扩大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为课堂教学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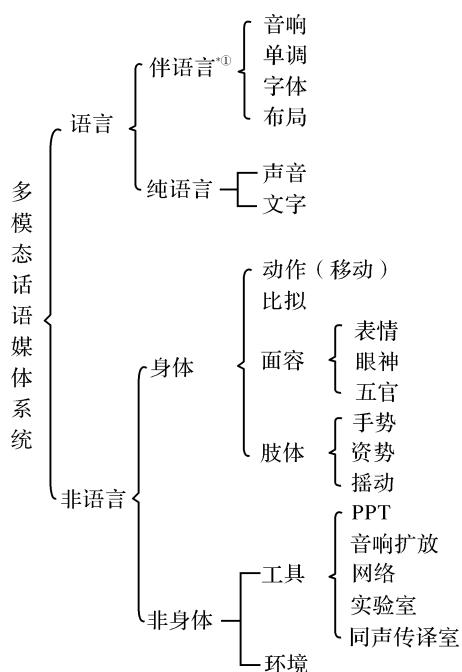


图1 多模态话语媒体系统(张德禄,2009)

3.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编码与描写

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以现场说课、现场讲课、专家提问三种形式展开。其中,现场讲课是对课堂的绝对模仿,教师不仅要在该环节中讲授教学内容,开展教学任务,而且要在没有学生的场景下模拟在课堂中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呈现真实的课堂行为。我们的研究仅选取现场讲课这一部分,该部分的录像时长约为8分35秒。教师使用西班牙语授课,在课堂中以幻灯片为主要教具,选择的教学内容为《现代西班牙语2》第7单元的语法“副动词和过去分词的区别”(董燕生等,2015),面向西班牙语专业一年级学生。教师将讲课分为课程导入、链接新旧知识、讲授新知识和课程总结四个模块。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对教师的多模态话语进行编码和描写,对于重复多次的多模态话语我们只做一次编码,但在描写中注明重复次数。限于篇幅,我们不讨论课堂中恒常的多模态话语,比如教师的衣着装扮、自始至终的微笑表情等。我们最终观察到24例

有意义的多模态话语,根据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重复多次的以初次出现为序),分别编码为 1—24,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编码与描写

| 编码 | 多模态话语图示 | 多模态话语描写 |
|----|---|--|
| 1 |  | 教师口误,在单词 resumiremos 的第一个音节失误后中断发音,紧接着重复了一遍该单词,同时伴有明显的摊手和低头动作,轻微摇头,笑容加深且音调降低 |
| 2 |  | 教师用言语描述分组任务的同时,侧身并张开左手臂指示幻灯片上的练习素材 |
| 3 |  | 教师离开讲台走到学生中,张开左手臂用邀请手势提问两名学生,在提问和评价学生时,伴有明显的音调升高 |
| 4 |  | 教师张开右手臂用邀请手势请一名学生在黑板上作答,同时从学生中回到讲台前 |
| 5 |  | 教师在黑板上手指学生的作答提示需要学生注意的地方,并伴有明显的音调升高 |
| 6 |  | 教师侧身目视幻灯片。该行为共重复 39 次,在 39 次侧身动作中,最长持续约 19 秒,最短仅持续不到 1 秒 |

续 表

| 编码 | 多模态话语图示 | 多模态话语描写 |
|----|---|---|
| 7 |  | 教师在衔接任务间的过渡句中双手交替做出翻转动作。该行为共重复 2 次,教师伴随 2 次动作所说的单词分别是 repasar 和 repetiremos |
| 8 |  | 教师张开左手臂指示幻灯片。该行为共重复 8 次 |
| 9 |  | 教师在讲解副动词的句法特点时,上下摇摆双手强调该句法特点即是副动词和过去分词的区别。该行为共重复 2 次,教师伴随 2 次动作所说的单词都是 diferenciar |
| 10 |  |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一名学生打断教师,教师随即暂停讲课看向该名同学,张开右手臂用邀请手势请该同学发言,并伴有明显的音调升高 |
| 11 |  | 教师在讲解过去分词的形态和句法上的两个特点时,手比数字 2 |
| 12 |  | 教师连续两次口误,第一次是将 estas dos(características)说成 estos dos 后立即改口,第二次是在单词 características 的第三个音节失误后中断发音,紧接着重复了一遍该单词。在第二次口误中同时伴有明显的低头动作,笑容加深且音调降低,第一次口误则没有 |
| 13 |  | 教师向前张开双臂并摊开双手。该行为共重复 9 次,教师伴随 9 次动作所说的单词和语句分别是 diferenciar, acción durativa, proceso, describe, pues bien, la acción, pues veis, ambos 和 por favor |

续表

| 编码 | 多模态话语图示 | 多模态话语描写 |
|----|---|---|
| 14 |  | 教师向前伸出左手臂指示学生书桌。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según nuestro libro de texto |
| 15 |  | 教师抬起左手臂并转动手腕做出翻转动作。该行为共重复2次,教师伴随2次动作所说的语句分别是¿os suenan estos dos términos? 和 continuéis pensando en este eterno problema de hoy; ¿gerundio o participio pasivo? |
| 16 |  | 教师从讲台一侧走到另一侧,后又回到原位,表演四处寻找东西的动作。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voy de un lado al otro buscando bebidas, 单词 buscando 伴有明显的音调升高 |
| 17 |  | 教师双手放在胸前,掌心向内。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单词是 nosotros |
| 18 |  | 教师向右侧张开手臂并轻微晃动数次。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al mismo tiempo |
| 19 |  | 教师向右侧张开手臂并在空中从左至右比画出数个点。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blablabla |
| 20 |  | 教师向前伸出右手臂并轻微晃动数次。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fijos, 并伴有明显的音调升高 |

续表

| 编码 | 多模态话语图示 | 多模态话语描写 |
|----|--|--|
| 21 |  | 教师抬起右手臂,手指聚拢并在空中从左至右画出一段曲线。该行为共重复2次,教师伴随2次动作所说的单词分别是 <i>escribáis</i> 和 <i>traduciéndola</i> |
| 22 |  | 教师双手举起一张白纸置于身前。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i>papel blanco</i> |
| 23 |  | 教师向前伸出左手臂指向学生,从左至右重复数次。教师伴随该动作所说的语句是 <i>os devuelvo a cada uno un papel</i> |
| 24 |  | 教师请学生判断纸上练习应当使用副动词还是过去分词,教师先后向讲台两侧移动,向学生说明讲台两侧分别表示对副动词或过去分词的选择,教师请学生离开座位做出选择 |

4.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分类与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从重复次数、功能和计划性三个角度对以上 24 例多模态话语进行分类,并对分类结果进行分析,提出我们的发现与思考。

4.1 按重复次数分类

我们将 24 例多模态话语根据重复次数进行分类,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重复次数及分类结果

| 重复次数 | 编 码 |
|------|---|
| 1 | 1,2,3,4,5,10,11,12,14,16,17,18,19,20,22,23,24 |
| 2—5 | 7,9,15,21 |
| 6—10 | 8,13 |
| >10 | 6 |

可以看到,教师的绝大部分多模态话语仅出现1次,而侧身目视幻灯片(编码6)、张开左手臂指示幻灯片(编码8)以及向前打开双臂并摊开双手(编码13)这三个动作是教师最常使用的多模态话语,在一节不到9分钟的示范课中重复了6次以上,其中侧身目视幻灯片更是达到了39次。

通过对教师多模态话语的描写,我们发现,仅出现1次的多模态话语往往是教师向学生提出任务和讲解知识时发生的,此时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师身上,并且不随着教师的多模态话语发生转移。而侧身目视幻灯片和张开左手臂指示幻灯片这两个行为,会使学生将注意力从教师转移到幻灯片上。

我们对幻灯片上呈现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在以幻灯片为主要教具的语法课堂中,幻灯片承载着绝大部分的新知识和练习。教师一方面需要切换幻灯片,另一方面需要带领学生阅读和学习幻灯片上的内容,因此教师与幻灯片有关的多模态话语数量众多,教师也通过一系列重复的多模态话语,不断推动着课程的进展。

4.2 按功能分类

作为优化教学效果采用的技巧,徐蓓蓓(2014)提出了非语言模态的五大功能:吸引注意、启发思考、调节气氛、调动积极性和获取反馈。但是我们发现,在第二语言的课堂中,如果使用目标语而非学生的母语授课,可能会出现学生没有听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多模态话语可以作为言语的补充,起到帮助学生理解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五大功能的基础上补充“帮助理解”这一功能,得到第二语言课堂中教师多模态话语的六大功能,并将我们编码的多模态话语进行分类,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功能及分类结果

| 功 能 | 编 码 |
|-------|--------------------------------|
| 吸引注意 | 2,5,6,8,14,20 |
| 启发思考 | 15,16 |
| 调节气氛 | 1,12 |
| 调动积极性 | 3,4,10 |
| 获取反馈 | / |
| 帮助理解 | 7,9,11,13,17,18,19,21,22,23,24 |

结合表2和表3,我们发现,教师为吸引学生注意共使用了51次多模态话语(含重复),为帮助学生理解共使用了22次多模态话语(含重复),吸引注意和帮助理解是教师使用多模态话语最主要的目的。

从吸引注意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不受其他条件干扰的理想课堂中,学生注意力的分布范围包括教师、同学、黑板、幻灯片和教材等。以课程导入阶段(编码1—5)为例,学生的注意起初在说话的教师身上,在教师描述任务时又将注意转移到教师指示的幻

幻灯片上,在同学回答问题时再转移到发言的同学身上,同学在黑板上作答后又将注意放到黑板上。在短时间内学生的注意力在不同对象上不断转移,这对学生听从教师的指令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教师通过站位、手势、音调变化等多模态话语可以帮助学生紧跟教师的节奏,从而提升听课效率。

从帮助理解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教师用目标语授课时,难免会出现学生没有听懂的情况,比如在教师的话语中, *resumir*、*diferenciar*、*durativo* 等单词学生可能还未学到。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由于同一个班级里学生的语言水平不一,二是由于教师使用的单词或语句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大部分学生的认知能力。对于这种情况,教师通过手势、音调变化、降低语速等多模态话语可以帮助学生把握话语中的关键信息,帮助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理解语句中的重点内容。比如在编码 13 中,教师用摊开双手的方式表现 *acción durativa* 的持续含义,和 *puntual* 形成对比,从而在不中断课堂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促进学生对本教学内容的吸收和掌握。

除此之外,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里不存在真实的学生,但是我们仍注意到教师使用了热情、有礼的身势和语气鼓励学生回答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多模态话语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和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获得学生的即时反馈。在语法课堂中,学生的反馈可以帮助教师评估学生对知识的领会情况,从而对接下来的课程进度和教学任务等方面做出调节。比如在编码 10 中,教师模拟学生提出对某例句使用副动词还是过去分词的疑问后,补充交代了句子主语对选择两种非谓语形式的影响。不过,也正是由于该示范课是一个虚拟的课堂环境,我们在录像中没有观察到教师留意学生的情绪变化后为获取反馈而使用的多模态话语,因此对于这一功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4.3 按计划性分类

在描写教师多模态话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师的有些行为是有意识的,而有些行为是计划外的,是下意识的举动。我们将 24 例多模态话语根据是否具有计划性进行分类,得到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计划性及分类结果

| 是否具有计划性 | 编 码 |
|---------|--|
| 是 | 2,3,4,5,6,7,8,9,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
| 否 | 1,10,12 |

从表 28.4 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绝大部分多模态话语具有计划性,只有极少数是下意识的行为。其中编码 10 是由于学生打断教师引起的,编码 1 和 12 是由于教师口误引起的。

在编码 10 中,学生打断教师提出问题,教师迅速中断讲课与学生发生目光交流,并用积极的手势邀请学生发言。由于教师预判到了学生的问题,因此在解答了学生的疑问后又顺利引出了新的知识点。对于此类由于学生行为引起的课堂变化,尤其是当学

生要求教师澄清或对教学内容进行提问时,教师应当采取鼓励的肢体语言和口吻回应学生。在备课中,教师也应当对课程的重难点有所准备,这样教师能够预判学生在听讲时可能存在的困难,并做出得体合理的应答。

在编码1和12中,尽管没有预料到口误的发生,但是教师迅速改口重复了口误的单词,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停顿,并用低头、微笑和降低音调的方式缓解尴尬,避免了对学生注意力的干扰。对于此类由于教师口误引起的课堂变化,教师也应当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口误有大有小,小的口误可能不会对课堂形成干扰,但是大的口误可能会使学生分心,甚至引发学生骚乱。口误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一门艺术,一方面教师应当避免口误的出现,另一方面口误有时也可以成为吸引学生注意的手段,如果教师能用幽默的语言和非语言模态化解口误,将学生的注意力重新聚集起来,也是教学智慧的体现。

5. 结论

本文以个案研究为方法,对多模态话语在西班牙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约8分35秒的课堂录像中,观察到教师有意义的多模态话语24例,共86次(含重复),平均每6秒就使用了一次多模态话语,在语法课堂中有非常高的频率。

在对24例多模态话语从重复次数、功能和计划性三个角度进行分类后,我们发现:(1)在以幻灯片为主要教具的语法课堂中,教师的大部分多模态话语与幻灯片有关,主要形式是侧身目视和指示幻灯片,其目的是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幻灯片上;(2)吸引注意和帮助理解是教师使用多模态话语的主要目的,教师有意识地通过指示、改变音调、调整站位、用手势比划与模仿等多模态话语以达到教学目的;(3)尽管教师有计划的多模态话语占据主导,但是教师也应当关注下意识的反应,如手势、语气、音调、笑容的变化,因为这些行为对调动学生积极性、吸引学生注意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个案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还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而对语言教学来说,本文对语法教学的实际效果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我们希望能够以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为例,为国内高校西班牙语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 董燕生,刘建,2015. 现代西班牙语:学生用书2[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05-123.
- 侯巧红,祖静,刘俊娟,2015. 浅析非言语交际行为与高校外语教学改革[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34(5):115-118.
- 胡壮麟,2007.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1):1-10.
- 李战子,2003.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5):1-8.
- 徐蓓蓓,2014. 非言语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D]. 扬州:扬州大学.

- 张德禄,2009.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6(1):24-30.
- CHERIF A H, ADAMS G E, 1993. The essence of teaching[J]. *Forward to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1(1): 5-7.
-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 KRESS G, LEEUWEN T V,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C].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 JEWITT C, BOURNE J, et al, 2005. *English in urban classrooms: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M]. London: Routledge and Farmer.
- O'TOOLE M, 1994.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M]. Cranbur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ROYCE T, 2002. Multimodality in the TESOL classroom: exploring visual-verbal synergy [J]. *TESOL Quarterly*, 36(2): 191-206.
- SAMOVAR L A, PORTER R E, JAIN N C, 1981.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California: Wadsworth.

作者简介:

王心悦,男,1996年7月生,上海人,文学学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对外西班牙语教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班牙语语言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 课程教改的路径^①

武 斌



摘 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专业生产面临新闻“泛社会”生产的挑战,以传统报业为核心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是赓续新闻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与时俱进,还是崇拜技术垄断而亦步亦趋? 本文认为,“新闻采访与写作”仍旧应坚持以报业文化为核心,恪守传承新闻学的基本原理,突出职业能力培养,贴近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推进教改,让学生学会新闻采写的方法,培养他们的新闻文化价值观,使之具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数字信息丛林中弘扬报人精神,精益求精,守本创新。

关键词:“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改;互联网;新闻文化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WU B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new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news “Pan social” production. Is the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course centered on the traditional newspaper industry to continu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news culture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or to worship the technological monopoly and follow suit? This paper holds that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should still adhere to the newspaper culture as the core, abide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heriting journalism, highlight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be close to the needs of applied talents, promote teaching reform, let students learn the methods of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and cultivate their news cultural values to make them hav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jungle,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reporting, keep improving, abide by this and innovate.

Keywords: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Curriculum reform; internet; News culture

^① 本文为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新闻采访与写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新闻采访与写作”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编号:ZX1918)的阶段性成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图配文的碎片化信息受到网民青睐,融合新闻成为新宠。“新闻采访与写作”课该教什么?该如何教?是承继报业文化,还是崇尚技术垄断?当今美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迈克尔·舒德森坚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仍然要通过新闻文化传承的那些最“古老”的采集与制作方式生产出来(舒德森,2018)。所谓“最古老的采集与制作方式”指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报界历经百余年实践探索形成并得到全球新闻界认可的新闻生产的专业主义范式,即客观、公正、准确、平衡等新闻规律。迈克尔·舒德森在提醒我们:“新闻采访与写作”在新媒体时代仍旧需要继承前互联网时代的报业文化精髓,精心组织,严格把关,报道真相,以优质新闻文化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是培养学生专业新闻素养的核心科目。当下,“泛社会”新闻生产对专业新闻生产形成了挑战,新闻失范现象冲击着新闻业的合法边界,“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不仅仅有益于培养未来的记者,而且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有利于优化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秩序,也为维持新闻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提供清朗的舆论环境。为此,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坚持以传统的报业文化为基础,与网络时代的媒介生态相调适,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着力培养职业素养好、动手能力强的新闻人才。

1. 活用教材:以职场的专业要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偏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教师宜选用应用型教材。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参考,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作为教学的导向,综合案例法、练习法、问答法、讨论法、讲授法等复合教学法,避免照本宣科、“满堂灌”的授课法。在教学中,教师根据媒体实践经验,着眼于贴近实战的操作要求,强化、突出实用技能方面的训练。在教学中,教师应多种手段并进,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如播放杨澜访谈录、央视新闻访谈节目,让学生通过记录提问问题、观察分析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了解采访的方法;将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的精彩片段制作成文字PPT,解析提问的难点。同时,可精选报纸和电视访谈节目资料,在课堂上组织学生阅读讨论,分析。随后,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内容为选题,采取抽签的办法,让学生在讲台上模拟采访,台下的学生作评委。规则是,交互提问,每人3分钟。这种模拟演练因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侧重于现场的即兴发挥,能够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受到欢迎。这个环节结束后,给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在课堂上练习将电视访谈节目改写成消息或人物特写,课后要求完成一次人物访谈。强化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最终运用自如。

在新闻实践中,采访的质量决定报道的质量。所以采访是记者职业生涯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职业技能。教师通过采取“案例讲授—案例分析—案例讨论—观摩—模仿—演练”等讲、学、练结合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新闻采写课程的第二个重点是消息的写作。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消息是所有媒体使用最多,占据首要地位的新闻体裁。一个受过新闻高等教育的学生如果不会写消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新闻教育的失

败。在消息写作环节的教学中,教师可采取“欣赏经典消息名作——阅读最新消息——分析讲解消息结构——将新闻材料改写成消息——采写消息”的教学流程,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了消息的写作技巧。“采访”和“消息写作”这两个部分是记者职业生涯的基础技能,应投入更多教学和演练的时间,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采用特稿改写消息的训练方式有助于学生通过对比熟悉这两种文体的异同,同时提高消息写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向学生推荐、提供课外学习相关资源。如今学生偏爱手机视觉阅读,比如抖音、西瓜视频、爱奇艺等,偏向于娱乐信息,不懂得把手机作为学习工具,不清楚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要从阅读优质新闻培养自己的感性知识,再逐步上升到理性知识。不少同学误以为只要把课本中的内容学好,有高分就满足了。其实,这门课程侧重于训练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离开了新闻案例犹如雾里看花,只凭借背诵和记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难以解决实践问题。经典新闻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能为初学者提供示范标本,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通过有意识的模仿学会自己做新闻。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就应该引导学生在手机微信上搜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微信公众号并关注,同时下载安装优质新闻客户端,如澎湃新闻、极目新闻、红星新闻等,利用碎片化时间培养阅读新闻的兴趣和习惯。教师还可以推荐学生通过电脑查阅中国记者协会网站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了解新闻精品的创作特点。凡此种种,有利于帮助学生熟悉不同介质的新闻作品,在对比中深化对各种媒介特点的把握,理解当下融合新闻的优势,为学生建立课程学习的指路明灯。鼓励学生参与校报、学院《博闻报》、学院《追风》杂志、学院网站、学院融合新闻工作室、微信公众号等锻炼“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工具理性的同时,教师还应以新闻经典案例和中外名著推荐阅读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价值理性,使之具备记者的主体意识,即信息意识、价值意识、受众意识、法治意识和审美意识,具备职业素养和人文情怀,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

2. 巧用网络:以丰富的线上新闻资源作为案例开展启发式教学

互联网在传播新闻的时效性和信息量的丰富性方面优势突出。在引导学生每天浏览网络新闻的同时,教师也要善于从互联网海量信息中打捞出适合教学的新鲜资料作教学案例,突出教学信息的新闻性和丰富性。在“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比较”这一节中,教师用了网上搜索到的张爱玲的小说《爱》与同题材的一篇特稿相比较,引导学生归纳出:文学语言的准确是艺术上的准确(艺术的夸张与含蓄)。新闻语言的准确是忠实于事实的准确(纪实)。在讲述“新闻语言的特点”这一节时,归纳要点:新闻语言是一种白描性的语言,这是它的主要特征。同时,用PPT展示了从网站上搜集的吴作人、范曾等画家的白描画,便于学生联想和领会“白描”的含义。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这一节内容比较枯燥,如果以空洞的大道理来灌输给学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教师可以利用网上记者蹲守现场抓拍引发争议的一组照片导入教学: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福建厦门

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学生看完照片后,进入讨论环节:你如何看待记者拍摄这组照片的行为?之后是网站上的4道选择题,主要探讨一个关键问题:当社会道德与记者的职业道德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学生完成上述练习后,教师提供了网友的正方和反方观点,提问学生表态赞成哪一方并说明理由。而后介绍专家观点。最后是一幅“路上小坑已被填平,行人出行方便的照片”,还呈现了“抓拍记者谈心路历程”的资料。教师从该事件引出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照片《饥饿的小女孩》,讲述了这幅照片背后的新闻故事。教师还可展示《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5天暗访拍摄的东莞市石碣镇华润超级广场附近一个抢劫团伙大白天抢劫的一组新闻照片。并告之学生,民警根据这些照片擒获了28名抢劫犯罪嫌疑人。通过生动丰富的画面和文字,在讨论、分析、问答和思考中强化了学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认识。

将网上丰富多彩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档,最后进行编辑,就建立了个人的教学素材库,随时可以为教学提供支持,及时利用便捷的网络资源来推进新闻教学改革。同时,教师还可以将手机作为教学平台,在课堂上让学生通过手机查阅新闻案例进行教学互动。在教学中,让学生手机查阅相关的名词、新闻、资料。教师课前将学习资料发给班委,群发给每一个同学,上课通过手机阅读、讨论和分析。学生可将作业、咨询的问题通过手机发给教师,及时互动反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在手机媒体时代,碎片化浅阅读正在侵蚀学生的时间和学习精力,为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人才,教师须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本人探讨的方法是,每堂课根据教学目标给学生布置练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笔头准备,然后进入提问环节,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效果显示,适度的压力催生学生的学习动力,符合OBE(目标成果导向)的教学理念。

3. 妙用评估:以平时与期末成绩相结合、侧重技能考核拉动教改

作为一门强调实践的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不应以死记硬背的期末成绩为评估目标。“考查学生对所谓采访写作知识的识记能力,让人感到非常痛苦”(刘冰,2017)^①。对于学生而言,分数是命根子,试卷直接牵引着学生平时的学习动机。常见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考试试卷是:①名词解释;②小问答题;③大问答题;④特稿改写消息。一般前三题占60分,均为教材中的内容,最后一题占40分,考查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这种试卷模式就是在向学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平时上课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前按照教师划定的重点突击背诵就可以过关。根据这样的导向,教师平时上课照本宣科念PPT,学生记笔记,完成四次作业即可,学生难以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掌握“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职业技能。因此,教改成败与教师如何出卷直接关联。笔者认为,教师改变学生成绩评估的对策是:不宜仅把期末以背诵教材为主的刻板模式作为全学期的唯一一次评估。而应该注重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动态考核,如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各占

50%。平时成绩通过对学生到勤率(10%)、课堂表现(10%)、消息写作(20%)、通讯写作(10%)进行严格考核,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动手能力。期末考试以突出应用能力考核为主,在期末试前,不划考试范围,仅仅介绍考试的重点和题型。试卷以应用题考查教学效果,不考教材中死记硬背的内容。

考勤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晴雨表。它能够折射出教师课堂组织管理和课堂教学的水平,也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一方面,教师课上得好,管理严,要求高,学生的到堂率自然高。另一方面,少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过分强调个性自由而漠视组织纪律,比较散漫,有的日日沉缅网络游戏,即使教师的课堂教学好,对学生放任不管,仍然会有学生迟到、早退或逃课。因此,在平时的考察中,将考勤作为一项评估,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意识。媒体的工作具有高效率、快节奏的特点,其管理具有半军事化的性质,记者的作风修养必须过硬,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严格要求其实正是在培养他们严谨踏实的学风,这有利于今后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课堂表现考查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如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等。

当下进入移动传播时代,学生痴迷于手机娱乐休闲,被大量的泡沫化、碎片化信息所淹没,沉浸于浅阅读,忽略了文字阅读与写作能力,这对于训练自己的新闻采访写作应用能力而言是无益的,教师应展开针对性的强化培训,要求学生坚持阅读传统媒体的文字新闻报道,借以提高他们的新闻赏析能力和应用能力。要求学生做报纸剪贴,对选择的新闻作品作简单评述,目的就是逼迫学生养成天天读电子报的好习惯,对优质新闻产生感性认识,有益于在个人的实践中模仿好新闻的结构写作专业规范的好作品。消息和特稿作业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评估手段,教师通过批改作业可以知晓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采取将学生原作品和教师修改后的作品以PPT对比展示的方法,用案例来说明道理,举一反三,这些习作是学生的,写的也是学生熟悉的人或熟悉的事,接近性强,学生会比较感兴趣。为了激励学生热爱新闻写作,教师还将学生的优秀习作为教学案例,在他们的名字前有意标注:记者某某报道,这样使学生有一种当记者的成就感。针对平时考核中个别学生出现的不良现象,教师在课堂讲评中趁热打铁,结合优秀记者敬业精神的故事,重温“记者的修养”这一章节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比,引导学生从一点一滴做起,培养认真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学习态度。

传统的案例教学法仅仅使用少量的正面案例,用以证明学科的原理,为理论作嫁衣。本人探索的新型案例教学法是:教学之初以一课一篇的阅读展开案例教学,通过思考、提问、讲解、模仿练习达到对新闻采写原理的感知;教学中程之后,导入一课一篇的反面案例,让学生通过分析、讨论、改写和教师剖析举一反三,深入掌握新闻写作的原理;教学后程,让学生通过对长篇特稿阅读、改写消息,使他们对两种不同新闻文体在对比中摸清其规律,最终形成自己的应用能力。教师通过半个学期的案例教学法之后,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方法,让每个学生模仿教师的教学风格开展案例教学,每人负责一节

内容,上台讲课 15 分钟,其间有讲解、有练习、有互动环节,这样可以激活课堂教学的氛围,让学生通过讲课练习提高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4. 善用资源:以名记者进课堂做讲座点燃学生的新闻理想

教师应密切关注新闻媒体,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与媒介保持接触,广交朋友,积累人脉。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适时邀请新闻界的一线记者(编辑)走进课堂,把鲜活的实践经验传播给学生,有益于培养学生对新闻业的兴趣和热爱,树立理想主义精神,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人或团体对某人某物、某一事情或某种观念的心理倾向即态度(认知、情感和和行为)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 W·巴克认为:“态度扎根于感情之中,所以可能变得很持久。虽遭非难,人们仍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心理倾向。增加的材料(即认知的深化)几乎不会改变人们的态度。”(李彬,2003)²⁴¹它说明,决定一种态度即心理倾向的关键因素在情感。笔者先后邀请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人李大同、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温州晚报副总编辑郑雪君等在中国记者节当天走进课堂,以教师访谈或嘉宾讲述的方式激发学生对新闻职业的理想主义精神。梅尔文·门彻说过:“记者生活于一个混乱、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然而,他们努力地通过进取心、机智、精力和智慧接近事实的真相,把他们的认识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和形式表达出来。”(门彻,2003)⁴¹通过名记者(编辑)的讲述,揭示出成功记者的秘诀:对新闻事业的满腔热情、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职业操守与人文关怀精神,这些对怀有记者理想的莘莘学子坚定信念、热爱新闻专业、培养新闻素养和做人的道德情操等都有启发。

教科书中谈及采访的技巧有:采访前要查阅资料,写好采访提纲。笔者在对李大同进行访谈前,刻意购买了他的一本书仔细阅读,撰写了总计 30 多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在对话过程中流畅顺利,这就向学生形象地展示了教科书中的抽象理论。作为记者(新闻主持人),设计的第一个问题非常关键,也许决定了整个访谈的成败。通常的技巧是,问题要小而具体、要轻松、要容易回答,要赢得受访者的好感和信任,要让受访者情绪放松……总之,提问的第一句话原则上要为整个访谈营造轻松良好的氛围。还有,提问宜简洁;提问宜间接;提问宜具体;善于从倾听对方谈话中提出即兴式的问题;善于观察采访对象和采访环境;要有适当的体态语;记者本人要放松;要合理运用开放式提问和闭合式提问;提问者本人少说,让采访对象多说;一次最好提问一个问题……如何在采访中将技巧融会贯通,运用之妙?采用教师与嘉宾的访谈式讲座可以自然而然地、综合地应用上述技巧,有助于学生通过面对面的观摩和参与,从感性到理性地理解采访的原则和技巧。假如学生在访谈现场是个有心人,就会发现教科书中所讲的“倾听”对于采访的助益,即在倾听中“追问”或“补问”即兴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赖提前准备的采访提纲。往往即兴式的问题是最生动的。假如学生在访谈现场是个有心人,就会发现教科书中所讲的“倾听”对于采访的助益,即在倾听中“追问”或“补问”即兴式的问题,不

能简单地依赖提前准备的采访提纲。往往即兴式的问题是最生动的。访谈者还可以直接对嘉宾的观点故事进行总结评论,对其言语中蕴含的新闻原理进行点评,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增强感染力,比如郑雪君谈及自己初当记者就因为勤奋和热心,结识了很多人,建立了自己的新闻来源渠道。她讲完这个故事后,笔者就即时点评:记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要结交很多的朋友,这样才有充足的新闻来源。此外,在做这次访谈前,笔者特意在着装上做了准备。新闻采访是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的融合,记者的仪表和服饰是非言语交流和沟通的符号,成功的采访应留心仪表和着装,体现对被采访者的尊重和敬意,展示个人的风格和内涵,良好的仪容和得体的着装有助于采访的成功。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新闻教育是“有学养的职业”(阎立峰,2009)。实践经验的积累是提升职业能力的途径。以访谈温州晚报副总编辑郑雪君为例,学生贴出的讲座海报中,广告语的排列格式不够规范,将“如何做一名成功的记者”讲座主题写成了两行,在断句上从“成功”断开,第二行从“的”字开头,这是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在悬挂的两条长幅中,都将郑雪君的职务“副总编”误写成“副主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访谈开始前,学生借了两只录音笔,但访谈结束后却得知,因学生不会使用设备,没有录音。还好,有细心的学生准备了DV在现场拍摄并录音,遗憾的是,因准备不足,电池电量不够,最后10多分钟的访谈没有录像和同期声。这是两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在记者采访中,采访前的准备非常重要,事关采访的成败。活生生的案例不仅对当事人,对所有学生都有警示价值。笔者在整理学生抄录的文字时,总共花费了17个小时之多,才将其变为通畅的文字稿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学生知识素养的不足,有不够细心的问题,也有听力水平不好的客观原因。访谈的过程和幕后的故事为教学提供了直观全面的演示和形象生动的案例。它还启迪新闻学专业学生,面对当下的舆论传播生态环境,掌握专业的新闻素养仍旧是有价值的,“虽然我们拥有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现代世界仍是难以描述的。”(舒德森,2011)²

5. 借力评奖:以参加大学生新闻作品大赛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

“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新闻职业素养,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得到社会的承认才算有真才实学,有真功夫。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面向社会塑造有职业素养的大学生,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利用校内媒体和网络自媒体作为练手的平台,寒暑假里利用好所在地的社会媒体练习自己的实践技能,在体验中积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经验和方法。同时,教师还应该指导学生参与多所大学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新闻节作品评奖,以此激励学生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动力,大多数学生完成四年本科的学习后要走向社会,如果具备了过硬的职业能力,有能够证明自身技能的获奖证书,那就有助于学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把学习目标和就业能力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对提高学校的办

学声誉、树立品牌形象有正面意义。比赛规则也是根据当下新闻话语的特点制定的,参加比赛有助于学生及时把握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新潮流,是对新闻界的亲密接触,有助于课堂教学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近年来,笔者担当了学生参加大学生记者节新闻短视频制作的指导教师,通过对学生新闻采制过程的引导,也发现了在教学中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有的学生执行力不足,本来已经策划好的短视频新闻采访无疾而终,学生在就要出发的前夕突然就打了退堂鼓;有的缺乏新闻采访的突破能力,到了现场后碰到困难不知道如何应对,不懂得随机应变,致使采访半途而废;有的对新闻价值理解不透彻,在采访制作中不懂得如何取舍,眉毛胡子一把抓,有时捡了芝麻漏了西瓜;有的不懂得如何提炼新闻主题,导致新闻立意失焦,新闻作品的意义黯然失色;有的忽略了在新闻中交代新闻背景,使得新闻故事因果关系不清晰,新闻主题被削弱,令受众不明所以……这些问题平时通过批改作业也有发现,但毕竟作业中出现的问题是纸上谈兵,学生没有深刻的感悟,意识不到存在的不足,也难以自主纠正失误。而在采制评奖视频的过程中,若是个人的新闻素养不足,已经获得的素材中有缺失纠正的成本较高,有的损失几乎无法弥补,没有第二次补充采访的机会,最终在评委的严格要求下丧失机会,这就给了参与生产制作的学生深刻的教训,促使他们在痛定思痛中反思理论知识学习的价值,主动查漏补缺,提高了对课程的认知水平。教师也可以将这些鲜活的事实作为教学案例,启迪后继者从中获得理性的认知,同时,教师还可以从中找到课程教学中的薄弱点,亡羊补牢,引导学生从知识传递走向问题探索,通过“重新语境化”推进教改。“重新语境化是指‘一个人从习以为常走向质疑与探究’,从机械接受走向主动重构,显现出基于本土生活体验的专业课程学习自我感。重新语境化也就意味着知识符号的生活情境化与理解个性化。借助重新语境化,师生实现语境转换基础上的新闻学知识重新编码和再媒介化。”(陈尚达,2015)从参赛选手的短视频采制、文字作品采写的纠错与修改,师生都认识到了“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意义:不管从事何种介质的新闻生产,借鉴经典作品,练就过硬的采访与写作的技能都是不可或缺的。

6. 结语

麦克卢汉曾指出,“旧技术成为创造新技术的认知框架,所以,一种新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旧媒介。”(洛根,2012)⁵¹这句话启示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不要因陷入技术崇拜而迷失了方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采访写作课程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它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当下对于专业新闻工作者和草根记者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事实真相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为此,教师应始终以优质的新闻传统文化为本,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探索教学改革,打造金课。以 OBE 的教学理念贯彻于课堂教学,倡导学生阅读优质新闻和中外经典名著,采用复合教学手段,精讲多练、每课一练,强化模拟采访和写作训练,始终围绕“采访实、文笔好”为中心,兼

顾新媒体时代的融合新闻特色,使学生从感性和理性上增加对“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理解与行动力,提高新闻素养;请名记者走进课堂带来一线新闻生产的经验和感悟,以活生生的实例启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利用新媒体技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新闻采写教学;将课堂教学与校内校外的实习实训相结合,通过参加新闻采写制作比赛等方式增强对新闻采写课程的感性与理性认知。总之,“新闻采访与写作”要以培养学生的新闻素养和采写应用能力为中心。笔者认为,新闻采写课程就是迈克尔·舒德森口中的“新闻文化传统的脚手架”(舒德森,2011),教师的价值在于搭建这样的脚手架,帮助学生攀登上升,练就新闻职业素养和技能,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 常江,何仁亿,2018.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历史、常识祛魅与非中心化[J]. 新闻界(1):12-17.
- 陈尚达,2015.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与探索[J]. 皖西学院学报,31(4):127-131.
- 李彬,2003. 传播学引论[M]. 增补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241.
- 刘冰,2017. 新闻实务训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前言 1.
- 洛根,2012.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51.
- 门彻,2003. 新闻报道与写作[M]. 展江,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41.
- 舒德森,2011. 新闻的力量[M]. 刘艺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3.
- 阎立峰,2009. 新闻学教育应注重博雅通识[N]. 光明日报,04-01(11).

作者简介:

武斌,男,1965年2月生,江苏南京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教授、主任记者,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实务、传媒教育。